

杭大人出版社

杭大軼事

第四集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四集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四集

杭大轶事

（第四集）

温时幸 主编

杭大人出版社

2023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四集

图书编目数据

杭大轶事（第四集）/温时幸编。——美国西雅图：杭大人出版社，2023.9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1）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1-970152-41-8

I. 杭大轶事 II. 温时幸 III.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IV. 杭州大学——回忆录

杭大轶事

（第四集）

温时幸 主编

封面设计：吴延风

封面题词：任 平

封三题诗：施建基

封底印章：任 平

出版发行：杭大人出版社（Hangdaren Press）

地 址：2303 N 147th Street Unit B, Shoreline, WA 98133

网 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

电子信箱：shixingwen@yahoo.com

出版日期：2023年9月10日

本书网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hdys4.pdf>

开 本：小16K

字 数：28万3千余字

定 价：免费阅读

国际书号：ISBN 978-1-970152-41-8

【杭大轶事】

第四集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毛宝钺（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伊建新（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郑良根（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温时幸（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四集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序

张美凤和史晋川向我推荐由杭大人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杭州大学回忆丛书》，目前已经出版的有《杭大轶事》和《杭大诗词》。细细阅读了这两部新作，我被文中的内容吸引住了，感动了，也说几句。

首先，我被同学们对母校杭州大学的深情怀念打动了。作者编者大多是 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那几年的大学生。大约四十年了，同学们对当年的青春生活记忆犹新，朴实无华，真情流露，感人肺腑，逾久弥香。实际上，那个时候各方面还在恢复和发展当中，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同学们在回忆文章和诗词里，记录了那个时候的求学经历；在相对简单的生活里，体现了勤奋、乐观、胸怀大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精神，不只是一个大学生要有的，也是人生必须有的。

其次，同学们的诗文回忆，也反映了历史的痕迹。很多同学都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严峻考验：高等教育遭受破坏，同学们面临青春荒芜的危险。高中阶段的同学，失去高考机会，当兵当工人，上山下乡当农民；年龄稍小一点的，可能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就实际上失去了读书学习的机会。幸好等来了重启高考，恢复了大学教育。你们被时代耽误过，而最后还是成了时代的幸运儿。有这些复杂和艰苦的经历，你们人生目标特别明确，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被教授们称为“空前绝后”的一代优秀学子。大多数成为改革开放新时代最倚重的人才，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各界发展的中坚力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注意到，《杭大轶事》也梳理了杭州大学的源流，对于“求是育英”这个校训的来源和意义都有诠释。这些，对于人们了解杭州大学曾经有过的历史渊源、发展轨迹、和办学成果等，都是有意义的。杭州大学在 1958 成立挂牌，通过浙江师范学院

承继了求是育英的百年滋养，至 1998 年四校合并，经历了整整四十年，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杭大诗词》给了我一个惊喜。没想到同学们不只是学业各界的优秀人才，也很有才情和诗意，也是诗人词人。正如一句“时髦”的话说的，人生不止要学习和工作，还要有诗和远方。读同学们的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尤其咏西溪，咏校园，每每把我也带回到自己过去的青春岁月。

我自己也是一辈子的杭大人。我从 1952 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杭州大学工作。经历了从浙师院到杭大的全过程，经历了杭大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停顿，经历了高考恢复以后杭大重新焕发青春的岁月，直至 1992 年离任，也是整整四十年。同学们说，“火红的青春年代”跟母校杭大紧紧联系在一起；我的青春，也是跟杭州大学连在一起的。

如今，我虽然已至耄耋之年，同学们对杭大的缅怀，对杭大的歌咏，我读来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因此，乐为之序。



原杭州大学校长
2019 年 1 月 15 日

《杭大轶事》 第一版（集） 前言

才忆校园书声朗，不觉两鬓竞成霜。我们逝去的青春呢？

路上车马今胜昔，花前楼馆似而非。我们杭州大学的校门呢？

自 1958 年杭州大学正式挂牌，我们的母校像杭州西湖一样，一直是一颗全国闪亮的明珠。它文脉久远，历经曲折。到 1978 年，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年内两届特别的新生到来，杭大开始焕发第二春。先是省内唯一的重点大学，继而跻身全国 211 名校，一直名列省级大学的前茅。

我们杭大人曾经是幸运的，自豪的。我们等来了邓公力挽狂澜，为我们重新打开大学校门。从此，一代人甚至几代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开启一个崭新的阶段。进入杭大也成为我们人生的一大荣耀。

然而，时至 1998 年 9 月，因高校合并，杭州大学被摘了牌子，变成西溪校区。从此，我们的杭州大学和我们的青春一样，只留在回忆里。我们杭大人何等遗憾！有人说，假如地处杭州的这所综合型大学发展至今，那将是何等格局！我们知道，历史没有假如。我们也无意去评说这场高校合并的是非功过。我们只是回顾我们的青春。

承百年渊源，杭州大学经历了四十年。我们这些杭大人，较早的从 1978 年入校算起，至今也是四十年。四十年啊！人生有几个四十年！历史一瞬间，人生已大半，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半！每当我们想起自己逝去的青春，就想起我们已经消失的母校。因为，母校就是我们的青春。

四十年过去，杭大人数以万计。如今，很多人已经是学界名人，商界大款，政界精英，或者桃李满天下的默默园丁，还有社会各界难以计数的名流名媛。或不倦深耕于家乡本土，或游刃有余于全国各地，或开枝散叶于五洲四海。不论身在何处，无分贫富贵贱，母校杭州大学，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杭大人”微信群是这个共同的精神家园里一个非常活跃的花坛。这里，人气旺、地域广、阅历深、感受强、主题明、才艺多。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不分先进后学，我们共同拥有曾经的杭大。这个纽带凝聚着杭大人一起缅怀青春岁月，抒发杭大人的情怀。

“杭大人”微信群成了最活跃的杭大校友联谊会。建群一年来，日日高楼，昼夜无歇，散文佳作，诗词歌赋，书法画作等等接踵而至，精彩纷呈，目不暇给。有感于此，“杭大人”微信群发起人温时幸、金友元等，秉建群之初心，提议编辑出版《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将各位学友的名篇佳作汇编成册，既是记录我们的青春，也是对母校杭州大学的缅怀；既便于校友相互学习交流，亦或可流传于世！

本册《杭大轶事》即为丛书之一，是“杭大人”微信群校友们抒情忆旧的散文佳作选编。入选的文章内容、篇幅不拘，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巨制，也有短短的三言两语。凡校友回忆杭大旧事，兼收并蓄。“轶事”虽非正史，却是校友们真实的经历，有感而发，真情流露，读来饶有趣味，也充满了历史的痕迹。

比如高考，是在那个青春荒芜、怀才不遇的痛苦之后转折的关口，自然是充满着惊喜、奋斗、角逐、继而有所期待的焦虑和入榜的喜悦；

比如入校和学习，因人生开启了新的阶段，既充满了新鲜，更多是奋发立志，和刻苦求索；

比如生活、同学和校园，则在字里行间浸润着对当年青春的赞美，温馨校园里美好的回忆和对同学间友谊的怀念，也偶尔透露了年少时期的某些谬误，记录着成长的足迹；

比如师长，除了尊敬、缅怀和感恩，也往往记录着自己学业和事业的发展轨迹。

最后一部分荟萃，综合涉及多个方面。尤其推重其中有关杭州大学校史和学术成就地位的几篇重头资料，相信有助于读者对于母校的来龙去脉有个更全面的了解，以期求是育英，精神永存！

谈笑间，四十年。这样的抒情忆旧就不只是停留于过去的岁月，而是基于这些鲜活的回忆，透露着人生几十年之后的回望和

对过去的审视，亦或夹杂着理性的剖析。回忆就不仅仅是回忆，而是充满着对人生青春美好的赞扬，对人生道路真谛的思考，因而也可能作为对未来人的警示，启迪和参考。如此，则幸甚。

《杭大轶事》编委会
郑良根执笔
2018年12月19日

《杭大轶事》第二集出版说明

《杭大轶事》第一版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即“杭大人”微信群成立一周年之际，正式出版。问世后，《杭大轶事》先后被多所美国名牌大学图书馆收藏，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此外，我还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电子邮件：

“我在几天前推荐了这本书。然而，我们的图书收购馆员需要一段时间来弄清楚如何处理中文电子书捐赠，因为你们的这本电子书是我们想要收藏的第一本中文电子书。

我今天刚刚听说，他们将先在图书编目里添加链接，到时把这本电子书添加到开放存取（即，open access，免费阅读）电子书馆藏，以便今后在国会图书馆网上提供在线阅读服务。”

如今，读者可以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下面这个链接，免费下载那本电子书：<https://www.loc.gov/item/2018372764/>

当初策划出版《杭大轶事》一书时，曾设想每年出一个增订版。那样的话，所有的回忆文章都会收录在最新的增订版中。后来在创办《杭大人》月刊时，也特地设立了“杭大轶事”栏目，为以后出版《杭大轶事》增订版提供素材。

然而，随着《杭大人》月刊收录的“杭大轶事”文章逐年增多，显而易见，按照原来的设想，《杭大轶事》一书会变得越来厚，长达几万页，甚至几十万页！那么厚的书，除了历史学家，其他人恐怕都会望而却步。而我们出版《杭大轶事》电子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广为传播，让人们记得曾经有过一所辉煌的杭州大学。

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决定修改原定计划。每年或每两年出版一集新的《杭大轶事》，视稿件情况而定。

自《杭大轶事》第一版问世以来，至今已有 4 年。是时候出版《杭大轶事》第二集了。

《杭大轶事》第二集的稿件，均选自《杭大人》月刊 2019 年的 1 月号至 12 月号，共 12 期。依照第一版，分 8 个章节：高考、入校、学习、生活、师长、同学、校园、荟萃。第二集收录了 52 位校友的 92 篇回忆作品。

编辑对选自《杭大人》月刊的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和修改。

在此出版之际，谨代表杭大人出版社，衷心地感谢《杭大人》月刊的各位编辑积极收集有关杭州大学的稿件！衷心地感谢各位杭大校友回忆有关杭大的亲身经历！

温时幸

2023 年 3 月 15 日

《杭大轶事》第三集出版说明

《杭大轶事》第三集的稿件，均选自《杭大人》月刊 2020 年的 1 月号至 12 月号，共 12 期。依照前 2 集，分 8 个章节：高考、入校、学习、生活、师长、同学、校园、荟萃。

第三集收录了 47 位校友的 57 篇回忆作品，共计 25 万 6 千余字。

编辑对选自《杭大人》月刊的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和修改。

在此出版之际，谨代表杭大人出版社，衷心地感谢《杭大人》月刊的各位编辑积极收集有关杭州大学的稿件！衷心地感谢各位杭大校友回忆有关杭大的亲身经历！

温时幸

2023 年 6 月 1 日

《杭大轶事》第四集出版说明

《杭大轶事》第四集的稿件，均选自《杭大人》月刊 2021 年的 1 月号至 12 月号，共 12 期。依照前 3 集，分 8 个章节：高考、入校、学习、生活、师长、同学、校园、荟萃。

第四集收录了 63 位校友的 73 篇回忆作品，共计 28 万 3 千余字。

编辑对选自《杭大人》月刊的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和修改。

在此出版之际，谨代表杭大人出版社，衷心地感谢《杭大人》月刊的各位编辑积极收集有关杭州大学的稿件！衷心地感谢各位杭大校友回忆有关杭大的亲身经历！

温时幸

2023 年 9 月 1 日

目录

作者	标题	页码
薛艳庄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序	i
郑良根	《杭大轶事》第一版（集）前言	iii
温时幸	《杭大轶事》第二集出版说明	vi
温时幸	《杭大轶事》第三集出版说明	viii
温时幸	《杭大轶事》第四集出版说明	ix

第一章：高考

孙嘉萍	我的《路》——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3
吴国雄	杭州大学，我来了	5
高知贤	一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曲折的高考经历	7
王自亮	当海洋打开所有的道路	11
戚志红	辗转曲折的化学梦	14

第二章：入校

潘晓东	走进杭大	19
-----	------	----

第三章：学习

裴晓敏	军用接收机	37
赵建中	我的古典音乐之缘	38

第四章：生活

吴磊	我们至今还记得那次校园雪仗	43
张德强	诗情燃烧的岁月——扬帆诗社往事点滴	45
吴宗兴	差一点到口的美食	54
岳耀勇	那些年，那些关于鲁迅、关于演戏的记忆	55
赵红	校园，青春，歌声	62

第五章：师长

罗卫东	我的老师和师傅谢瑞淡先生	73
田 伟	清明寄思 怀吴熊和师	76
王元骧	我的学术自传——人生路，风雨兼程	79
蒋 遂	吴熊和先生	101
林 怡	由抄写油印本《怀任斋诗词》怀蒋礼鸿先生	103
谢庭藩	他们彻底改变了我这个农村放牛娃的命运	116
陈才宇	罗伯特·杰斯基	128
卢敦基	姜亮夫先生人生品格之我见	132
张涌泉	姜亮夫先生的胸怀和做学问的方法	139
林家骊	姜亮夫先生楚辞学的贡献与地位	142
陈 野	写在导师姜先生诞辰 115 周年之际	147
应守岩	缅怀恩师吴熊和教授	154
陆 坚	爱生如子慈母心 —— 追念盛静霞先生	159
沈一兵	我的老师白正国	164
潜问根	难忘名师指点——怀念陈企霞老师	168
张涌泉	难忘导师情——怀念业师郭在贻先生	174
楼含松	清风留古道 春雨忆初阳——怀念朔方师	184
张梦新	令人终身受益的一课 ——忆蒋礼鸿先生	192
陈欣文	汪飞白先生印象	201
陆道先	在夏瞿禅承焘先生身边的岁月	202
陆道先	云从先生二三事	209
张广星	吴熊和教授的这四年	212
任 平	夏承焘：词学冠今 书艺清雅	218
蒋礼鸿	任铭善先生	221
任继昉	云中鸿鹄自高洁——云从师与《汉语语源学》	223
胡 利	纪念恩师戚文彬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杂忆	229
盛静霞	含泪写金婚	232
盛静霞	忆云续录	251

蒋 遂	青鸟不传云外信，白沙如今是蓬莱	260
钱茂伟	缅怀仓修良先生	263
叶建华	从论文批注看仓修良对研究生的培养	277
张金山	师恩绵长 博大昭明——怀念恩师杨招棣先生	290
薛家柱	一位学者型领导——纪念杨招棣先生	292
吴战垒	夏承焘先生说词	298
陆 坚	春风时雨活水流 ——追念夏承焘先生	302
王尚文	西子湖头忆恩师——忆夏承焘先生	313
沈洪保	缅怀夏承焘老师	319
顾志兴	夏承焘先生给我们讲宋词	322
黄金贵	难忘蒋礼鸿先生的言教身教	326
陈欣文	朱良璧：杭大史上最牛讲师	332

第六章：同学

赵 红	同学叶航	339
邓梅妮	忆陈建平同学	344
李 娜	刘军，很高兴在杭大遇见你	347

第七章：校园

褚建君	忆杭大生物系	353
林珍珍	我记忆中的杭大河南宿舍	357

第八章：荟萃

朱 瑾	杭大 1990，离歌 1990	363
谢作涵	杭大，我的家	379
许高渝	特殊的年代 永恒的情谊	382
吕建明	那个时代我们这样交流	388
慎海雄	祝贺中文系建立 100 周年	391
洪定国	难忘西溪——半个世纪的记忆片断	392

周亚平	参加物理学系 90 周年庆典感怀	398
裘一琳	“俗家弟子”的杭大情结	401
戚平岨	岁月无题	405
毛五星	半世纪后温旧梦	418
金培	我的杭大记忆	422
叶子南	风雨杭大路	427
岳耀勇	一张老照片里的大学记忆	431
岳耀勇	找到回家的路	437

第一章：高考

我的《路》

——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孙嘉萍

纪念中国恢复高考四十年，我有机会重读自己的高考作文《路》。除了为那些极左色彩哑然失笑，我对自己临场所表现的思路清晰很感意外，尤其是文中对话。其时我二十一岁，下乡务农近三年，经过杭州地区初试后，参加浙江省复试。《路》中所写均为真实感受。唯一说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当时紧张得腾云驾雾，连题目都没看清便已下笔，幸好没有离题。文中起承转合的那句「田间小路，崎岖山路——两条小路，一个目标」并非我原文所有，应该是为使范文完美，编者所加。

记忆中，我的高考数学考得一塌糊涂。地理把一张浙江省地图当成美国地图来填，还将钱塘江误为密西西比河。出考场听人在议论，我想：完了，地理卷也没戏了。考完我便快快返回知青点，因为赴考暴露了我「不安心扎根农村」，之后的日子肯定更难过。填志愿时我毫无把握，但也不免跃跃欲试。我填了北大图书馆系，复旦新闻系，杭大中文系，好像还填了黑龙江商学院和服从分配，我当时一心只想“跳农门”。

至于，何时和怎样收到杭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我都是得其彷彿，想不真切。只记得我返杭搭乘的是一辆送新知青下乡的客车。新老知青及其家长都神情复杂地目送我上车。那一刻，比之侥幸和骄傲，更占据我心的是沉重：他们还要在此呆多久？我们公社共有四百多名下乡和回乡知青，那次只考上三个，我是其中唯一的文科生。

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给予我的则是人生尤其是写作的信心。我体会写作就是要我手写我口。下乡经历和农村社会的错综复杂，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用笔战斗」的愿望。我是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离开杭嘉湖平原，沪杭线上，那个现在叫星桥乡，当时叫星桥公社的地方。我既感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涯，使我明白中国农民之艰辛，改变中国之要务是农村，也想尽快摆脱仍有不少阴暗面的农村社会。我深深同情弱势农民的无助，很想用笔反映他们的现状。

入学后，我没少逃课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可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七七级冒出不少小说家，自己的作家梦却始终没做成。

记得录取后回中学母校杭州学军中学，遇上后来的中文系七七级同学陈志锋，他当时是该校的教师。他提起自己的《路》引用了屈原的《离骚》，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很是自卑，文学根柢到底薄弱。幸亏大学教育很让人感恩：尽管集中了十一年的考生，但中文系七七级把我们结集在同一起跑线，重新出发。

大约一九七八年暮春，我收到《浙江教育》的两本刊物和平生第一笔稿费二十元。不敢相信，我一个被中学语文老师老是批评为文风不正的学生，竟然在慌不择路的高考作文中脱颖而出。感谢最初发现我的阅卷老师。我的评阅老师是吕漠野教授。入学后，我一直未敢和吕先生「相认」，即使他来给我们七七级上课。直到毕业，才由金一平同学陪我去拜访吕教授。先生依然微笑，淡然，寡言。我们不安地立谈几分钟就离去。后来我在香港的小学《中国语文》课本中，偶然发现收入了吕先生写于抗战的诗歌《燕子》。可惜我没能保留住那个课本。

四十年过去了，当年文学创作愿望那么强烈的我，也没能写出小说，连象样的随笔都欠奉，但我一直难忘初衷。我感谢在我并不丰盛的人生中，上天赐予我文字表达的权利和能力。我知足了。

我移居香港后，在《大公报》任职副刊编辑，庶几圆了我的复旦新闻梦。在常感功力不足的同时，仍是极大地得益于杭大中文系的各项基础训练。尤其是像语感，句子分析，古汉语，文艺学，包括多重人物性格分析，虽然分析到最后，连自己也因瞻前顾后变得犹豫软弱，但我依然非常享受杭大的校风、学风和文风。在我担任副刊编辑期间，有幸亲手刊发了不少七七级同窗的文章。

我发现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文字风格：平实，温婉，清爽，始知中文系给予我们的滋养是一生的。

而我和七七级同学的情义，如男同学所言：“考上做同学，成了一辈子的记忆。”

（2017年夏，于香港）

杭州大学，我来了

—杭州大学化学系77级 吴国雄

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常听到大人们说：“这小孩，挺聪明。”因为年幼不懂事，听到大人们的夸赞，就心高气傲。每当有人问我，长大了打算干什么，我就会顺口说，长大了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老师。其实，那时候我连科学家、工程师究竟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和老师一样都是很有知识的。可以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懵懵懂懂有了一个上大学的梦想。

1963年，我初中毕业了。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再加上我家人口多，有兄弟姐妹7个，却只有父亲一人工作，家庭困难是不难想象的。我是长子，父亲就在供销社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让我去上班。那一年镇海县只招收了4个高中班：镇海中学2个班，柴桥中学2个班。那时我已经收到了柴桥中学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因为我家住在柴桥镇）。当父亲让我上班工作时，我对父亲说，我还想读书。最后，父亲无奈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上了高中。一晃，高中三年过去了。1966年夏天，高中毕业考试已经结束，再有12天就要高考了，我心里既期盼又担心考不上。这时，突然来了通知：高考推迟半年，要求学生在校参加“文革”。说是半年，后面却再没人提起高考的事。再后来就是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与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响应号召到了黑龙江插队落户。从此，大学就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是1969年5月到黑龙江插队的。在插队期间，当地的农民对我们知青还是蛮关心和照顾的，我只干了一年多的木工活和农活。到第二年8月，我就成了一名代课教师，再过一年转为公办教师。在黑龙江教书7年间，原来停办的大学慢慢恢复招生了，只不过是招工农兵，且主要以推荐为主。我们知青人生地不熟，一般是不大可能被推荐的。我也就是看看人家上大学罢了。

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大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976年结婚后，我就基本没再去做大学梦了。

1977年10月，我听到了当年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并且确有专长的“老三届”学生也可以参加考试。恢复高考的消息霎时把我的大学梦重新激活。两个月前，我刚从黑龙江调回镇海老家，在大榭中学工作。但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有专长、能不能参加考试。于是，我鼓起勇气去找校长，提出我想参加高考。校长问：“你高中毕业，学校安排你教高中毕业班，还让你担任高中理化教研组组长，学校对你这样重视，你为什么还不安心？”我只能低声喃喃道：“这是我上大学的最后机会了，错过了就不再会有了，我想上大学。”最后，校长还是支持了我。与妻子商量，她当然支持我。与父母商量，父亲的一席话却使我陷入了深思。父亲说：“你现在教着高中，如果考上大学，那什么事也没有；但如果考不上，你以后怎么教学生？人家会说，你自己都考不上，我们孩子让他教，怎么能考上大学！”父亲的话也有道理，我内心非常矛盾。但是，儿时的梦想、对知识的渴求，最终促使我决定背水一战，我义无反顾地报了名。

复习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我一边给学生辅导，一边自己复习。后来，我与好多位学生一起参加了考试，他们有的还跟我在同一年上了大学。1977年的高考，由于人数太多，因此分了初试和复试。我报的是理科，初试已经印象不深了，复试考了语文、数学、理化和政治。理化是一张试卷，我是高中化学老师，化学部分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道化学平衡的附加题却没有做出来。物理也还可以。数学一共有三道难题，一道数列题，一道平面几何题，还有一道代数题。我只做出了一道平面几何题。

那年高考，还有一个小插曲。复试前几天，妻子难产，我和母亲把她送到了离柴桥100多里的宁波市第三医院妇产科待产后，自己狠狠心返回柴桥参加考试。高兴的是刚考了半天，母亲就打来电话说妻子已经顺利生了个男孩，叫我去接回家。我只能告诉母亲，等我考完后再去接。这样，我儿子在医院又多住了两天。

大概是1978年2月，我收到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在化学系，3月到学校报到。此时距高中毕业已过了11年，我30岁，我的大学梦终于圆了。

一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曲折的高考经历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高知贤

我襁褓失怙，由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成成人。从8岁读小学开始，古人勤奋苦读的故事就激励着我，希望将来学业有成，既报答母亲的养育栽培之恩，也能为国家尽自己的赤子之心。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优秀，后来先后考上了乐清中学初中部和高中部。

当年的乐清中学，不仅在本县首屈一指，而且在全省也颇有声誉。1965年高考，乐清中学的录取率达75%。校领导雄心勃勃，要在我所在的这一届高中毕业生中“放卫星”，争取录取率有更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各位任课老师为此不懈努力，学生更是刻苦学习。我们还在校领导和老师的指导下填写了升学志愿表。我踌躇满志，填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第二、第三志愿也都是外语院校，自信一定能如愿以偿，因为我各科成绩优良，英语成绩更是优秀。

正当我们做着大学美梦，期待着高考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先是北京来了文件，将高考推迟半年，谁知这一推迟竟变成了空头支票。后来“文革”由文斗转为武斗，为躲避武斗，我不得不避祸温州，还连累年近50的母亲随我连夜翻山越岭，远走他乡。此后，我曾有一年多时间避难在舅父家，靠阅读文学书籍打发时间。1969年春夏之交，我跟随一位表妹夫去做泥水粗工，帮助编制预算，也做一些抬石头或砖块、拌石灰等粗活。干了半年多后，又回到老家，准备当一辈子农民。

好在当时乐清城东中学小学合办，恰好缺少民办教师，母亲跟担任大队干部的一个邻居求情，为我争取到村里的一个民办教师名额。1970年春，我去学校当了教师，月工资27元。一到学校，我便担任了三四年级复式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还兼任初中班的英语教师。尽管工资微薄，功课繁重，但我仍然非常愉快。

1973年春节前后，我偶然遇到上初中时的俄语老师林奋先生。他告诉我，虹桥中学正缺英语教师，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即表示同意。

新学期开学后，我便到虹桥中学当了编内代课教师，月工资含粮差补贴共 32 元 5 角，比民办教师多了不少。我在虹中教了几个学期英语，后来又改教数学。当时语文教研组组长蔡老师问我既然喜欢文学，为什么不教语文。我回答说，正由于喜欢文学，所以才要教数学。因为数学备课和改作业要比语文少花时间，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读文学书籍。但几个学期后，校领导还是让我改教了语文。

1976 年春，天安门事件爆发，我们议论纷纷。4 月 25 日，是春季农忙假的第一天，同事约我登白龙山观景散心。我借酒浇愁，喝了不少，酒后口无遮拦，说了一些斥责“四人帮”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话语。此事后来被校革委会上报给县“追查反革命办公室”，被定性为“白龙山反革命事件”。得到这个消息后，我觉得在劫难逃，就事先把自己的书信、日记和许多诗稿转移到舅父家里。后来又怕牵连舅父，连累同学和朋友，只好将这些多年心血凝结成的文字付之一炬。此后至今，每念及此，不胜痛惜。

在忧心忡忡中挨到了 7 月 28 日，那天是我次子出生的第三天，县公安局干部老鲍和虹中的两位同事把我叫到虹桥区公所。一进办公室，他们就开始审问我，问我在白龙山做了些什么，翻来覆去问了老半天，我就只是说我喝醉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第二天早饭后，老鲍又把我带到乐清县政府招待所 214 房。此后的 108 天，我就被扣押在这里接受审问，没完没了地一次次写所谓的“交代材料”，直到“四人帮”倒台。1976 年 11 月 13 日，我终于回到了虹桥中学的讲台上。

1977 年秋天，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讲话的内容，极为高兴。会议结束回校后，我当即找来高中数学课本，开始认真复习，准备迎考。

周六从学校回到乐清时，我把自己要参加高考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表示反对，说我 30 多岁了，有了两个儿子，不再适合上大学了。尽管我非常期待能圆大学梦，但听了她老人家的话，想到母亲几十年来吃了无数的苦，尤其是“白龙山反革命事件”使她刻骨铭心，余痛

未已。她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我怎忍心再让她与妻子共同分担家庭的重负呢？于是，我就同意了母亲的意见，决定不再去考大学。

周一回到学校，课余也就不再复习数学了。没想到周末回乐清，母亲郑重地对我说，她同意我去考大学。我当然很高兴，但还是再三与母亲商量，如果家庭负担她和妻子两人难以承受，我还是不去考。但母亲说可以承受，有困难也只有四年时间。母亲原本就是通情达理的人，她深知我自幼就勤奋好学，因而也一定能学有所成。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和她说了参加高考的事后，她与我一位表姑商量。表姑说我读书一直很好，要不是“文革”，早就大学毕业了，现在是最后一个机会，况且读大学的四年很快就会过去，毕业后会有更好的前途。因此，母亲改变了原先的想法。

母亲的支持让我极受鼓舞。我暗暗发誓，一定不辜负母亲的期望，好好复习考上大学，毕业后报答她老人家。

这是自 1966 年高考中断 11 年以后的第一次正规高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恐怕也不比这更难。为迎接考试，我与几个要好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复习小组，复习各门功课。现在我还记得，在乐清中学操场上举行的考生大会上，我曾代表全体考生表决心。我还记得，我在初试中写的作文曾被印发给大家参考。在考生志愿表上，我只填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我已不可能再像 20 岁那样能远走高飞了，四年后我要回到家乡，去接过本应由我承担的家庭重担。

由于我高中时成绩就不差，八年的教师生活让我一直没有丢掉知识，复习时又抓住了某些重要知识点，所以考试很顺利。考完已是 1977 年的冬天，但等到年底，入学通知书也没有寄来。直到过了 1978 年春节，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才到了我手上。

关于我的录取，上大学后才知道有一个插曲：因为当时对“白龙山反革命事件”尚无结论，有人对录取一个有“现行反革命”嫌疑的考生存在疑虑，可负责录取工作的杭大中文系副主任姜兴茂老师认为我考试成绩好，政治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决定把我录取了。从这一方面说，我永远铭记和感激姜老师对我的赏识与选拔。难怪报到后我去系办公室问成绩，姜老师对我说：“你的成绩不会差的。”我办好

了各种手续，又到虹中完成了班主任与功课交接事项，告别了母亲、妻子和两个儿子，于1978年3月8日早上乘坐刚开通的乐清至杭州的班车，经过10多个小时的颠簸，来到杭州大学报到。

从青春大学梦的幻灭开始，十多年来，我历经各种磨难打击，到此时终于赶上了末班车，圆了大学梦，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返回目录](#)

当海洋打开所有的道路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王自亮

1977 年恢复高考之前那段日子，我正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人生所有的门几乎都对我关闭了。

代课老师是无法继续做下去了。当我正准备下个学期高中化学课程的时候，学校通知我不用来了。原因是我得罪过的人当上了区领导，专门交代学校让我歇业。种田也回不去了。我曾回乡的那个生产大队早把我“注销”了：“他是来镀金的。”在家里开个店铺也是妄想，尽管经商是我母亲这一方的家族特征，但那时得到一个“小贩证”比登天还难。我甚至想到去集市贩卖农产品，在牲畜或旧衣交易市场去谋个开票记账之类的活。还有就是逢年过节去卖对联。我曾计算过每副对联能赚多少，整个春节能卖出多少副。我总算习过字。年幼时父亲管教严厉，每天必得用富阳元书纸临帖，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二王等都临摹过。

除了偷窃和抢劫，我什么都想尝试。只要能把日子过下去，我愿意做一切可以做的。有一天，父亲异想天开地去找区领导，想为我谋个职业：投递员。那个平时对我们还算不错的领导冷冷地说：“你说什么？想吃天鹅肉啦？”那份羞辱终生难忘。为了我，父亲也是整日唉声叹气，眼神里半是不满，半是泄气。他的祖父、我的曾祖都是前清举人，文章绝佳，还在奉化等地当过官，看来到他和我的这两代是穷途末路了。

我所能想到的还有学手艺这一条路。自然，我很不想干这营生，觉得做个手艺人单调乏味，寂寂无闻，终日劳作，所获无几。可是不做手艺人，又能做什么呢？1975 年上半年我高中毕业前夕，母亲就让我尝试跟二舅学手艺做棕绷。但看到二舅整天让我为他干家务、抱孩子，三个月之后，倔强的母亲一怒之下就让我回家。可是，在我吃了很多苦又无事可做的情形下，母亲还是主张我去学手艺谋生。学手艺毕竟稳妥，什么世道都用得上。这次是另一个行当：车木。

那就做手艺人吧！正当我死心塌地想做一辈子手艺人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开始，我不认为这是真的。我觉得，认命做

人是首要的道理。“四人帮”被粉碎后我高兴了一阵子，而失去代课教师的机会却让我置身冰窟。“文革”后期，读高中的我也狂热过，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原谅过自己。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时，我彻底清醒过来了。记得“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还组织同学为邓小平举行了一个秘密集会，就在一个老宅为他点蜡烛祈祷。我们当时的感觉是邓小平下台意味着中国完了。在此前后，我和同学一起时经常讨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类问题，真是一个残酷的青春期。那时，我并不觉得恢复高考是针对所有人的。我不相信有一个制度性的福音会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年轻人。

过了几天，参加高考的气氛越来越浓烈。人人跃跃欲试，我虽按兵不动，但内心还是有点心动：万一是真的呢？从小学到中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所在学校最优异的，且各门功课成绩都比较均衡。再说，我又当了一年多的代课教师，教过语文、物理、化学，参加高考很有优势。多年之后，有人告诉我，我的备课本之完整、清晰和提纲挈领，很令人羡慕。就阅读量而言，我有把握说一句，我是整个百年老镇上最大的，古今中外，无所不涉及。尽管如此，我还是满腹狐疑。那天在街上，一个邻居问我：“你怎么还不报名？”我谈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对我说了一番话，从根本上打动了我：“去报名吧，我们这条街上还有谁比你更有资格读大学？去吧，反正报考也不花钱，你没什么损失。”

“反正不花钱”，居然成了我参加高考的重要动因。自然，这位邻居也勾起了我小小的虚荣心：最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人。没想到我在初试时就打了一个胜仗：黄岩县第一名。当然，这是我一个亲戚从领导那里搞到的消息，有点密电码的味道。初战告捷，士气大振。其实我几乎没有复习，从报名到考试时间太短，加上我半信半疑，还学着手艺，不好意思为了考大学这一不切实际的事而告假。

复试开始前，我还是做了一个星期左右的准备。当然也是以晚上为主，白天还得干手艺活。母亲的眼里饱含了期待和爱，而父亲佯作无事，弟弟们懵懂不知，还是照常干活或者上学。生活在真正发生改变之前，并不是非得有什么预告。我只是感到某种热力在胸口酝酿，

寻求出口。我时常想起马克思的那句话：“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全世界。”结果，我的高考成绩很不错。虽然具体分数我不十分清楚，但有人提醒我，可以填好的志愿。于是乎，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专业和杭州大学中文系之间犹豫了半天。当时浙江大学只有工科，没有文科。杭州大学的文科是浙江最好的。最终，我放弃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专业，填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

能读杭州大学我已经非常高兴了，而且后来事实也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正是上了杭州大学，我才得以认识一大批诸如姜亮夫、王驾吾、蒋礼鸿、徐朔方、沈文倬、郭在贻和吴熊和等名师大家，以及一大批极为出色的同学，这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

考上大学，所有人都为我高兴，父母几乎喜极而泣。在我们这条百年老街上，比邻而居的那些小贩、手艺人、职员、基层干部、进入老年的女响马、拖着辫子的遗老、冬烘先生、算命测字的，都来道贺并祝福我。本是好事，该庆祝，但我竟然陷入极大的惶恐，反而深感不安，好像几个家族的责任一下子压到了我身上。很快也就没多想了。至少，我告别了无望与那些梦魇般的挫败感，生活灰暗的感觉不再如影随形。我的文学和语言之梦也许会得以延续。

一条道路开启，也许意味着所有道路将被打开，因为道路是相连的。将近40年的个人经历证实了这一点。正如多年后，在《海上生明月》这首诗中，我所写下的诗句：

此刻，我们抬头朝天空张望，却感到意外和震惊——

月亮像一位接受牺牲的女神，做出了俯身的姿势。

这时海上铺满了血色的光芒，波浪在持续的照耀中呈现透明，海洋打开了所有的道路。

返回目录

辗转曲折的化学梦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文革”初期的一天，几个造反派来我家抄家。不久，在杭州大学化学系任教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我和三个兄姐便成了“黑五类”子女。

1973 年我初中毕业。当时仅约 25% 的学生能升高中，我得知自己在向阳中学的推荐单上名列前茅而比较乐观。发通知那天，我正踩着缝纫机补衣服，得到的消息让我眩晕：学军中学因为我的成分而拒绝了我。那时父母恰在近旁，于是我赶紧弯腰，假装在地上寻找一粒失落的纽扣，偷偷抹去盈眶的眼泪。我不愿过多流露伤心和绝望，让孩子受到牵连而痛苦的父母加重自责。

次日，班主任彭老师得知我被拒后先愤愤不平，转而安慰道：“我会和陈书记一起去找学军领导，再为你争取一下。”这次我却不敢再抱希望。至今我仍不知究竟是何种因素促成学军中学改变决定，让我占用 5% 的“可教育好子女”的名额入读，从而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们高中班的学生是分别从四所初中遴选出来的，班上学习风气相当好，老师们也很优秀。所有的科目中化学是我的最爱。儿时的星期天，常被父亲牵着手跟他一起去化学楼，对实验室里的各种玩意儿充满了好奇。他对自己专业的热爱更让我确信，这必定是门非常有趣的学科。

1975 年我高中毕业后，便迫不及待地要去农村，真诚希望在广阔天地里改造自己。但当时已实行校社挂钩集体插队，我在等待下乡期间回到了祖籍慈溪。在亲戚联系妥当后，我挑着自己的铺盖和大米油盐离开奶奶家，去临近的胜北公社医院，在几个科系轮转着一边当下手一边见习了三个月，甚至学过为产妇接生，感觉颇有收获。

终于等到 1975 年深秋的一天，我与另外 17 名杭大职工子女前往萧山县楼塔公社插队。知青们住在大队一座空闲着的仓库里。8 位女生占一大间，用竹篱笆隔成两间 4 人宿舍。我睡在其中一间的门边，

冬天雪花透过无数缝隙飘落到撑着蚊帐的床前，在水泥地上积起薄薄的一层。严寒季节，夜里没倒掉的洗脸洗脚水，到早晨已经在面盆里连底结冰了。

体力活的粗重在预期之中，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也让我学会了凡事咬牙坚持，但有时仍觉艰难。例如，在刚施了肥的水稻田里用手指为植株松土（即耘田），时不时抓到一团人粪；感觉小腿肚上被蚂蟥叮咬，拉扯时结果半段蚂蟥留在体内；“双抢”季节时在烈日下割稻，腰酸得仿佛要断，手指也磨破流血，但因打稻桶在身后紧跟着，只能半跪半爬地挥着镰刀继续向前挪动。

最令我失落的是自己扎根农村的信念逐渐破灭。此前为来农村进行的各种准备（如开拖拉机、扎针灸、采草药、植木耳搞嫁接）全然无用。我也知道大队领导虽有时让我在医疗站帮忙，但绝不会重用我，因为知青中我的家庭成分最差。别人都当上了民兵，用真枪实弹进行训练，唯独我的申请不得批准。我的出路在哪里？当代课教师或招工，猴年马月才轮得到我？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更是比海市蜃楼还要缥缈的梦幻。

当时我求知欲望十分强烈，却苦于无书可读。于是每每清晨早起，跑到屋后，倚墙坐在小板凳上读《毛泽东选集》。读完了当时已出版的4卷，还记了大量笔记。此外，手头有一本原版《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虽然斗大的英语词汇我认不了几个，也毫不指望这辈子用得上英语，但工余还是拿出来解闷，慢慢竟读懂了故事梗概，喜悦油然而生。

插队将满两年，母亲从杭大校医院退休，根据政策我可以顶职回杭州。正在办理手续期间得知高考恢复了，我毅然报名并参加初试。1977年12月初，我以顶职名额进入杭大化学系，在物理化学组当上了学徒工。不久又去高考复试，所填志愿以杭大为首选，专业均为化学系，因为我的愿望是女承父业！

那年高考虽然文理分科，但任何考生均可选试外语。为了提高被录取的几率，我加考了英语笔试。接到口试通知后，我高兴地向家人报告。父亲提醒我，去参加英语口语的话，说不定会被外语系录取。

可我不以为然，认为外语属文科，而我考的是理科，应该先被化学系选择。若没被化学系录取，读外语也胜过没得上大学。

英语口语试完后，我就把这事丢在了脑后。当时物化组正赶着测试一个新型固体催化剂，实行三班倒，夜以继日持续实验，我也与其他组员一样全身心投入。那时我的顶头上司是袁老师和后来当上最后一任杭大校长的郑小明老师。

1978年2月，我终于盼来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用微微颤抖的手展开纸页，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上了杭大化学系的分数线，录取我的竟是杭大外语系！原因是那年外语系有优先录取权。无论我怎样解释央求，外语系都不让我换专业。眼看自己的美梦如肥皂泡般破裂了，我的心被懊悔煎熬着：当初真不该不听父亲的劝告，我怎会那么任性、那么愚蠢？

物化组的固体催化剂课题取得了重大突破。1978年春节前夕，我随着全组成员敲锣打鼓去向校领导报喜。汇报成果完毕，我们正要离开时，郑小明老师一把将我拉到校领导面前：“这位是戚志红。她爸爸是化学系的老教师戚文彬。”接着，郑老师解释了我被外语系误取的“冤情”，并代我请求换回化学系。那位校领导当场欣然同意我转系。

就这样，命运之神又一次让奇迹出现，我终于进入了那梦寐以求的化学殿堂。

（原载祝毅主编的《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返回目录](#)

第二章：入校

走进杭大

—杭州大学中文系 62 级 潘晓东

可能是命中注定吧，我以后要读中文、跟文字结缘。我 4 岁时，父亲不幸病故，我们一家突然掉进了苦难的深渊。母亲去街角摆个香烟摊，小妹不久被饿死。

1950 年土改时我 6 岁，在浦江老家种田的叔父毅然来到杭州，把我们兄弟 3 人带去抚养，跟他自己的 4 个儿女一起生活，在山环水抱的山村读小学，砍柴放牛。夜晚在昏黄的菜油灯下，堂房爷爷给我们讲解《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天刚亮，我就翻身起床，跑到爷爷的“书房”高声朗读爷爷讲过的名篇，动人的故事和优美的词句像甘泉一样滋润了我枯寂的心田。

小学毕业时，全校只选了我，被保送进了初中。1957 年，母亲安排我插班进了杭州开元初中，我门门 5 分，当了学习委员。1959 年考进杭州第四中学读高中，语文、英语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在那困难时期，初中同学阿瑜却经常请我看苏联、印度电影，给我看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和文学杂志《人民文学》《萌芽》等，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62 年 7 月高考第 1 天，我在食堂里买了碗稀粥，用炒过的盐拌一拌，喝完就走进设在母校杭四中的考场。后来，发榜了，我居然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了。

1962 年 9 月，秋高气爽，云淡风清。早上吃完饭，我穿着妈妈给我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手提着一只网兜、一床旧棉被和一只旧皮箱，走出墙门，穿过开元路，来到湖滨，沿着西湖走过四季常青的香樟树，来到保俶塔脚下，再沿着保俶路往北，不久就到了杭州大学的校门口。这条路，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将每周往返走一次。

离大学校门不远的教学楼门口，摆着一排课桌，几位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在这里热情地接待新生；我登完记，被带到了宿舍大楼。大楼有两层，都是砖瓦结构，哈哈，都是洋房哦！每层都有卫生间（而杭州千家万户用的是马子，即粪便桶）、盥洗室，比我们家住的房子好

多了！宿舍朝南，窗外就是大马路，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四周是农田，稻子已经收割干净，只剩下稻草堆和一排排短短的稻根了。

很快，其余 4 位同学陆续都到了，大家带来的行李都差不多，几样东西很快摆放好了。互相介绍一番，才知道其中一个义乌人，一个是余姚人，其余两个和我都是杭州人。大家都穿得很朴素，有的跟我一样衣襟上还打着补丁。没有父母兄弟随从护送，都是自己走路来的。班里只有一个宁波的阿圣带来了一辆自行车，大家都感到很新奇，围在车边看。而我来报到之前，刚刚在涌金门开元路上一个人学会骑自行车，差一点骑到旁边的小河里，幸亏被杨柳树挡住。

不久，学校举行运动会，我报名参加了 3000 米自行车比赛。阿圣把他的自行车慷慨地借给了我；我乘着刚学会骑车的新鲜劲，初生之犊不怕虎，一鼓作气骑完全程，冲过终点线；费劲地跨下车，感到双脚酸软，像踩在棉花上一般，但我心里满含着兴奋和对阿圣的感激。

这年，被录取的同学一共只有 60 个，分成两班。我们的系主任姜亮夫先生 60 岁，1949 年任云南教育厅厅长，楚辞学专家；他在始业教育大会上，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嗓门却非常洪亮。他挥舞着手臂，告诫我们：“如果你们不好好读书，将来啊，社会的大棒会打到你们的头上！”有老师告诉我们：“你们能在大学读书不容易啊，要 7 个农民干活，才能供养你们一个大学生啊。”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我知道农民的艰辛。听了这些话，心情自然十分沉重。心想，如果再不好好读书，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啊？国家现在还十分困难，但学校还是给我们发助学金，从每月 5 元到 17.5 元不等。在报助学金的时候，我报了 11.5 元。过了几天，班主任华宇清老师笑着告诉我：“根据你的家庭情况，系里决定给你每个月 12 元 5 毛助学金。”就是说，每个月我可以吃饭不掏钱。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华老师笑着走开了。他是教我们外国文学的，对泰戈尔情有独钟，上课热情洋溢，喜欢笑，非常和蔼可亲。

上大学了，首要任务自然是学习，第一是上课。每天上午有 4 节课，下午两节课；到后来是上半天课，半天自学或者讨论。大一（1962.9—1963.7）计划安排上《中共党史》《现代汉语》《写作》《文学概论》《现代文学作品》《英语》或《俄语》，还有体育课。大二（1963.9—1964.7）计划安排上《写作》《政治经济学》《语言

学概论》《古代汉语》《古代文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英语》或《俄语》。大三（1964.9—1965.7）计划安排上《哲学》《古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史下》《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英语》或《俄语》。我跟大多数同学一样，对《现代汉语》不感兴趣，觉得比较简单，枯燥无味。但哪里知道，10年后，却要重新复习，报考《现代汉语》专业的研究生。

教《英语》的鲍老师，中年汉子，胖胖的，行动迟缓，非常和蔼；大概他查阅了全班的高考分数了吧，发现我是高分，就宣布我是《英语》课代表，任务只是向同学收交作业本而已。但因为他的信任和鼓励，我对英语一直不敢放松，学习英语的兴趣和习惯一直得到保持，以后让我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就这一点，我也必须感谢鲍老师！

教《写作》的马骅老师46岁，是位散文作家，是系写作教研室主任。他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讲话慢条斯理，风趣幽默；他批阅过的作文，会有几句或一篇中肯的批语，字写得非常工整清晰，读他写的批语是一大享受。有一次，他给大家出了个作文题目：《雪》。我的脑海里闪过一幕幕“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外出乞讨倒在雪地上的祥林嫂和卖火柴女孩可怜的身影和我童年挨冻的感受，什么雪的洁白无瑕、玲珑剔透、美丽无比都隐退消失了，脑海里只留下了雪的冰冷刺骨和冷酷无情。几个星期后，马老师把我们写的作文都批阅好了，在课堂上表扬了几位同学的作文，是赞美雪的；后来又表扬起我，是怨恨雪的，说写得比较真切，全班只有这么一篇。马老师的鼓励让我懂得写散文或创作其他作品都要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马老师不仅给我们上课，还动员我们在课余时间到西湖去采访划船的船娘，写她们的身世和劳动感受。写作离不开生活。可惜，虽然《写作》课有两年的时间，但因科目太多，要读的中外图书浩如烟海，写作的时间很少，哪里能深入生活，去体验感受，搜集大量素材，构思创作呢？当然，收获还是有的，在两年的时间里，学了一点创作的方法技巧，如何分析欣赏文章的方法，为以后当语文老师打下了基础。

谁也不会想到，几年后，和蔼可亲的马老师居然含冤愤然离开了他原本热爱的杭大，回到家乡温州教书去了。1982年，我去温州开会，抽空，我找到五马街，拜访了我思念多年的马老师。在他家窄小的客

厅墙上，我看到挂着一幅醒目的对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对联是清代龚自珍的诗句，但也饱含着马老师一生的辛酸。这是后话。

再说入学不久，系里发下来一本参考书，类似于《大学中文专业必读书举要》（1986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我系的7位教师，他们根据教育部关于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方案中规定的必读书目，并参照全国有关重点院校所规定的必读书目，精选出了90部作品，书后还附有“阅读书目”，有中外古今关于语言文学的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共266部。

有道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有名师指点，登山踏波，可望日行百里。我们系可称得上名师灿若星斗，夏承焘、王驾吾、姜亮夫先生年逾花甲，全国闻名；其余的中青年教师诸如马骅、蒋礼鸿、徐朔方、王维贤、倪宝元、蔡义江、吴熊和、平慧善、朱宏达、王林祥（元骧）、蔡良骥、华宇清、丁子春等老师，个个满腹经纶。在课堂上，老师们讲课不像大多数中学老师那样照本宣科，而是大多不看书，不翻备课讲稿，课文内容早已烂熟于心，脱口而出，丝毫不差；对古诗词、经典文章他们倒背如流。徐朔方老师只在一只小小的火柴盒上写着几个字，大概就是讲课提纲了。老师们讲课或娓娓动听，或侃侃而谈，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或生发议论、条分缕析，或抒情讴歌、热情奔放；我如坐春风，如沐甘霖。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临考背笔记，考过很久也不忘记。

精选书目加阅读书目共356部书，按学制5年内要全部阅读一遍，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奇才。因此，像我这等平庸之辈，必须从中再挑选出自己感兴趣的最经典最重要的书进行精读细读慢慢读，读出味道，有所心得；而其余的书则挑几本快速浏览，随便翻翻，仅知道个大概就行，有许多书根本无暇顾及。有些教授老师在讨论：“读书是先博后约呢，还是先约后博？”有人主张先博后约、由博返约；有人提倡先约后博，专精一门，举一反三。我认为，还是教授先生的话有道理，还是多看些书吧，多多益善；但也不能什么书都看，不可能，也没必要。只能把自己最感兴趣最重要的知识设定为圆心，画一个圆，把跟圆心有关的书籍圈进来阅读思考；离圆心越近的，看得越细致，思考得越深入。就是说，博有范围，约有基础，

在很少的时间里才可能学有所得。根据这样的考虑，我制定的读书计划是以文学作品为圆心，从里向外依次画在圆圈里头的是我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我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俄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进不了圈子。

英语、体育是我每天的必修课：读英语，背单词，朗读课文，保持了中学的良好习惯；几乎每天登山、托（没有场地、球网，不能打）排球，有时游泳，坚持体育锻炼。

图书很多，令人眼花缭乱。我像一头饥饿的野牛闯进了菜园，埋头吃啊吃。图书馆每次可以借阅几本，一次我要阅读两三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读得很慢，因为没有快速阅读的本领。买书吗？哪来的钱？教古汉语的老师发下一本自编教材《古代汉语》，要收两元钱，是我一个月的零用钱；零用钱没了，剃头理发就等等吧。晚上在寝室里自学，饿了想出门买块烤番薯吃也买不起，就算了吧。从此，我一直坚持平时不吃零食，一日三餐；虽然在我们的“三瓜食堂”偶尔也有走油肉、熏鱼，打牙祭，但饭是吃得饱的，就很满足了。

给我们上《文学概论》课的几位老师都十分年轻，有的讲起来慷慨激越，热情动人；有的文质彬彬，慢条斯理，引人入胜。王林祥（元骧）老师属于后者。他很有学者风度，美男子一个，身穿蓝布中山装，脚蹬一双黑色布鞋。他在课堂上从来不翻书，一堂课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讲，引经据典，条分缕析；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但下课后，他会走到我们当中来，了解情况，答疑解惑；空时还同我们一起散步、登山，这显得他与其他老师大不相同，引起了我们的好感。我们几个同学在课余时间常去他的宿舍，跟他聊天，讨教文学理论，谈论身边的事。他的书房不到10个平方，靠窗的书桌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书籍，足有两尺高；墙上只端正地挂着一张周恩来总理的黑白照片，总理似乎就在我们身边温和地注视着我们，书房显得格外肃穆庄严。在这样的气氛中吧，我们只谈正儿八经的事情，不谈鸡毛蒜皮的琐事，更不谈女人。

有一天上午，我跟他聊天，不知不觉，聊了很久，我就告辞。正站起来转身要走，迎面走来他的母亲，一位个子矮小、相貌清秀的瘦老太太，她捧着一碗刚煮好的面条，面条上铺着一层金黄色的蛋丝和红白相间的开洋（虾仁）、乌贼干丝，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王妈妈说：

“吃吧，我们老家的。”王老师的老家在玉环，那是个在浙东大海边的美丽小岛，盛产各种鱼虾海货。这辈子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面条！他们的盛情就这样永远装进了我的脑海。我非常感动，默默在想：王老师、师母啊，我拿什么来报答你们的恩情呢？刻苦读书吧，将来报答所有的恩人，我只能这样去做。

王老师还写得一手飘逸俊秀的字，而我的字实在不行，要努力。中午午睡时间，我读王羲之、柳公权、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拿起毛笔来临摹，是我的业余爱好之一；写字读帖入神了，就觉得脑子清醒、心情舒畅。写字有了进步，下午上课也有了精神。

下午4点半左右，我们几个男女同学经常跑到操场上，围成一个圈，打排球啊，其实是用双手垫起对面来的排球，没有排球网，没有场地，怎么打啊？玩玩，活动活动也很开心啊！几乎每天一清早，我们几个室友就起床，用冷水洗把脸，就一起跑出校门，从杭大路跑进黄龙洞，沿着石径登上初阳台，望一回日出；然后折向东，穿过宝石山脊的小路，沿保俶塔北面的小路冲下，跑到松木场，走进小店吃早点。一碗沃面9分，一碗油渣面1角3分，一副烧饼油条6分。吃饱了，慢慢走回宿舍，准备好笔记本，到教室听课去。

除了听课，系里还请来了著名学者、教授、作家、戏曲表演家，为我们演讲，表演。我国第1位翻译《共产党宣言》和撰写《修辞学发凡》的陈望道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我省作家任斌武和沈虎根先生、著名京剧表演家盖叫天先生，先后莅临讲演。盖老一边表演武松上景阳冈打虎，一边讲艺术如何才能贴切地体现出人物性格。他的一招一式，转动灵活的眼睛，表现出武松威武勇敢的英雄气概，我们都不禁鼓起掌来。

1963年3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陪同访华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来到杭州，系里选派几个同学和我去笕桥机场欢迎。我们手拿鲜花，列队站立在机场，激动地等候总理的到来。终于，总理来了！他身穿银灰色大衣，挥动着一只手，朝我们大步走来。近了近了，在我前面只有两步路的地方，我清楚地看到了他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大眼和英俊迷人的笑脸。总理走远了，我们又赶紧上车，赶到西湖边的杭州饭店。不久，周总理陪同班达拉奈克总理出现在二楼的阳台上，一起低头向我们挥手。我的喉咙里好像被什么堵住了，不知道该呼叫

什么。同学们一片欢腾，拼命挥手，也不知道呼叫什么才能表达我们对总理无限敬仰的心情。我们真傻，连一声“总理您好”都没有喊！总理一定知道我们是太高兴太激动了才变傻了啊！他很快就转身回房间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这么近距离地亲眼目睹总理的风采，感受到他发出的光辉。很久很久，我们都沉浸在幸福和自豪之中……

不久，在1963年5月开始的“社教”运动即后来的“四清”运动推向了高潮，把我们推到了诸暨湮浦村。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任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从此，暴风开始席卷全国，烈火开始燃烧大江南北。

我们是一帮热血青年，火一点就着啊。几个同学把报纸一放，大吼一声：“走！上街去！”我们几个人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都锦生丝织厂”门口，一看厂名，我就说：“都锦生，资本家哦！把名字改了吧？”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最后改做“东方红丝织厂”。好！有人去传达室要来了纸笔，写上“东方红”3个大字，把招牌上“都锦生”3个字盖住。然后我们满街边走边看，把“奎元馆面店”改做“工农兵面馆”，把“知味观酒家”广告牌四周的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全部砸碎，因为霓虹灯是上海十里洋场里资产阶级的东西，跟我们无产阶级毫无关系；看见解放街百货商店橱窗里陈设的皮鞋，非常刺眼，有人气愤地大喊：“这是资产阶级狗崽子穿的，统统扔掉！”“尤其是那双尖头皮鞋！”营业员赶紧跑来，把皮鞋全部拿走，我们不禁鼓起掌来。

街头破“四旧”完了，回到学校，同学们纷纷把从旧书店买来的一些线装书烧了，把自己比较喜爱的《庄子》《孟子文评》《古文观止》等偷偷放进箱子里，书架上只剩下《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共党

史简编》等。而我平时没钱买书，也就没有什么旧书可以破了。再到哪里去“破四旧”呢？其实，资本家、老教授、名人家里的“四旧”当然最多，如果到他们家去破，就一定会大有收获。可是我们却没有这样想。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就很“聪明”，他们冲进画家潘天寿教授的家，把他多年的画作撕的撕、烧的烧、拿的拿，全都破了个底朝天。最激进的要数中学生了，他们冲上吴山、北高峰、宝石山，把看得见的石雕、泥塑菩萨都凿掉毁坏，甚至扬言要火烧灵隐寺。浙大的学生闻讯紧急集合，阻拦冲动的中学生，展开激烈辩论，双方寸步不让。结果，请示中央，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来电：灵隐寺暂加封闭。市园林管理局就在寺庙大门外砌砖封门，才使这座千年古寺得以保存完好。

8月8日，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文革十六条），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学校随即组织师生写大字报，数学系批判著名数学家陈建功教授是“白专道路”，搞“专家治校”，是“数学一霸”。我们中文系批判夏承焘教授是“老牛鬼蛇神”，批刘操南先生是“迂腐先生”，批孙席珍先生是“爱情教授”，批其他老教授是“老学究”、“封建余孽”。

不久，以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姜旭为首的工作组进校，把副校长林淡秋和老教授夏承焘树为靶子，组织了“林夏战役”，发动我系师生进行大批判。但我们对林副校长和夏先生的著作、思想等了解很少，不知道批什么，只能按兵不动。

我非常走运，24日下午，我正在宿舍外散步，王林祥老师迎面走来，偷偷跟我说：“系里买了票，送给青年教师赴京参观的，还有一张车票，你去不去？”我喜出望外，二话没说，就跟王老师直奔城站火车站，走上列车，并排坐在一起。车厢里挤满了人，但都有座位。侧耳细听，外面传来大喊大叫的嘈杂声，据说是聚集了许多吵着要乘车上京的师生。过了好久，列车终于摇动了，慢慢开出了车站，朝北开往北京！我庆幸，激动，饿着肚子熬了两夜，26日清晨到了北京。一下火车，王老师就拉着我，兴冲冲地左转右转，终于第1次看见了辽阔的天安门广场、巍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大会堂！我瞪大了眼睛看，急促地呼吸着，心潮澎湃。第2天，同学们也到达了北京，被安排住在北京西郊的人民大学里。我也赶到人民大学，跟大家会合；听说有几个成分被定为地富反坏右等的“黑七类”同学，被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首都红卫兵赶回杭州去了。

9月5日，国务院正式通知，从9月6日开始，全国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交流革命经验；免交通费，在京伙食费由国家财政开支。从此，全国红卫兵南来北往，火车日夜满载着学生在祖国大地上奔驰。我们再也无法坐在寝室里了。我们几个室友商量：“走，到广州去看看吧！”于是，我到系里去打外出乘车证明，办证明的工作人员只肯写“车到衢州”，为什么？他说：“有通知，广州暂时不能去。”怎么办？别管它，先上火车吧！4个室友就上了车。火车终于接近衢州站，我们坐在餐车里一边慢慢吃着面条，一边忐忑不安，担心马上就要被赶下车去了。我看着桌子上的那瓶酱油，突然灵感一闪，拿出乘车证明，铺在桌子上，再拿起酱油瓶，在纸上洒了几滴，用手一抹，字迹变得模糊不清了，再把“衢”字改成“广”字，嘿，一眼看不出是假的呢。我把改写过的证明一扬，说：“好了，我们闯关去吧！”走到检查的小门边，正好有几个女中学生在跟检查员大声争论，我把我们的证明递给他，他一把抓过去，一看，就对那几个女生高声说：“你们看看，他们有证明，可以去广州！”我们高高兴兴通过小门，再到另外一节车厢去找座位，等待车子开往心仪已久的广州城。在紧急关头，弄虚作假，为的是大家可以顺利出关，到外地参观、交流革命经验，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所以，我们都很庆幸，感到自豪。但类似这样的事，仅此一次。

车到广州，一下车，就有红卫兵战友们前来迎接，把我们安排在一所中学里。9月的广州，很热，白天只需穿件衬衣或汗衫，晚上在课桌上睡，饭可以白吃，吃饱为止。我们除了逛街看大字报，还到越秀山公园五羊雕塑前面拍照留影。一天傍晚，我们逛到了一家电影院门口，我进去跟影院工作人员打听，说有广东汉剧经典剧目《齐王求将》可以放映。汉剧《齐王求将》1962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上映，讲的是东汉列国时期，齐宣王恃强傲世，马放南山，整日贪杯观舞，听信夏妃谗言，罢免老相田婴，绞杀正宫娘娘钟离春；钟离春被田婴救护，隐居练兵。几年后秦兵来犯，于危急之时，齐宣王求助老相田婴，祷告正宫娘娘显灵复生，备受戏弄，最后娘娘带兵击退了秦兵。我就跟影院工作人员商量：“就放这部电影吧，是大毒草，群众看完可以进行批判。电影票我们来卖吧！”他同意，于是，两个室友当了售票员；我当了义务宣传员，走上台，向观众讲了几句“这部电影歌颂帝王将相，是大毒草”之类的话。电影放完后，室友和我一起站在窄小的售票室里，一五一十清点了售票收入，竟然有20多元钱！我们就一分不差地如数交给了电影院。我们带着满满的自豪感，班师回朝，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可惜，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碰到这样的美事了。

在广州待了几天，买了几串香蕉，就回杭州。回到学校，校园里静悄悄的，同学们都外出串联了，我们商量再次出发，去上海。在上海，参观了几所大学，看了些大字报，然后坐车到南京，参观了雨花台、中山陵；接着去山东，到济南参观了趵突泉；最后到达青岛。在海滨，迎着习习海风，我们请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坐车到西安。西风起，很有些凉意了，虽然我只光着脚，穿着一双塑料凉鞋，也不觉得冷。我在西安仪表厂宿舍找到了玉堂舅舅（注：浦江毛店村小外公的儿子），见到了舅妈和3个年幼的表妹。玉堂舅舅1949年在杭州制氧机厂工作，我当时在读幼儿班，他给我交过学费，买过烧饼油条，我感恩在心。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

后来，我们室友几人坐火车去成都。车站上人山人海，等列车一到，大家蜂拥而上，有人干脆就从窗口爬进列车。列车上挤满了红卫兵，过道上、凳子下、行李架上都是红卫兵。没有空位，我只好躺在地上，把脑袋钻进座位底下休息。在成都，我们一起参观震惊全国的

收租院。进了恶霸官僚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看见高墙里的大房子，一把把快枪连使用的手枪，镶嵌珠宝的八仙桌，八人抬的大轿子。据说刘文彩每天喝奶妈的奶，上轿子坐在女人的大腿上；那收租的场景，干瘪精瘦的农民，野蛮凶狠的打手；后院的水牢足有 3 米深，一个木头架子浸在发黑的水里，欠租的妇女被关在这不见天日的鬼地方。参观者络绎不绝，无不义愤填膺，在心里刻下了仇恨的烙印。（注：据 2017 年 12 月网帖，当年被传关入水牢的那个妇女出面证实：这个收租院是当时的县委假造的）。

此后，我们坐火车到了重庆，就急忙去参观歌乐山下的“渣滓洞”。只见渣滓洞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四周铁丝网密布，是国民党特务关押和残杀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集中营，英雄烈士江竹筠就是小说《红岩》里那位钢铁女英雄江姐的原型。我在监狱外的空地上徘徊，想象着那个血腥的年代，烈士们不屈不挠的抗争情景。我对“渣滓洞”这个名字非常反感，心想：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的共产党烈士称为“渣滓”，而今解放了，我们应该把它改为“正气洞”“烈士洞”什么的才对啊！在山城盘桓了几天，上下山坡都走石梯，地无三尺平。

然后，我们几个室友分道扬镳，我独自乘船东下。船到巴东停靠，我想起唐代李白写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商隐的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便跟着前面的人，下船，登上几十级石头台阶，来到了山坡上一条一米多宽的街道。许多人在敲锣打鼓，有人高喊：“欢迎毛主席的客人红卫兵！”我回头看，并没有其他的红卫兵，只有我一个。我想，难道他们是在欢迎我一个红卫兵吗？一位中年男子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一间小小的客栈里休息。

不日，我乘舟东下，过巫峡，上宜昌。傍晚到宜昌，在一间铺了些稻草的屋子里，没有床，没有棉被，蜷缩着身子过了一夜。同屋的几个女红卫兵睡在不远的角落里，发出窸窣窸窣响声，大概是又冻又怕的缘故吧。第 2 天，我和她们一起登山，瞭望宜昌，长江辽阔，浩荡东去。几天后，我回上海。在上海静安区镇宁路三干娘家的小屋里住了将近一个月。干娘干爷都是毛纺厂工人，起早落夜，工作非常紧张。干娘家的房间 40 平方，一床一桌一柜一窗，晚上两个表弟和我睡

阁楼，3个表妹不知道睡哪；厨房10多平方，四周、中间都是灶台，十几家邻居公用，大家挤在一起烧饭炒菜，嘻嘻哈哈蛮热闹；星期天，干爷就亲自下厨炒小湖蟹招待我这个杭州小外甥。小表弟在读小学，调皮捣蛋，干娘就怒吼一声，叫他跪下，背诵“老三篇”。有空的时候，弟妹们带我一起去虹口公园、外滩玩，看看黄浦江上来往的船只，拍照留念。我也学会了讲上海话，至今不忘。

回到杭州，已有同学陆续返校，纷纷成立了战斗队。杭城也热火朝天，延安路南段人民大会堂附近的高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马路上有人把京剧武生演员盖叫天抓住，摁进垃圾车里游街。我远远地看了一眼就走开了，对这些游街行为不感兴趣。因为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一天，在营门口马路上，我偶然碰见杭四中的陆鉴三老师，他马上迎上来跟我低声说：“啊呀，他们把我关进牛棚，叫我们跪在水泥地上，用鞋子打我，脸都打肿啊！”后来，大家都在传说，北京来了一些红卫兵，用皮带抽打，把四中的一位女的图画老师给活活打死了。我十分惊讶，不可思议。我想起前几天，我和阿兴在宿舍里就看见，几个学军中学的红卫兵押着一位中年妇女走过我们窗前，那人被剪了个阴阳头，脖子上挂着一双鞋子。听说，她是学军中学的校长书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对中学生这种简单粗暴野蛮的行为有些反感，但又不能去阻止，无可奈何。

进入1967年，风暴刮得更加猛烈了：1月，上海“一月风暴”，张春桥、姚文元等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2月，谭震林等老师批评中央文革的错误做法，被毛主席严厉批评，定为“二月逆流”；4月，刘少奇被批判，被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7月，武汉军区部分军人和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部分成员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被林彪定性为“搞兵变的反革命事件”，被牵连者18.6万人；8月，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各地造公安、检察、法院的反，夺他们的权。浙江也积极响应，省市党政大权都被“革命委员会”夺走，“走资派”一律靠边站，被批斗、撤职、关押、下放。

“批斗风”也刮进了校园，消息灵通的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同学立刻闻风而动。一天，我在操场跑道上活动，忽然跑来一群同学，其中一个回头朝我看了一眼，我认出他是高年级的阿汪。他和几个同学钻

进了灌木丛，很快就兴高采烈地抓出了一个人，那人脸色煞白，原来是我们的系总支副书记毛逸。有一个同学把拎着的一只废纸篓硬生生地狠狠套进毛书记的脑袋，废纸篓上写着什么，我没看清楚。这群人一边喊着，一边推着拉着他一溜烟似的就消失了。我有点茫然，因为毛逸副书记在始业教育时我是见过的，在我的印象中，他笑得很温和，像个儒雅的文人，不像官气十足的官老爷。我不知道他曾经写过什么毒草，也没有记住他讲过的什么黑话。他跟我们无冤无仇，我不恨他。我茫然地朝他被拉走的操场尽头望了一眼，就若有所失似的回到宿舍。系里何时召开批斗会，怎么批判的，我都不知道，我们全班恐怕也没人知道。在造反派骨干们看来，我们是中毒最深、最没有战斗力的一个班。

1967年的一天，校园里集合的哨子又吹响了，命令我们立刻去钱江大桥，说是有一批萧山的保皇派想进城捣乱，我们必须马上去阻拦。我们个个赤手空拳，凭什么去阻拦？没有考虑，就连忙爬上卡车，跑到大桥桥头下车。我跑过大桥，看见几个工人模样的造反派，手拿铁棒，正押着几个人朝我们走来，有的头上流着血。有一个造反派跑到被押的人身边，侧面狠狠踢他的小腿，几乎要把那个人的小腿蹬断。我们知道阻击战已经结束，我们只不过赶了个马后炮；但总算看到了胜利，大家都很高兴没有白跑一趟。

6月7日，传来消息说，昨天造反派“省联总”1万多人，藤帽铁棍，血洗了另一派“红暴”的老巢“杭丝联”（杭州丝织印染联合厂），打得一塌糊涂。我很惊讶，也很好奇。杭丝联就在拱宸桥旁边，桥的另一头就是在杭棉厂做工的我小娘舅家。8日，我一个人偷偷乘车去了拱宸桥，找到了武斗过后的“杭丝联”。四周静悄悄，不见一个人。我走进工厂大门，进入车间，听不见隆隆机声，看不见一个工人，满地的断砖破瓦，几片破布条，几块血迹。据说“红暴”分子已经逃往长兴煤矿，那里有枪炮支援他们，可以“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这场武斗，现在有人在网上发了图文，详细记述了这场武斗经过，看了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学校没有参与这场武斗，实属万幸。

喜讯终于降临——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

的通知》。校方立即组织全校师生到操场上去拔草，满目荒芜变成一片整洁。该上课了吧？可哪来的教材和教师？11月17日，中央批转北京针织总厂开展“早请示、晚汇报”活动的情况，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每天上午，早餐后不久，同系2年级的阿华就会拼命吹响集合哨子，他是我们系造反派的一员干将。我们就从宿舍里跑到门外的空地上排队集合，在他的带领下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三呼万岁、永远健康。有一天，阿华叫我去协助他办简报，在教学楼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摆了两张桌子。我每天去上班，他坐对面，一边抽烟一边改稿，编写一些造反批判之类的报道，绞尽脑汁。有一天，我又去上班了，走上二楼，到了办公室门口，推不开门，低头看见地下放着我的一双旧球鞋。我明白了：被炒鱿鱼了！我捡起球鞋，默默回到宿舍，把一腔被侮辱的怒火咽下肚子，没跟任何人说。过了几天，我听大哥说，他们的解放路百货商店里在闹革命，欢迎红卫兵去支援，我就没有跟其他同学说，独自去了。

在解放路百货商店，我大哥是财务会计之一，也成了红卫兵。他们斗批“走资派”党总支书记，写大字报。我跟造反派商量，如何写大字报、发动群众。后来，又来了几个杭四中的女同学，我的校友，其中一个叫宋红的，就住在营门口，她面貌清秀，说话温文尔雅，是他们的头，我们成了同一战线的战友。人手增加了，做事就热闹了许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大哥跟我和妈妈说：“有人要来我们家抄家。”我一听，火冒三丈：“谁来抄我们家？我跟他拼！”我妈是工人，我爸参加了8年抗战，老家是贫农，他们有什么理由抄我们家？最终，百货商店没有来人。但我大哥说：“他们撤了我的红卫兵……”原因是他在1951年去了温州读书，是小叔抚养长大的，而小叔是虹桥米厂老板的女婿；造反派要我大哥跟资方代理人小叔划清界线，彻底决裂。我大哥深感痛苦、恐惧和焦虑，有一次下班回家后对我妈说：“我还是去死吧！”我们听了大吃一惊，拼命劝他想开点，没有什么事的，一切会好起来的，等等。有一回，大哥理完发，慌慌张张地逃回家，说：“理发师要告我！他会打电话到店里去的……”我知道，他病了，拉他一起去医院，检查结果是精神分裂症，配了几瓶西药。每天晚饭后，我就陪他到涌金门、柳浪闻莺一带去散步，一边给他讲些宽慰的话。慢慢的，他的精神好多了，头也不再痛了，我和

我妈也才松了一口气。不久，我要回到学校闹革命了，我约宋红在人民大会堂看了一场电影，就此告别分手，再也没有彼此的消息。

终于到了1968年，回到寝室里，每天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就是站在窗前唱歌。阿兴的嗓子很好，歌声嘹亮；我跟着唱，几乎每天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跟着喇叭里传来的男高音，一起唱起悠扬嘹亮的《乌苏里船歌》、忧伤深情的《草原之夜》，心情才慢慢舒畅起来。每天的歌唱，提高了识谱和歌唱的能力，不料在以后的教师生涯里却派上了用场。

1968年7月，毕业分配方案终于下来了！我班33位同学，29个分配到全省各地县，到农场、牧场、盐场、公社初中，杭州只有4人。大家先是传阅分配方案，自报到何地，每个同学根据自身条件报名。各个寝室里一片哀叹：“哎，倒霉！我去湖州。”“我只好回金华算了。”“哎，我他妈的滚回舟山钓鱼去啰！”很快，每人选好了自己的去向，我选了留在杭州我的第2故乡，没有一个同学反对，谢谢各位！过了几天，经过上面批准，大家最后去自己选定的地方报到。悲哀、失望弥漫了每个角落。没有拍毕业照，没有毕业派对，默默地，分道扬镳，作鸟兽散。

提着破箱子，我走出校门，回头再看一眼人去楼空的校园、高耸的图书馆大楼、教学楼，我在心里喊着：“再见了杭大！再见了老师！”一转身，我朝湖滨慢慢走去，一路上，梧桐树里发出一阵阵嘶哑凄凉的蝉鸣声……

返回目录

第三章：学习

军用接收机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裴晓敏

读书时，不少同学经济困难，买短波收音机十分犯愁。即使省吃俭用凑点钱，也只能挑最便宜、性能低劣的产品。杂声此起彼伏，欲收的电台却得耐心捕捉，辛辛苦苦收到还常常不翼而飞。

其实，外语系电教室有几部高级军用接收机却闲着。很弱的信号用那些机器收听就和“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一般清晰。我利用课余时间，跟电教室的师傅一起做了个短-中波转发机。初步调试可覆盖整个外语楼和六幢宿舍，稍作改进可覆盖前面的女生宿舍。经济困难的同同学买的廉价单波段中波收音机即可收听外台。即使条件好一点的，个人买得起的机器再好，也不能与军用接收机相比。

设备做出来了，去让系领导批准，却难为了他们。官方政策允许的只是“Radio Peking”。VOA，BBC 等外台只对外语专业，不时有传闻说会禁听。即使当时没人说，政治风向一变，“收听敌台”罪名可不小。转发敌台的担子谁能负的起？于是，转播之事不了了之。

注：

当时外语系 77 级男生住学生宿舍六幢，女生住五幢。

[返回目录](#)

我的古典音乐之缘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赵建中

(一)

启蒙在我的记忆中，读大学之前，由于文革十年的文化禁锢，我几乎没有欣赏过西方古典音乐，听得最多的就是《地道战》、《地雷战》等几首电影插曲与《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等几个样板戏的音乐，还有就是在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学校老师忽然让我们学唱《毕业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文革以前的革命歌曲。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还是在进入大学之后。

1978 年，我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记得在一个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午后，先我一年考入杭大物理系的一位来自莫干山的同学来找我。这位同学姓张，中学比我高一个年级。中学时期，由于志趣相投，他家距我家又比较近，因此我们经常碰头。她母亲是机关干部，教育孩子严格，因此，他的文化修养与家庭教养都很好。先入山门为大，因此，他就是我的学长。他一听说我来杭大报到，第一时间就来看我。一见到我，他先大致说了学习情况，然后很快就聊到杭大的文化生活。其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与大量外国名著同时引进中国的，还有大量外国电影。前不久他刚看过以芭蕾舞演员生活为题材的奥地利电影《冰上的梦》，于是就兴奋地向我介绍。他原来性格温和沉静，但一年不见，性格活跃许多。他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该片不仅舞蹈很美，还有三支歌也很好听，就是《我的幸福》、《不要爵士》、《我对你说》。他特别喜欢《不要爵士》这首歌曲，还专门模仿影片中演员表演学唱了一下，表情陶醉。同时，他还告诉我一个信息：一位名叫毛昭晰的杭大历史系的教授会不定期地在校本部举行“西方古典音乐讲座”，让我关注学校的通知。电影海报毛昭晰是历史学家，除长年担任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外，还先后担任过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名誉理

事长等职；并且还从过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近年，他为保护文化遗产到处奔走、呼吁，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救火兵”之誉。不过，他还有一门精通的学问，大概除了老杭大师生以外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西方古典音乐欣赏与研究。我入杭大中文系的时候，恰逢国门刚刚打开，人们对外国文学艺术如饥似渴，就在这时，毛教授送来了及时雨，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选修课“西方古典音乐欣赏”。

毛教授从莫扎特讲到贝多芬，从《天鹅湖》讲到《胡桃夹子》，从《茶花女》讲到《蝴蝶夫人》，从宣叙调讲到咏叹调，从圆舞曲讲到波尔卡，让我听了大开眼界。那时候欣赏音乐的条件有限，只有磁带，CD 唱片还没有问世，音响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我仍然听得如痴如醉。他在播放莫扎特的乐曲时，还有一句评论莫扎特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最喜欢莫扎特的作品，他虽然人生历经苦难，但作品却是明亮欢快的，这是多么高尚的境界啊！”特别是当毛教授播放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时候，我听了深受震撼。毛教授还对该曲作了详细讲解，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说，这首交响曲一开始的“邦、邦、邦、邦”，是表现“命运在敲门”，但贝多芬不甘屈服，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这是一首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当时我对高度抽象的音乐能作这样的理解感到很新奇，并从此开始慢慢体味到音乐的魅力。教授的讲座既有作品欣赏，又有作品分析，还有许多作曲家的故事，深入浅出，表达生动，因此深受同学们欢迎，去晚了根本找不到位置，于是经常在教室后面的过道上、窗户外挤满了人。毛教授的讲座让我很着迷，于是，自此以后，我隔三差五地从位于杭州市上宁桥的杭大中文系出发，步行近 20 分钟到位于天目山路的校本部听毛教授的讲座。当年因为杭州有浙江美术学院，我们听美术讲座相对比较容易，比如说我就曾在美院听过梵高的系列讲座，但浙江没有音乐学院，要听到西方古典音乐方面的讲座就难了。

毛教授的讲座，让我们十分欣喜。毛教授的讲座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不过，他有时也夹杂几句杭州话或英语、日语，以活跃气氛。毛教授爱好音乐几乎与他爱好读书一样痴迷。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1947年一个秋天的夜晚，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和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学坐在土木系朱兆祥先生的周围，听他给我们讲音乐。就在学生时代，他曾编过竺可桢校长从国外带回浙大的四五百张唱片的目录。改革开放以后，每次出差或出国，他都携带随声听，并且每到一地，总要抽空去淘唱片，为此，他收藏有大量原版唱片。记得毛教授是浙江奉化人，出生于1920年代，身材中等偏上，不胖不瘦，脸型稍长，面容清癯，眉眼俊朗，既有江南才子的风流倜傥，又有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还有上海人称之为“老克勒”的绅士风度。

我对这位古典音乐的启蒙老师一直心存感激，与他所讲的音乐一起，他的形象至今还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返回目录](#)

第四章：生活

我们至今还记得那次校园雪仗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吴磊

（2020 年 12 月 25 日）

看到【杭大人】月刊编辑刘榕同学的提议，本月设有“冬之恋”专刊，心里怦然一动，想起了 40 多年前我们三班的那场“雪仗”，正好应景，就胡乱涂几笔吧。

冬天的杭城湿冷，朝南的寝室中 4 张双人铺，7 个人加上 7 个大箱子挤满了 8 张铺，把冷意全挤走了。一大早，太阳起来之前，校园的大喇叭会响起嘹亮的冲锋号，我们匆匆赶到操场上长跑，做广播操，背英语。早饭时间，食堂门口黄鱼车上卖着热气腾腾的包子，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和李谷一的“乡恋”，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79 年杭大校园夜里的一场大雪，轻轻地悄然而至，带给我们一份惊喜。古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月西湖、月西湖不如雪西湖”，在雪花翩翩飞舞的时空里，穿上花衣服，带上鲜红围巾的女生们穿梭在晶莹雪白的小道上，真是校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当年我们班有 22 位同学，男女各半。男同学个个英雄好汉，女同学也是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有当年照片为证：每次合影，一张是男同学站着，女同学坐下；必有一张女同学站着，男同学坐下，连尊敬的葛藤老师也遵守规则，息事宁人。于是我们照例男生一队，女生一排，那白雪皑皑的小操场，就成了我们三班男女同学鏖战的沙场，小操场两边的冬青树丛成了双方的掩体。我们各自为阵，紧张地藏匿在冬青树后面，怕被对方发现；用寝室里带出来的脸盆舀着满地积雪，企图制造出足够的武器弹药。

记得我方女生都没有戴手套，用冻僵的手挖一块松软的雪，捏成一个球，呼吸放松，排除杂念，瞄准目标，左眼看一下，右眼看一下，也看不清楚什么，然后瞎指一个目标，随着一阵阵欢笑；一个个形状各异的雪球嗖嗖地向对方阵地飞去。

安静片刻之后，对方阵地大反击开始了，他们的雪球结实，表面光滑，在空中翱翔而不会散开，一个一个稳、准、狠的呼啸着，毫无怜香惜玉之情，夹头夹脑琅琅地打过来，我们无处躲藏，一片惊叫。

一看大势不妙，我方阵地的少英同想起了“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壮士，蹭地一下冲出掩体，直接攻入对方阵地，弹无虚发；同时被对方被无数雪球砸中，一头秀发全湿了；男生阵营的指挥官，我们班长连连夸她“勇敢，勇敢！”

我方阵营 Alice 同学一看室友吃亏，抓起一大把雪，用射雕英雄的英姿，飞入敌方心脏，抓住老姚同学领子，一把塞了进去，其它男生慌作一团，抱头鼠窜，几个机灵鬼都不见了人影。在没有决出胜负的情况下，在一片片大笑中，双方就这样停战了。

老姚昨天的回忆：“是的，我么用雪球扔，你们就直接拿雪球塞进我的脖子；现在还有些凉意！不过蛮爽的，很想复习下。”

Alice：“那次玩雪仗太开心了

少英同学不同意老姚的回忆：@银杏 “你当时是说这个雪进入后背凉飕飕的很不舒服。”

卫美人在四十多年后的昨天，还在嘟嘟囔囔“小 Peter 用雪球砸我的脸”，我@小 Peter：“打雪仗的事你讲讲，为什么雪球做的那么硬，砸我们？哼！”小 Peter 毫无歉意地回答：“哈哈”。

老姚：“那时的我们会玩，怎么玩也不会过分，美好的年华就这么溜走。

小鸽：“多么美好的记忆，虽然我好像一点记忆都没有了，看来已提前进入老年痴呆行列了。

Alice：@小鸽 那时的你，虽然是文艺委员，但十分低调，低着头进出教室，以至于有女生看好你，你也全然不知。

四十年前的那场雪仗太有趣了，太浪漫了，太难忘了，一直到昨天，脑海里的记忆还是如此清晰，耳边的笑声依然不绝，同学们的讨论还是那样热烈，真的希望再有一个美丽的冬日，再去当年的杭大校园，打一次雪仗……此刻，空中传来了“I'm dreaming of white Christmas” 的旋律。

诗情燃烧的岁月

——扬帆诗社往事点滴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张德强

（2015 年 3 月 3 日）

几次搬家，书越搬越多；这次应该最后一次了，45 箱书，光是整理装箱和拆箱上柜就折腾了我一个多月，还不得不给搬家工人若干小费。其中有一大捆资料，从杭大中文系学生寝室搬到工作单位的集体宿舍，再运到分配给我的住房、转至后来自购的公寓，跟随我从市中心到城西再至郊外，一直舍不得丢掉。尽管几只档案袋早已破损，里面的纸页也全泛黄发脆，却被我视作珍宝收藏着。那是一批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民间杂志，大学生自办的文学刊物，包括我们杭州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创办的《扬帆》诗刊。

小心翼翼地翻阅着这些民刊，如吉林大学的《赤子心》、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四川大学的《锦江》、北师大大的《初航》、杭师院的《我们》等，我的思绪被带回到 35 年前。那时，同学们的热情多么高涨，创作的势头多么旺盛，扬帆诗社的活动频繁：写作、交流、探讨，郊游、集会、朗诵；那校园草坪上围坐论诗的争辩声，那中秋夜保俶山上吟诗咏月的兴致，那台灯下刻蜡纸印诗刊的背影，那四五朗诵会的热烈场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忍不住连连感叹，真是：青春激荡的年代，诗情燃烧的岁月！

扬帆初航

现在已经记不清扬帆诗社是哪一天正式成立的了，只记得最初似乎是中文系写作课上组织的一个诗歌兴趣小组，由我和吴晓负责，因为我和他都是上大学前已在公开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歌作品的老三届学生。1978 年 9 月的一天，兴趣小组第一次活动，有十来个同学参加，当时准备每月搞一至二次活动，在写作课老师余荇的指导下，大家交流讨论诗歌，也打算邀请杭州的几家文学刊物的编辑来给我们讲讲课，

辅导一下，同时想编一张诗传单，开辟一个小小的园地。后来便决定自办诗刊，并取名《扬帆》，小组成员每人捐两毛钱，用来买纸张油印小报，争取国庆节前能创刊。

为什么要叫《扬帆》？至今我还保存着一份油印的朗诵诗稿《扬帆歌》，曾在杭大中文系的一次文艺晚会上由男女数人朗诵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东风有意，鼓起洁白的征帆，
阳光多情，铺满壮阔的航程。
在十月的早晨，我们扬帆出征。

我们愿作时代的弄潮儿，
在惊涛骇浪里
赢得斗天的胆，擒龙的心……

风中的勇士啊，浪里的骑兵，
让我们以诗页作帆，诗行作桨，
迎着汹涌的波涛奋勇前进！

那年9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吴晓花了整整一天一晚，埋头收集整理修改大家的诗稿，进行排版编辑。稿件较多，编成16开8版，用了4张蜡纸，几乎全是由我一个人刻写的，因为钢板只有一块。刻蜡纸的技术是我在乡下插队时为公社革委会编印《双夏快报》和《围海战报》时学会的，我还带来了一副专门的花样铁笔，可以绘制各种线条、图案。创刊号印出来了，感觉挺不错的，图文并茂，双色套印，报头是两个红色大字：扬帆。可惜的是，现在我手头没有这期创刊号，也不知何故没能保留，最早的已是第三期了。因而也说不上创刊号上有哪些诗歌，估计其中有我的那首《当我佩上大学校徽时》。

诗歌兴趣小组的活动比较正常，一般半个月大家碰一次头，利用课余时间，每人拿一把带扶手的木椅子，到操场一角的树荫底下围坐，念自己近期新写的诗歌，请大家来评论，提意见，帮助修改。因为每

个人都必须拿出新作，便有所压力，硬逼一下有利于创作并提高。有时候同学们商定，利用上午四节写作课的整块时间，集体到校外去走一走。我们每人备一匹“马”（借来自行车），从杭大中文系出发，沿着保俶路至西湖边，长途骑行，一直到苏堤、花港，正值秋高气爽，杭州最佳季节，心旷神怡，灵感勃发。记得好像是1978年11月，我们在满觉陇的石屋洞举行了一次活动，一边喝茶，一边交谈。那时的石屋洞游客很少，非常清静，就只有我们十几个扬帆诗友在那儿高谈阔论，探讨诗艺。后来在第三期上有一则这次活动的消息，还有一篇短评《观扬帆初航》，作者史平，不知道是不是余刚所写。

当时刊载在《扬帆》诗刊上的诗歌，以反映校园生活的居多，还有抒写青春、爱情、友谊以及人生哲理方面的，也有写家乡和亲情的，后来慢慢开始触及到社会现实题材。总体说来，都比较浅显直露，内涵不足，表现手法也很单一。

《扬帆》诗刊的编印逐步走上正轨，同学们的作品在上面纷纷亮相，作者包括：张德强（强弓）、吴晓（石流）、王自亮、余刚（墨痕）、余永定、毛建一（剡剑）、田伟、杨甘霖（甘欲洒）、王依民（晓鸣）、祝骑云（禾苗）、张也频（一弛）、陆修钗（巛岚）、曹爱光（冰凌）、蒋学基、贝莉莉（黎黎）、陈志峰（之风）等。通常由我与吴晓、余永定选稿编辑，我负责排版、刻报头、标题和题花等，诗歌正文大多由王依民刻写，他的字非常漂亮，刊名“扬帆”二字就出自他的书法。而油印则一般是杨甘霖、祝骑云等人操作。

随着《扬帆》诗刊的编印发送，扬帆诗社的影响在日益扩大，不仅在杭州大学校园内名声鹊起，而且在杭城的文学圈、新闻界也声誉日隆，作为浙江的大学校园中相对搞得比较出色的学生民间社团，扬帆诗社广受关注。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东海》杂志1979年2月号刊载了《扬帆》诗刊第3期上我的一首《真的勇士》，那是写1976年“天安门诗抄”事件中的“四五”英雄的，后来又用了《扬帆》第4期上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诗作《闪光的路标》。1978年底，杭州市文联主办的《西湖》杂志的诗歌编辑胡丰传特地到杭大来找我们，准备在第3期上专门介绍扬帆诗社的情况，选用5首诗，包括吴晓的《向

广场》等，他还亲自撰写了编者按，前来征求我们的意见。这真让我们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浙江日报》副刊的编辑还约请扬帆诗友为元旦特刊的国画配诗，后来我和王自亮的诗见了报。

杭大中文系的老师当然对扬帆诗社更加厚爱。写作课老师余荇和文艺理论课老师蔡良骥非常关心《扬帆》诗刊，时不时手把手地加以指导；刘操南教授对大学生自办刊物十分支持，亲自送来了他观看历史剧《大风歌》后所写的6首七言绝句，供《扬帆》发表；远在舟山群岛的浙江著名诗人方牧老师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和一首诗《扬帆远航吧——致青年诗友》。这一切，无疑是对诗社同学们的极大鼓舞和鞭策：只有写出更加优秀的诗作，把《扬帆》诗刊办得更加出色更有特点，才不会辜负长辈们的期望。

1978年底1979年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百废待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展了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开始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批评不良社会现象。《扬帆》诗刊上刊载的诗歌也逐渐尖锐犀利起来，敢于触及时弊，发表政见，同学们写了不少充满批判精神、气魄宏大、令人深思的诗歌，如冰凌的《魔鬼礼赞》、余刚的《为了让白鸽高飞》、晓鸣的《怒涛颂》、石流的《法律，快护卫赤裸的真理》等。1979年6月20日，《扬帆》还专门编印了一期4版的“号外”：纪念张志新烈士专辑，刊载了10首诗，表达莘莘学子对被四人帮残酷迫害、割喉牺牲的女英雄的痛悼之心。

“诗悼英灵，歌壮征程。”1979年清明节，为了纪念伟大的四五运动三周年，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4月4日下午，扬帆诗社在中文系大礼堂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得到团委学生会的支持。到会共有120余人，包括各年级的部分同学和一些老师，也有杭大外语系、历史系的诗歌爱好者。杭州诗人陈继光、楼奕林、董培伦、谢鲁渤、高钊、张新等也赶来助阵并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会上先朗诵了几首天安门诗抄，集体表演了配乐诗《周总理，你在哪里？》，然后是扬帆诗社成员上台朗诵各自的习作，中间穿插独唱、笛子及手风琴演奏等节目，活跃气氛，最后以《扬帆歌》

结束。这次活动搞得颇为成功，《杭州日报》文化记者作了报道。

由于诗稿越来越多，质量也大有提高，原先 8 版的诗报形式已不适应，于是决定改版，变成杂志，增加篇幅，装上封面。第 10 期（1979 年 9 月）正好是扬帆诗社成立一周年，就出刊了 24 个页码的一本杂志，还设了目录页，很像个样子了。

与全国多家兄弟院校大学生社团的交流日益增多，从东北吉林大学言志诗社的《赤子心》到西南贵州大学的烛光诗社，从北京师范大学的《初航》到广州中山大学的《红豆》，从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到西北大学的《希望》，等等，起码有三四十家刊物在互相赠阅。对扬帆诗友来说，影响最大的要数北京的民刊《今天》，它让我们接触到现代象征派诗歌，读到了北岛、顾城、舒婷、芒克等人的朦胧诗，大家感觉耳目一新：原来诗歌还可以这样写！1979 年 10 月中旬的某天，扬帆诗社贴出海报，要在中文系举办一次小小的展览，展出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文学刊物和其他民间刊物，受到了同学们的极大欢迎。我们把教室布置了一番，课桌排作一长溜，分摊那些油印的、打字的、铅排的、来自天南海北五花八门的学生刊物，使同学们大饱眼福，获得启发和触动。

1979 年 7 月，我们连续收到了两封寄自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编辑部的来信，他们建议十几家比较活跃的自办刊物联合创办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文学期刊，综合性季刊，可以采取轮流编辑印制的办法来操作，旨在尽大学生的能力为社会做点事，为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些贡献，同时有利于各院校之间的相互观摩，学习交流。当时他们提议有 12 个发起单位，包括北京大学中文系《早晨》、北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南京大学《耕耘》、中山大学《红豆》、贵州大学《春泥》等。

扬帆诗社就这件事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们作为发起单位之一参与创办大学生文学季刊，编辑方面应该没问题，轮到我们班是可以胜任的，届时也可请教老师或杭州的老编辑。关键是要求印刷 10000 份（每期十万字），经费难以解决，发行也比较困难。但最后大家决定回信表示赞同，一旦各校确定后，我们会全力以赴想方设法

完成任务。至于他们约定暑假期间各校民刊派人到北大开会商谈一事，有点难度。扬帆诗社成员中没有北京籍的同学，若专程赴京我们穷学生的经济条件又不允许。怎么办？后来听说同年级的查晓刚同学假期要去北京探亲，我们就全权委托他去北大参加会议。但结果那天他正好有事去不了，因此情况不明。幸亏也是发起单位之一的杭师院《我们》杂志去了人，开学后主编陈越光来杭大给我们简要介绍了与会情况。

筹办全国性大学生期刊的预备会议于1979年8月10日是在北大学生张桦家里召开的，大约十个同学到会，互相介绍了各自办刊的情况，一致同意联合创办刊物，轮流编辑，可收取一定的工本费，立即起草相关宗旨、决议及致全国高校同学的公开信等。会议决定，这本季刊定名《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珞珈山》承办。与会全体代表草拟了发刊词：

“这一代，他们已经获得了这样多的名号：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战斗的；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这一代，有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睁开眼就看见五星红旗，从小就呼吸着新中国的空气。可是，真理本身并不能代替对真理的探索……这一代，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追求，幻灭，迷乱，痛苦和欢乐，爱情和仇恨……于是，这一代有了他们神圣的使命：他们是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人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的继承者，他们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的见证人，他们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绚丽未来的浩荡新军。……我们的习作将唱出这一代人以及他们联系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将描绘出这一代人以及他们所向往和投身事业的风貌，也将在这一代对艺术世界的探索中留下自己的脚印……”

创刊号即将问世，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高伐林、王家新给我来信，要求先预收一部分订户的钱汇给他们，否则印刷厂不同意开印。我连夜写信寄发已预订的各地区师专，请他们收款，另外通知本系各年级的班长协助登记交钱。经过努力，终于在11月初收交了200元汇至武汉。然而，风云骤起，形势突变。《这一代》出刊遇到了麻烦，或许是厂家得到什么旨令，印刷过程中百般刁难，甚至抵制，印到一半竟

然扣下不印了，印好的那部分又无处装订，连街道工厂也不敢帮忙。莫非真是什么反动刊物吗？究竟哪篇文章冒犯了当局，直至 35 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不明白。

《这一代》创刊号（也是终刊号）终于寄到了杭州。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中间少了 16 个页码，根据目录，正好是一辑诗歌“不屈的星光”，包括徐敬亚的《罪人》、黄子平的《脊梁》、王小妮的《闪》、超英的《沉默的大游行》等，第 96 页之后也不知少了多少页，翻译的日本电影剧本《犬神家族》才印了个人物表，正文都还没开始。扉页上临时油印了几句告读者书：“由于大家都能猜测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为了让寄到杭州的一千册刊物及时送到读者手中，扬帆诗社的同学全体出动，在会议室里打包寄发，邮往全省各地，同时抄写了《告读者书》贴在布告栏上，请同学们谅解。这些缺页的刊物反而激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好多同学等在校门口，争购这本也许会成为历史文物的唯一一本大学生联合自办的文学期刊。谁知这件事引起了校方的不安，把我叫到中文系办公室，要我们停止发行，但又不能使人感觉他们压制民主，提出两条：一是撕掉广告，二是今天别在本校卖。我立即和诗社其他同学商议，为了不激化矛盾，转移策略，我们决定到另外大学去发行。还未走出东门，几十本刊物就被抢光了，我们赶紧捧着书包乘车前往浙江大学，在大门口地上摊开广告，很快有同学围上前了解情况，于是，几十本刊物又被一抢而空。

诚如《告读者书》所云：“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缺并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缺！”我在第 13 期的《扬帆》诗刊上写了一首《不折的冬笋》：

青春不折
刚直是你生命的精魂
探索是你自然的本能
向往着自由之春
你永远不会停止抗争
未来必定是翠竹青青

但是，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情势下，《扬帆》诗刊终于难逃厄运。到了1980年初，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姜新茂老师找我谈话，委婉地希望我们不要再编《扬帆》了，由系学生会出面另办一本综合性文学杂志。因为根据最近中央的精神，一律不允许搞民间刊物，不能搞“四大”了。呜呼！《扬帆》必须停刊，接受“招安”，合并于官办刊物。我想，这或许与最近几期刊载的诗作锋芒太露也有关系。例如第11期上的《我没有信仰》（小子）、第12期上的《唱给失望》（强弓）、《哀长城》（石流）、《在省府大楼门口》（甘霖）、第13期上的《和民主约会》、第14期上的《迟送的挽章》等诗，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最终，1980年4月编印了第14期之后，《扬帆》诗刊便寿终正寝，再也没有第15期了。

1980年5月30日，我写了一首《无题》诗，寄给吉林大学的诗友们：

这是最后一次远航
它将落下篷帆，收敛翅膀
不是因为害怕汹涌的波浪
而是出于无可奈何的惆怅……

徐敬亚在课间操时收到我的信，当即在我的诗行左侧挥就一首诗，说：

落下帆
告别了风
就拿起笨重的桨来
把整个大海搅动……

王小妮写了一首《这消息……》：

没有什么。
一切如同每一个夜宵。
照旧写诗，伏在那巴掌大的小桌上，

那厚厚的一叠白纸，
忽然给我带来慌乱的烦恼。

他们7个人每人都写了一首诗寄给我们，以示安慰。

是的，帆不再扬了，并不意味着从此停下诗笔。诗照写不误，而且要写得更加精彩，更加犀利，更加沉郁，更加深邃。

确实如此，同窗学友没有忘记扬帆时期的执着，依然埋头探索，诗笔越来越雄健。毕业后，扬帆诗友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多数没忘写诗。我和吴晓、王自亮、余刚、毛建一等一直在诗路上跋涉，成绩斐然，出了好几本诗集。杨甘霖近年也重新拿起了诗笔。其他同学尽管不再写诗，但诗情依然，诗意更浓，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非凡的业绩。对此，我深感欣慰，毕竟我为扬帆诗社付出过青春的心血，也蒙受过无奈的责难。

30年后，扬帆诗社的部分同学又聚在了一起。

[返回目录](#)

差一点到口的美食

—杭州大学中文系 62 级 吴宗兴

1962 年考入杭大中文系的时候，3 年饥荒还没有过去。

我们是一群食不果腹的饥民。于是入学不久便成立了油炸饼小组。每天晚上，饥肠辘辘之时，派人去校外，或直接从绑扎不牢的竹篱处钻出去，买个油炸饼吃吃。有时，外面只有番薯，也照样买回来填一下肚子。如此，在半饥不饱的状态下上床睡觉。

吃，是当时全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那一天，好事来了，我班小 D 在一片水杉林里抓到一只黄鼠狼。大家马上想到了肉的香气：差不多已 3 月不知肉味了吧？于是，众志成城，迅速剥了黄鼠狼的皮，将它放到陶罐里去蒸来吃。

当时的食堂是大家买米蒸饭，一人一个黑乎乎的陶罐。大家必需在早饭后买好米放好水，放进蒸笼，中午才有饭吃。米是不淘的了，那么奢侈，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淘米呢。那只倒霉的黄鼠狼也被我们找了一个陶罐一起放进蒸笼里了。

中午涌进食堂，大家翘首以盼，迫不及待。等小 D 把罐子打开，刚想伸筷子抢它一块时，只闻得一阵令人恶心的臊臭，扑鼻而来。大家赶快把筷子缩了回来。动作快的一个，连忙去水龙头处洗筷子去了。

大家对视傻笑。一罐美食倒进泔水桶里了。

事后一想，不去掉黄鼠狼臊臭的部分，也没有除腥的黄酒姜蒜，怎么会好吃呢？

3 年以后，形势好了不少。大家开始有肉吃，各种消失的食物又出现在食堂里了。这一切，要拜托刘少奇、邓小平。没有他俩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农民的积极性不可能调动起来，我们也将永远处在饥荒时代。

而刘邓的功绩，却被作为罪状，在文革中遭到令人发指的迫害。

人民的心中，有他们崇高的地位。

[返回目录](#)

那些年，那些关于鲁迅、关于演戏的记忆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岳耀勇

一个多月前那个教师节，我组织了一场我大学老师汤洵的新书《西溪路五十六号》的阅读分享会读书岛札记 86：一张老照片里的大学记忆。为了使这场分享会有看点，我找出一张 40 年前我在大学时和同学们演出话剧《在酒楼上》后的合影，并找来了照片上的几位同学。那天，这张黑白照片勾起了同学们的记忆，大家七嘴八舌，意犹未尽。同学马华甚至哼唱起戏里的小曲。

于是，有同学建议，你们当年学生剧社的同学应该都写一篇回忆文章，结集成书，一定非常精彩。恰好，今天是鲁迅先生诞辰 140 周年，而《在酒楼上》则是 40 年前我的同学们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 100 周年编排的独幕话剧。于是，这篇回忆文章便顺理成章地出笼了，以纪念先生的诞辰，纪念我们逝去的青春年华。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1977 年冬考试，1978 年春入学，史称“77 级”。1981 年是我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先生诞辰 100 周年。在中文系师生眼里，鲁迅是圣人一般的存在。新生入学第一个学期，都要去绍兴参观鲁迅故居，我们曰之“朝圣”。所以，作为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精心准备了献礼的节目，把鲁迅先生作品《在酒楼上》改编成独幕话剧。

《在酒楼上》是鲁迅的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 1924 年 5 月 10 日《小说月报》，后收录在小说集《彷徨》中。《在酒楼上》讲述了主人公吕纬甫从热血青年到意志消沉文人的转变，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的形象及心态作了深刻的探讨剖析。

鲁迅先生有 3 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收录了几十篇短篇、中篇小说，改编哪一篇是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我的同学黄海滨出生于温州一个文艺世家，特别喜欢戏剧，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剧社的发起人之一。他避开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阿 Q 正传》

《祝福》《狂人日记》等鲁迅代表作，而选择了普通读者相对生疏的《在酒楼上》。把小说中写到的周君、吕纬甫这一对当年的热血青年重聚在一石居酒楼的故事演绎到舞台上，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



黄海滨写好剧本后找到了我和吴雪景。我们 3 个人是当年杭大中文系学生剧社的“铁三角”，已经合作过好几部话剧。大家一拍即合，一致同意用《在酒楼上》向鲁迅诞辰 100 周年献礼。黄海滨是当然的导演，我扮演吕纬甫，吴雪景扮演周君（也就是小说里的“我”，鲁迅的形象）。还有 78 级的马华、徐敏扮演琴师和阿昭，77 级的陈红捷、卫军英扮演长庚和慰老爷，79 级的朱杰、杨勇和 80 级的王家庆、翁迪明扮演堂倌、酒客，78 级的张子帆担任美工，陈叶薇负责场务、道具。



当然，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上舞台。杭州大学中文系历来有演艺传统。上世纪60年代，杭大中文系学生剧社就曾经改编排演过大型话剧《青春之歌》，并到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演出多场。我们进入杭大中文系后，继承了前辈的演艺传统，也组建了学生剧社，排演了不少话剧。我记得有黄海滨编剧的《钱江怒潮》《黄蜂》，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俄罗斯话剧《大雷雨》，有王旭烽（后来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编剧的《闪烁》等等。

当时参加剧社的同学们都非常热衷于演戏。白天上课看书，晚上闹哄哄排戏，直到深更半夜，玩得不亦乐乎。一些只有一两句台词，或者根本就没有台词的群演，也一场不拉地天天晚上来参加排练。大家把自己学到的文学和戏剧知识在舞台上展现出来，把自己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热血青年的狂放在舞台上尽情发泄出来。记得有一次演出黄海滨编剧的话剧《黄蜂》，我和同学郑伟中饰演一对先后被逼疯的父子，寓意十年动乱对人性的残害。因为入戏太深，疯狂的眼神和满台打滚的场景居然让外系同学看得目瞪口呆。这种舞台实践不

仅是沉溺于书本的年轻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发泄，而且对于理解这些经典文学和戏剧作品，有明显的帮助，让我们从本质上了解了舞台和戏剧，了解了鲁迅作品“匕首和投枪”的意义。

但是，这次演出《在酒楼上》与过去剧社在中文系的自娱自乐有所不同，最后是要向参加浙江省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代表汇报演出的，而这些代表都是来自全国和全省的鲁迅研究专家，马虎不得。所以，中文系领导非常重视，专门请来了20年前主演《青春之歌》并对鲁迅作品有深入研究的中文系老师陈坚和浙江话剧团导演戈辉指导我们。在陈坚老师和戈辉导演的指导修改下，我们这个独幕话剧更加精炼突出，我们的演技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陈坚老师（左一）、戈辉导演（左二）指导排练

1981年10月26日，浙江省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当时的浙江省委副书记薛驹、省委宣传部长商景才、省文联主席黄源以及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李何林、副会长唐弢、华东师大教授许杰等120多位鲁迅研究专家出席讨论会。27日晚，学术讨论会代表在浙江展览馆文化会堂观看了我们演出的独幕话剧《在酒楼上》和短诗剧《过客》。演出后，黄源、唐弢、许杰和全体剧组成员合影留念。

很可惜，这张合影始终没有找到，只留下在杭州大学大礼堂演出后的合影（下图，前排左起：陈红捷、杭大中文系副主任张颂南、卫军英、马华、杨勇，后排左起：我、陈叶薇、徐敏、朱杰、黄海滨、吴雪景、张子帆、王家庆、翁迪明）。



演出后，杭州大学校报记者到宾馆采访了著名鲁迅研究专家许杰、唐弢。许杰教授对《在酒楼上》表示高度肯定，认为“改编者体会了作品的原意，没有违背原作的精神，这是费了苦心的。把鲁迅的这篇小说搬上舞台很不容易。现在话剧处理阿昭的命运就比较好。演员也演得不错。”唐弢也认为，“作为学校的业余演出，是很不错的。阿昭、吕纬甫都演得好。”同时，他们一致认为，“剧本既然要放鲁迅，就要把他完全放进去。现在这样，周君作为鲁迅先生的形象，不太突出，没有戏，较为被动。”

一群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一群鲁迅研究的顶级专家面前，并没有出丑，还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令我们这些即将离开大学的学子兴奋

莫名，几夜睡不着觉。至少对于我来说，这是大学四年最高光的时刻。直到今天，我依旧铭记在心。

时光已经过去 40 年，又是鲁迅诞辰纪念日。再过 4 个月，明年的 1 月，就是我们大学毕业 40 周年。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都已垂老矣。但是，我们的记忆依旧清晰。



毕业前夕，杭大中文系学生剧社的成员们曾经给我签过一张明信片。左下角那个“杭大中文系学生剧社纪念”的异型篆刻似乎是 78 级同学任平（如今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的作品。其中有一位同学写的 5 个字一直留在我心里：“戏子做到底”。40 年下来，我深深地感悟到，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我的“戏子”岁月。我们辉煌过，也低落过。我们欢乐过，也痛苦过。如今再来读鲁迅，再来读《在酒楼上》，又是一番不同的见识。对吕纬甫这个我曾经扮演过的人物，又有了不一样的认识。这就是经典的力量，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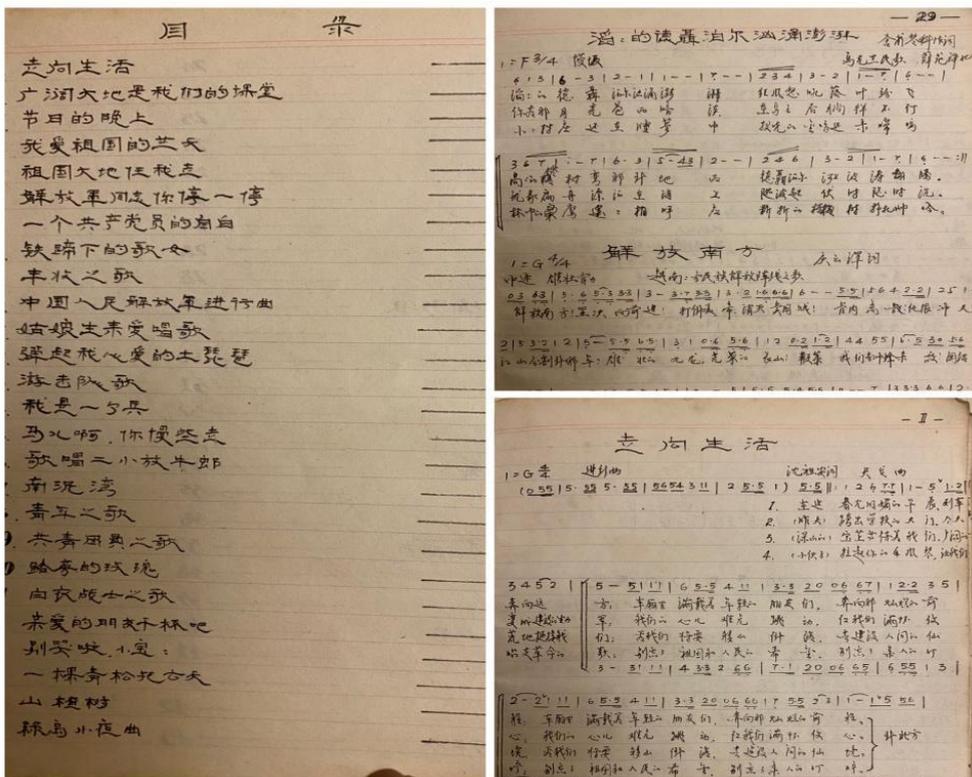
我们毕业以后，杭大中文系学生剧社就消失了。又过了十几年，连杭州大学也消失了。今天我这篇文字，就当做杭大中文系学生剧社集体回忆的开篇吧！希望旧日剧社的同学们一起来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让后人领略我们曾经的风采。也许，这些戏梦人生的回忆积累起来，会成为一本不亚于《120个回望》的好书。我等待着！

[返回目录](#)

校园，青春，歌声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赵红

放在我面前的是一本手抄歌本 — 近 50 年来，我一直保存着的这本手抄歌本之一，也是最早的一本 — 1974 年读高一时的时候。高中毕



业下乡，我抄歌的爱好也带去了乡下，两年后考上杭州大学，这爱好不仅仍然保留，且发展势头更为强劲：抄歌本子换成了半精装的硬皮本，先后抄录了 170 多首歌曲，还细心地编辑了目录（上图）。

这期间收集的内容广泛得多：除了一些我国的经典歌曲，如“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等，以及反映时代特点的歌曲如“赤脚医生之歌”、“广阔大地是我们的课堂”等之外，许多有代表性的外国歌曲也被我收入囊中，像一些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滔滔的第聂伯尔汹涌澎湃”、“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它国家歌曲“深深的海洋”（南斯拉夫）、“哎哟妈妈”（印尼民歌）、“红河谷”（加拿大）等等，现在都记得这些歌为自己、为周边同学带来的激动心情。

作为班级首任文艺委员，我劲头十足地刻钢板蜡纸，将当时颇为



流行的印度电影《流浪者》三首主要插曲油印出来，发给全班同学。每首歌曲结尾处还洋泾浜兮兮写上“THE END”。唉，读书不用功，尽玩了。

1978 年秋，入学半年后，同学之间逐渐熟悉起来。学校和社会一样，改革思变，气氛活跃，课余时间，各种研讨座谈、创办杂志如雨后春笋，文艺演出，乃至交谊舞也渐次兴起。前些天我偶尔翻到那时的家信，里面居然写道：“... 系团总支规定，12 月 26 日之前，每个团支委都得学会跳舞。”若不是信上所写，真不相信系团总支曾下发过这么有趣的指示。跳舞用得最多的曲子是《青春圆舞曲》，通常是在教学楼一楼最靠西南面的我班教室里，将课桌椅拉向四周，空出当中一块，和着青春阳光的旋律就跳将起来。当时各班气氛都挺热烈，女生热情地教，男生积极地学。记得一天晚上在系大礼堂，当时三班团支书何包钢跟我学跳交谊舞，但见他右腿扭在左腿的后面，僵直着腰问说：我如何转过脚来？我说你就放松点，随着旋律节奏，腿换过来就行了。他别扭站着的样子，逗得我哈哈大笑。

一天，系里通知说要举行文艺演出，各班起码准备一个节目。这事自然就落在班团支部份上。我们班 20 个人只有 3 个女生，于是团支书朱红炜同学就找到我商量怎么办，我俩盘点了一下各自的人脉资源，想出一辙：当时在地理系就读的我在杭十二中的高中阙同学，原是校文宣队的男主担当之一，跳舞时扮演《红色娘子军》里的党代表洪常青，请他来给我们当导演还不是小菜一碟；演员么，就地取材，因为另一女生华坤正在病假中，因此就我和朱红炜俩人，红炜爽快人，马上拍板：排一个节目：跳舞。说干就干，我马上跟阙同学取得了联系。阙同学不负期望，每天下午课余时间骑着自行车从学校本部赶到位于文二路的政治系，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我们两个认真地学，三人齐心协力，捣鼓出了一则双人舞《唱支山歌给党听》，在临近演出的前两天，我们终于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全曲动作，在全系文艺演出中成功出演。演出是在当时政治系的大礼堂兼饭堂，我和红炜姐在不小的台上翩然起舞。现在说起此事，红炜姐开心地回忆道：“那次演出我们好像穿的是黄军装，涂了个红脸蛋，上台很自信的美了一把。后来听说学校希望尽量多的同学上台表演，就定了个大合唱去（参加学校文艺汇演），不然，我们这个节目也有机会上校级演出呢！”现如今功成身退的红炜姐成了省老年大学舞蹈队的队长。

这次演出各班都拿出了绝活，印象深刻的是三班田路同学的独唱《延安颂》，他出色的男高音一开腔：“夕阳 - 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 - 映照着河边的流萤...”高亢明亮，很有气势，甚是好听。后来听说他家兄妹几个都擅唱歌，妹妹田鸣当年就是中央歌舞团著名歌唱演员，和当时的搭档张西珍组成女声二重唱。每天下午课后，同学们出来到操场活动，广播里便想起了她俩嗓音清脆、旋律优美的合唱《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我把心儿献给祖国》、《校园的早晨》...，还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她们两人的青春倩影。37年后，77级老同学组织去欧洲旅游，我才第一次见到年轻时的偶像田鸣本尊。

1978年底，为了参加杭州大学文艺汇演，系里组织了由76、77、78级三级同学组成的系合唱团，团里为首的有杨爱群师姐。杨师姐容貌秀丽，歌声甜美，堪称一绝，平日里既亲和，又有号召力，还参与了话剧《于无声处》的演出。前些天与杨师姐聊天，她还还原了当时的一些情况：政治系合唱团团长兼指挥是杨师姐的同学李彪，朗诵是她同学楼献，领唱有4人：田路、杨爱群、吕有志和何伟，后两位也是杨师姐同学。四段合唱曲，每人领唱一首。合唱团员100人，排练主要由杨师姐他们召集，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到晚饭前，在我们系教学楼二楼大教室。指挥李彪至今仍对此留有美好印象。“合唱排练和演出的全过程都得到了校宣传部、团委、广播室，以及系领导和团委的支持。录音机是系里事先联系好，我骑自行车到广播室找一个外语系的美女同学借的。片子很重，她态度非常好，借用时间不限，还教会我如何使用，挺支持我们的，给我留下了很深很好，很美的记忆。”正式演出是在学校本部大礼堂，我们拉出的节目正是平日里练熟了的《长征组歌》，记得有“四渡赤水出奇兵”。我们阵容整齐，合唱有力，颇有气势。当指挥有力的臂膀在空中划下最后一个音符时，我们的声音尚在空间回响。紧接的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时，大家明白了，这次比赛的第一名非我们莫属。

随着国家的改革深入，校园的氛围更趋开放，各种文艺思潮也纷纷涌现。我抄写的歌曲中多了好些港台歌曲，最著名的有“香港之夜”、“月亮代表我的心”、“千言万语”、“一封情书”等等。港

台歌曲主要是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和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邓丽君的歌曲那时被称为“靡靡之音”，还是很有争议的，我们只能偷偷地听。我一直保留着21首当时抄录的邓丽君歌曲，因年代久远，发黄的纸张上钢笔字迹已淡，有些因沾水而漫漶，但邓氏特有的嗓音和气声唱法，当时真使我们大开了眼界，听起来如同天籁，激荡心怀的那种感觉，清晰如昨。

跳舞此时已成日常。听说二班男生史晋川新买了一台日本东芝双卡收录机，也有一些世界名曲伴奏带。我周日下午从家里回到寝室，几位同学经常怂恿我向史晋川借录音机，史同学也很配合，总是提着收录机送到我们寝室，送给大家一下午和晚上的欢乐。

话说上一年我和红炜姐的“成功”出演，确切说是较为顺当地将一首曲子跳了下来。但就是这么第一次演出，为我们带来了小小的名气，也带来了压力。第二年的系文艺汇演任务名正言顺地落到了我头上。这时，我已篡权担任了班第二届团支书，蒋泰维同学为第二任班长。我就跟蒋同学商量班里出什么节目。蒋同学倒是挺干脆，说，我会夏威夷吉他，要不你唱歌，我伴奏吧！最初听了这建议，没啥感觉，等到几天后蒋同学从家里搬来了吉他，放在教室里摆开阵势，悠扬动听的吉他声回响起来时，我和在场的同学简直惊呆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夏威夷吉他。

夏威夷吉他外形与古典吉他类似，但与后者的弹拨方式不同。只见蒋同学将吉他平放在双膝上，左手持一块铜质金属滑棒按弦，右手弹拨琴弦，乐声叮咚响起，音质柔软，旋律美妙，很是动听。我们就这样练了一阵子，直到演出那天。我当时唱的是自学的两首歌，一首是朝鲜童谣《小白船》，另一首意大利那不勒斯民歌《桑塔露琪亚》。只记得众目睽睽下，我哆里哆嗦地站到讲台位置，面对台下那么多张直面我的同学的脸，心里既害怕又难受，脑袋一片空白。随着身边蒋同学的伴奏琴声响起，我条件反射般地唱将起来，过程中声音颤抖，头热冒汗，完成任务般的唱着，只觉得自己没唱好，终于唱完了，我赶紧逃离。哪知道同学们的反应与我自己的感觉完全相反，我溜下台之后大家先是安静了一下，之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鼓掌声。之后几天，

我在课间时，或下午课外活动时，好几位同学主动找到我说，他们从未听到过这么好听的歌。甚至毕业之后，都有同学说当时我唱的歌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二年级的下半学期，政治系一分为三：哲学、经济、法律三系。经济系教政治经济学的吴征询老师，原先在部队就是文工团歌唱演员，一口纯正标准的女高音，经常在年级开大会之前指挥大家唱歌。吴老师富有指挥经验，随着她双手有力地挥动，加上她好听的歌喉，常常带动大家的情绪，带领同学们唱了好多当时的青春歌曲。吴老师还给我们排练了女生小组唱，唱什么歌我已经忘记，只记得我们一排女生站在台上，因为大冬天的，都穿着棉衣上台唱歌（下图。右三为作者）。



系合唱团还保留着，只是因为杨师姐他们这届已经毕业，人数少了好多。第二年春天我们又将参加学校的文艺汇演。于是，在吴老师的带领和指挥下积极排练大合唱，唱什么曲目已经忘记，得了什么名次也全无印象，只记得快到演出时，不知是谁很有法道地从海军部队借来了演出服——女生蓝裙子，男生蓝色西装裤，全体人员身着的白衬衣自备。我那时梳着两根长辫子，穿着朴素好看的演出服，感觉甚是青春朝气（下图。第一排左八为作者）。



说来好笑，我母亲的一个朋友得知我的唱歌爱好，竟主动拉媒牵线，给我介绍了一位沈阳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我那时懵里懵懂，只觉得自己年龄尚小，对此不感兴趣，最终不了了之。

时光倏忽，转眼到了我们毕业典礼那天。毕业典礼是在通常上课的主教学楼二楼最西面的大教室举行。学校领导代表、系领导、主要任课老师等庄重地就座前台。老师、同学好几位代表上台慷慨激昂地讲了好些话，内容已经忘了，唯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大家全体起立，同唱《毕业歌》。那天大家的座位不同以往上课那样：女生在前男生在后，而是全部打乱，只记得我站在教室靠南面的后端，边上基本是高个子男同学。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歌词既出，心中就翻卷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悄悄环顾四周，同学们个个立正挺胸，神情肃穆，眼里泛着晶莹的泪光，放声唱道：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2021年10月11日于杭州小和山）

[返回目录](#)

第五章：师长

我的老师和师傅谢瑞淡先生

—杭州大学经济系 78 级 罗卫东

【作者按】本文是为谢瑞淡教授文集《晚晚余晖》写的序言。谢老师已经于 2012 年故去，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对此文稍作修改，以资纪念。

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老师很多，师傅则几乎没有。我很幸运，有老师也有师傅。

谢瑞淡先生，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师傅。

先说作为老师的谢先生。

我于 1978 年 10 月进入原杭州大学政治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读本科，两年后转入复建的经济系，到 1982 年毕业，度过了四年难忘的大学阶段。那个时候的学习，条件并不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好书，也没有现在的网络条件。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反而学得很深入、很仔细，感觉很充实。

谢老师是我们主干课政治经济学的老师，主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部分，讲课富有激情而又条理清楚，把深奥抽象的马克思经济学讲得浅显易懂。他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讲课的时候也显示了自己非常深厚的人文素养。他身材矮瘦，面容清癯，但声音洪亮，很难想象如此嘹亮的声音来自这样一个微小且有些羸弱的身躯。他是浙江平阳人，普通话并不标准，但是咬字清晰有力，声调抑扬顿挫，表情丰富生动，授课艺术是非常精湛的，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很多年后，同学们在一起还都会津津乐道当年谢老师在讲台上的风采。当时没有现在这样好的技术手段和条件，没有留下他上课的影像资料，真是遗憾。他热爱自己的教学工作，对研究并不是非常在意，很多好的观点和思想，都没有进一步的展开，但对学生的思考和研究却启发很大。我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基本上是谢老师的课给我打下的。多年来，我都受益于这个良好的学术基础。

谢老师上课上得好是大家公认的，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独如此，而是他热爱真理、追求正义的那种学者品质。大概是八十年代初，谢老师应定居美国的兄长邀请去探亲，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时间，期间走访考察了美国的几个大城市，回来后私下跟我们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恐怕站不住脚，此后，他对教案做了很大的调整和修改。他结合自己亲身观察和感受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现实，坚持对那些已经被教条化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批评。这种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对学生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也获得了学生发自内心的钦佩。

再说一个小插曲吧，谢老师是1924年生人，为我们开课的时候已经年过半百，满口假牙，因是之故，有些词句的发音很是吃力，加上牙医技术不是很好，发爆破音时候，假牙常常会脱口而出，效果十分惊悚，他慌不迭地抢装假牙的动作与神态十分有趣，常常引来同学们满堂的笑声。这个情形今天是历历在目，回想起来，是那么地亲切。

再来说一说作为师傅的谢瑞淡先生。

1982年，我留在经济系担任教师，进入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当时我才19岁，虽然出身在教师世家，非常热爱这个职业，但无论是学养、经验还是对教师工作的理解，都与这个职业所要求的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本科生教本科生，再怎么自我鼓劲也是底气不足的，内心不免惶恐忐忑。记得自己第一次上讲台，紧张得声音变调、直冒冷汗，写板书时候，教室后排估计都能够听得到战抖的手拿着粉笔敲打黑板的有规律的嗒嗒声，三节课的内容不到一节课就讲完，然后是脑袋一片空白。

庆幸的是，谢老师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前辈。系里安排我给谢老师担任助教，这样，谢老师又做了我的师傅。在此后一年里，谢老师真可谓是手把手地传帮带，他把自己的授课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从如何提炼知识点、如何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和学习热情，启发学生的思考，调控课堂气氛，到如何准备课堂讲义，如何写板书，如何优化口头表达……，一一指点。他还给我开出了一份经典著作阅读的书单，定期检查我的阅读笔记。在这一年里，我是一边随堂听课，自觉地观摩谢老师的课堂教学，一边给学生辅导答疑、阅改作业，有

时也受谢老师的委托讲几章内容。回想起来，这段做徒弟的经历对自己后来教书育人的工作是影响巨大的。如果说我自己在课堂教学方面有一些成绩，那么它显然深深得益于谢老师的言传身教。对此，我要由衷地感谢他。

谢老师出身名门，从小得到很好的教育，成年后就读国立浙江大学法学院，离开学校后，除短暂在政府供职，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度过。他虽然学术底蕴深厚，身世颇不寻常，但待人处事一直儒雅谦逊，十分低调，一直到很后来我才从别人嘴里得知他的父亲竟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百岁棋王”谢侠逊。

我满师后独立上课，与谢老师做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同事，先后长达十年时间，这期间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了多方面的巨变，我们共同经历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从他的言行中，我进一步感受到一种古典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他对国家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高度关心，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学生的呵护，对非正义的痛恨，这些都深深地感染了我这个做学生和做徒弟的。我该向他学习的不仅是教书的技艺，更有他作为一个伟大教师的精神品质。知识的进步已经使得老师当年传授给我们的专业知识面临必然的更新，但谢老师的品格对我们的影响则是潜移默化、历久弥新的。

谢老师在年近 70 岁的时候离休，虽然离开了教坛，但又重拾起工作期间得不到发挥的文史兴趣，展示了他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特长。作文吟诗撰联，笔耕不辍，在《浙江大学报》以及其他文史类的报刊上，常能看到他抚今追昔、放眼人生、追忆师友的散文随笔和诗赋小品。这些作品性情高洁、文辞优美，读后给人的感受是亲切、高贵和隽永。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为一个伟大教师的那种卓越才华和品格。我在工作繁忙的间隙，拜读谢老师的文章，即可获得教益，又可放飞心灵，还能体会到老师的殷殷之情。现在这些文章结集付梓，一方面可以留下一份珍贵的值得保存的心灵档案，另一方面也能够让更多的人分享一位老人的智慧。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期待这部《晚晚余晖》文集的问世。

清明寄思 怀吴熊和师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田伟

吴熊和是“一代词宗”夏承焘的学术传人，在唐宋词学、词学文献学、明清之际词派研究、域外词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学术上以专驭博，卓然自立，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词学研究体系，奠定了在当代词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吴熊和(1934年05月-2012年11月02日)，上海人。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文学遗产》通讯编委等。

寒月临窗梦皎洁，西溪闻报痛离别。
大江东去声声慢，烟雨休吟秋季节。
一绝句试作，辛卯年，秋甚。

2012年秋深，浏览钱江晚报时偶见同窗室友王自亮的悼念文章：《铜琵琶，铁绰板，而今何在》，惊悉吴熊和老师辞世。黯然久之，入夜，有淡月临窗，留下这首七言绝句。

近日，遵嘱整理旅次诗草，以备付梓。检点行囊时，手机备忘录上赫然跳出上述诗行，一时看得竟然有些痴了。

又值清明时节，雨声淅沥，吴熊和师的音容笑貌也历历浮现眼前了。他穿的较多的是那种中式对襟棉袄，似乎是留短平头，高高大大的形象，在精研古代汉语、古典文学的学者、教授中，实在是不多见的。尤其是那份自信洒脱的板书，在比中学教室大上许多的黑板上从右写到左，写错了就随手画个圈圈，也不擦去，一堂课下来，正好写满一黑板，好像在告诉我们，作家珍爱的原稿就是这样的。

我们当然深记得他给我们这批经历“文革”浩劫，恢复高考后的首届中文系学生开的课是《唐诗宋词通论》，从韩愈、苏东坡、周邦彦到辛弃疾、陈亮、李清照，从唐宋八大家到豪放派、婉约派，乃至

豪放和婉约的风格、气韵、情致兼具的，那些跨诗界词界的人物故事，他都信手拈来，从具体情节，到思想境界，从身世遭遇，到时代背景，直叩历史和人心深处，那种挥洒自如，鞭辟入里，似春日载阳，几入化境。至于那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诸如江河奔流般的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先生的作品，那确乎是只能产生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背景下的，也只有在大时代、大跌宕的氛围和至死无悔的情感苦旅中，英雄情结和儿女心肠方能如此砥砺融汇，靓瞎人眼睛呵！前可鉴屈子、杜甫，后竞开数千年中华文脉之传承发展。

又如南宋北宋更迭之间的女作家李清照，她既贡献了婉约派的名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又赋出绝不次于“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因此，吴熊和师的课堂行吟，有时竟然同时引发师生间的前世今生感怀，那是经历“文革”浩劫后，师生共同期待的精神狂欢吧，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名师酿就的灵魂鸡汤呵。

多少年后，我在接盘时处低谷的钱江台时写过这样的诗句：

为英雄而生，英雄走不出悲剧
听黄河之水从肩上流过
天上人间，有暗香流动
拈一朵小小的、蓝色的毋忘我

自亮兄行文约记：大学四年来，我们努力在寻找一个范本，就是那种能真正把学问、气度和胸怀打通的范本，其实近在眼前的，就是我们在吴先生身上闻到的这种气息，这种确凿的存在。这种理想人格的范本，随着岁月的更替，更添魅力，更加完整了。信然斯言！叹之，敬之，吴熊和吾师！自亮当年在老杭大扬帆诗社和我等一起棹歌中流，激扬文字过，毕业后历任报社总编、政府官员、名企高管，淡出江湖

后欣然谋得某大学教授一席，也算是沐先生之风吧。爱其岁月积淀，传承有自，内涵外延沉雄博发，文事更盛，并记。

注：

一、大江东去出自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
《声声慢·寻寻觅觅》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作品。吴熊和师是研究唐诗宋词的大师，桃李天下。况值清明时节，江南布谷，有怀斯文，补记。

二、拙作《寒月临窗梦皎洁》七绝体，舍平水韵而用中华新韵，似更符合推广普通话之义。念吴熊和师，穷一生而弘扬中华文脉之本质力量，当不会罪我。

[返回目录](#)

我的学术自传 ——人生路，风雨兼程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元骧

（2019年6月12日）

—

我搞文艺理论和美学纯属偶然。大学读书期间，我酷爱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诗词）。1958年8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刚成立的杭州大学，杭大中文系员工只有六人，书记、主任、两位讲师、两位助教，我就是两位助教之一。“文学概论”是中文系一年级的主干课，这样，领导就分配我去从事“文学概论”教学。大约不到半年，省委决定将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浙师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以及杭州市俄语专科学校等单位组建而成的，师资实力雄厚，但由于解放前无论是浙大还是之大中文系所学的主要是传统典籍，没有“文学概论”课程，自然也没有“文学概论”课的专职教师，“文学概论”教学是由一位从古代文学改行过来的讲师承担，平时从事教学的主要也是他与我两人。两校合并后的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多达360人，还有一千多名函授生分布在全省各地，教学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所以除了教学之外，就根本不可能再从事研究工作，而且自己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搞什么研究。因为当时青年教师搞研究往往被某些领导看作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表现，是走“白专道路”，至少在杭大中文系是这样。

后来业余去搞点研究完全是由于教学的推动，因为在教学过程中常常发现一些疑难问题，觉得自己不加深入研究就很难对同学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在这些疑难问题中，同学们提的最多的是典型问题。由于当时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都非常强调阶级的观点与阶级分析的方法，因而学界有些人也就把典型性等同于阶级性，有些教材里也这样写。但每当讲到这个问题，学生总是会问：阿Q是什么典型？贾宝玉是什么典型？奥勃洛摩夫是什么典型？他们的思想性格难道能代表他们所属的阶级的阶级属性吗？

这样，我就从典型性问题入手开始了我文艺理论研究的艰难跋涉。我当时的想法是：优秀的典型形象“不仅是对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作家的创造，它透渗着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感受、思考和评价”，这就使得艺术典型总是作家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结晶，它体现着作家对生活的一种独具慧眼的发现和理解，“是第一次出现在典型画廊中的独一无二的人物”，就像别林斯基所说的他既是常见的又是独特的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它虽然有阶级的特性但不是社会学的标本，不是以一般阶级的概念所能概括的。我把对这些思考的成果写成了一篇长文章，在《文学评论》1964年3期上发表了，从此在某些系领导眼里我也就成了一个“白专的典型”，还差一点要对我进行批判。这就是我初涉研究所得到的报偿！

1965年杭大文科各系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使我逃过了这场劫难，回校后不久就是“文革”了。由于我不会打派仗，就先是被分派到“造反派”组织所编印的《东方红》杂志，负责编辑“批判文艺黑线”这一栏目，自己也写了一些所谓“大批判”文章，其间还读了一遍《鲁迅全集》，与两位学生一起编了一本《鲁迅语录》；但后来组织头头似乎认为我写的文章学术气太重，不会“上纲上线”，不像大批判文章，又把我调到“教育革命小分队”，先后到嘉兴东栅、余姚梁弄以及温岭城关等地为干部和师资培训班上课。待工作结束后回杭，首届工农兵新生已入学半年了。当时正值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各单位都土法上马开挖防空洞。我由于没有教学任务就安排到防空洞工地劳动，在1973年春的一次劳动中把耳朵震聋了。这样，我又被分派到中文系新创办的《语文战线》杂志社工作了两年。在编辑工作之余还写了一些文学知识和中学语文课文分析之类的文章，并作为函授教材结集出版过两次。在当时这个知识读物极度贫乏的时代，竟颇得到不少中学语文教师和知识青年的欢迎，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自全国各地寄来的热情洋溢的鼓励或求购的长信。

“文革”十年，所见所闻所想虽然也有不少，也深为人性的沦丧而悲愤、人民的苦难而痛心、国家的前途而忧虑，但由于都缺少自己切

身的经历，似乎都算不上是自己真正的人生体验。回想起来，自己的思想基本上还停留在一个童话的世界里。使我对人生真正有所领悟的似乎始于这样两起经历：第一次是，大概从1977年春开始，浙江掀起了一场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帮派体系的运动，窃居省运动办公室主任地位的竟是原来省“造反派”的一个头目。这样，在各单位凡属于他这一派的都成了“革命派”，而与他对立的另一派造反派就成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我在“文革”中什么派都不是，但由于我看不惯“造反派”的某些作为而对之时有揭露和抨击，所以中文系的那些得势的“造反派”就断章取义、去头却尾地抓住我的有些言论，说我“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大大小小的开了十多次会对我进行围攻。我也就义正词严地与他们斗了十来次。这件事情虽然最终以我的胜利而告终，但却使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邪恶和卑鄙！再一次是1982年，当时杭大建造了72套所谓“高知楼”，按规定是分给副教授以上教师的，我当时一家三口居住在22平方的房子内，由于地势低洼，地板也都霉烂了，稍不小心，就会一脚踏穿，而且老鼠日夜横行，有一次用一个老鼠药竟同时药到两只。按照我的情况以及分房方案，我完全可以分到的。可是分配的结果是有些有关系的讲师都分到了，而唯独卡了我一个副教授。这还谈得上什么正义和公道？出于对自己人格尊严的维护和所受凌辱的抗议，我数次向学校打报告要求调离。但不久校领导班子都换了，新领导竭力挽留，我想他们是无辜的，我也就应该给他们一个面子，所以调动的事以后就不再提了。这两件事（比起我们这代有些人的遭遇来说，其实根本算不得是什么）虽然使我几乎十年时间没有安下心来从事自己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工作，但也为我补上了人生必要的一课，使我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变得敏感起来，并懂得了真善美只能是在与假恶丑的斗争中得到发展，它需要我们以自己的行动去进行维护和加以争取，因而对于理想也变得更为执著。

以上的经历都在我的研究中打上深刻的烙印。我在研究中比较强调“问题意识”，我的问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来自理论本身，来自自我教学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这使我养成了不善于追新逐异、跟风

赶潮，而总是以探讨学理、追求学理的完善为目的的兴趣和习惯。所以我每当研究一个自认为有价值的问题时，总是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情来钻研前人的优秀成果，主观上总希望尽可能多的掌握与之有关的文献资料，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来发现和提取它的难点、疑点、争论的焦点和突破的关节点来做文章，力图在继承中求得发展，在综合前人一切合理见解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对于学术的积累和推进起到一些微弱的作用，从不敢撇开传统来侈谈什么“原创性”。二是来自现实，来自自己的人生体验。它不仅使我走出“童话世界”领略到人生的险峻和严酷，而且也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正因为美好的东西在生活中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就更应该在精神上坚定地守护它，因为它会转化为一种动力，而把美的东西重新召唤到我们生活中来；否则，我们真的是没有希望了。怎么去维护和召唤呢？对于我们理论工作者来说，我认为理论研究就是自己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常常以文艺理论研究来阐述自己的人生理想，认为这比抽象谈论人生问题更为有效。这就使得我的研究没有走上纯学术的道路，而始终怀有强烈的人文情怀，虽然我所关注的现实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这种人文情怀却随着自己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的加深变得愈加自觉。这两方面原因形成了我的理论文章这样一个我自己可以肯定的特色：“学院性”、“思辨性”和“现实性”、“参与性”的结合。

二

由于以上原因，我真正沉下心来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还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这样经过将近两个十年的折腾和耗费，我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既然调离杭大已经无望，我总不能把自己一辈就这样陪进去。所以我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安下心来从事教学和研究。从哪里入手呢？当时文艺理论界正在兴起一场关于“文艺主体性”的大讨论，在学生中也颇有争论，所以我就对这问题思考起来。我认为文艺主体论是不无合理之处的，我在1963年写的关于阿Q典型研究的文章中把别林斯基的“典型”是“熟悉的陌生人”理解为它是作家独

特的发现和创造，就表明我的理解中创作活动是离不开作家的主体意识活动的，但认为这不足以否定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个命题。而文艺主体论把“反映论”等同于“机械反映论”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这在很大原因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把“深奥的哲学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以一般常识的观点把“反映”这个有丰富内涵的哲学概念，理解为“照相”和“复制”。事实上，任何反映活动都是一定的主体意识参与下作出的。因为人的头脑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蜡块”或洛克说的“白板”，它潜存着许多以往经验（人类的和个人的）积淀下来的认知结构和思维定势，这就使得任何反映活动都是经由主体认知结构同化、整合而完成的，它不仅是主体契合客体，同时也是客体契合主体的过程。所以列宁认为反映也就是创造，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出于这一认识，当时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想吸取主体性理论的合理因素，对文艺反映论作出新的解释，于是就借用了当时流行的“审美反映论”这一术语，对作家创作中的反映活动在澄清对“反映”这一概念的一般认识的基础上，又结合文艺的特点，作了这样的具体阐发：认为文艺虽然与科学一样，它们作为人们意识活动的成果，都是对现实的反映的产物；但文艺又不同于科学，它是以作家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情感不同于认识，它作为认识主体对于能否满足自身需要的客体所生的态度和体验，所反映的不是事物实体的属性，而是一种关系的属性，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判明“是什么”，向人们展示一种“实是的人生”，给人以知识；而是为了追寻“应如此”、亦即一种人们所期盼和梦想的“应是的人生”。所以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价值的意识。价值是一个包涵的内容非常广泛的概念，像利、善、美等对人来说都是一种价值；但彼此又有所区别：从性质上说，美与利和善不同，就在于利和善都具有外部现实性的要求，都要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求得满足；而美却是一种仅供“观照”的对象，它虽然有实践的指向，但只不过是一种意向和愿望，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发生作用。从形式上看，利、善的观念是居于理性层面的价值意识，是对客体分解把握的成果；而美的表象和观念虽然积淀着

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但却是以感性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想象之中。感性的东西是一个未经知性分解的丰富的整体，所以它不可能以概念、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的方式而只能以生动的直观表象和内心体验等形象思维的方式来对之作出把握，这决定了它只有经过形式的建构，并以艺术形象这种感性的形式才能获得生动的体现。就像黑格尔所说，它们之所以有各自的方式，“既不是碰巧在那里，也不是由于除它之外就没有别的形式可用。而是由于具体内容本身就己含有外在性的、实在的、也就是感性的表现作为它的一个因素”。所以形式对文艺来说不是外在的和外加的，是由内容生发出来的，它与文艺作品的内容有着一种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这些意见直到现在我还在一直是坚持的。但后来也逐渐发现了这些阐释主要还只是对“五四”以来在我国流传的“认识论文艺观”的丰富和完善。还仅仅从反映一维、从认识论的、即“知”的视角去研究它的性质，似乎还是不足以充分的说明文艺的性质。这使得我渐渐发现从意志、实践、从“行”的一维，亦即从价值论和实践论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对于正确而深入理解文艺性质的重要。这不是说我以前完全无视文艺的实践因素，但由于当时哲学界一般把实践狭隘地理解为物质生产劳动，再加上受了黑格尔、克罗齐、朱光潜等人的美学著作的影响，以致把它看作只是文艺活动中的制作和技艺的问题，是到了传达这一环节才出现的工作，而没有从人生论、价值论、伦理学的角度去进行理解。这认识的发展和深化首先得益于现实的启示，我在《探寻综合创造之路》一书的“后记”中曾对自己认识的发展作了这样的回顾：“我的思想认识大概到了1994年才发生较大的变化，现在回想起来，促使我认识变化的深层原因恐怕还是出于对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物欲的膨胀、精神的滑坡，以及由此引发的消费文艺畸形发展的深切忧虑；而直接原因则是在1994年暑假前后偶尔间阅读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以及其他一些人生论著作所得的启发，它使我认识到了从完整的意义上来说，实践不但是一种物质活动，一个生产与制作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人的生存活动”，亦即康德在谈到“实践理性”时所说的“是一种有目的的意志，一种指导人们按照自己的人生理想和

人生目标去生活的行为法则。”它不仅属于认识的活动，而且是属于意志的行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黑格尔所说的：“理智的工作在于认识这世界是如此，意志的努力即在于使世界成为应如此。”以这样的思想认识来进行回顾，我以前所谈的文艺与科学不同，它所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属性，它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展示“实事人生”以判明“是什么”来给人以知识，而是为了追寻“应如此”、一种“应是人生”的愿景，就不应该只停留在从反映的成果方面，理解为只是作家对现实人生的评介性和选择性的反映所要达到的目的，而更应该从它的功能方面，理解为萨特所说的是“对读者的一种召唤”，“对社会的一种介入”。它的性质实际上是属于康德所说的“实践的理性”，其价值就在于为人的行为确立一种有目的的意志。因为“应如此”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这样看来，作家创作就不只是一种认识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意向行为；文艺就其性质来说就不仅仅是认识的，给人以求知的满足，同时也是实践的，引导着人们为实现美好的人生理想去进行奋斗。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像克尔凯戈尔当年所说的“想方设法愚弄或者恐吓那些权威，使他们不敢说：你应该”的社会中，“最重要的这声权威的棒喝”，也恰恰是他所说的“你应该！”因为“惟此方能推动时代的前进”！所以，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当一个作品从作家手里完成，它还是一个“潜在的”实体，而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观众和听众的欣赏，当读者、观众和听众为作品所感染、所打动，并把作家所期望和追求的转化为自己的期望和追求之后，它的价值才能从潜在的转化为“实在的”，作家的创作目的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因此对于文艺的性质，我们只有从“体”与“用”、“知”与“行”、“实体”与“功能”统一的意义上，才能作出完整而深入的理解。当然，对于文艺的这种实践的性质，我们自然不能作简单、狭隘、功利主义的理解，好像判断一个作品的艺术力量就看它是否马上转化为人的行动，对现实直接有所作为；因为文艺作品作为作家创造的美的载体，一种作为“观照”的对象，它只能是诉诸人的情感和想象，所给予人们的也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或抚慰，为人们在生活中增添一份

诗意、一种企盼、一种梦想、一种美好的心愿。虽然这理解和要求可能与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文艺作品有些、甚至是较大的差距，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一种居住（按：隐喻人的生存）可能是非诗意的，只是因为它在本性上是诗意的；一个人可能失明，但他必须保持作为一个明眼人的本性”，同理，就文艺的本性而言，它就应该、也只能是这样。因而人们往往把文艺比作人生的梦，这“梦”虽然被人从以科技理性的眼光认为它是虚幻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而予以藐视甚至鄙视；然而正如俗语“人生有梦才美丽”所表明，这种梦想对于人生来说实在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正是这种追求和梦想，才推动人们去为之进行永不休止的奋斗，去创造美好的现实人生；要是这样的梦想也没有了，那么生命也就必然陷于停滞和枯槁。所以，文艺虽然与科学一样都有认识现实的价值，但就其本性而言却是服务于人的实践的，因而鲁迅把它比作既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又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它照亮着我们前进的人生道路。

三

对于这些认识的推进，我思想上也曾满足过；但深入思考下去，又有一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面前：“应如何”毕竟是一个主观的尺度，如果没有客观的依据，在当今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里，岂不会陷入到价值相对主义？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完善这一理论？以前为我所忽视了的“文艺本体论”的研究，到了这时才开始在我的意识中浮现出来，并发现了它巨大的理论价值。所以自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我比较多的在思考这个问题，试图把它与审美反映论与艺术实践论结合起来来弥补以往认识的不足。现在我就想谈谈这个问题。

文艺本体论源于哲学本体论，从西方哲学史上来看，它是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对象。自亚里士多德从“知识论”的角度把“本体”定义为世界的本原和始基、世界发展的“第一动因”之后，人们通常都从知识论的观点来加以看待。其实，在当时对“本体”的理解除了“知识论”的视角之外还有“目的论”的视角。这是由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从神话发展分离出来不久，对世界的理解深受神话创世说的影响，

把宇宙万物都看作都是“神”的作品，是按照神的理念、范式创造出来的，它的一切安排无不体现神的意志和目的。所以在古希腊哲学中，本体论原本具有知识论和目的论的双重涵义。但是后来人们把两者分割，转而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本体问题，如当时的怀疑学派代表人物皮浪，就是从知识论的观点认为它是认识所无法到达和验证的而对它提出质疑。这思想也为近代怀疑学派的代表人物如休谟等人所继承，以至近代西方哲学对本体论未作深入分析和批判就予以放弃而转入到认识论的研究。那么，本体论的研究是否真的就没有价值、不屑一顾了呢？这首先引发了康德的思考。鉴于自启蒙运动以来工具理性的肆虐，享乐主义成风所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衰颓，促使他对本体论研究重新作出鉴定和评价：他继承古希腊本体论所固有的知识论和目的论的二重性的思想，把本体论区分为“知识本体论”和“道德本体论”，认为知识本体虽不存在，而道德本体却必不可少。其原因就在于它从目的论的意义上确立了人的生存的价值。他把这种道德本体看作是一种“至善”，并从至善出发把道德法则导向宗教伦理，假设一个“上帝”来作为人生实践的需要。

在本体论问题上，康德虽然不像皮浪、休谟那样因认识无法到达予以废弃，而从伦理学、道德哲学的意义上保留了它；但在认为它是认识所无法到达这一点上，他与皮浪和休谟又是一致的。这就使得对本体的理解在古希腊哲学中原本统一的知识论和目的论这两方面内容，在康德哲学中处于分裂的状态。康德把判断力分为“意见”、“知识”（这是柏拉图就已论及的）和“信仰”（这是康德后加的）三种形式，认为“意见”是主客观两方面理由都不充足的，“知识”是主客观两方面理由都是充足的，而信仰则是主观理由充足而客观理由是不充足的。康德自己并不相信“上帝”，他从本体论、宇宙论、目的论三方面都论证了“上帝”并不存在。他把“上帝”视作为信仰的对象，就表明了它在客观方面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它只不过是一种“道德的确实”而非“逻辑的确实”，它只能在人的内心、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找到确证。这种由于目的论与知识论分离所造成的康德的道德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得他主观上虽然力图为人的生存确立一个终极目的，但

在客观上这目的却是虚幻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它永远只是停留在人们的企盼的期望之中”，以致后来被海德格尔视之不过是“无”，一种离形去智的、不可把握的、无限开放的走向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尽管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存在和作用就是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而这种“神圣”到底是什么，“我们至多只是唤醒大家去期待它”，却“无法把它想出来”。正是由于这种本体论自身所存在的虚幻性和空想性，所以，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那里，就索性以批判“在场的形而上学”为名彻底予以否定。这样一来，人也就成了完全失去生存目标和根基的无所依凭的精神漂泊者。

这表明康德复活本体论虽然有它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但他把作为道德本体论的“至善”看作只是道德的确实而非逻辑的确实，它只有目的论的价值而没有知识论的价值，只有主观的依据而没有客观的依据的思想是不可能对本体论做出科学的解释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文艺本体论的研究上真正有所收获，就必须重建它的哲学基础。

怎么重建？我当时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克服康德把两个世界分割而重新寻求目的论和知识论统一的道路。这种统一当然不是回到古希腊的神话创世说，而只有在现实的人的活动中，在活动的人的身上才能找到依据。因为世界是人的世界，它只是对人才敞开的，正是有了人的活动，世界才从“自在”的变为“为我”的，才能成为人的认识、意志和情感的对象，才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成为今天人生存的世界；若是没有人，世界也就回到了洪荒时代。而反过来，人又正是通过自己的活动，使自身得到改造、获得提升，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就在于他有自我意识，就在于他不仅能“感觉到自身”，感觉自己怎样活得好，而且还能“思维到自身”，思考自己为什么活，怎样活才有意义和价值。这样，就形成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必然就具有的两个世界，即“经验的世界”和“超验的世界”，经验的世界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需要而言的物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所追求的是一种“有限的目的”；而超验的世界是相对于人的文化需要而言的精神的世界，只有进入这个世界，人才能找到自己所追求的无限的、亦即“终极的目的”，从而使得在两个世

界、两种目的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不断地把人引向自我超越。这种自我超越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从空间上来看，就在于超越一己的利害关系而进入到别人的情感生活世界，并通过与别人在思想情感上的交流和沟通，意识到自己活着对别人、社会乃至人类历史应尽到什么义务和责任；从时间上来看，虽然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当他创造的价值不仅只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且为社会、历史所承认，能在别人那里得到确证、延续和发展，他的生命也就从有限进入无限、从暂时进入到永恒。这两者不是彼此分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不同于动物的追求自我超越的本性，而使得人的生存自觉成了人的自我意识的最高标志。这是我从人与世界、目的论与知识论统一的意义上对于本体论思考的一个答案，并根据这个答案来看待文艺的性质。大家平时都说“文学（也可以推广到整个文艺）是人学”，它是以人为对象和目的的，哪怕所描写的是自然山水，花鸟虫鱼，在文艺作品中也都是人的世界，人就在它的对象世界之中。所以对于文艺，我们不仅需要从宏观上联系由于人的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己生存世界的关系，而且需要从微观上联系作家与他反映对象的关系以及作家的人格来认识；因为文艺是以审美情感为中介来反映生活的特点的，这使得一切外部世界的东西都只有经过作家的情感体验，转化为作家内部世界的东西，进入到作家的人格无意识，才能在作品中获得真切而生动的表现。这样，我们也就把作家的人格引入到了文艺本体之中，表明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作为人类智慧和良知的代表的作家，是不可能没有这种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人格精神的。认为正是凭着作家的这种人格精神，才能把人们不断地引向自我超越，从而使我们研究和评价文艺的价值属性找到了最终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根据。

根据以上对文艺本体的理解，当时我就以“超越性”作为对于美和美的文艺的一种根本界定，表明要实现文艺回归人生，就是唤醒和激发人的生存自觉，在满足人的感官的享受的时候，又使人从当下的个人生活中超越出来，去思考自己生命终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终极目的相对于有限的、实际的目的来说，也许永远只是一种期望和

企盼，但它却可以使我们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至于当到达了有限目的之后就会陷入迷茫和空虚，而始终觉得前面还有一个更为高远的目的等待我们去完成，从而使自身的生命价值不断地得以提升和拓展。在这方面，柏拉图、中世纪神学美学、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以及后来的存在主义文论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理论资源。但是它们往往都把这种超越性引向彼岸世界，引向脱离现实。与之不同，我们认为这种追求自我超越的渴望本身就是现实人心所固有的，本身就属于人生的一种追求美好、完善的形而上学的冲动。只不过它隐伏在人们心灵深处，直到作家把它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才为人们所发现。因此，在文艺作品中，“应是人生”就不能像反映论文艺观和价值论文艺观那样认为只是由作家审美评价所赋予的，它同时也是作品反映生活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的一个标志。所以，凡是优秀的、伟大的作家一方面都直面人生的，哪怕是最严酷、惨淡的、血淋淋的也不予以回避；而另一方面又与一般作家不同，他在对现状的痛切的感受和描写中无不伴随着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的渴望。因此，他的作品在描写卑琐、空虚、平庸时又成了对卑琐、空虚、平庸的超越；描写罪恶、苦难、不平时又成了对罪恶、苦难、不平的超越；描写压迫、剥削、奴役时又成了对压迫、剥削、奴役的超越。这样，我们就不仅可以把认识论文艺观与本体论文艺观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且也使得以往的价值论文艺观由于缺乏本体论的依据所可能导致的价值相对主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使我们的文艺学成为真正有根的文艺学。

四

但是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有些学者的责疑，认为这是一种高蹈的、脱离实际的理论。这里，除了包含着一定误解、曲解的成分，把它对于文艺性质的阐述理解为改造社会的理论之外，也与“本体论”原本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是超越于经验之上的对于世界存在的终极追问，致使我主要从价值论、伦理学的角度来理解美的超越性，不能使精神层面和现这层面、超验层面与经验层面达到辩证统一有关。以致我对审美超越性的理解虽然从文艺的实践性中引发出来，但结果却反

使得艺术的实践性不能进入生活、落到实处，实现艺术为人生目的和理想。而让我意识到这问题是黑格尔的一句话，他说“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只有在行为里，个性才是现实的”。从而让我想到要使文学回归生活，与生活相结合，只有落实到人的行为才有可能。

“行为”是在一定环境作用下由于机体内部变化所产生的外反应，它一般被归属于“意志”的领域，它不仅只能在现实关系中发生，而且只有通过自身的驱体动作才能完成。这样，就把主观和客观，心与身统一起来，表明作为行为的人总处于现实关系中“身心一体”的人，如果仅仅从精神、思维的层面去理解文艺的性质，就难以使心与身、人与现实的关系统一起来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思辨形而上学。但以往我们在谈到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时，认为文艺与科学不同，它所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是价值属性，不是为了判“是什么”而是追问“应如此”；但主要都是从精神领域，从价值论、伦理学的角度来加以阐发，所以就难以突破意识的囿圈，进一步向行为的层面推进。而之所以在这前面停步不前，回想起来，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受康德的审美判断的方式是“观照”，即“静观的”，它只不过是对于对象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对对象的实际存在是淡漠的，是不会发生意志的冲动这一思想的束缚。而让我对这一思想产生怀疑是由于后来我发现对于“静观”，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理解。由于古希腊哲人把“最高的幸福”看作是“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追求”的“思辨的活动”，所以到了斯多亚主义那里，就把静观看作是一种远离激情的淡泊宁静的生活而与意志分割开来；与之不同，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那里，却把静观理解为“清理自己的灵魂”，“以便向上帝的神圣工作开放自己”以求自己灵魂进入天堂的途径，这就带有强烈的意志的成分。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之所以强调不受意志干扰，在我看来在于他研究美学是深感自近代社会以来，由于幸福主义伦理学以及科技理性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导致人的私欲的极度膨胀和社会风气的沦丧，而希望通过审美抵制欲望的肆虐才倾向斯多亚主义的理解，

并不表明他认为“静观”与意志就是绝对对立的。这样，文学回归生活之路就可以打通了。

“生活”是人的生存活动的总称，但严格说来又不完全等同于“生存”。雨果说：“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这表明它不仅只是指人活着，而且还包含着为什么活、以及应该怎样活，亦即生存的意义和价的问题，唯此才能显示人的生存自觉，使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所以我认为要使文学回归生活与生活相结合，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美的熏陶来提升人的生存自觉，在推动“实是人生”向“应是人生”发展发挥它自己应有的作用，但若是只限于为从价值学、伦理学角度去理解，从意识的领域去回答，就很难充分说明文艺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自身特殊的价值。因为文艺作为作家按自己的审美理想所创造的“第二自然”，它与其他意识形态不同，就在于是直接诉诸人的感觉和体验的，它会把人带入到仿佛自己所亲历的生活之中，以自己的感官去与周围现实建立联系，所以在文学阅读中，就像马克思说的，唯有人们把一切感觉能力“视察深切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都调动起来，投入其中，才能达到“对对象的全面占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我们阅读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们从中所领略到的意境就不会只限于视、听两区，还总会激发起触觉（东风之煦和）和嗅觉（花香之扑鼻）的想象，正是由于它们共同所构成的一种“场”的效应，我们才会像身历其境那样沉入对象世界，就像鱼生活在水中那样陶醉其中，而切实地感受到这春天的美好。这表明唯有凭借自己全部感觉能力，在人与现实开展多种关系联系中，才能显示自己在对象世界的处身性，自己是一个在实际生活中活动的现实的人。要是脱离了感性世界人就被虚化了。由此看来，感性世界并非像柏拉图他们认为那样是“不真实的”，它实在是人与世界建立关系的现实基础，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产生，如同康德所说，“要是没有感性，就会没有立法知性用来加工的材料了”。他把审美判断理解为“反思判断”，是一种从个别感性事实中

去寻求一般的认知方式，就是批判地继承了鲍姆加通的“感性学”的精神，视审美为一切精神活动的发源地，并从个体、心理的层面上变思辨领域内的人为现实的、具体的人。

如果这样来看待问题，那么，文艺的超越性也就有望回归到现实性，而达到两者的有机结合。使人们通过文艺作品的阅读不仅拓展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在想象中进入作品所描写的人物的生活世界去经历他们的生活，从人物所经历过苦难和困顿中去历练自己的意志和毅力，而且还由于人的心灵是一种由知、意、情统一的有机整体，所以当人们从对象世界获得某种认识的时候，又往往会引发某种相应的情绪体验。这样，不仅使认识经由体验进入个体心理，使情与理统一起来，化“认知”为“体知”，即一种经由自己切身体验所获得的人生经验和见解，而使认识真正深入人心；同时也使得意志由于情感的强化而得以激活。因为事实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感觉与思维不同，思维是纯精神的活动，“它与驱体是分离的”，而“感觉是不能脱离驱体的”，这不仅是由感官本身就是躯体的组成部分，而且“当某种由感觉所引发的情绪出现时，机体内部组织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它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像布伦坦诺说的“使感觉表象不仅成为判断的基础，而且成为欲求等心理活动的基础”而使心理活动指向动作，即他所说的“意动”。以致像近代“身心二元论”的代表人物笛卡尔到了晚年，也不得不承认“从心灵角度看是激情的东西，通常从身体角度看就是行为”。这样，作品进入人的心灵同时也就成了进入人的行为前导，成了激发人的意志行为的心理能量和精神动力。这就克服了以往哲学、心理学中所存在的“身心二元论”和“身心平行论”的倾向而转向“身心交感论”和“身心一体论”，不仅表明处身于现实关系中的人也就是“身心一体”的人，而且唯有从心身一体论的观点来理解文学艺术，才会真正克服以往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倾向，把我们原来从理论层面上所阐述的艺术的实践性的思想，按心身一体的观点落实到个人行为的层面，而化“潜在的”功能为“实在的”功能。

所以，我认为要使文学回归现实，从心灵层面进入行为层面，就应该把深化和内化人的认识与激活和强化人的意志结合起来来看待文学的功能，而意志在人的生存活动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前面谈到：人生无非是一场追逐梦想的活动。梦想虽然美好，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唯有凭着坚强的意志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有可能获取胜利。所以许多哲人都认为人生的问题在于“立志”，“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而人们之所以需要美的、优秀的、伟大的文学艺术，就在于它会使人从中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让读者作为一个人生道路上跋涉者，仿佛回到家里，得以休憩，消除疲劳而恢复力量；又仿佛在航行途中所见到灯火，看到目的地临近使人们信心满怀，它既给人以抚慰又能给人以激励。这样，我认为就可以把审美、艺术、人生三者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使我们对文学艺术的性质有一个更为全面完整而深入的理解。

五

对于文艺性质的认识，我就是这样从认识论视角而一步一步地经由价值论、本体论而进入人生论视界的。但我从未否定过文艺认识论研究的价值。它始终是我后续研究的思想起点；若是进入人生论后回过头来就否认文艺反映论，我认为就必然会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所以，经过这 20 年的思考和探索，我愈来愈深切地感受到，若要对文艺问题有一个正确而完整的了解，唯一的途径只有走综合研究的道路。这是因为文艺是一个整体。整体之所以是整体，就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它处于多种关系和联系之中，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也只能通过多视角、多层次的综合才能对它作出全面的把握。

那么，怎么进行综合研究呢？我认为应该从纵、横两方面，即从“层次论”和“活动论”两方面入手。

纵的方面是属于“文艺层次论”的研究，就是把文艺看作是一个实体，一种作家创作的成果，以静态的眼光把它分为一般、特殊、个

别三个层次来进行考察。从一般的层面上，我先是认识论视角，后是从价值论、实践论视角，都是赞同把社会意识形态界定为文艺的一般属性。意识形态虽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又不同于科学等一般的意识形态，它总是这样那样、或隐或现地反映着一定阶级和社会集群的思想利益、愿望和要求。所以，它不仅有知识的成分，而且还有价值的成分，因而对于该社会集群的成员来说，必然具有一种价值定向的作用，目的是为了统一和凝聚该集群的社会的力量为着共同的目标去进行奋斗。所以它的性质不但是认识的，同时也是实践的。但文艺又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形态，因为真正的艺术作品作为作家所创造的一种美，一种审美反映的成果，就在于它除了超越一己和狭隘的阶级利害关系，以一种普世情怀来审视和关注现实人生之外，还在于它总是通过作家自己的切身体验所把握到的，是他的心灵的自然流露。因此，哪怕是最美好、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理想、愿望和集群意识，也只有转化为作家自己的个人意识，自己的感觉和体验，自己的追求、企盼、梦想，自己的人格无意识，才会具有审美价值，并在作品中获得真切而生动的表现。这就使得一切美的艺术作品不仅总是带有一般社会集群意识所不可能具有的作家个人的思想、理想、气质、人格的印记，是作家独一无二的创造，而且又无不这样那样地反映着作家所代表的集群乃至人类对于美好人生理想愿望和追求，从而使得优秀作家总是作为一个如同荣格所说的“集体的人”，一个人类良知的代表出现在作品中，文艺的审美特性即由此而生。要是我们的研究不能进入这些特殊的层面，我们对文艺性质的认识就必然是肤浅的。从个别性的层面上看，文艺这个种概念下又包含着下属的许多类别，如文学、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等。虽然它们同属于作家审美反映的成果，但是由于各自独具的内容又使得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反映途径和方式。这样，这些类别的文艺的各自所采用的媒介和表现形式也就成了它们特殊的躯体。它不仅制约着作家的想象和构思，而且只有凭借它们，作家的思想和构思的成果才能化为实际存在。文艺作品就是由这样三个层面的制约与反制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后一层面总是以前一层面为基础，而另一方面，前一层面的

内容又只有当它进入后一层面才能克服自身的抽象性而获得具体的表现，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但以上这些还都只限于静态的研究，它对于我们理解文艺虽然必不可少，却还不足以最终说明文艺的性质。因为从“体”、“用”统一的观点来看，事物的性质只能在使用过程中、与外界事物发生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就像海德格尔谈到用具时所说：“属于用具的存在总是一个用具的整体”，“只有在用具的整体中，在与其作用的对象发生关系中，亦即打交道之际，用具才能按本来面目在它的存在中显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体”与“用”，亦即“实体”与“功能”统一起来，把实体看作是价值潜隐的功能，把功能看作是实体价值的显现来进行研究，才会有更具体深入的了解。因而我们必须从静态的研究进一步走向动态的研究，从层次论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活动论的研究。

“文艺活动论”的研究近年来在我国较为风行，但从理论资源上看，主要似乎是受阿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所提出的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文艺四要素的启发。以致不少学者在谈论艺术活动时，把它看作只是由这四个要素所组成的一种外在关系和外部的流程，而没有深入发掘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这就回避了问题的根本性质。因为活动是人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是人为达到一定目的所采取的一切动作的总称；对于文艺活动来说，就是为了实现作家创作目的所形成的一系列动作的流程。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无疑是居于主导地位，所以，要正确地认识文艺活动论，我们首先就必须从作家创作中寻找它的起因。作家创作所面对的是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以自己的审美感受和体验与之建立联系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只有那些为作家所深切感受和体验到的人物和事件，才能引起作家的创作冲动，作家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所深切感受和体验到了的东西经过自己的构思借助一定的媒介传达出来而与读者分享。这决定了创作绝不只是作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它对于读者、观众和听众总是抱有一定期待的，总是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把读者引向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这就是萨特所说的是对读者的一种召唤，对社会的一种介入。因

此，只有当读者、观众和听众为作品所感动了，与作品发生共鸣，把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化为自己的思想情感之后，作品的潜在的价值才能转化为实在的价值，作家的创作目的才能最终宣告实现。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者之间就不只是一种外在的联系，而更是内在的、为作家的创作目的所支配和规定了、是文艺性质的一种历时态的显现方式。这四个环节也是互相制约与反制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双向的。尽管在整个活动中，作家是居于主导地位，但反过来，读者、观众和听众的审美需求又会有意无意地制约着作家（常常是通过文艺批评），使作家随时根据社会的需要对自己的创作动机和目的做出必要的调整。这种创作和接受之间的微观的互动的关系，也可以从宏观的眼光推广到对文学史的研究，虽然文学史上的那些作家都已作古，但后世的读者总是按照自己的趣味和理解来接受他们的作品的。这些理解如果得到社会的承认，它就会在他们的作品中积淀来，充实和丰富作品的内涵，所以豪泽尔认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部分的都是他们后世的创造”。这实际上也就成了读者的一种反馈，因而我们在阅读时就不可能完全按照作家的本意，而总是伴随着历代读者的理解和解释所赋予的意义层一起去理解和接受的。所以它不是“化石”，而永远活在我们生活中。从创作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文艺源于人生，又回归人生，最终实现艺术与人生合一的过程。这样，认识论、价值论、本体论和人生论四者也就统一起来了。

所以对于文艺问题，我认为只有这样纵横交错来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综合研究，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完整的把握。但这并不排除从一个层面或一个环节来进行考察这种研究方式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若是缺少了这样一种具体细致的分解而深入的研究，我们的整体把握很可能会陷于空疏和浮泛；但另一方面，又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事物的部分只能在它的整体中才能显出它的意义，“肉体上各个器官肢体之所以是它们那样，只是由于它们的统一性，并由于它们和统一性有联系。譬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上割下来，按照名称虽然仍然可以叫做手，但按照实质来说，已不是手了”。同样，在我们

的文艺理论研究中，若要使这些分解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文艺问题真正有所帮助，又只能是以整体把握为前提。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地找到这些局部研究在整体研究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层次、视角研究的关系，而不至于陷于一隅、以偏概全，或造成认识上的错位。而这恰恰是我们研究中最容易犯的毛病，如从纵向的、层次论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以往只着眼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同性质，忽视它的特殊的（审美的）和个别的（符号的）特性而流于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现在我们往往又片面强调文艺的特殊或个别的属性来否定文艺与其他意思形态的共同属性而与“为艺术而艺术”、“形式主义”同流。又如从横向的、活动论的观点来看，过去我们的研究较多地着眼于作家的创作或作品本身一维，无视读者阅读和欣赏这一环节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文艺性质的重要作用而陷入“作家中心论”和“作品中心论”，现在由于受了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影响，又往往片面地强调在阅读和欣赏中读者的理解和解释，而无视作品的客观制约性导致理解的相对主义和陷入“读者中心论”。这都足以说明正确而辩证地理解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文艺问题的重要。

六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下，我这里所谈的都是文艺理论中一些基础研究的方面，它所要解决的是文艺“何以是”的问题。我这些年来主要精力也是用在这些方面。这除了我是一个教师，我长期从事的都是文艺基础理论的教学工作，我研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如何把这些基础理论问题向学生讲深、讲透、讲完整，讲得符合实际，讲得有新意而有说服力之外，还因为我相信马克思说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所以要做到“彻底”，我们就必须抓基础的研究，因为基础理论不仅是一门理论科学建立的根基，而且也是我们理论创新、学科发展所首先要探讨和解决的最最根本、也最最关键的问题。回顾两千多年来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不最先都是从这些基本观念的突破开始的？“观念”作为人们对于事物根本性质的认识虽然是思维活动的产

物，但不能理解为与现实是分离的。它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也只有解决和回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求得自己的发展；一个文艺理论研究者若是没有丰富的实践（创作或阅读）经验，就不可能进入文艺的堂奥，对文艺问题有深入细致的体会和理解，在理论上真正的发现和建树。但又不能理解为就是经验的直接产物，它与现实之间不应只是“描述”的关系，只是为了说明现象、说明现状，而应该是一种“反思”的关系，总是这样那样体现着理论家、乃至他生存的时代、他代表的集群对文艺的理解和倡导的性质，目的是为了推动实践按照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克尔凯戈尔的在谈到人时所说的：“人是什么？只能就人的理念而言”，“那些庸庸碌碌的千百万人不过是一种假象，一种幻觉、一种骚动、一种噪音、一种喧嚣等等，从理论的角度看它们等于零，甚至连零也不如，因为这些人不能以自己的生命去通向理念”。这话我认为对于我们理解文艺的观念是有启示的，它表明一切观念都不仅是实然的，而且也是应然的，为的是使我们看待文艺问题有一个理论上的预设。否则，它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因此，我认为看待一种理论的成就和水平，就是看它在文学观念的探究上获得多大程度创新和突破。但遗憾的是这一点目前还很少为我国理论界所理解，这除了长期以来被理论界流行的实用主义所迷误之外，近年来从西方引入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等洋教条更使文艺理论的基础研究雪上加霜。这种所谓“反本质主义”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们认为本质的东西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是绝对的、抽象的、凝固的，事实上，这种理解早已受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批判。在他们那里，本质是一个多层次的、流动的、变化着的概念，它只是对事物的一种简单、贫乏的规定，并与方法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只有借助与之相应的方法，才能在说明和解决现实问题上生效。所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特别强调它不只是“教义”而同时是“方法”。这表明本质虽然只是对事物的一种简单、贫乏的规定，但我们之所以还必须予以维护和坚持，因为它为我们的思想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和理论依据，为我们理解现实问题确立一种眼光，一种视界，一种标准，一种分析和评判的原则和尺度。

要是连这一种理论前提和理论依据都没有了，理论大厦的基础也就坍塌了，那我们只有“跟着感觉走”，而成为一个完全没有原则和操守的随机应变和随波逐流者，我们的思想也势必陷于一片混乱。但“反本质主义”者对这些本质理论在现代的发展都视而不见，却还以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的观点为靶子进行大批特批，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无的放矢，而且还有进一步导致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在我国理论界的泛滥。实用主义者多属于一些思想懒汉和浅薄的功利主义者，以为文艺理论就是经验的直接产物，可以不加转化就直接套用到文艺现象上去、直接用来说明文艺现象；否则就斥之为脱离实际。这就把文艺理论教条化了。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文艺理论中与文艺现象联系比较直接、紧密的部分，那通常是属于“技”的部分；相对于文艺理论中“观念”，亦即“道”的部分来说，它毕竟是属于派生的、经验的东西，它只有依附于“道”，被一定的观念整合，有了一定的观念支撑之后，才能成为整个理论的有机的构成因素。否则，我们的理论必然会流于琐碎，就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很难在世界上立足。

这是迄今为止我对于文艺问题的一些基本认识。我只是一个在文学理论研究道路上的跋涉者，我所能谈的只能是在真理道路上探索的过程，我还不知道自己离终点有多远，但坚信只要坚持文学反映人生又回归人生这一基本信念，并尽可能广泛地吸取中外古今一切有益的理论资源来加以综合创造，是终将会达到这个目的的。只是我们这辈人过去荒废的时间太多，要读的书读得太少，以致我现在还为补课不得不挤出时间来读书。读书使我感到每天都是新的，似乎自己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所以，我并不想把这篇文章画上句号，还希望以后能不断有新的、更有价值的学习心得和体会去补充它、完善它……

返回目录

吴熊和先生

—杭州大学数学系函授生 蒋遂

吴熊和曾经担任过杭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吴先生担任院长时，曾经到我家向父亲“汇报”过。杭州大学的各级领导好像都有这样的“习惯”，沈善洪校长上任后，也由他的办公室主任盛斯猷先生陪同，到我家向父亲“汇报”。吴先生“汇报”时，很谦虚地说：“维持，维持。”

吴先生上世纪 50 年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考取夏先生的研究生，以后在杭州大学工作。

上世纪 5、60 年代，社会上物质缺乏，一些贵重商品需要一种“公债券”，凭此券可以购买。吴先生那时要买一辆自行车，可是手里缺乏公债券，我母亲提供给他足数的公债券，吴先生得以购买了一辆自行车。

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但是向往学习“脚踏车”。母亲向吴先生借了他的自行车，扶着我在道古桥宿舍 16/17 幢后面的小路上学习自行车，映像非常深刻。

吴先生对我父母亲非常仰慕，上世纪 60 年代，吴先生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的一次讨论“封建道德是否能批判继承”的会上，说：“当然可以！蒋先生、盛先生的感情至今这样好，不是继承了封建道德吗？这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1995 年 5 月 9 日，父亲与世长逝。我打算编一本《书魂——蒋礼鸿教授纪念文集》，母亲和吴先生商量，请他写一些诗词纪念父亲。吴先生当即表示：“可以，可以。”



敬悼 礼鸿先生

摊书闭户作生涯，挥手丹黄奠万譁。
海内共推今叔重，临风展拜墨行斜。
星斗微茫接段王，一时清峻集门墙。
而今绝学虫鱼贱，后世谁窥大德光。
十年四校窟中书，兰蕙盈庭道不孤。
转眼皤皤诸老尽，东南文献久蹉跎。
人才涵养仰宗工，谁启乾嘉坠绪穷。
珍重微言传一脉，慧光再照浙西东。

吴熊和谨拜

一九九五年十月

父亲逝世后，我母亲有意将父亲的著作收集、集中出版。父亲弟子联系浙江教育出版社，获得同意。但是增加一个附带协议，稿费的70%要提供给整理者。对于这样的分配，我很无奈，但是为了父亲的著作面世，再加上附带协议是母亲签署的，我只有不作声了。

《蒋礼鸿集》出版后，这个附带协议自然提到桌面上来了，稿费在我手上，当然要过我这一关。父亲的几位弟子找我商议，我耐着性子说：“我爸爸给任铭善先生出书，一分钱也没有拿。”一位弟子振振有词地说：“现在时代不同了。”最后我和母亲商议，由我姐姐和他们协商，把稿费的30%给整理者。吴先生是《蒋礼鸿集》主编，他自始至终反对这样的行为，一分钱也没有拿取。

吴先生得浆细胞骨髓瘤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和疾病做斗争。最后时刻，吴先生选择不去医院，一代学人在家里安然谢幕。

对于现在的过度治疗、无限制拖延病人的生命，把病人置于生不如死的境地，实在不可理喻。我很赞赏和羡慕吴先生的勇气和坦然。内子敏俐逝世后，有一次在杭大路马灯桥遇见吴先生夫人陆兰芬医师，讲起亲人的离去，陆医师泪雨朦胧。

[返回目录](#)

由抄写油印本《怀任斋诗词》怀蒋礼鸿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 83 级 林怡

丁亥年秋，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先生应“福州市第二届读书节”组委会之邀，亲临榕城九仙山（于山）九日台讲授“朱熹读书法”。承



徐先生美意惠赠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书报刊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刊物《藏书》创刊号和第二期两册，书样典雅玲珑，图文清丽，形神俱佳，爱不释手。当日挑灯夜读，

见第二期有原杭州大学教授，现在南京师范大学执教的黄征师兄的大作“《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前言（附蒋礼鸿先生和师母盛静霞先生诗词选）”，披读之余，感慨良多。

次日再晤徐先生，语及昔日负笈西子湖畔，幸有机缘受蒋、盛两先生耳提面命，至今深为感怀他们那代学人的风骨神韵；并出示珍藏多年的手抄本《怀任斋诗词》。徐先生热情相约就此抄写油印本为《藏书》撰稿。不才自虑多年来学无长进，唯恐有辱师门，迟迟不敢下笔。岁末将至，徐先生再催及此文，踌躇再三，颇觉却之不恭，勉为其难，援此拙稿，以为心香一瓣，祭奠先生们的在天之灵。

大约在 1986 年前后，时任蒋礼鸿先生助手的颜洽茂师找我，说：“先生大病愈后，很想找个钢笔字好的学生，帮忙把他以前写的一些诗词按线装书的格式繁体竖排，抄录成集，自费印一百册，赠送给友好。你看能推荐谁胜任做这事？先生说要付给学生抄写费。”

我当时负责中文系团委的工作，立即推荐了一个学生干部（似乎是文体部长。很抱歉，如今竟想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他刚获得当年全国大学生硬笔书法比赛二等奖，一手遒劲飘逸的行楷。先生和师母看过该同学的字样后，立即同意由该同学负责抄录。

这本仿线装 16 开本的《怀任斋诗词》封面是淡墨梅花数枝，右下角加盖先生的“怀任斋”章。封面和扉页的书名都由蒋先生亲自题写，扉页右下角蒋先生自署名并盖章；扉页二是先生手稿《水龙吟·丁丑永嘉除夕》，扉页三是先生在书桌前专注工作的近影一帧；扉页四、五是师母盛静霞先生为该手抄本亲自手书的“序”，《蒋礼鸿集》第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8 月出版）尽管录有《怀任斋诗词》，却不收师母为它作的序。

序文并不长，不到四百字，但不仅说明为何抄录印行该书，还涉及蒋先生的学问、为人、文采以及师母和先生的伉俪情深，师母的文采、格调、情怀也尽显其间，今特录于此，与书界同仁分享：

这本诗词是云从解放前所作，和他的文集都以“怀任斋”为号，他对任心叔先生的怀念是深刻的。云从专攻训诂，但诗词也写得不差，把它印出来赠给友好，也许还是有些意义的。在这些诗词中，如“一懒有根蟠九地，四时无刺到群公”，“久客布衾添垢腻，夜窗凉吹听喁吁”，把自己形容得又脏又懒，当然是夸张，但在那个时代也是一种逆反心理的曲折表现。“只被闺人词几阙，叫人比作赵明诚”，这却牵涉到我了。我哪能和李易安相比，何况赵明诚也未可厚非，这是云从的戏笔。只是有一点，我们夫妇却可和赵李比一比：他俩当国破家亡之后，明诚先逝，易安晚年流落，历尽艰辛，“凄凄惨惨”之词不忍卒读。而我俩均已年逾古稀，尤其是今年云从大病一场，经良医手术，竟霍然而愈，我们仍可吟咏于小斋，徜徉于湖畔，白头伉俪，可要大大笑傲古人了！我们结识后，云从也有些诗词，将编入《频伽室语业》中。盛静霞弢青志。

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中叶，郭在贻先生在课堂上曾以十分敬重和万般无奈的口气说道：“你们可不要以为陶先生、盛先生是没文化的旧式家庭妇女啊。解放前后陶先生就是大学教授了。陶先生、盛先生都

是才女啊。只不过五六十年代国家困难时期，要精简工作人员，陶先生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才服从组织需要，自愿辞去公职。这才落到今天没有工资、没有医疗保障的境遇。”

当时姜亮夫先生的夫人、师母陶秋英先生患不治之症，靠姜先生的工资难以维持治疗，只好到香港展出拍卖陶先生自己的画作，筹集治病款，郭先生正是因此事而发感慨，我辈因此才得知盛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有中央大学才女之誉了。

先生与师母情投意合，伉俪情深。大家闺秀出身的师母丰神俊朗，清通简约，甘与先生安贫乐道。解放前朋友戏笑他们举债买书，先生作诗答友人，云：

缟綦家具拟何如，可少千金买旧书？
谢女左芬原解读，笔床茶灶共萧疏。
风流倘继天随子，功业何须范大夫？
他日吴船能击汰，烦君好事写成图。

能看到师母搀挽着先生在通往黄龙洞方向的杭大路人行道上散步。某日，我从西子湖畔归来，恰好遇上二位先生正从黄龙洞方向往回走，就陪着他们一起慢走闲聊。盛先生突然发问：“你是福建人？脸庞一看就像福建广东一带的。福建林姓可是望族啊。林则徐、林纾、林白水，还有林语堂。对了，你和林语堂有关系吗？”我没想到师母一口气点了这么多家乡耆老先贤的大名，并问了这么个问题，连忙摆着手说：“没关系，没关系。他是闽南人，我是福州人。”“噢，那和林觉民呢？”盛先生又问。我说：“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关系。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不过他的故居还在城里的三坊七巷中，我去看过。”“那你知道林徽因先生吗？她可是个大才女！”不知何故，不容我回答，盛先生不依不饶地继续“盘问”我：“那你和林则徐有关系吗？林则徐的家也在福州，房子可还在？”

我见师母一脸热切地盯着我，不禁有些紧张，小心翼翼地说：“我只去过纪念他的祠堂。他和我们家似乎有些关系。我们有个祖上叫林雨化，刚正耿直，是他很敬重的老师，因得罪上司，遭冤狱发配

新疆，传说林则徐也被发配新疆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无所谓，无非再走一遍雨化公走过的路而已。’现在林则徐祠堂大厅右侧墙上布展的第一幅画像就是雨化公发配新疆时戴着镣铐枷锁，画像下的玻璃橱窗里展出林则徐年轻时为雨化公的古文集写的‘后记’。听我父亲说，他的先祖和我们的先祖一样，都是从莆田、福清逐渐迁往福州的。我们村的老人人口耳相传说他年轻时来过我们村，拜过祠堂，好像还提出归认到我们这一宗来，但当时的族人长辈似乎认为他科举考试的名次还不够前，没同意。”

盛先生听完我的话，竟心满意足地笑开了，频频点头说：“好，好。”始终不发一语、听着我们对话的蒋先生，这时忽然用他那颇重的嘉兴口音，温和地笑道：“她年轻时有些才气啊，喜欢林语堂。”盛先生听了，将眼神转向蒋先生，俩人互望着，一起默契地笑开了。记忆中，这是我和师母说话最多的一次。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如今想起这一幕，二位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如在眼前。

先生平素沉默寡言，但宅心仁厚，对后辈晚生，从不乏亲切、平和、风趣的一面。我曾看到他无拘无束、开怀畅笑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郭在贻先生家书房门前，与郭先生一起兴致勃勃地观赏他家种的盆景，恰巧相邻的先生也正在门前小院落逗着小孙子玩，忽然传来他咯咯咯开怀畅笑声，像个老顽童似的，郭先生和我看着他们祖孙俩，也不禁跟着他们笑开了。

大约在 1985 或 1986 年，先生在曾华强老师的陪同下，给我们 1983 文献班讲授“版本学”课程。许多同学原本就不喜欢文献专业，对版本学更觉枯燥乏味。一次课堂上，先生以浓重的嘉兴口音举例说：“《花间词》收牛崎柳枝词：‘解冻风来末上青，低垂罗袖拜卿卿。’‘末上’两个字，汲古阁本、宋本《乐府诗集》《全唐诗》也都作‘末上’，但南宋淳熙鄂州册子纸印本、四印斋本作‘未上’，汤显祖评本改作‘陌上’。你们说，到底哪个对？为什么？”我们班 19 个同学一片寂然。先生看看没人敢回答，就微笑着说：“糟糕，可能是我的口音重，你们没听懂。”立即笑着转身板书，写出了牛峤词的原句和“未上”、“陌上”两个词，然后又转身指着我说：“你来回

答。”我当时还没有通读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心虚地磨磨蹭蹭起立，回答说：“不知道。可能还是汤显祖改的‘陌上’对吧。是不是说春天来了，田陌上的草开始青了？”先生笑得更欢了，说：“好，好，你请坐下。”然后，他对着全班望着他、想跟着他笑又不敢笑的同学说：“你们看，汤显祖错了，她也跟着错。”我和全班同学一起哄堂大笑，一扫原本紧张的氛围。先生接着说：“汤显祖为什么错呢？就是因为他不懂得‘未上’有‘首先’‘最先’的意思。”然后，先生引经据典，从《左传》《庄子》《逸周书》，到《景德传灯录》，再到《红楼梦》，信手拈来，娓娓讲解，指出南宋人也是因为不明“未上”的词义，而误改为“未上”的，提醒大家版本学必须有训诂学的基础。就这样，一堂原本枯燥的课，在先生宽容的调度下显得妙趣横生。

1987年秋季，先生在中文系会议室给中文系和古籍所的硕博士生讲授训诂学。第一次开课，坐在我身旁的某师姐因为刚入学读博士而突遭婚变，情感上倍受打击，加上思念远在它方的两三岁的儿子，在先生刚开讲的头三五分钟，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竟在课堂上失声痛哭。我们大家不知所措，紧张地盯着先生。先生停下讲课，吃惊地问：“怎么啦？”陪同在他身边的颜洽茂师向先生建议说：“先让她回去休息吧。”先生连连点头，对我说：“你先扶她回宿舍吧。”我安顿好师姐赶回教室，才入座，先生又停下课，问我：“她好些了吗？”我点头。先生又说：“女同志，不容易。你们今后多帮助她一些。”

先生为人内敛耿介，却不乏清通平和。先生的一个硕士生来自西南偏远地区。该师兄出生普通家庭，“文革”中出于侠肝义胆而和一起插队的京城落难某高干女儿恋爱结婚，并育有一子。“文革”后，官复原位的高干岳父母和他们入读北大并平步青云的女儿却决意要了断这门婚姻。师兄不同意离婚，又想念被“抢”到京城里的儿子，就报考离京城较近的以文、史、哲闻名的某高校读汉语史硕士生，已经考上线了，该校接到京城来的压力，不敢录取他。他第二年报考了先生，名列同类考生中的第一名，杭大校方和先生同样接到了来自京城要求不录取他的压力，但先生淡然地说：“他考第一名，我没有理由

不收他。”杭州大学也以“尊重导师的意见”为由，挡住了高官的无理要求。可是，对方却一而再地诉诸法庭，要求离婚，甚至让在寒冬腊月赶到北京，住在简陋的地下室欲见儿子一面的师兄连续吃闭门羹。那时先生和师母怕师兄出事，三番五次地把师兄找去劝慰他，并对我们几个年纪小一些的学生说：“你们多劝劝他，多陪陪他。强扭的瓜不甜。犯不着干傻事，把自己给毁了。”师兄终于接受了现实，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顺利通过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并在杭州任教，开始了新的生活。

先生笃于师友之道，师生情重，朋友情深。《怀任斋诗词》中收入了多首先生与他的老师锺锺山（泰）先生、夏瞿禅（承焘）先生等诗词唱和的作品，从中既可见他对师辈的礼敬，又可看到他“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坚持独立思考的一面。譬如诗《瞿禅师论词绝句版行》四首，就是因他不同意他所敬重无比的“一代词宗”、老师夏承焘先生的个别论断而作的。先生在《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3月版）里曾写到：

“我在之江念书的时候，老师锺锺山（泰）先生的反复涵泳，细完文章脉理的读书方法，夏瞿禅先生谦虚乐受的读书态度，徐益修（昂）先生的诚挚不已的治学精神都对我有所熏陶、启发，惭愧的是践履不及三师的百一。”

即便到了晚年，先生对前辈师长依然执弟子礼甚恭上世纪80年代，姜亮夫先生80大寿，陆维钊先生为姜先生画像，请先生作“赞”，当时已近“随心所欲”之年的先生依然“不逾矩”，恭然题道：“陆维钊先生为姜先生写真，后学蒋礼鸿敬赞。”

师母在手抄本《怀任斋诗词》序文中说的“这本诗词是云从解放前所作，和他的文集都以‘怀任斋’为号，他对任心叔先生的怀念是深刻的。”任先生即任铭善教授。他是1949年10月前的浙江大学教授，解放后曾任浙江师范学院教务长，但在“反右”中蒙冤受难。“文革”开始，红卫兵疯狂地抓人打人，不少教授学者死于非命。任先生在惊惧中一病不起，临终托孤给挚友蒋先生和盛先生。从此先生

和师母对任先生的幼子倾注了无限的关爱，在他们的倾心教养下，任先生的公子任平兄也学有所成，如今已是某高校教授。

记得1983年秋，我们刚入学，在巩固专业思想的教育仪式上，姜亮夫先生身着一袭青衫由曾华强先生陪着，率先进入教室，蒋礼鸿先生、沈文倬先生、徐朔方先生、郭在贻先生紧随其后，鱼贯而入。他们一行五人齐刷刷地一字排开，坐在由简陋的课桌拼成的讲台上，对着我们全班十九个第一届“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开始了“训话”。

姜先生最先发言，大意是在陈云同志支持下，国务院、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恢复设置“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意义如何重大，并回忆自己年轻时，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与向达、王重民先生等不约而同地节衣缩食自费搜集拍摄流落域外的敦煌文献带回祖国的艰辛，要大家珍惜这个专业学习的机会，末了他以浓重的云南昭通口音高声说道：

“学文献学，就是要把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血脉传下去。古人说：亡其国者，必亡其史。你们可要争气啊！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我们可得争气啊！”并看着身旁的蒋先生说：“让蒋先生说说。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就让日本人不敢小瞧我们。”蒋先生谦逊地笑着说：“姜先生您都说了，我没啥好说的。”这时曾华强先生对大家介绍说：“蒋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出第一版时，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在日本杂志撰文评价说这本书是敦煌学研究的‘指路明灯’。我们请蒋先生对大家说说话。”

在同学们的掌声中，蒋先生平静地缓缓说道：

“学文献学，小学的基础要打好，就是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这些本领要学好。姜先生的古文字研究就很有造诣……我年轻时在原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我的老师胡小石先生对古文字学等也很有研究，你们也要读读他的书……音韵学呢，你们要好好读读任铭善先生留下的一些遗稿……”

那是我第一次从蒋礼鸿先生的话里闻知任先生。

先生以文会友，乐与师友同道相互切磋，疑义相析，精思共享，故而“思旧之情”总是历久弥深。他在《自传》里写道：“我还是一个帮闲，一些朋友的作品如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厢记》，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徐朔方先生校注的《牡丹亭》和编校的《汤显祖集》，都吸收了我的一些或大量意见在内。我的学生或同行寄来的文章，我也多数提过意见，不以为厌；但近来因事务忙迫，则有应有不应了。”

先生毕生只专注于治学讲学，只以自觉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为己任，淡泊于各种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上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后，他题诗《闭关》，云：

闭关却扫自装聋，不管高楼雨与风。
一懒有根蟠九地，四时无刺到群公。
浮萍身世心原定，蜗角功名路岂通？
直作庸人庸到底，未须呵壁问苍穹。

他著述的《商君书锥指》获当时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授予的三等奖，凭此升任中央大学讲师，时年29岁。后因中央大学中文系人事纠纷，城门失火，祸及池鱼，先生竟被中文系主任胡小石先生解聘，即便如此，先生终其一生，从不非议胡先生。每言及胡先生，必恭称之为“先生”，而且在1983年我们刚入学接受专业思想教育的座谈会上，就向我们推荐应该阅读胡先生的代表性著述。

上世纪40年代末，先生离开中央大学后，回到母校之江大学任讲师。这“讲师”一任30余年，直到1978年9月，杭州大学报请浙江省和教育部有关部门批准，直接授予先生教授职称，国务院学位办并授予先生“汉语史博士生导师”资格，但先生从不争着要招生名额指标，为了确保培养学生的学术质量，他宁可少带或不带学生。

上世纪80年代中叶先生大病过后，学校有关方面多次劝说他多带博士生，但先生还是坚持学术质量至上，坚持量力而行，每届只招一两名博士生。可是，1989年1月，郭在贻先生差一天满五十周岁去世。看着自己的高足英年早逝，先生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当时因受郭先生早逝的打击，校园里弥漫着“宁要长寿，不要教授”的凄凉氛围。先生这时却以衰病之高龄，毅然把郭先生指导的未及毕业的三个博士生收入门下，亲自指导他（她）们完成了论文，并将和张涌泉兄一起跟随郭先生从事“敦煌俗语词”课题研究的黄征兄也收入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1987年我本科毕业，蒋礼鸿先生、郭在贻先生和祝鸿熹先生因连续招了三届硕士生，按当时规定，他们当年停招汉语史硕士生以确保有时间进行必要的学术充电，专心从事科研和培养好已招进来的学生。祝鸿熹先生负责的汉语史和文献学教研室研究通过，并经中文系同意，由郭在贻先生和祝鸿熹先生联合推荐，保送我到杭大古籍所读硕士研究生，但后来学校突然又有新规定，我还是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以总分378的成绩被古籍所录取。视我如自家子侄的郭先生替我规划好的学习途径是：先用两年时间师从文献学专家雪克先生，打好文献学的基础，然后第三年直接申请转到他的门下攻读汉语史的博士学位。1988年底郭先生突然查出肝癌晚期，一病不起。1989年新年伊始，先生壮志未酬，怀着无数的遗憾离开了亲人师友和学生。

1990年初夏，我想悄然独自离开杭州，不愿意大家来送行，但颜洽茂师和老同学江兴佑（现为西泠印社副社长）坚持送我到火车站，郭在贻先生的夫人、师母彭娜琪老师则早早跑到杭大路的电车站等着我，强忍着泪眼，坚持要送我去火车站，我强颜笑慰师母，和颜老师坚决劝阻她也去火车站送行。

我揣着蒋先生云从师亲自为我写下的就业推荐信，顺利地任教于福建师大。此后，我几乎“自闭”了两三年，埋首把当年先生夸我“买得好”的《五灯会元》和佛教典籍读了一些。1993年福建师大陈庆元教授拟申请挂靠杭州大学招博士生，但因错过申报时间而未果。他在长安山前邂逅我，喊住我说：“林怡，我到杭大去了，你的老师、系主任吴熊和先生问起你，我说你还好。”我顿时百感交集，吴先生主持中文系多年，繁忙中还惦记着我，而我却日复消沉，不禁惭愧万分，就对庆元师说：“您如果招博，我就报考您的吧。”陈先生当时

笑着谢绝说：“我怎么敢指导你？再说你已经评上讲师了，读博士也没太大意义了。”

但我决心已定，于1994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师从张可礼教授和陈庆元教授攻读魏晋南北朝文学博士学位。入学时，张先生神情凝重地说：“杭大蒋礼鸿先生、郭在贻先生都是一流的学者啊。郭先生英年早逝，太可惜了。蒋先生近来可都好？他们和我们这里的殷焕先先生是挚友。当年殷先生弟子答辩，都请蒋先生和郭先生或审阅论文，或主持答辩。”我惭愧地说：“这些年，自己学无长进，先生那也疏于请安，久不联系了。只偶尔从师兄姐们那里探听到先生的消息，听说先生疾病缠身，身体大不如前了。”

1995年5月中旬，我因做博士论文从山大到北京一星期，查阅有关文献。某日到北大图书馆查完资料，忽然想到听说久未联系的师兄张涌泉正在北大师从裘锡圭先生做“博士后”，一时间兴冲冲地到北大中文系询问涌泉师兄的联系方式。入了中文系所在的老院子，里面空无一人，我往楼里走去，迎面一块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著名语言学家、杭州大学教授蒋礼鸿先生于1995年5月9日因病逝世。需发唁电，送花圈的同志请到办公室登记。”

我如遭雷轰，眼泪登时夺眶而出，呆立在黑板前。好一会儿，见四周依然无人，死一般的沉寂，也不知该上哪找涌泉兄，就抹了泪，低头转身匆促地往院子外走去，正好与一个同样埋着头匆忙进院子的人迎面撞上。我们各自抬头，异口同声惊道：“怎么是你？！”来者正是涌泉兄。我唏嘘道：“来找你，谁知竟看到先生的噩耗。”涌泉兄伤心低语道：“我也是突然接到消息的，几天前赶回杭州办了先生的后事，今天才回来的。”我们俩不知该说什么好，难道是先生在天之灵有知，竟如此让我和涌泉兄见上一面？涌泉兄请我到食堂吃午饭，饭间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杭大共同的师友，却谁也不提先生，以强忍心中的悲痛。

1997年5月，杭大百年校庆，我回到熟悉的校园，去探望曾华强先生。一进曾先生家门，迎上前来的曾师母就紧拉着我的手，哀声叹息，用她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急切地说：“蒋先生也去世了。他连骨灰

都没有，只有衣冠冢。”我吃惊地问：“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曾先生插话说：“是蒋先生和盛先生约好的。他们约好身后把遗体捐献给浙医大，捐献给国家。”我默然。先生和师母忘我、无我的纯粹精神是我辈难以企及的。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叶，许多知青纷纷回城。先生的爱女“文革”中才22岁就去了黑龙江农村，在当地成了家并育有儿女。噩梦般的岁月终于过去了，她也想回到西子湖畔和父母团聚。但杭州户口限制非常紧，先生、师母没有同意，理由是：“你回来了，那北国的丈夫和儿女们怎么办？”女儿请求父母以他们在学界的声望向当局设法要来户口指标，先生师母不为所动，说：“我们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为个人的私事向当局提出过任何的要求，这是不可能的。”女儿终于还是失望地回到了东北。

先生、师母难道不爱自己的骨肉吗？难道不愿意晚年安享天伦之乐吗？决不是。抄本《怀任斋诗词》里就收有先生早年喜得千金而写下的诗《十二月六日举女》和词《沁园春·举逊儿》，那里有先生对爱女的挚爱和殷殷期盼：“顾弄何妨当掌珠，而翁本是敬通徒”“恐砚田一片，还要传伊。”然而，世事沧桑，如今他们宁可节衣缩食，接济在北国冰天雪地里的女儿一家，也决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先生的儿子儿媳所在的工厂效益差，只能和先生同住。

2006年清明节过后不久，我偶尔上网，惊悉师母也于4月16日凌晨以90高龄仙逝，去世前她依然神志清醒地要求儿女按照她和先生的约定，将遗体捐献给国家。网上转载了先生弟子黄金贵师等拟就的杭大人文学院师生追思师母的两幅挽联：

先师品性静若秋水，
才女人生诗意留霞；

诗美、词美、文美、人美，金陵美才女，痛也九秩摧玉，
贤妻、贤母、贤长、贤德，西溪名贤师，慨乎一朝捐躯。

那晚我对着电脑默然伤心，枯坐良久，一夜无眠。

先生年轻时在师友中就被誉为“小圣人”。抗日战争期间，先生曾和钱锺书先生一起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共事过，该校就是钱先生的名著《围城》写作的主要空间背景。当时钱先生曾作诗《雪喻》赠先生，诗云：

食肉奚妨贞士相，还期容俗稍恢恢。

钱先生以冰雪清姿和如梅风骨赞誉先生，但又劝先生不妨随和容俗些。先生却对钱先生诗末二句的规劝不以为然，次韵奉答说：

顾闻市悦莫如热，独此凌兢少取裁。
世宁那知心是水，诗人漫许格同梅。
倘将千尺驱蝗吻，懒说盈仓兆富财。
与失不恭宁守隘，敢持谔谔配恢恢？

手抄本《怀任斋诗词》最后两首诗词是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哀挽他的业师锺山先生和已去世多年的徐益修先生的。现录于此，以观云从师毕生鞠躬尽瘁恭然践履的师道尊严和风骨气节渊源有自：

《锺山师哀辞》

一老空斋咬菜根，平生浩气固常存。
山颓梁坏非虚感，雨润风薰念旧恩。
后死期无惭晚节，楹书责在振凝尘。
从今秦望峰头路，腹痛何堪更一巡！

《余既为锺山师哀辞，复痛益修师前卒，因续为一章，

以述二师风概如此》

锺子岩岩徐子真，两翁辉映典型存。
饥犹择食温而厉，俭执辞调道益尊。
无欲屹为千仞壁，有容酿就一团春。
剧怜同学凋零后，遗教何人与共论！

（注：抗日战争时，徐师拒敌伪之招，曰：“饥犹择食。”）

写到这，我才从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蒋礼鸿集》第6卷第596页拜读到师母为“无欲屹为千仞壁”做的注解，云：

“林则徐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6月在虎门查禁鸦片时，曾亲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为座右铭。云从亦书此联作为座右铭。诗中‘无欲’两句当由此联化出。”

我恍然大悟师母为何二十多年前在杭大路上与我关切地谈论起林则徐。生命中有些印痕是无法抹去的，它将与呼吸共始终。先生和师母俱已驾鹤仙逝，但他们学养与人格的光芒，犹如不灭的灯火，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后学弟子，行走在漫漫人生路上。只要先生们的尊严风骨擎托起的心灯不灭，我们就不会惶惑，不会迷失。

附：蒋礼鸿教授为古籍所硕士生林怡写的就业推荐信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林怡，学习期间刻苦研读，曾连续三次获校奖学金，专业课成绩历年均列全班和全年级第一，1985年小论文《释“昵”》获中文系学生优秀论文报告奖，刊于《古文献研究》。该生于198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期间品学兼优，连续评为校、系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动乱期间，没有参加任何非法活动。据上述情况，该生品学兼优，有独立科研能力，故乐于推荐，希望尽先录用。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礼鸿（章）

1989年12月

[返回目录](#)

徐瑞云、陈建功、华罗庚， 他们彻底改变了我这个农村放牛娃的命运

—杭州大学副校长 谢庭藩 口述

做了一辈子教师，也研究了一辈子数学。

其实我自己没什么特别的经历，就是一个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穷小子。我很幸运，一路求学，遇到了很多好人。

徐瑞云、陈建功、华罗庚，是我的老师们，彻彻底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1、1943年，日军进村了

人们问我，人生最初的记忆是什么？

我脑袋里蹦出了一个画面。很久远，也很清晰。

1943年夏天，日军进村了。高头大马，长枪刺刀，他们高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见到村民就抓。

8岁的我跟着家人跑到山里躲避，一整天都不敢回村。远远的，能听见枪炮声，此起彼伏……

傍晚，大家偷偷溜回村里。我看见，堂祖父躺在泥地上，一动不动。他中枪了，浑身是血，已经没了呼吸。

恨啊，我的心中只有恨！亲人被杀害的痛苦，我至今清楚记得。

1935年1月，我出生在江西玉山的仙岩镇周源村。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我从小就帮着家里干农活，放牛羊。父母对我最大的期望，是将来能当个小学老师。

记得小学第一课是“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第二课是“亡国奴最痛苦”。

自堂祖父走后，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家”什么是“国”，没有国，哪来的家？

我从小立志，要好好学习，长大当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为国家做贡献。

2、搞不懂的“难题”

村里上学条件艰苦，四个年级一起上课，全校只有一个老师。

但好处是，能听到高年级的课。一年级，我就学到了一点四年级的内容，还想学更多的知识。

老师课上教的内容太简单，比如数学，学会写“12345”就行。

我有个堂叔父，他经常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题目给我做。

他也是个农民，弄不明白什么高深的学问，别人考他的，他不会，就转头来考我。

一天，他问我：“老李家有一群羊，3个3个数，多2只，5个5个数，多3只，7个7个数，多2只，那么一共有多少只羊？”

我一听，便回屋拿一把豆子，洒在地上，挨个比划。想了很长时间，才算出结果。

其实这是一千多年前，《孙子算经》中的一道算术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这就是初等数论中的“孙子定理”，是中国古代求解一次同余式组的方法。

没过几天，堂叔父又问：“100个和尚吃100个馒头，大和尚一人吃3个，小和尚3人吃1个，那有多少大和尚多少小和尚？”

我想不明白的，就埋头写写算算，一开始只能用凑的，很久以后才知道这就是“对分法”。

有时候堂叔父给的“难题”一会儿就做出来了，有时候，几天也搞不懂。

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个“难题”：十六两等于一斤，那么一斤10块钱，一两是多少钱？

堂叔父说，村里有人买东西，算不清账了，有时也让我给算算。我算了好久，也算不出来。

后来我知道，10除以16，等于0.625。但人手算，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

越想不明白的事，我越好奇，对数学的兴趣，也逐渐浓厚。

我有一个小舅舅，比我大几岁。家里想让他帮着算帐，便从村里请来人教他打算盘。

他摆弄着手里的算盘，拨上拨下，学了一会就烦了，不想学。我坐在他旁边，边玩边看，学会了。

很快，村里人听说，老谢家有个小孩儿很会打算盘，就都拿着自家的账本，来找我算帐。

一个小鬼头名气大了，很多人不服，有找我“斗算盘”的，还有找我打赌比赛的。

在村子里，值得思考的问题多得数不清。买卖粮食，测量田地，计算牲口……看似简单的农桑问题，背后都离不开数学。

我常常一边放牛，一边看书，脑袋里想着数学题目，时间一晃而过。

3、初中毕业，没钱读书了

小学毕业，我考进玉山中学。

在学校里，我常和老师一起探讨数学问题。

有一次，我问他：“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为什么还需要证明？”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藏了很久，上大学才慢慢搞明白，几何要从公理出发。

初中，有个很有趣的事。

1948年，我初二。校长因为贪污被举报，学生老师一起闹，把他赶下台了。

没有校长后，伙食费由学生自己来管理，我成了膳食委员会的出纳，负责记账。

这一年，国民党滥发纸币，搞得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眼看大家都要吃不起饭了。

我们想了个办法，用“大米”当硬通货。正好班里有个同学家是开米店的，我们就把所有同学的伙食费，都在他们家换成大米，按照原有的价格固定采购。

每天去买菜，就按“米的数量”兑换，对方拿着我们付给他的米票，去米店换粮食就行。

钱已经不值钱了，但大米，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想吃饱。

第二年夏天，国民党被打跑了，玉山解放。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我和大家一起，敲锣打鼓地游街，欢迎解放军。

毕业后，因为家里穷，读不起上饶的高中，我回到村里，帮着家里干活。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是衢州师范学院寄来的。

信上说，因为我在初中的成绩一直不错，学校愿意接收我，不需要考试，直接去念书就行。

但学校要收取一笔学费，我家没钱，拿不出来。

父母知道后，很着急，到处想办法。眼看我就要没书读了。

就在这时，外祖母来了，她说愿意从家里拿出一百斤囤粮，给我抵学费。

小舅舅用担子挑着一百斤大米，送我去学校。我们从下镇坐火车到衢州。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出去求学。

4、打不出题目，要“吊黑板”的

1952年夏天，我从衢州师范毕业。

这一年，浙江师范学院刚刚成立，他们希望招收一批优质的学生，培养成老师。

我在衢州师范时，成绩还可以，机缘巧合下，直接被保送到浙江师范学院。

经过测试，我进入数学科学院学习。

我一直对数学感兴趣，但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学习，只能在课余，抓紧时间自己看书补课。

毕业后，我留校做老师。

徐瑞云先生是我们数学系的系主任，也是系里唯一的女教授。

徐先生对老年教师十分尊重，加以照顾，对我们青年教师则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对生活上有困难的教师更是倍加关心，不吝援助。

徐先生是一位体态素雅，和蔼可亲的长者，她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非常平易近人。

当时教授不多，能由系主任、教授亲自授课，大家都觉得意外和兴奋。

徐先生上课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她上课声音宏亮，坐在最后一排也听得清楚。她板书也写得一丝不苟，清晰合理，简直是一件艺术品。

徐先生就像长辈一样，对我们都特别好。

她常喊我们去家中做客，一有什么好吃的就分给我们。她家里干净整洁，生活简朴。

徐先生对我们的学业也很关注，她常常指定一本书，让我们自己回去自学，然后再讲给她听。

她边听边提问题，我们答不出来，要“吊黑板的”（一个人在黑板旁边站着）。

和徐先生在一起工作学习，我进步得很快，收获很大。

原本弄不懂的地方，都理顺理清了，许多更深更难的问题，我也能自己独立思考了。

5、“赶鸭子上架”的治学方式

1956年，我考上研究生后，学校决定把我送到复旦大学进修，师从陈建功。

陈建功先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数学界公认的权威，毕生从事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

他主张教学科研相辅相成，提出数学教育的三大原则：实用性原则、论理性原则和心理性原则。

时至今日，这些思想和方法依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我亦因此获益匪浅。

新中国成立后，陈先生回到浙大任职时，浙大数学系仅有5名学生，陈先生既是数学系主任，又担任科研和教学工作。

陈先生的理想是改变中国科学落后的面貌，培养和造就一支国际一流的数学学派。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陈先生和苏步青二人及其弟子连同浙大数学系一起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

现代数学在上海迎来高峰。

我到复旦进修时，陈先生已近花甲之年。

他为了在复旦大学建立起一支数学队伍，常常同时指导一、二、三年级的十几名研究生。

在陈先生看来，培养人比写论文意义更大。

课堂上的陈先生像是一名战士。

他上课像打仗一样，要充分准备，讲一个新内容，一定要讲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他的课堂除了讲公式定理，还会介绍前人研究问题的曲折历程和数学故事。

“上讲台精神百倍，下讲台满身白粉。”苏步青曾这样描述陈先生。

陈先生上课不带讲义，但不是没有。他每年都要新编，老的删掉，补充新内容。

他的教学还有一大特色，即数学教学一定要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陈先生常说，要教好书，必须靠搞科研来提高；反过来，不教书，就培养不出人才，科研也就无法开展。

令我记忆最深的，是陈先生在高年级学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中开设“数学研究”讨论班。

讨论班分为甲、乙两类，前者精读一本最新数学专著，后者读懂一篇国际数学杂志最新发表的前沿论文。

然后，我们轮流登台讲解，陈先生和其他学生可随时提问。

如果我们准备不充分没讲好、问题没答好，便会遭到当堂“训斥”。

面对专业和外文两大挑战，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治学方式，让我们不得不更加刻苦钻研，不敢有丝毫侥幸和懈怠。

每周，我们还有一次“论文介绍课”。

每周三上午第三四节课，陈先生给我们介绍最新论文，告诉我们研究什么问题、什么时间提出来的、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哪些还没有解决等。

我们受启发写论文，陈先生会亲自修改指导，并推荐到高水平期刊发表。

他十分爱护学生，我们发表文章时，他会倾尽己力帮助我们完善文章，但自己却不署名。

陈先生很好，他每个礼拜都要跟我们介绍世界上最新的课题，我学到很多东西，进步很快。

陈先生学识广博，总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对我来说，最有效的就是跟陈先生学习三角级数和函数逼近论。

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学到了一些理论、方法与技巧，并且应用到研究当中。

渐渐地，我自己也做出一点东西来了。

6、华罗庚说：“让谢庭藩留下来帮助我工作。”

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改为杭州大学，陈先生被任命为副校长。值此，杭州大学成为陈先生一手创建的第三个数学高地。

没有陈先生，杭州大学数学系不会发展得这么好。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根据学术论文及其影响力对大学进行排名，杭州大学位居前列。

而我，很有幸跟随陈先生在复旦学习，读研回来后，又成为了杭州大学的一名数学教师。

在杭大，我一边教微积分，一边自己做研究。

国家鼓励将理论研究成果用作解决实际问题，为“工农兵”服务。我也做了一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项目。

比如为工厂提产，桥梁设计，研究进口机器的结构，以及大坝孔附近的应力等等。

1964年，全国召开函数方向的学术交流会议，陈先生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去，会议由华罗庚先生主持。

华罗庚先生比陈先生小 18 岁，年纪轻，但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了。

就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华罗庚先生。他站在讲台上，我坐在人群中，只是远远地望着。

华先生的演讲，让我印象深刻。后来我听说了他的故事，更是为之感动。

1925 年，华先生初中毕业后，因为家中贫困，父母已经无力继续供他念书，他只好辍学回家，帮助父亲打理家中的那间小杂货铺。

但他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人生，而是开始了顽强艰苦的自学之路。冬天在寒风中苦苦学习，他后来因病左腿致残。

华先生的经历感动了我，他的勤奋好学与刻苦努力，是我学习的榜样。

1970 年，华先生在上海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把数学用在实际生产上。

省科委组织了一批同志去上海学习，我也跟着去了。

回来后，我向省里汇报说：“华罗庚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在生产上很有效果，但具体是怎么运用的，我还没有弄清楚，希望能继续学习。”

不久，我得到浙江省省长周建人的批示，派我到北京师从华罗庚，深入学习，以华罗庚为榜样，认真严谨广开思路。

科技局副局长，我，还有一个干部，我们三人一起去了北京。

十多天后，另外两人要回杭州，华先生对他们说：“让谢庭藩留下来帮助我工作。”

能留在华先生身边学习，我求之不得。

从此以后，我就常常留在北京，到华先生家里去学习。他要到外省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也叫我跟着一起去。

和华先生相处，我才了解，什么是对数学真正的热爱和执着。

7、做不出题，就是一顿大骂

一开始，我很不习惯。

他会傍晚的时候，突然丢给我一本书，让我第二天给他报告书里的内容。我熬一个通宵，也没法这么快看完整本。

第二天，如果回答不出华先生的问题，就会挨骂。

华先生原本有两个助手，但有一些题目，他会直接让我做。做不出，难免又是一顿大骂。

骂着骂着，我也习惯了，只是更努力地去研究。

有一天，华先生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我做了好几天没做出来，我想让他教我，他说：“你都做讲师了，题目还做不出来？”

我被他这么一说，不敢吱声，回去埋头苦解。

过了半个月，我再去找他，我说这题目我真的做不出来，太难了。

他哈哈大笑说：“你是应该做不来的，我也做了很长时间没有做出来，但还是比你高明，我今天做出来了！”

其实，华先生看问题透彻，每每让我研究的问题都很有意义，我收获颇丰。

到北京几个月，我连颐和园都没去看过。有时，华先生家里就我和他两个人，我们对面对坐在书桌前，他讲我听。

除了数学和工作，其他事情，华先生都很随意，甚至完全不在乎。

有一次，华先生说：“你今天别出去吃饭了，就在家吃。我昨天晚上请陈省身吃饭，一大桌子菜，还剩了很多，你陪我一起吃。”

还有一回，浙江一位领导请华先生去人民大会堂看表演。我陪着华先生一起去，坐在他旁边。

表演正进入最高潮，华先生突然用手肘推推我，小声说：“带纸了吗？”

我以为他要去方便，就拿出一张纸递给他。他拿出笔在纸上飞快地写起来。

不一会儿，华先生突然站起来，跟身边的领导说：“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不出所料，他又回去继续研究数学问题了。

只要是与数学相关的事，华先生就有无限的热情。

华先生平时对学生们严格要求，他常说：“如果自己的脑子里没有问题了，就不是数学家了！”

在他的严格教导下，学生们兢兢业业，勤奋不息，一刻不敢懈怠，即使假日也不休息。

他总是尽力把题材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有时也对一些数学定理证法的妙处赞叹几句。

我向华先生学习到的，不单单是学知识，还有做人。

华先生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中，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

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高水平的教授总能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把难的东西讲容易，反之就是低水平的教师。

9、一张纸，一支笔，一盏灯，就足够了

1983年，我担任杭州大学副校长，1992年调任中国计量学院院长。

这些年里，我搞过生产，创过企业，当过领导，也一直没停下手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其实我这个人不太适合当领导，也不会做管理。当学校的一些问题都落在你手上的时候，做事是很难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这辈子，就想做个个实实在在的人。

我觉得，做人不能乱来，做的事要对老百姓有利，做校长要对师生有利，对教学和生活有利，做一个单位的领导，就应该为这个单位的人着想。

但凡事要实事求是，这样做人，才能心安理得。

我也曾见过认识的人从三清四白到贪赃枉法，最后银铛入狱。人是会变的，官越大，变坏了，危害越大。

我最喜欢的，还是教书育人，研究数学问题。

这些年，我对学术研究始终没有停止。

教书四十多年，我培养三十多位硕士，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1996年，我从校长岗位退下来，空的时间多了，就到处去走访，重新抓起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

2001年，我在中国计量大学给计算机系的学生开课。

一块黑板，一支粉笔，我也没有准备什么教材，教案，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教书，是快乐的。

现在的孩子们，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真的很幸福。

在我们那个年代，想要学习先进的知识，是无比困难的。

除了要自己努力，也得不断抵御环境的干扰。

我在浙江师范教书的时候，也要去劳动。大夏天，暑气最盛的时候，一干就是好几天，中暑晕倒是常有的事，只能坚持。

文革时期，更是没法好好上课。大家都在街上游行，批斗这个，批斗那个。

我出生贫农，境遇稍好一些，被批斗过，被贴过大字报，没关牛棚。

但许多优秀的专家学者们，就在这场浩劫里，陨落了。

在大街上被人群推攘着前行，口号声震天响的时候，我满心只想回到我的小书桌前，有一张纸，一支笔，一盏灯，就足够了。

要是我也生长在现在这样的好时代，定要加倍努力地学习。

这世界上的知识，太多了，一辈子也学不完。等着我去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只是我越来越老了。

我和夫人赵桂英是同行，两个人都研究了一辈子数学。

9、每天都做自己喜欢的事，很快乐

2010年，我查出来得了大肠癌。

我家对门邻居就是医大校长，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手抖，不能帮我开刀了。

他推荐了一位上海来的专家，据说是亚太地区第一号的肿瘤专家。

手术后，我恢复得很好。教学工作一直在做，研究工作也没停过，还去国外访问了几次。

我的脑袋也开过刀，现在这里还有一个洞，没骨头的，但是头发挡住了，你们看不出来。

脑出血，血液占了脑部的四分之一，把脑组织都挤到一起了。

开刀后也没留下什么大问题，就是手和脚不如以前利索了。

到现在十几年过去，没有复发，真幸运。

很多人都跟我说，您86岁了，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

其实主要是心态要好，把脑子用在业务上，不要整天去想那些病啊痛的。

除了数学研究，我有很多爱好，我喜欢钓鱼，喜欢拉胡琴，也喜欢唱歌。

前几年还去学校晚会上唱了，虽然唱得不好，但是很喜欢，哈哈。现在就是记忆力差了，许多事都忘记了，很多新论文也看不进去了。

但脑袋里还是经常会想，反思自己这些年在教学上没做好的事，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我最近在研究“ π ”，对，就是圆周率的那个“ π ”。我想把它搞明白，搞透了。

你们看我这张小书桌，80年代我就在这儿看书做题，一晃四十多年。

房子老了旧了，我也不中用了，但接下来的人生，还是要好好过。每天都做自己喜欢的事，很快乐。

[返回目录](#)

罗伯特·杰斯基

—杭州大学外语系 70 级 陈才宇

我的文学翻译是从英国民间谣曲开始的，所依据的英语原文来自罗伯特·杰斯基（Robert Jeske）赠送给我的那本《诺顿诗选》。

杰斯基是美国人，杭大外语系聘请的外教，负责青年教师的英语培训。我参加了 1981 年那期培训班。杭州大学外语系为我省高校的外语教学做了一件好事：他们将外教请进来，让来自全省各高校的青年教师直接从洋人那里学习英语，这是提高英语水平的一条捷径。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洋人，就是那棵大洋树上的一片叶子，通过它，我们可以认知那棵树。对于没有机会出国深造的人，这片从异邦飘来的叶子就是你了解外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杰斯基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文学博士，他每周给全系师生作一次英美诗歌的讲座，听的人很多，大教室坐不下，许多人只好搬凳子坐过道。在杭州大学外语系所聘请的外教中，大家一致公认他工作最认真，课上得最好。他给我们培训班讲授的是美国小说。说是讲授文学，其实更多时候是天南海北的神聊。培训班共有十六位学员，我的英语水平是垫底的。但杰斯基并没有因此而小看我，反而说我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这一错爱源于他的自恋情结，源于我们对文学的共同爱好。

他曾要求我们每周写一篇英语日记，我把自己的小说习作译成英文敷衍他，想不到他居然对我的作业大加赞赏，还约我去他入住的西湖宾馆谈文学。原来，他和我一样有一个作家梦！他还拿出他的小说稿让我提意见。在我看稿子时，他还洋洋自得地在一旁踱步。凭我那点英语水平，我实在说不出子丑寅卯。但他并不在乎我笨拙的评论，还兴奋地提过录音机放音。机子里响起一个女子的朗诵。他向我解释：那是他另一部小说稿，朗诵者是他所在的纽约大学的一个学生。我问他小说有没有出版？他没有回答我，却用低沉而伤感的语调吟诵起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

Full many a gem of purest serene,
The dark unfathomed caves of ocean bear:
Full many a flower is born to blush unseen,
And waste its sweetness on the desert air.

这几句英语译过来，大概是：

不知有多少宝石纯净晶莹，
埋在深不可测的幽暗海底：
不知有多少鲜花世人未见，
徒然将芳香撒向广漠天际。

听了他的吟诵，我当时就有些感慨：在这个世界上，有着成千上万文学爱好者，他们中该有多少人的抽斗里锁着一部小说稿或诗歌稿而找不着出版之门啊。每一个文学爱好者，就是一个潜在的作家和诗人，只不过他们的作品没有印成书罢了。而印成书的那些诗文，也只是机缘巧合而流传于世罢了。出版商的利益是文学的标尺，而不是文学本身的价值。

我和杰斯基就这样成了朋友。我和他的年龄相差12岁，按中国的生肖，都属龙。我向他介绍了中国的生肖，他很感兴趣，从此他自称白龙，叫我红龙。五一节他要去南京旅游，外办要给他安排陪同人员，但他指定要我去。那次南京之行还有两个德语外教：他们不是夫妻，是临时结对来外语系任教的，负责陪同的是德语班的学生小田。

在火车上，杰斯基教我和小田下国际象棋；那一对德国男女则一刻不停地搂搂抱抱，那男的还经常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按压那女人的私处。我和小田装着没看见。杰斯基给我们讲解国际象棋的规则，然后我和小田轮流与他对弈。由于规则生疏，一开始我们都输给他，赢了棋的杰斯基神气活现，好像他就是卡斯帕罗夫。我当时就警告他别高兴太早，并说我不久就能打败他。他不信，要跟我打赌。抵达南京后我们游览了雨花台、中山陵、紫金山天文台等风景名胜。当天晚上

回到长江大桥边下榻的宾馆，他便急着要与我在国际象棋上见个高低。我们采取三战两胜制，结果是我 2:1 赢了他。他觉得没面子，一个人气呼呼地走出房间，到一楼大厅喝咖啡。我也不去理他，待到他喝完咖啡回到房间，我见他不再那样耿耿于怀了，便向他解释我取胜他的原因。

“罗伯特，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赢你吗？”

“不知道。你小子是不是想说你们黄种人比我们白种人聪明啊？”

“不是。我赢你是因为我会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的规则与中国象棋差不多。”

他表示要跟我学中国象棋。我提醒他别忘了他的赌注：我要他送我一部书，并指定要那部《诺顿诗选》（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他没有食言：给外语系师生做完最后一次诗歌讲座后，他就把《诺顿诗选》留给了我，上面还有他的题字：for hong long from bai long with admiration and friendship.

我之所以向他要《诺顿诗选》，是因为这时的我正在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作为英语教师，我得搁置起文学家的梦，回到现实之中，先从文学翻译和研究上做一点成绩来，以便获得晋升教师职称的资本。

杰斯基教完我们那一期教师培训班后就回国了。临行前我去车站送他，当时还答应一定给他写信。但我这个从不食言的人这一次却食言了，原因是同去送行的一位外办领导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从而使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为折损：杭州大学外语系的领导觉得杰斯基是迄今为止所聘请的外教中工作最出色的一位，因此向国家教委打报告，要为他申报优秀外教的奖励，并希望他留下来再教一期培训班。有关部门于是对他进行了“政审”，但从美国那边反馈回来的消息是：罗伯特·杰斯基是个同性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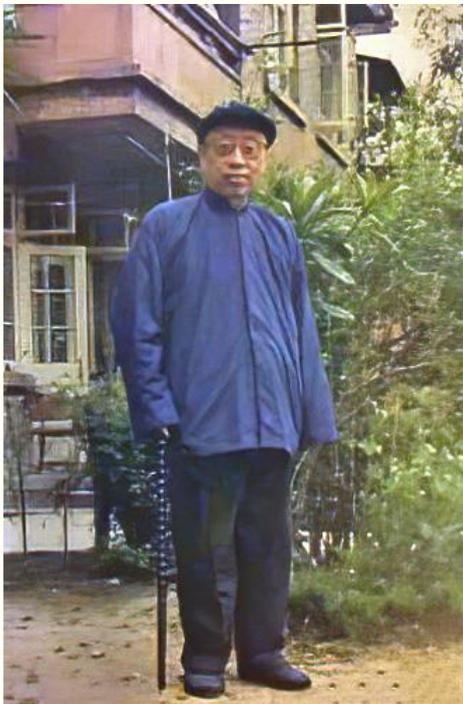
同性恋这玩意在当时的国人眼里是了不得的事，谁听了都像吃了一只苍蝇。我这人没见过世面，听人家这么一说，就不敢再与他交往了。我忽然想起南京之行他的一个反常举动：每天晚上睡前洗热水澡，他总是赤条条地进出洗漱间，胯下的鸟儿晃荡着，全然没有羞耻感。我当时只觉得他孩子般的幼稚可笑，经外办的人一点拨，才觉得这应

该就是同性恋的表征。就因这个缘故，我一直没有给他写信。待到我懂得如何宽容地对待同性恋时，他原先留给我的地址已经不是他的栖身处。我只好在这里寄托我对白龙的怀念：明知他读不到，还是要写出来，也算是我向他表达的一分歉意或者说对友谊的怀念吧。

[返回目录](#)

姜亮夫先生人生品格之我见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卢敦基



姜亮夫先生一生除治学领域宏富、学问博大精深之外，其人生品格同样令后人高山仰止。综合来看，其人生品格突出表现为“自强不息”“敬业”“乐群”等三个方面，超越功利主义而追求人生终极价值，对学生及后辈学人具有久远的启迪意义。

一、我所见所闻的姜亮夫先生

我于 1978 年 3 月来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为“文革”后第一届高考生。来到系里，听说居然有“八大教授”，一时舌挢不能下。以前小老百姓哪里见过教授？当年的职称评审制度也极不正常，据说解放后 17 年才评过两次，更不用说 17 年后基本陷入停顿的“十年”。那时一般大学的一个系若有个把教授算是不错了，但杭大中文系竟然有 8 个！当然，经过多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例有折损，但是姜亮夫先生的大名仍是列在前边的。其时夏承焘先生已在北京，口传多时，最后仍未见真容。王焕燠先生，其时为系主任。这三位先生，又在 8 大教授中名列前茅。

在校四年，见过一两次系主任，但现在记忆里，似乎没有见过姜先生，尽管姜先生的大名经常有老师在课堂上传诵。也是过了很多年后才知道，姜先生身体弱，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已不堪站立，已经不给大学生讲课。所以我们无缘得见也很正常。这里要补充的后话是：姜先生后来到 1995 年才辞世，而与他同辈的能够站立授课的先生，

皆先于他驾鹤西去。噫！人生遭际之不奇，果在此乎，果在此乎！通俗的结论是：一个人，哪怕你身体不好，也不用为长寿操心。

我对姜先生有较深的印象是在大学毕业。当时我们同学自发做了个纪念册。纪念册翻开，是领导和老师的题字。领导有两位，老师则是系主任和姜先生。王先生的题字很好：“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姜先生的题字则是：“敬业乐群，自强不息”。

我是过了好多年才慢慢读懂姜先生题辞的含义。其时我是毛头小伙一个，对长者的智慧，徒识其字，哪知其心？接着到地方上工作两年有半后，我以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到了姜先生任所长的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4年的研究生班，以后才第一次见到了姜先生。这里要解释一下，我的第一名成绩，恰好也印证了高考状元不能成大器的普遍规律。不过这一点倒是当时我就懂。当时的张涌泉、刘跃进，我早知在学问上必远胜于我，跟考分多少并无关系。事实的进展恰如预想。

姜先生因为早已不上课，所以他的办法是，把一班十人全都叫到他家，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了一课。一课讲了很多内容。然而当时的我，年纪不小仍不更事，先生的话宛如东风过马耳。只依稀记得示以中国传统经典十二种书目，分为六大六小，每个学生须读懂一大一小。今日想来，这是何等重要的治学门径！然而时至今日，我也没有读懂读通其中之一，当时就更不用说了。另一条记忆就是毕业时，先生高高兴兴地来到大操场与我们合了一张影。

毕业后，与古籍研究所倒是有联系的，但由于读书时不敢去拜谒姜先生，后来也延续了这个不良习惯。又过了好几年，居然又跟姜先生扯上一点点关系。原来我1993年去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生唯一的爱女姜昆武老师就在此所工作。有时雨下茶边，会谈到先生及先生之学。尤其是姜先生去世后一年，我自己遭际了一些事情，于是拿起一部《汉书》死啃，突然觉得明白了一些学理世情。其时才对姜先生这位学术大师产生了更多的理解。然而，斯人已逝，以前伸手可及的当面请益的机会永不能觅，此时的我，方于宇宙江山的寥廓苍茫，初有会心。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1986 年研究生毕业合照

（前排左起：郭在贻先生、雪克先生、平慧善先生、徐规先生、姜亮夫先生、沈文倬先生、刘操南先生、王荣初先生。后排左四为董平。）

二、姜亮夫先生的人生品格之我见

我与姜先生少当面请益的经历，但是他的学术以外的文字还是看了一些，加上后来与姜昆武老师的闲谈，所以自己觉得多少有一点了解。我以为，他的人生品格，恰用他给我大学那一届毕业的题字可以概括，就是：一、自强不息；二、敬业；三、乐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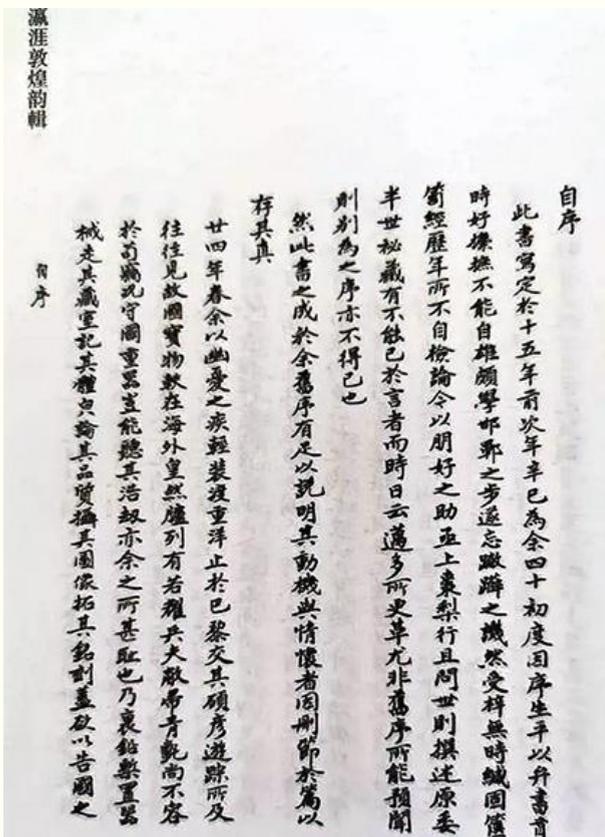
“自强不息”，出自《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今天都知道，宇宙的运行，自有它的轨迹和规律。但如它为一个单纯的自足的物体，那么它的规律与轨迹也谈不上有什么意义。我自己这次乘机来昭通，在云海上空飞行时，见到寥廓而寂寞的长空，心中也无比的平静。然而我毕竟马上要回到地面，马上要生活在嘈杂纷乱的社会中，这就不得不对人生和宇宙加上一份人格化的理解。古代中国的哲人将“天行”加上“健”的品格。这个“健”，意思多重，康健、雄健、雄深雅健……等等，以一字蔽之。而人要法天，所以必

须“自强不息”。翻译成今天的励志性话语，就是不管你碰到什么困难，你都不要失望，不要绝望，必须永远保持进取之心，鼓足勇气，去拼搏，去奋斗。

这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的考量，不是为了达到某个具体目标的一种标准做法，而是为了实现人的本质所必须的一种永恒态度。人，哪怕只存在一天，都要对未来持乐观，都要持进取之心，哪怕我们早已知道我们都将同归虚寂。两者并不矛盾。《庄子》也是姜先生指定的十二种中国典籍之一，姜先生对道家的透彻了解自在不言中。但是人生在世必须秉持自强不息的态度。这让人活得有力，活得乐观，活得有依凭，因而也让人生充满了意义。人生本无意义，但是人可以寻找意义。寻找到了意义，人生才显得有意义！

姜先生的人生经历正体现了这么一种品格。我知道他在巴黎恭抄

“瀛涯敦煌韵辑”时，是抱着为国家继绝学的念头。如果说那些事太远，我也知道先生在“文革”的动荡颠沛中，也是素心底定，从未悲观。这未必是如阴阳家算定日后定当无往不复，而应该更近乎儒生的“乐天知命”、“旁行而不流”。我曾于另一篇小文中说到此点：“‘文革’中先生曾留一照片，为惟一之未戴眼镜者，其时潦倒穷困，无以复加，桌前罗列，无非药瓶，身上穿戴，皆是旧服。然先生弦歌之声未断，青云之志不



影印本《瀛涯敦煌韵辑》中姜先生手写的自序

坠，终身向学，不废著述，九十三岁方谢世，远超诸多身体康健之同人。如谓无信念、精神以支撑支离之病体，其谁信与？”

“敬业乐群”，出于《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是学校判别教育效果的标准。后面是“大成”、“大学之道”兹皆不论，暂且将此四字拆成两块来说。先说“敬业”。

敬业看来简单，就是敬重你所为的那行，将它做好。它不是一种功利的考量，也是指一种人生态度。古人假设人在社会上有分工，而这些分工皆较为恒久不变。这在技术进步极为缓慢的古代极为正常。你既然从事了某一行业，就要敬重它，善待它，将它做精做好，同时也是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寄托其中的意思。往极端了讲，就是必须干一行爱一行，就是要忠于自己的职位，肩负该职位的责任。在业中要投入所有的智慧和精力，更甚是要投入整个的生命。一个人的一生必须有业，不能游手好闲啃老，要养得活自己，同时亦须对社会有所贡献，哪怕是在利己条件下的贡献。司马迁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跟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是同一个意思。如果分工是合理的，你为了利益干好你的职业工作，就是敬业，就是对的。

敬业必须有精神，今天所说的“工匠精神”，说的大概就是这种精神。且莫以为凡是工匠皆有工匠精神，其实，凭我自己对于工匠的调查，有“工匠精神”的匠人其实不甚多。多数人从事工匠还是机会主义者的想法，即为了糊口而已，也不排除有过更好生活的想法。但在技艺上精益求精，只是少数匠人的追求。我们看今天的学术界，凡是有敬业情怀、工匠精神的，不出人头地也难。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学术事业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公平的领域。姜先生一辈子的劳作，就体现了他的敬业和工匠精神，因而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最后谈谈“乐群”。从字面上看，“乐群”的意思就是“乐于在群体中生活”。人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古人的“隐居”、“桃花源”等等设想，也不过是在一个相对偏僻封闭的小社会中生活，少了些同类的倾轧相害而已。

既然在社会中生活，人就应该将自己生活的群体视为快乐的、善意的、有趣味的。这几乎是一种先验的设定，应该也是一种有益身心的设定。现实是纷繁的、复杂的、多层面的，它可能是污秽的，也可能是高尚的；它固然是庸俗的，但也可能是高贵的。它有着一切的复合方面。作为生活中的主体，你最好还是多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



姜亮夫先生《楚辞通故》手稿本

美，尽量对丑恶、下流的部分视而不见，至少是少动用自己的身心予以回应。这也是生活中趋利避害的现实一法。当然，任何人都不是凡心不动的神佛，任何人也不可能是不犯错的圣贤，社会中的错误与罪孽常常可能会有我们个人的责任。所以我这里所讲的也仅仅是一般化

的、粗浅的原则。

“乐群”也同时意味着“为群所乐”。这也提醒了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应该自以为高明，蔑视众生，傲娇江湖。《红楼梦曲》说妙玉时有“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语，此种劣根性，自有人类以来一直存在，估计今后也不可能改正。所以我读刘向《新序》“一人举而万夫俯首，智者不为也”，不禁浑自颌首。生活中固然经常可以看到众多的自命不凡者，但不管是内外合一还是名不符实，皆不如平和中正来得恰当，学界尤其。如此也可能减少了许多暗地里的被中伤。

我虽然未听到姜先生在此问题上的正面立论，但他以他的行为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姜先生似乎不介入学界的一些争论，他评价学人的学术成果，也多从其学术的源流入手，看清发展的源由脉络。一旦看清，其成果的利弊高下也就了然于心，无用宣之于口。至于我们同学，几十年走来，也似无相嫉相争之病。其性格脾气爱好特长不可能一致，但大家还是和而不同，相携相扶，其间有无老师示范与教诲，我不敢

说，不过单凭此次讨论会的聚首，其乐绵绵，至少说明了乐群的必要和重要。我也曾与一位谙历世事的官员朋友聊过，他说世界上任何群体总有一些惹麻烦、挑事情的人。你可能会说如果没有某某这个群体就很好办。但要提醒你，此人不在，新来的下一个也可能仍然是这一类。所以不要有完美的想法，而要把它当作常态。此语大有理！但我仍相信如辅之以“乐群”的教导修养，世界大抵会显得更为润滑和美好一些。

（本文原载于《昭通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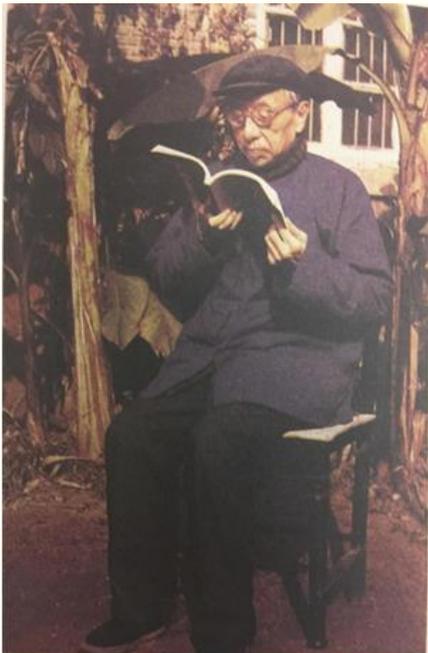
[返回目录](#)

姜亮夫先生的胸怀和做学问的方法

—杭州大学中文 77 级 张涌泉

姜亮夫先生学问博大精深，宽无涯涘。以其治学所重的敦煌学和楚辞学领域观之，即体现出先生广阔的胸怀，自觉跳出狭隘的民族情结，而把学术研究放到超越国家层面的更广阔空间中去。在研究方法上，先生注意从基础入手，由浅入深，做深做透，最后逐渐形成系列成果。其胸怀与方法，均值得后学认真领会学习。

姜亮夫先生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创建者，是我们所的第一任所长。自 1984 年 9 月进入古籍研究所读研究生起，我在姜先生的指导和领导下学习、工作了十多个年头。姜老的学问博大精深，非我辈晚生后学所能窥其涯涘。这里我只是从姜老学生的角度，谈两点感想或者体会。



第一点感想是要学习姜老广阔的胸怀。姜老研究的面很广，但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域，即敦煌学和楚辞学。敦煌学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敦煌藏经洞刚发现不久，其中的精华部分就被西方各国盗劫而去。另外由于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国长期处于战乱和阶级斗争之中，所以敦煌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落后于日本和欧美各国。所以曾经有人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日本”。姜老的书中也多次提到过“敦煌材料在敦煌，敦煌学在日本”这样的话。这当然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所以后来也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研究敦煌学的热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姜老到巴黎学习考古学，当他看到流散在巴黎的敦煌写卷时，他的爱国心也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了，于是他放弃原来的学业，

转而投入到敦煌写卷的抄录和拍摄之中，从此走上了敦煌学研究之路。所以爱国心也是姜老研究敦煌学的出发点。但姜老的目光并不限于此，他认为敦煌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1990年，敦煌研究院召开国际会议，当时年近九十的姜老虽不能亲自与会（姜老一辈子也没有到过敦煌），但心向往之，专门为会议写了一幅字：敦煌学是全人类的同心结。这就是说敦煌不光光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需要全世界的学者一起来研究它。这就跳出了狭隘的民族的情结，而把敦煌学研究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学术空间中去，这对促进敦煌学的研究是很有益的。后来季羨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这两个提法的实质是一致的。可贵的是，九十高龄的姜老还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我们不能不佩服姜老眼光的远大和胸怀的广阔。



《姜亮夫全集》

第二点感想是要学习姜老做学问的方法。姜老的学问博大精深，对后学来说，可以说宽无涯涘，有望洋兴叹之感。但我们认真读姜老的著作，就会发现姜老做学问有他的方法。这个方法我体会就是从基础入手，由浅入深，做深做透；同时注意普及与提高并重。比如姜老研究《楚辞》，他编了《楚辞书目五种》；他研究敦煌学，他写了《莫高窟年表》，编了《敦煌俗字谱》，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工作，也

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把研究对象做深做透。相比之下，我们的有些年轻人不愿意做这种基础的工作，一开始就要写文章，其质量就可想而知了。同时姜老做学问注意普及与提高并重。比如研究敦煌学，既有《瀛涯敦煌韵辑》这样深奥的专门之作，也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敦煌学概论》这样的普及之作。他研究楚辞，既有《楚辞通故》这样的巨著，也有《楚辞今绎讲录》《屈原赋今译》这样的普及作品。总之，他每研究一个课题，总是注意从基础入手，由浅入深，做深做透，最后往往会形成一系列的成果。这种做学问的方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后学认真学习的。

（原载《昭通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返回目录](#)

姜亮夫先生楚辞学的贡献与地位

—杭州大学中文系 79 级 林家骊



姜亮夫先生遗著 30 余部，涉及楚辞学、敦煌学、古史学、古汉语等多方领域，可谓博大精深。其中楚辞学研究贯穿一生，成就尤为显著。先之《诗骚联绵字考》、《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楚辞学论文集》久已蜚声学林；后之《楚辞通故》涉及哲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化学、宗教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图谱学等十大部域，被郭在贻先生誉为“集大成之巨著”。

姜先生少年时即工文字训诂等国学，中年时又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人类学，学贯中西，其治学思维亦呈现多元化特征，表现为具体乃是其多元的研究视角。以往的楚辞研究者们往往拘于文字训诂或是章句评点，而姜先生则是从历史、地理、民俗、考古、文化等多种角度解读《楚辞》。如《离骚》开篇四句，历来注家只解其乃寅年寅月寅日生，三寅相叠。而姜先生则从历史、地理、民俗三个角度分别阐发：从历史上看，高阳原为光明之神，继而演变为

地方神，又继则变为楚之祖先；从地理上看，姜先生否定了原有的楚人东来说及其他误说，提出楚人西来的观点“若水在昆仑之墟，此屈子所至为崇敬之地，盖楚人以其自西来也。”从民俗上看，姜先生认为楚国保留了较多的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遂对许多字有了更为深入的阐发，如对“寅”的解释：“寅者，古渔猎时代，人民奉矢祀日，以象祀日之事，至为庄肃。”



1990年夏，姜先生在家中书房给他的博士生谈读书。
从右到左：任平、姜亮夫，王云路，俞忠鑫，林家骊。

以往的研究往往从北方文化的视角来评判屈原及其作品，以致陷



姜先生《楚辞通故》手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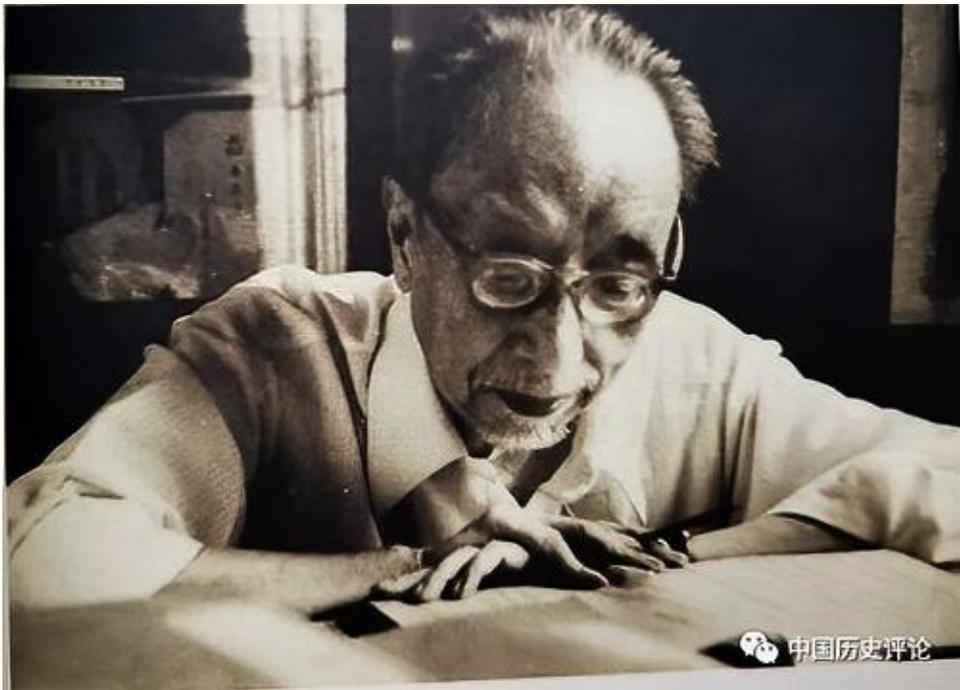
入迷惑。姜先生则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出发，他认为楚民族本与大夏族同起于黄河上游，当周民族在黄河上游兴起建立礼仪文化时，楚民族则南下云梦并保留了较浓厚的原始文化色彩。据此，姜先生提出了楚

学与北学不同体系的著名论断。由此论断，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离骚》中的情节，先生在《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中云：齐、鲁、三晋之书，必求雅训，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屈子言之最多。上通于天，陈辞于舜，迎宓妃，求二姚，逐日月，使西皇，无处不怪，无在不乱，则其史必多鬼神之事，为缙绅先生所不言，必欲扬弃而后快。其合于民习者至多，《九歌》之肆情无隐，《天问》之放言无忌，《远游》之浪漫无涯，《卜居》之牢骚不隐，二《招》之侈陈不讳，皆非北学之所许。孔子不言祈祷，而屈子则灵氛、巫咸、詹尹，皆《洪范》之‘明用稽疑’也。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而屈子专与死人为伍，凡此种种，皆由民习决之，非关理论之是非然否也。”

又，姜先生建立了屈赋分类体系。他指出，研究屈骚，必须将屈骚与屈子的思想情感发展历程相联系。《离骚》是屈原被楚王初疏时所作，所以其前半部分有奋斗精神，后半部分则已露远游之端倪。所以，《渔父》、《卜居》乃应在《离骚》之前，而《远游》则是《离骚》后半部的延伸。《怀沙》、《悲回风》等篇，死意已决，则更在远游之后。而《天问》是屈子关于宇宙问题的学术性文章，《九歌》是屈子对楚地民间流传的祭祀神曲的加工。据此，姜先生认为屈赋可分为三类，即有三种不同的体系：《离骚》、《渔父》、《卜居》、《远游》、《九章》为一类，《天问》一类，《九歌》为一类。

关于《渔父》、《卜居》、《远游》等篇章是否为屈原所作，历来争论不休。姜先生从屈原的思想发展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其他论据，论证此三篇为屈子所作。他在《楚辞学论文集》中说“从整个屈子作品综合论之，《远游》一篇正是不能缺少的篇章。屈子一生坎坷，初仕见疏作《离骚》，继而见放作《远游》。在《离骚》中，还有释阶登天的思想，还希望能访求得贤才，共辅怀王。但兰蕙化茅，贤才求不到，乃远游昆仑而往见先人发祥之地，但仆悲马怀，只能想着远一点的先人旧乡，最终则是逃隐！而到了《远游》，国事已无望，悲忧愁哀以至想到了死。得仙而上升为死之归宿是战国以来的民间习俗。故远游以求王乔也是在见到西土后发仆愁马怀时的感叹，也不能不思及

祖国。既不能不死，则当死个‘清白’，这也真是忠臣宗子之心了。故《离骚》是中年前后的《远游》，而《远游》则是垂老将死时的《离骚》。再而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怀沙》、《悲回风》，遂不能不死了。”



姜先生撰写《楚辞通故》时留影

姜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在总结屈原作品的章法、句法特点的基础上，多能辨识前人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错误。如《离骚》中对“薜荔施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王逸注曰“薜，蒺藜也。葍，王芻也……三者皆恶草。”也就是说，王逸认为“薜”字是个名词。而姜先生根据《离骚》中的他所总结出来的句法规律，认为这是一个“动词+以+动名”的句式，认定句首的“薜”字应该是个动词。此论甚当《离骚》中“依前圣以节中兮”、“制芰荷以为衣兮”等句皆为此类。再如《离骚》中“鲧婞直以忘身兮，终然殁乎羽之野。”对于“殁”字，王逸注曰“早死也”，历代注家均从之。姜先生根据《天

问》言鯀被“永遏在羽山”之事实，从声音线索推出另一结论“殀”字通“夭”，“夭为雍塞之义”，夭字“长言之则曰‘夭遏’”。而《天问》“永遏”即“夭遏”的双声之变。

无论是辨析文本的真伪还是辨识前人的字句之误，乃是我们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根本的文本依据，很多问题看似零碎，细思实乃至伟之奇功。

姜先生楚辞学成就斐然，无愧于楚辞学史上的一代宗师。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08年5月1日第8版)

[返回目录](#)

写在导师姜先生诞辰 115 周年之际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83 级研究生 陈野

姜亮夫先生在其研究与教学计划中，切实体现出“普照整个专业与全部文化史”和“整体推进”的教学、研究理念，通过训诂学、目录学、文字学、文献学、音韵学等科目实施对学生学问境界的全面培养，从而形成对学生知识结构、个人旨趣、学术观念、研究取径、价值评判等方面的深厚教益与影响。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首批 6 名研究生

1983 年 9 月，我考入杭州大学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所，成为姜亮夫先生“文革”后招收的首批硕士研究生之一。这于我本科毕业以后的出路而言，其实是一个注定的结果。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本科求学阶段，雪克、郭在贻两位先生悉心教导我研读古文献，也多次带我去姜

先生府上拜见求教。毕业那年，姜先生招研究生，两位先生命我报考，我恭敬从命。后来考上了，也并无特别感受，只觉得就是通过了一场考试。因为我一直是个认真学习的学生，在考试这件事上，成绩一般都还好的。



当代著名词学家吴熊和先生在夏承焘先生墓前留影

现在想来，我很认真在做的“学习”这件事，很大程度上并非只为“求知”，与“做学问”则更不沾边。主要的内涵，是“上课”和“应试”；基本的状态，是听话与勤奋；学习的结果，不少时候是考出漂亮的分数。有一次考古代文学，吴熊和先生监考。他在考场里走来晃去，到我座位边看了会儿我的试卷，很不耐烦地说：“你好交卷了。题目要答得这么长篇大论的做啥！”我不敢违命，赶紧结尾交卷。卷子改下来，分数很好看。碰到吴先生，不敢跟他说。郭在贻先生的训诂学选修课，我居然考了100分。因此，系里不少老师都觉得

我成绩好，是好学生。

然而实际上，我却只是个遵章守制的懵懂学生，并无学问根柢、先天慧根和向学问上求发展的自觉意识。雪克先生教我学古文献，先是让我读《诗经》，我便遵命去系资料室读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一段时间读下来，也就只是一个“读”而已，并无所“悟”。又有一回读《尔雅》，雪先生嘱咐说细细去读，如有问题，记下来，他会集中讲解。后来督查，要我提问。我只提得出不认识的字来请教，并无什么深刻的疑难可以发问，惹得雪先生大为光火。想来当时他的心里，必是充满了“孺子不可教”的失望。

因此，即使考入了姜先生的门下，对我来说，仍然还是本科时的那种状态，认真上课，好好考试，志向不明，懵懂而行。

此次前往昭通拜谒姜先生故居，回望年少时的求学生涯，少不得有所思、有所想。细细考究自问，有幸师从姜先生三年，我于何处受到教益，又从何处有所回响？



位于昭通古城原陡街 84 号的姜亮夫故居

从师门学统的传承精进而言，我是不合格的弟子。

姜昆武老师在《苦行修善果——忆先父姜亮夫先生》文中记到的姜先生房间里那张摆满了茶杯、水瓶、药瓶的书桌，至今宛在我的眼前。那时，我曾多次坐在桌旁，聆听姜先生的教诲。当时并无笔记，现在也已难全部记起。印象深刻的，是姜先生每次都给予我这个无知晚生的笑意与慈祥，是他老人家轻声细语的讲授和指点，是满室书籍沉静了室外喧嚣的清雅与安谧。惜乎彼时茫昧愚钝，于姜先生在楚辞学、敦煌学、音韵学、古汉语等领域的成就声望闻而不晓其详，于自己的学业进路思而不得其解，于切实的古文献学研究习而不知津要，只是兢兢业业于每一门功课的学习，实在有负先生教诲。

毕业离所，犹如落叶离根，自去飘零，当时颇感彷徨。如今细想，勤勉于学，顺利毕业，各安其职，正是多数学生的常态。而于师门之中传承衣钵、赓续学统、成学问之新境界，岂是易事，非文江学海的拔类超群之才而不可为。如今众师兄弟勉力精进，学问业绩如繁花盛开、结实累累，师门由是光华熠熠，景象灿烂。叨光其间，至为感佩，甚是自豪，也着实自惭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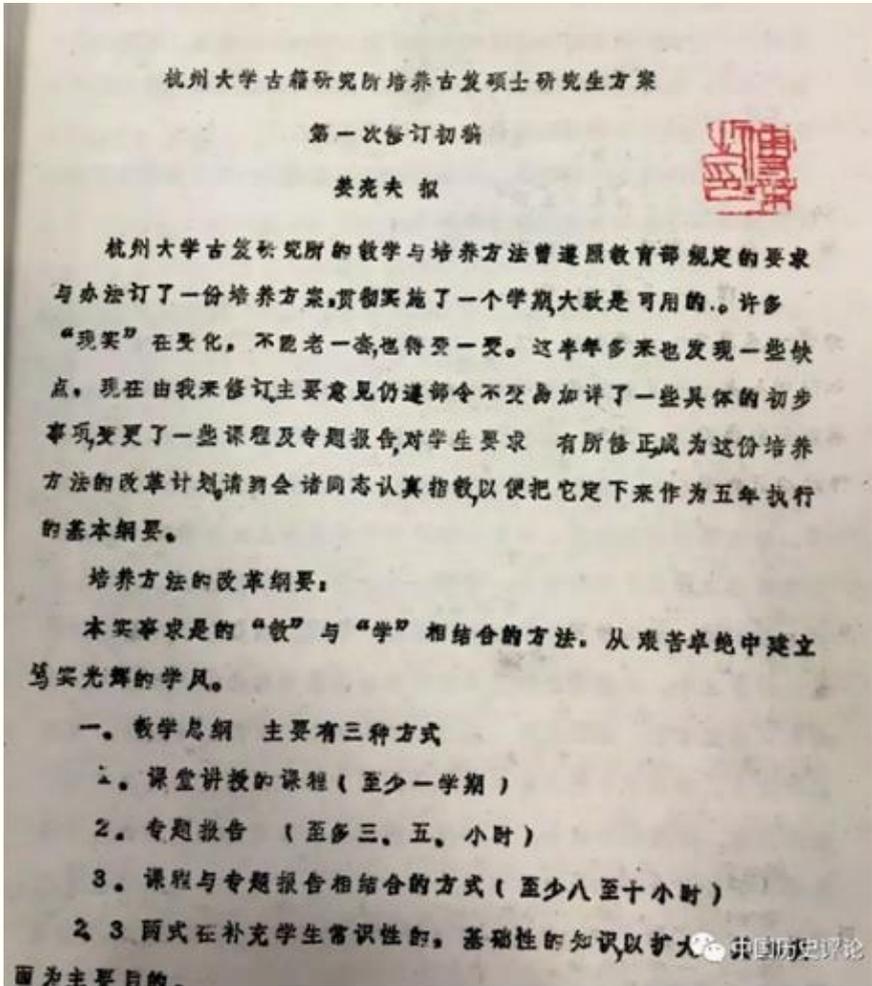
从学问境界的养成而言，我于姜门终身受教。

1992年5月，姜先生写下他对古籍所研究生的“最后最高要求”：“要求每个毕业生能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至小(少)是学术史的能力，及各个方面(指学术分类)的独立研究古籍能力，而且有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坚(艰)苦卓绝的气概。”

以我粗浅的认识来理解，姜先生对学生的此番要求，既是他自己一生学问路径的总结，也是于梁启超、王国维先生的学脉承继。姜先生曾自述其做学问的“秘诀”：“我是以人类文化学为猎场，以中国历史(社会史)为对象，用十分精力搜集资料，然后以古原始的传说，以语言学为基本武器，再以美国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法国毛姆《史前人类》的一些可信据的结论为裁截的基础，又时时与自然科学相协调，这是我做学问的秘诀。而抓住一个问题死咬着不放，是我的用力方法。”李零先生曾有言云：“王国维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颠扑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论’，而是把每个细小的问题都纳入大的范围来考虑，善于即小见大，它更关心的是问题的整体推进。除了从小到大，还要从大到小，特别是从大到小。”

在姜先生为我们制定和实施的教学计划中，切实体现了这种“普照整个专业与全部文化史”和“整体推进”的教学、研究理念。在古籍所学习的三年里，除安排我们学习训诂学、目录学、文字学、文献学、音韵学等主干课程，学习所里先生们各自擅长的课程外，姜先生还聘请所外师资为我们开设多种文化史专业课、开办多种讲座，让我们旁听敦煌学讲习班，参与敦煌吐鲁番学活动以及所里举办的学术会议，至今留存记忆中的，有科技史、建筑史、敦煌美术、周易、佛学、

《水经注》等课程以及王水照、许嘉璐、陈桥驿、杨明照、沈康身、王锦光、章祖安、魏隐儒等先生的风采。



由姜亮夫先生拟定的《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培养古笈硕士研究生方案》第一次修订初稿

虽说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经历、治学的时代环境都已不敷培养如前辈那样淹贯各科、会通中西的学术大家,但就一个学者的学问境界而言,这样的擘画和授业,却是一种极好的养成方式。就我个人而言,

从知识结构、个人旨趣、学术观念、研究取径、价值评判等方面，无不深受教益与影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从人文情怀的涵育生发而言，我当恪守师教，勉力践行。

“情怀”这样的大词，现如今很多人都不屑于说了，也许是觉得它空幻、虚假，也许是因它与实利无关。但我还是喜欢这个词，并且认同它包含的大格局、大气度，那便是我们对国家、民族、社会以至文化传统的责任担当。姜先生积学深厚，成就卓绝，被尊为代“学术宗师”。然而，他却并非只是书斋里的一介书生、并非只有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作为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姜先生具有与导师们一脉相承的炽热的家国之情、社会公义和文化自觉意识，并努力践行其责任担当。姜先生传授于我们的，一方面是专业研究能力和“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则是超越个人私利的人生境界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气质。所以我认为“情怀”二字，正是姜门不同于其他许多师门的一种学术底蕴和品性，也由此而显正大磊落之超迈气象。

“情怀”也是落实在日常实务中的修行与作为。1983年，古籍所初建。作为本校中文系学生，又是杭州本地人，我在研究生入学之前，即已参与到建所的零杂事务中。当时目睹所之草创，万般初萌，开拓不易，艰辛异常。诸师前贤，筚路蓝缕，勉力奋进。终使所如“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姜先生年高位尊，却多次坐在学校河南宿舍区某幢一楼古籍所办公室的南窗桌前，受理各种事务，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印象深刻者，比如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学英语基础不好，而研究生英语教学不但课文篇幅巨长，生词量极大，老师还是全英语授课，对听力要求很高。我们的学习压力和困难之大，成为校研究生处、外语系和本届研究生全体同学关注的“现象级事件”。姜先生为此十分着急，亲自召集我们开会，了解具体情况，讲述他自己的外语学习体会，教授学习方法。他的一番苦心，意图解除我们的思想顾虑，提高学习成绩，但收效甚微。于是姜先生聘请杭师院一位英语教授给我们开小灶，每周几个晚上做英语辅导，练习听力。此举效果极佳，所谓“突飞猛进”一词，于此得到亲身体验。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1986 年研究生毕业合照

（前排左起：郭在貽先生、雪克先生、平慧善先生、徐规先生、姜亮夫先生、沈文倬先生、刘操南先生、王荣初先生。后排左四为董平。）

姜先生执着事业、关切学生的殷殷之情与毫无身份执念、甘为琐屑实务的忘我之举，在我看来，正是一种人格修为的自然流露，体现出天然本真的利他情怀。

此次昭通之行，一路顺畅。而师门回望，却深感自己 30 余年来学无所成，旁枝斜出，漫草遮途，不胜愧疚。于是写下这些旧事与感怀，以为纪念，也自警醒。

（本文原载于《昭通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

[返回目录](#)

缅怀恩师吴熊和教授

—杭州大学中文系 59 级 应守岩

感伤的告别哀乐渐渐消逝，安祥的先生遗容淡淡远去，但填补脑海的镜头一个接一个地跳跃而出，联缀起我与词学大师吴熊和先生的一幕幕往事，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是杭州大学 63 届的中文系学生。当年，吴熊和先生教我们宋词，那从容、清晰而富有磁性的讲课风格，那亲切和蔼的待人态度，在学子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象。

1963 年我毕业后，分配在杭州一中（今杭州高级中学）当老师。吴先生住在杭州体育场路御蹕弄杭大教工宿舍。他的家离我的家很近，故常去拜访。我退休后，来往更加密切。谈形势，谈学术，谈思想，谈生活，可以无话不谈。

我与先生相处，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热情待人与先生对我学业上的扶持帮助。我退休后，仍参加一些编纂书籍的工作，也写点文章。当我遇到学业上的问题去向他请教时，他总是满腔热情地予以解惑。2004 年，我参加整理编纂《东阳丛书》。在点校清初东阳学者王崇炳（1653—1739）的《金华徵献略》一书时，发现了南宋词人黄中辅的《满庭芳·题太平楼》词。这是一篇痛斥秦桧卖国罪行的杰作。但在唐圭璋所编的《全宋词》中，只有“快磨三尺剑，欲斩佞臣头”两句，未见全阙。为此，我写了一篇《黄中辅和他的〈题太平楼词〉》。吴先生带病审读并修改我的文章，还把关于我发现此词的经过部分，给单独辑出改写，题为《痛斥秦桧的黄中辅〈满庭芳〉词全阙尚存》，以我的名义发表在国家图书馆主办的 2006 年第 3 期《文献》季刊上，令我非常感动。

吴先生患的是多发性骨髓瘤。2007 年，先生的病情加重了，癌细胞转移到了肾脏。他眼不能看，手不能写，只能坐在轮车上接待来访者。但当我有问题向他请教时，他依然广征博引，侃侃而谈，思路清晰。

2010年，杭州师范大学林正秋教授约我编一本《南宋西湖词选》，我觉得没有把握，于是向先生征询。先生说南宋词人写西湖的词很多，他鼓励我接受此任务。当我问起南宋词人张鎡(1153—1211)卜居的“南湖”在何处时，他说就是今天杭州市艮山门的水星阁一带，说当年夏承焘先生曾带他们去考察过。后来他还跟我谈起：他原想写一部《西湖词话》，后来没有时间顾及，今更不可能了。吴先生希望我写这方面的文章，其连载的报刊，他可给我联系。我说待我手头的《南宋西湖词解读》书稿杀青后再考虑吧。而今我的《南宋西湖词解读》书稿已交出版社，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而先生却魂归道山，再也不能得到他的指教了，不禁扼腕叹息！

今年3月中旬，李丹学兄来杭，我俩同去看望业师吴先生。李兄在给拍照片时，端坐在轮椅上的吴先生突然问我：“这几天你有没有看过《钱江晚报》？”随后，让师母把3月7日的《钱江晚报》交到我的手上。原来，这一天的《钱江晚报》刊登了介绍《西湖红颜》一书的文章，此书的作者在谈到李清照时说：“李清照在杭州待了二十多年，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西湖，没有写过西湖的词。”吴先生说：“这是胡说八道！”大概是因我曾写过《李清照与杭州》的论文（刊《文澜》2009年第2期），他授意我写一篇批驳文章。为此，他不仅讲了李清照流落杭州后与秦桧夫人王氏的关系以及与流落泉州的丈夫赵明诚家属的关系，还特地叫师母找出徐培均先生的《李清照集笺注》一书交给我。后来我写了《李清照没有写过西湖词吗？》一文，请先生过目，得到先生的认可。后此文刊发于《浙江杂文界》（2012年第2期）。当我把此消息告诉先生时，先生也感到高兴。

吴先生不仅言传身教帮助我做学问，还赠送我不少书籍。他不仅把他自己的著作《唐宋词通论》、《吴熊和词学论集》工整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我，还把他案头的如《诗词浙大》、《庆贺吴熊和教授从教50周年论文集》、《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的校友卷、吴战垒学兄女儿吴蓓（吴先生的博士生）著的《梦窗词彙校签释集评》等书送给我，这对我了解情况和做学问都有很大的帮助。最令人感动的，是我在解读南宋黄中辅的《题太平楼》词时，对“筹边楼”一词，尚未

查得出处。在拜望先生时，我见他的书柜上面有台湾的《中文大辞典》，我想查一下，先生马上去搬来梯子，让我查找，终于解决了难题。先生见此书对我有用，后来就把此书送给我了，真使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虽然雅好诗词，却只是偶尔为之。2008年初，东阳市的金一初学兄送给我一本他的《诗词艺文续选》，我回赠他一本拙著《西湖小品》。因有所感，附寄去一首《〈诗词艺文续选〉见赠呈一初同学》的七律：“世事沧桑留梦痕，而今皆已白头人。秋冬春夏平平过，出处穷达淡淡闻。有志唐僧能见佛，无知杞子枉劳神。遥呈《小品》供谈笑，何日孤山细论文。”本想请先生批评指正的，想不到先生和了我四首诗。先生的前三首七律，已入选于《庆贺吴熊和教授从教50周年论文集》，其诗如下：

应守岩见示新律，依韵奉和 三首（2008年2月）

其一

双鬓满堆岁月痕，浮生大半是劳生。
人无奇遇诚堪贺，子有微言了不闻。
七省破冰除大厄，¹一星绕月独丰神。²
当今正用亲民策，愧煞相如封禅文。

注：

¹去冬湘鄂赣皖等七省横遭冰雪之灾。

²嫦娥一号探月成功。

其二

水上风行自扫痕，乐于盛世作闲人。
旧时语业终须弃，当下鸿儒总阙闻。
薄酒难招虬髯客，余年莫问紫姑神。
前贤名节斑斑在，廉退岂为谀墓文。

其三

雪泥鸿爪数留痕，燕去雁来尽故人。
病后家山频问讯，云间鸡犬少知闻。
老归笔塚诗成帙，寒拥书城句偶神。
把酒何时寻旧约，从容论世复论文。

其实在此后面还有一首：

再和应守岩

钟声渡水了无痕，佛说真如是我闻。
尘事虽烦知世味，名心渐泯识高人。
暮年欲结桑榆社，岁祀还同土地神。
洁去洁来终有累，不须更作解嘲人。

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其诗内涵丰富。有的诗句我还领会不透，但我知道，它既是先生感情的抒发和志节的表白，也是对我的勉励和教诲。因此得先生赠诗后，我又写了《呈恩师》诗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浮生有幸近程门，说地谈天更论文。今读锦诗思玉语，最难相报是师恩。”今重读先生的诗，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可转眼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是“钟声渡水了无痕”，此情何堪！

今年中秋前，我去看望先生，带去一篇《南宋西湖词解读》的《前言》，请先生看一看，并征求写《序》之人。谁知这是最后的相见。在告别的时候，我见先生人虽清瘦，精神却不错。我握着他的手，问他“胃口可好？”他说“可以。”“睡眠如何？”回答“也好。”我总以为恶梦已经过去，先生的恶病已向着好的方向转化。不意11月3日，我参加“西溪祭祀两浙词人祠”的仪式回家，打开电脑，看到老杭大63届同班窗友告知的噩耗，得悉吴先生已于11月2日22时10分走了，享年78岁（虚龄79岁）。我五内寸裂，眼前顿时一片空白！“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标杆性的词学大家，我失去了最可亲的指导老师！

我立即给师母陆兰芬女士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先生的儿子吴海若先生。我表吊慰后，要求参加先生家庭式的送别。在 11 月 4 日的告别仪式上，我敬挽联一副：

诗书有骨，卧榻问经沾化雨；

药石无功，素帋洒泪哭春风。

并受托，代居外地的我杭大 1963 届窗友、吴先生弟子张世欣、李丹、沈洪保、郑爽明、王湄若、方伯荣、毕炎英等诸君，向吴先生遗体深深三鞠躬。

据说天上有白玉楼，如李贺还在，当不会感到寂寞。请恩师一路走好！

（2012 年 12 月 6 日于杭州师范大学）

[返回目录](#)

爱生如子慈母心 ——追念盛静霞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 57 级 陆坚

盛静霞先生是我进大学后，第一位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她当时讲授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经》，是我们五七级学生入学后的第一堂专业基础课。

全年级 160 多名同学都集中在 101 阶梯大教室听课。盛先生讲课语言明晰清朗，语速不快不慢，她那略带扬州音色的普通话，我听了特别亲切悦耳。她在课堂上很注重师生互动，课堂秩序活跃。她生动的解说，常常赢得学生会意的微笑和赞赏的掌声。

盛先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谈心。她很关心从农村、山区、海岛来的学生，看到他们冬天赤脚穿布鞋，床上没有垫被，平时衣食都较困难，她总不声不响地给予帮助。有时怕对方不肯接收，盛先生就叫其他同学带过去，叫带者不要说是她送的。有时学生生病不能去听课，她知道后，常常烧好稀饭带到寝室去看学生。学生都很愿意和她交流思想，谈学习，谈生活，谈家庭，谈恋爱婚姻，聆听她的指教，很多学生毕业后，还与她通信联系，或特地登门拜望。盛先生不仅是一位关爱学生的好老师，她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但她平时不炫耀自己的才华，总是朴实平和，可亲可敬。

她出于吴梅、汪辟疆、汪东、唐圭璋诸大家名下。在前中央大学读书时，即以“女才子”闻名遐迩。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中央大学出了两位女才子：前有沈祖棻，后有盛静霞。”盛先生所作诗词，颇能尽此兴风雅之能事，许多篇章诚可与当代著名诗人沈祖棻先生诸作先后辉映。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盛先生的不少鸿篇巨制，直陈时事，反映现实，倾诉爱憎。在抗日战争期间，盛先生写了多首揭露日寇侵略暴行、鼓舞抗战卫国的“新乐府”。全国解放后，盛先生热情歌颂新时代的新人新事，也严厉批判一些不正之风。

在几十几的交往中，盛先生对我有三次不同的称呼。我做学生时，盛先生称我“陆坚同志”；我留学校工作之后，盛先生称我“陆坚老弟”；我做了盛先生家邻居以后，盛先生直称我“陆坚”。这三种不同称呼，使我有时难解却难忘，仔细想想，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师生感情的时代印记。

记得盛先生给我们讲好第一次课之后，就主动到我们学生宿舍征询意见。因为那时我们刚刚进大学，胆子小，心里慌，不好意思讲话。但老师这么热情，又不应该冷场。于是就有一位同学提议：“叫班长先说！”盛先生问：“班长是哪位？”还是那位同学指着我说：“是他，陆坚。”盛先生马上就对我说：“好，陆坚同志，请你对我讲的课提提意见！”此后几年，盛先生就一直称我“陆坚同志”。我听了很不好意思，但我心中也知道这个称呼有一定的“时代含意”。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战火燃烧的岁月”，今天老师在台上讲课，明天就可能在台下听学生批判！以同志相称，在当时是最时尚，最平等，也是最亲切的称呼。自称我“同志”以后，盛先生经常叫我课前提建议，课后提批评。有时刮风下雨，也到学生宿舍来听建议，听批评，有时还把备课笔记拿出来叫我们修改。那种虚心和认真的态度，使学生久久不忘！大家都希望多听听盛先生讲的课。

可是，“十年浩劫”中，盛先生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打击，再也未能回到她所喜爱的、学生所盼望的课堂。盛先生中年时曾因十二指肠溃疡开过刀，此后饮食特别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胃痛。在那“横扫一切”的暴风雨中，造反派挖空心思地翻出“三反”、“五反”运动中曾一度提及过的之江大学子虚乌有的“黄金案”，也就把盛先生揪进专案组，进行隔离审查。因天天吃冷菜硬饭，引起了肠梗阻，痛得倒地地上打滚，粪便从嘴里喷出来。直到病情非常危急时，造反派才勉强同意好心人把盛先生送去医院紧急开刀。

从此，身心备受摧残的盛先生，体质更为虚弱，不得不提早离开了教学第一线。但是，她对学校、对中文系的事，仍然十分关心。特别是“四人帮”粉碎后，她常常拖着缓慢的脚步，走到马灯桥，隔着

天目山路望望校内的新景象，听听校内的新声息。或者向熟人问问学校的新变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学校命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后不久，有一天在路上遇到盛先生，我马上从自行车上下来。盛先生突然喊了我一声“陆坚老弟”。我感到很难为情。她马上解释：“这不是恭维你，是祝贺你在前进的道路上长进了一步！”接着又说：“我赞成你做系主任，你做了系主任以后，要尽量多为系里的老师做好事，为学生做好事！我要退而不休，我支持你，我会经常向你提建设性意见和合理化建议。”当时我顿觉一股暖流涌动全身。

盛先生非常关心我，生怕我把工作搞错，经常提醒我。有时还叫人带口信或带便信给我，告诉我哪位老师生病了，哪位老师有急事，要我去看看。有时还告诉我，兄弟院校有什么好经验。完全把我看作自家人，帮我扶我，真像一位好顾问、好教练！

有一天，在学校东门的西溪河边，又遇到盛先生站在那里，我马上下车。她比较严肃地对我说：“陆坚老弟，今天我要批评你了，听说有人去系主任办公室找你，几次都没有找到。这不应该啊！”我因一直教书，不太习惯坐办公室。自盛先生这一批评之后，我没有特殊情况，都能坐办公室；如不在办公室，也告诉系办公室我的去向。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下午，盛先生在系里一位青年教师陪同下，到了借住在省总工会干校的杭大中文系。她先在我办公室聊了一会儿，开玩笑地和我说：“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是不是在办公室。”后来她又去系办公室坐坐，听听往日的同事们讲讲话，然后再到校园内转转看看。那天下午我送她回家，请她坐在我自行车上，她不肯。走到上宁桥时，我看她很累了，不得不在附近的小商店歇了歇，又和我说：“下次到中文系时，半路上不歇就好了！”我说：“盛先生身体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她点点头，笑了笑。那天的情景，我至今仍常常浮现于目前，翻动于脑海！

1982年夏，我的家从借住的省总工会干校宿舍，搬到西溪路与杭大路相交的杭大新村27幢，与盛先生家做了门对门的邻居，天天相见。盛先生对我们一家十分关照。我夫人也是她的学生。盛先生常到我家

坐坐聊聊。这时，她对我们夫妇都是直呼其名，犹如慈祥的长辈，我们都感到特别亲切！这段时间，她写的文章，往往要我先看看，提提意见。她和蒋礼鸿先生诗词《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出版前，盛先生亲作注释，也许是邻居的关系，有时要我和她一字一句的讨论。有时一天之中，要我去她家三四次，或者她到我家来三四次，有时我下班迟了，一进家门，孩子就说：“快去盛奶奶家，她找你好几次了！”

由于盛先生的关爱和提携，这段时间，我增长了很多知识，也开拓了眼界，特别是对盛先生和蒋先生的道德文章，又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在那特殊年代，盛先生主动放弃了心爱的教学，放弃了评定职称的机会，但在我们老学生心目中，盛先生就是专家，就是教授，就是才华横溢的诗人！

大概是2004年，有一天盛先生来我家，径直对我说：“陆坚，到书房去，有要事和你说！”我请她坐定。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已封好的，在骑缝处盖了她印章的黄色信封。很沉重地对我说：“陆坚，过几天我准备住进杭州福利中心去，这信封里是我的遗嘱，托你先保存一下！”这出乎意外的嘱咐，使我既感激又觉心情沉重。感激老师对学生的信任，沉重的是盛先生可能自感身体不好。

盛先生住进杭州市福利中心后，我们仍如往日一样，经常联系，有时我去看她，有时她托人带信叫我去。每次见面她都很高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往往是她先要我谈谈学校和中文系的新闻，谈谈老同事们的情况，还讨论讨论当前的一些学术问题，然后再拿出她新近创作的诗词给我看，或者带我去看看黑板报或墙报上发表的她的作品。

她住进福利中心的第二年秋天，她的学生（我的同届同学）陈尚铭、陆惠解夫妇专诚从宁波来看她。陈、陆二位要我作陪。我们三人到达福利中心时，已过十二点。盛先生已吃好午饭，她一定要请我们三人到食堂吃饭，她买了很多菜，坐在旁边看我们三人吃，还不时给我们夹菜，仿佛家长看自己子女吃饭一样高兴！饭后，我们请盛先生先休息一下，我们去园内亭子里坐坐。可是盛先生不肯，她情绪很好，要和我们一起去亭子里坐坐，聊聊天。她一下子提及五十年前我们五

七级同学中二十多位同学的名字，问及他们的近况，还叫陆惠解把部分同学的通信地址及电话给她记下，盛先生还想和他们联系联系。

为了不过多影响盛先生的休息，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告辞了。盛先生一定要送我们到大门口。我们几次挥手请她进屋，她还是一直站在大门口目送我们。后来，我们又走回去，送她进房间休息。站在房门口，她和陆惠解拥抱久久，然后陆惠解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说：“盛老师，请您多保重！过些时我们再来看您！”

走出杭州市福利中心，我们三人久久未能说一句话，只见陆惠解泪流满面。大家心中都在反问自己：“我们也是四五十年教龄的老师，我们也有很多学生，今天也有这样的师生情谊吗？”我送陈、陆二同学到火车站时，陆惠解的眼睛仍是红红的。临别，她又一次对我说：“盛先生不仅给了我们学问，还为我们树立了做老师的榜样！”

我们再次去看望盛先生时，她已从杭州市福利中心转往杭州市中医院。得知盛先生重病住院，很多老学生纷纷赶去探望。有时学生们要依次排长队走进病房。那情景感动了医生和护士，感动院方，也感动每位至今仍深深怀念盛先生的学生！成了流传久远的、师生情谊的佳话！

返回目录

我的老师白正国

—杭州大学数学系 62 级研究生 沈一兵

白正国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益友。印象最深的是，白正国先生非常强调理学学生的文献功夫，因为上世纪 60 年代杭州大学数学系新建不久，图书资料还不够健全，他就派我们研究生轮流去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图书馆，把重要的学术文献抄回来，再请专门懂得数学符号和公式的师傅把它们蜡刻出来，复制 10 份给大家学习。

喜欢数学，就去考浙大

1916 年 12 月 17 日，白正国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父亲在镇上经营中药铺。他从小数学成绩出色，高中时，自学了微积分与射影几何，对严济慈的《几何证题法》和 Salmon 的“ConicSections”特别入迷。有一位留学过日本的数学老师对他说，平阳出了两位著名的数学家，姜立夫和苏步青。还说，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数学家都在浙江大学任教授，你既然喜欢数学，毕业后可以去考浙江大学数学系。

1936 年，白正国报考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在“求过四定点的抛物线”的考题中，他正确解出了两条抛物线，引起了苏步青教授的关注。苏步青和陈建功曾约定，要在浙江大学办一个世界一流的数学系；所有重要的数学课程都由他俩亲自讲授。大学四年，白正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浙大西迁时期，白正国在遵义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执教之余，选定射影微分几何为研究方向。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意大利著名数学家 G. Fubini，这一领域的著作与论文，大多是用意大利文和法文写的。于是，白正国开始学习意大利和法文。

西迁唯一“研究助教”

1942年起，白正国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射影曲面论方面的文章。第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的《科学记录》上，该杂志是当时我国出版的可以发表数学论文的唯一的一种学术刊物，采用英文发表。可是由于物价飞涨，竟不能用起码的新闻纸印刷，而是用粗糙的土纸印刷。



1943年，白正国被浙江大学聘为研究助教。做助教第一个月的工资是70元，学校按月扣除10元抵还他读书时向学校借的贷金，

从左至右分别为叶彦谦（后任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白正国、方德植（后任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苏步青

实发60元。白正国托人到贵阳买了一个2磅热水瓶花去30元，买了12尺白竹布做床单花去10元，剩下20元只能勉强吃饱饭。当时内迁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设有“研究助教”一职，竺校长借鉴此况，聘白正国为研究助教，以让他集中精力搞科学研究。这是浙江大学的唯一的一例。

由于国内发表论文的条件太差，白正国只得把论文航寄到美国去投稿。但抗日战争时期邮路不畅，没有回音。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白正国才从美国“数学评论”（Math. Revi.）的微缩胶卷上得知自己的好几篇论文已经发表在美国数学会的杂志上。抗日战争

胜利结束后，中美开始通邮。白正国发表在美国的近 10 篇论文的单行本也陆续寄来。这些“实物凭证”，使他在浙江大学的学术声誉大为提高。

1958 年杭州大学新成立，陈建功教授被任命为杭州大学副校长，白正国任杭州大学数学系主任。同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白正国参与合并后的数学系的领导工作。

“文革”期间，白正国曾经参加浙江省气象局的台风路径数值预报的研究工作，研究小组集体发表的一篇文章，获浙江省科委颁发的二等奖。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复兴杭州大学数学系的过程中，年届花甲的白正国又受命出任数学系主任。1991 年，白正国被杭州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成名之作

白正国的成名之作是在 40 年代初解决了射影微分几何中著名的 Fubini 问题。在 30-40 年代，以苏步青为首的浙大射影几何学派是与当时的意大利学派、美国学派“三足鼎立”的学派。当时有一个引起国际数学界注意的问题：是否存在曲面，它的一族渐近曲线是互相射影等价的？问题的起因来自德国著名数学家 W. Blaschke 的一个定理：若非直纹曲面有一族渐近曲线属于线形丛，则此族是射影等价的。意大利著名数学家 G. Fubini 研究了 Blaschke 定理的逆问题，得到了问题的肯定回答。由此，Fubini 提问：除了一族渐近曲线属于线形丛的曲面以外，是否还有非直纹面的曲面，它的一族渐近曲线是互相射影等价的？这个难题被称为 Fubini 问题。白正国经过潜心研究，终于圆满地解决了此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即：除了有一族渐近曲线属于线形丛外，还存在且只存在一种特殊的射影极小曲面（projective minimal surfaces of concidence），它的一族渐近曲线是互相射影等价的。对白正国的这一结果，G. Fubini 来信大加赞许，并要求杂志社提前发表白正国的论文。后来，这一成果被载入由 Terracini 执笔的《Fubini 传》中。苏步青教授在专著《射影曲面概论》中对他的得意门生的这个成果也以专题作了详细介绍。此外，白正国在射影微分

几何的曲面论方面还有许多独创性的工作。从 50 年代起，白正国转入一般空间的微分几何学的研究。1957 年，他发表了论文“关于空间曲线多边形的全曲率”，推广了著名的 W. Fenchel 定理。在空间曲线的整体微分几何中，这是一个非常简洁而有鲜明几何意义的不等式。它被载入《中国数学十年》一书，也被《中国百科全书》数学卷所提及。

在黎曼几何方面，白正国完美地解决了日本著名几何学家矢野健太郎（K. Yano）提出的存在若干独立保圆变换的黎曼空间的尺度形式问题，这是保圆几何中一个关键性的基本问题。1980 年，由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倡导的“双微”（微分几何与微分方程）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法国著名几何学家 M. Berger 曾向白正国索要这个成果的论文单行本。

蜡刻纸的记忆

1946 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苏步青之前面向研究生开设的高等微分几何课和主持的“讨论班”甲、乙等课程，由白正国讲授。这期间听过白正国课的学生，有中科院院士谷超豪与王元，美籍数学家杨忠道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董光昌和郭竹瑞等。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白正国一面执教，一面培养教师队伍。那时正值大力提倡向苏联学习，白正国翻译了俄文的几何教材为教师讲课。白先生对教师的进修和培养非常关心，特别是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与提升尤为关注。有一次教师调整工资，他认为有一位教师科研成果突出而工资偏低，主张给这位教师连升两级。但上级不同意，认为全省无此先例。后来，白正国两次向系党总支坚决要求，终于被批准了。

正是由于白正国和陈建功的努力，杭州大学数学系在“文革”前夕，已从开课都成问题的极差境地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教学和科研达到一个新阶段、可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数学系之列的水平了。

返回目录

难忘名师指点 ——怀念陈企霞老师

—杭州大学中文系 60 级 潜问根

走出杭州大学校门二十多年了，大学里的许多人与事都已忘却，可是有一位老师的名字，却一直以来深深地、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里……

1961 年 6 月，我因病休学，次年春上病愈返回母校。新学期开始，忽然听说教我们中文系二年级（3）班写作课的老师是：陈企霞。陈企霞？就是“丁陈反党集团”中的那个陈企霞？真的是他？我不敢相信，心里连连冒出问号。

老实说，在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里，再没有比“反党”这罪名更重的了。而现在竟然让一个“反党集团”的头目来教我们的写作课，真叫人不可思议！难道让他来教我们写“反党”文章？

但是，不管好歹，“反党”也罢，英雄也罢，是学校安排的，我能奈其何！不过，能让“名人”来教我们，还是好的。且看这大名鼎鼎的陈企霞本领如何，拭目以待。我心里这么一想，倒盼望着快点儿上写作课了。

第一节写作课，讲些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这“反党”头目，一见之下，全然不是我心中原先想象的那般面目狰狞，青面獠牙，可怕可憎可恶之极，倒也是一个与一般人没什么任何不同的普普通通的人。不高的个子，方脸，微黑，鼻梁上架一副极为大众化的眼镜，就跟当时我们穷书生所架的一个样。上身穿一件褪色的短呢大衣，没棱没角的。因为是给我们一个班四十余人上课，就在一个小教室里。他讲课时，脸上始终带着微笑。讲课的声音不大，像拉家常一般，不慌不忙地说下去，也没怎么看摊在讲桌上的讲义。一节课下来，没有激昂慷慨之势，没有故作顿挫之调，娓娓道来，不觉得刺耳，句句都能听清。

第一节课后，我们似乎和“反党”头目拉近了距离。

三周后的一天下午，我和两位同窗没去阅览室，就在宿舍里看看书，时而聊几句天，聊天难免会发出笑声。也许是这偶尔的笑声在整个静悄悄的宿舍显得太突出了，突然，有人轻轻叩门。

门只是虚掩着。我们相互看了看。

“进来！”同窗甲干脆利落地喊了一声。

门被慢慢地推开了，我们都没料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他！

宿舍里的温度仿佛骤然间下降了十几度。

短时间的沉默。

“陈——老师！”甲终于先开了口。

“进来吧，陈老师！”乙跟着说。

“陈老师，进来坐！”我也跟着说。

如果说，听课时我们都还有几分戒备心理的话，那么，此刻，面对咫尺之间的“反党”头目，望着他那始终微笑的脸孔，我们的心理防线，在一刹那间，就全垮了！

陈老师走进来坐在一张小方凳上，和我们随便聊了起来。他问我们，上课是否听得懂，对写作课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又问我们，平时自己是否也写点什么。又说，如果有人写了习作，可送到他家里去，他愿意帮助修改等等。

我们就这样随便说说，大约一节课时间，他告辞走了。

说话中间，我有几次故意盯着他那略宽的脑门，意思是想从那脑门的皱纹之间寻出“反党”这两个字来，可是，直到他走出门去，我什么也没有寻见。

因为平时喜欢动动笔，也爱向报刊投投稿，但不知是编辑里没有伯乐，还是我自己本来就缺乏文学细胞，总之是稿子投出去，要么泥牛入海，要么盼来一张千篇一律的铅印退稿信。现在听了“反党”老师的说话，心里禁不住怦然一动：什么时候到他家里登门求教求教？兴许经他这位“名师”一指点，我这个“矮徒”也会变成“高徒”哩。

可是，我不敢对同窗袒露心声，也不敢独自登门。万一被他人知道了我和“反党”头目密切接触，那后果……

又是一日下午，宿舍里只留下我和同窗甲。

我们各自看了一会儿书，甲试探着问：你说，班上有人敢到“反党”头目家里去求教吗？

我反问：为什么不敢？

甲问：你敢？

我反问：你不敢？

暂停三秒钟，异口同声，我与甲轻而有力地吐出一个字：敢！

两颗年轻人渴求知识的心，碰撞出了火花。

记得是五月初的一天，校园里春意浓浓的。上午上完写作课，我与同窗甲一起走出教室，走到陈老师跟前，问清了他的住处，便说晚饭后想去他家，当面请教一些问题。他听了微笑着点点头，和蔼地说：欢迎，欢迎你们来！

六十年代初期，杭州大学坐落的地方叫做道古桥，冷清得很。说是什么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桥。一条通往浙江大学后门、留下方向的窄窄的沙子公路，从杭大教师宿舍旁边经过，一道长长的不高的竹篱笆，隔开了公路和宿舍。公路的北边还有一些宿舍，据说是教授们住的。“反党”头目自然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他就住在篱笆的南边那一排宿舍的最西头。

晚饭后，暮色苍茫，校园里一片宁静。我与同窗甲走进教工宿舍区，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找到了陈老师家。

那天谈话的内容，现在也全忘了。只依稀记得我们不是很有头绪地问了问写作上的一些问题后，同窗甲交给老师几首小诗，我交给老师的是一篇小说习作。老师高兴地接过我们的习作，说过几天还给我们，又送我们到门口，微笑着说：欢迎你们经常来。

以后，我与同窗甲，便或者同去，或各自去，渐渐地，俨然是老师家的常客了。

在我的心里，“写作老师”取代了“反党头目”。

同窗甲的小诗经过指导修改，终于有两首变成了铅字，出现在浙江省的文艺刊物《东海》上。我们班上的许多同学都为他高兴，心里也多了几分对陈老师的敬重。我的小说，老师帮助修改几次后，鼓励我投给《新体育》“试试看”，可我自己总还觉得不行，最终没能投

出去。可惜那写有老师不少修改意见的原稿，在“文革”初期连同日记、讲义、教科书一并付之一炬了。

陈老师每一次给我修改习作，都在我的稿纸上用红墨水写了不少字，或眉批，或增删词句，当时教我激动了半天，后来留在心里的只有抱愧了。

那时候，我正订阅着一份《北京晚报》，报上马南邨的“燕山夜话”专栏杂文每期必读，阅读之余，便也自己专门弄了一个练习本，每天在上边写几百字、千把字的杂感“豆腐干”，妄称“道古桥闲话”。大体上每周一次，把“闲话”送到陈老师家，请他指教。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逐篇地看，逐篇地改。在我的练习本天头地头和其它空白处，写满了陈老师的看法和修改意见。

我的“闲话”一直写到离开道古桥。没有写作课了，陈老师也不教我们的写作课了，我仍然不时地把自己的“闲话”拿去请陈老师指教，他也仍然一如既往耐心地给我看，给我说，丝毫不嫌弃我这些不值钱的“豆腐干”。

终于，到了大三快结束时，我的“闲话”开始变成铅字了。记得7月3日上午课间，有人告诉说，刚到的《浙江日报》三版上发表了我不的一篇短文。我不敢相信，却又但愿如此。待跑去阅览室找到当日报纸，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省报上，顿时心花怒放。吃完中饭，马上急匆匆、乐滋滋地跑到陈老师家，告诉他这一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好消息。他把报纸捏在手里，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指着那篇仅仅六百字的“随感录”《两个圆圈》，微笑着鼓励我：继续写，试试看，再投几篇。“关键是要有你自己对生活的新的发现，要有新意。”

他的话是对的。早些日子，他给我看“道古桥闲话”时，就曾指出那篇《两个圆圈》有点新意，可以投出去试试。我按他的指点去做了，果然投中。我佩服他的眼力。

他的话自此便牢牢地铭记在我的心里。

可惜，我那厚厚的一堆“闲话”，也连同日记在“文革”初期化成了灰烬。

要离开杭大了，我与同窗甲等入去向陈老师道别。那是 1964 年 7 月中甸的一天傍晚，杭州的气温已高达摄氏三十几度，空气相当闷热。陈老师在屋子里，上身只穿着一件旧汗衫。没有电扇。他没有多说话。脸上显得很平静，仿佛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凄凄惨惨的悲伤情调。我们几个同学也便只有淡淡的几句话，说分配方案已宣布，明天就各奔东西，不知以后哪天再能见面。

走出杭大校门，一分配到金华二中，不久便被派到农村搞“四清”，一年后回校，教书一年未竟，文革烈火骤起，九州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也被赶进了“臭老九”的行列，我猜想还在杭大的“反党”头目肯定在“横扫”之列，我只能把名师深深地、深深地藏在心底里……

终于，我从报上看到了党中央为“丁陈反党集团”平反的消息。

终于，我从报上看到了他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这个好消息。

我想念他，想给他写信问好，想向他请教自己这许多年来教学与写作中的一些问题，因一时不明他的地址，信一直没写。有时又想，他一定还能对党工作许多年，以后总有机会的吧。何况，这么多年下来，我并无多少对生活新的发现，倘使见面之后，他问起来，我将何以言对？再等一等吧……

忽然，我从报上看到了他逝世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文艺评论家，《文艺报》，《民族文学》创办人之一陈企霞同志，因病于 1988 年 1 月 16 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74 岁。……我只能在心里深切地悼念他，深情地呼唤他……

现在，我的案头放着他的遗像，是从《文艺报》上剪下来的；放着他的遗诗，是从《人民日报》上剪下来的，其中《无题》一首中有“湖畔盘桓十五年，秋月春晓谁为伴”两句（1988.6.2. 人民日报），从中可以想见他在杭州大学时的寂寞心情。我真后悔在杭大读书那几年，没能更多地向他请教，没能多叫他几声陈老师……

陈老师走了。他把一生交给了党。死后他把遗体捐献给了北京协和医院，他真正是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

五年前我从西子湖畔来到了黄河之滨。我的心里铭记着名师指点。我在生活中努力做到有新的发现。断断续续地，教学之余将点滴新的发现写成短文，投诸报刊，仍是“豆腐干”，数量不多，但渐渐地也有那么一、二、三……

我原想待到有一定的量后，还像以前那样，再请陈老师指教，倘有可能，编一本小册子送给他……谁知他匆匆而去……叫我说什么好呢？……

每当我教学之余，于深夜灯下忽然想写几句“闲话”却又感到并无多大新意之时，我便记起了二十多年前陈企霞老师给我的指点，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他那亲切微笑的面孔，于是用我笨拙的笔，在稿纸上顽强地向前走去……

(2009年7月21号)

[返回目录](#)

难忘导师情 ——怀念业师郭在贻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张涌泉

我自认为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我求学的道路上，我有幸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老师。郭在贻先生便是这些老师中的一个，是他把我引上了我今天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之路。

一

我见到郭先生是在 1979 年。1978 年春天，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我跨进了杭州大学的校门。中文系第三个学期开设的课程有一门是古代汉语，先生便是任课老师之一。

本来我对古汉语并没有特别的爱好，但先生那渊博的学识、生动的讲授，却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求知的欲望，也激发了我对古汉语的兴趣。每次听先生上课，就像是一种艺术享受，我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先生的信徒，尽管当时先生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上的是大课，全年级一百四十多人挤在一起听课，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任课教师是不可能认识的）。两个学期结束，古汉语期末考试我竟然拿了个全年级最高分。这使先生感到意外，他专门把我找了去，对我取得好成绩表示祝贺，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此后，我便成了先生家里的常客。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一些古汉语方面的名著，诸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等，都是我涉猎的对象，这为我今天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9 年下半年，我开始阅读杜甫诗及其他一些唐诗的选注本，其中如明王嗣稷的《杜臆》、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我都仔细地读过，并认真地做了笔记。一次我把阅读杜诗的一些札记送给先生看，先生亟表赞赏，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我把它们整理成文，先生专门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推荐给杭州大学首届文科学生论文报告会，后来又推荐给学报发

表。那几年我还写了另外几篇读书札记，每一篇先生都仔细地看过，一字一句也不放过。记得我在一篇文章中把单人旁的“俗”写成了双人旁，先生用红笔在旁边写了个大大的正字，并加上方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别看错个字是小事，编辑看了，就会觉得作者的基本功不行，文章自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先生还把他写的论文手稿拿给我看，只见毛笔小楷，一笔一画，极其工整；所有的引文都详细注明书名、版本、卷次、页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底，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然先生极力推荐我留校任教，但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被分到了远离杭州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对此，先生十分惋惜，但他劝我不要灰心丧气。先生用毛笔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四个大字送给我。在我悲观的时刻，是先生的临别赠言，给了我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1983年春天，我出差来杭州，特意去看望了先生。先生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他希望我不要沉沦下去，并鼓励我报考研究生。在先生和母校其他老师的关心、鼓励下，我参加了1984年的研究生考试，并以较好的成绩考取了古籍所的研究生，重新回到了先生的身边学习。

在读研究生的两年时间，先生系统地为我们讲授了训诂学、文字学等基础知识；先生还专门抽出时间，为我们介绍治学的经验和方法。先生常对我们说：不要急于述作，要紧的是打好基础，要甘于坐冷板凳。先生告诉我，做学问要注意根柢之学，对几种小学名著，必须扎扎实实地精读一两种。先生说他自己曾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读过几遍，这使他受益终身。根据先生的建议，1985年春夏之际，我开始通读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正好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拟议出版《清十三经注疏》，约请先生校点《尔雅义疏》，先生便让我和他合作，校点该书。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我先把《尔雅义疏》通读一过，又在自己用的本子上校点一遍，然后再录到其他本子上。《尔雅义疏》的引例十分丰富，全书引例约有三万余条。这么多的例证，并非都出自第一手资料，其中有相当多一部分是郝懿行据《经籍诂》等书转引来的，存在着不少错误。为了保证校点的质量，我逐字逐句地查核了郝书所引例证的原文。有

时为了查找一条例证，甚至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这项工作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到1987年底基本完成，几乎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虽然由于出版事业的不景气，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8年取消了整套书的出版计划，但通过这样一番艰苦劳动，我学到了一些根柢之学，觉得是值得的。

1985年暑假，我因事去上海，随身携带了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上下册，抽暇读了一遍。我发现该书在校勘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些前贤已经指出，有些则没有指出。当时我想，造成这么多问题的原因何在？

其间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回杭州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大为赏许，他要我把《敦煌变文集》再认真地看一遍，写成一篇专文。后来先生因病住院，在病床上，先生仍不时地关心着文章的写作情况。

每写成一条，就让我读给他听。后来病情稍有好转，先生就让我带上文章的初稿，陪他到医院外面走走。洪春桥边的茶室，植物园中的小亭，飞来峰下的石墩，先生抱病为我审读论文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文章草成以后，先生写了很长的一篇评语，对我这篇今天看来并不成熟的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开始，先生建议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文史》，但又觉得《文史》出版周期太慢，便把它推荐给《杭州大学学报》。后来这篇长达三万余字的论文分别在《杭州大学学报》和《敦煌学辑刊》上发表了。

1986年夏天，我完成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由于先生的力荐，我得以留校任教。这年春天，国务院批准先生为博士生导师，先生便鼓励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并说可以以《尔雅研究》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研究生班毕业必须工作两年以后才可报考博士研究生，不同意我报考。为此，先生亲自找研究生部主任，又专门写推荐意见。经先生的据理力争，有关部门终于同意我报考。但临到考试那天，却又突然通知我必须加试政治。对此，我毫无准备，只得罢考以示抗议。事后先生安慰我说，做学问关键是要有真才实学，要出成果，而不在于考不考博士。先生说他自己只有大学文凭，没有

读过硕士研究生，更没有读过博士研究生。先生劝我不要考博士研究生了，他希望我抓紧时间多出成果，争取破格晋升。

二

1980年前后，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和熏陶下，先生的研究方向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了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俗语词渊藪的敦煌变文，却一直未能有一部较为可靠的校点整理本问世。当时学者所依以为据的，大抵是50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如前所说，由于受当时学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敦煌变文集》的校订工作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疏漏，这就不能不对方俗语词考释工作的准确性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样也不利于敦煌变文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有鉴于此，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徐震等先生都一再呼吁学术界吸收这些年来校勘成果，编辑出版一个敦煌变文的新本子。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先生在1987年前后开始酝酿《变文集》的汇校问题，并决定与我和黄征同志合作进行这一工作。1987年4月在杭州富阳举行的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年会上，先生正式提出了编著《敦煌变文汇校》一书的设想，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吕叔湘、项楚、王等著名学者都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积极的支持。后来先生又提出编著《敦煌文书俗字典》及《枢敦煌变文集校议》的计划。这样，加上《敦煌变文汇校》，就是先生与我跟黄征合作撰著的“敦煌学三书”。

由于合作撰著“敦煌学三书”，我和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也更多地接受了先生的教诲和熏陶。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学术商榷文章态度要诚恳，语气要谦和，用词要婉转，尽量少用“非也”“误”等等过于生硬的字眼。先生说，他早年写的一些文章有时锋芒太露，过于咄咄逼人，这是一个教训，要我们引以为戒。

先生曾和我合作撰写过一篇《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的论文（刊《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文章要刊出了，先生重阅此文时，觉得其中对《王梵志诗校辑》一书的几条批评，用词过于尖刻，便亲自给主编写信，希望主编代为斟酌删改。

1988年8月，我和黄征同志赴京参加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行前先生特意把我俩叫去，授以“谦虚谨慎”四字。可以说，“谦虚谨慎”正是先生处世治学的基本准则。

先生强调治学应该谦虚谨慎，但他又反对无原则的迁就，反对人云亦云，无所发明。先生提倡年轻人要有点傲气，要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认为年轻人如果没有点傲气，没有自信，是很难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做学问要贵发明、重创造。他把某一个训诂问题的解决比作发现一颗新星，并且常常以此自得其乐。先生特别推崇宋代理学家张载的一段话：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先生认为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或精于此，或疏于彼，不可能包罗万象，无所不通。所以他认为即便一些名家、权威的著作也会有纰漏，年轻人读书要尊重名家、权威的意见，但又不可为名家、权威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学术探讨上，先生从不以长辈自居，他常常鼓励学生挑他的文章中的毛病。

先生的《敦煌变文校勘拾遗》是一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我看了这篇论文后，觉得其中有一条似乎未尽切当：“遍体悉皆疮癣甚，形体苦老改容仪。”（《目连缘起》）其中的“苦老”较为费解。先生认为“苦”是恶义，“老”乃“差”字形讹，“苦差”就是丑陋、难看的样子。从文义看，这样的解释是可以成立的。但“苦差”连用，别无文献佐证；“苦”指容貌丑陋，也没有更多的证据，所以我觉得先生的校说不一定可靠。我把我的想法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觉得有理。他让我核对一下这两句话的敦煌写本原文，一查原文，答案找到了：原来“苦老”写卷本作“苦”，乃“考”的俗字（见《干禄字书》），“苦考”就是“枯槁”的假借字。在先生的指导下，我把我的想法整理成文，与先生的意见进行商榷。文章写成后，先生又专门写了一个评语，推荐给有关刊物发表。

先生这种严于解剖自己，不护己短的治学态度，使我很受感动。

在合作撰著“敦煌学三书”的过程中，先生和我们合写了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通常由黄征和我分头执笔。黄征执笔的，写好后先让我看一遍；我执笔的，写好后先让黄征看一遍，然后再送

先生审定。先生审阅时，大到谋篇布局，小到遣字造句，都认真地加以推敲，或肯定，或否定，或增加例证，或删除枝蔓，在我们论文的初稿上，留下了先生数以千计的评语和删改意见。先生在我执笔的一篇论文初稿上写道：“文章应力求精炼，套语少用，多余之字宜删，反复琢磨，必能臻于妙境。”像这样的指导性意见，既使我们看到了文章的缺点，又使我们明白了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读书治学，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马虎苟且。但对我们的进步，先生却满腔热情。先生和我合作校点的《尔雅义疏》完稿以后，先生让我执笔写一篇校点前言，分析一下《尔雅义疏》的成就和不足。初稿写好后，我送给先生审阅。先生当天下午就带着看好的稿子来到我的住处，他说写得不错，他要我署我一个人的名字，誊抄后由他推荐给《辞书研究》发表。他对我说：像这种重点文章，你一个人署名好了，两个人署名，对你以后升职等不利。但这本是先生与我合作的项目，我怎么好意思一个人署名呢？由于我的坚持，先生才让两人连署。先生与我们合作撰著“敦煌学三书”，先生也坚持要把我和黄征的名字写在前面。他说，中国人论资排辈的思想非常顽固，这不利于学术发展，他想为学术界开一种新风。

三

1985年夏天，先生因胆囊炎引发腹膜炎而动了手术。手术不算太大，但术后的恢复却特别缓慢，先生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四个多月。从那以后，先生的身体似乎一直就没有真正恢复过，不幸的种子那时候大概也就已经种下了。

但与此同时，先生在学术界的声望却如日中天，不断上升。于是登门拜访的、委托审稿的、请求看稿的，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接踵而至。特别是许多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的论文请先生审阅，在他们看来，先生俨然是一个超级裁判，先生的意见将会决定他们论文的命运。而先生恰恰又是“菩萨心肠”（一次先生和我谈话时，曾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自己），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先生每天忙于会客、看稿、写信（先生自己曾有个统计，1987年全年发信297封）、跑邮局，这些繁杂的事务消耗了先生的时间，也消耗着先生的生命。与此同时，先生

又要为未来的博士、硕士、学士们上课，为他们审阅论文、批改作业。就在先生去世前的那个学期，先生还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训诂学》、《楚辞研究》两门课程。实在太忙了，先生只得放弃许多像高考阅卷、自学考试阅卷、为夜大学生上课、函授辅导等等，这些在清贫的大学教师看来都不失为“赚钱”的机会，尽管先生家里仍然穷得可以！先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今天可以做好的事绝不会拖到明天，如果有什么本该做的事拖下了，先生会坐立不宁的。后来实在力不从心，书桌上待看的稿子渐渐多起来了，先生只得请他的学生帮着看一部分稿子。有一次先生感慨地对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先生指着他刚编好的论著目录说：从1978年到1985年，他每年都要发五篇以上的论文，而这两年每年只发一两篇小文章，因而大有“江郎才尽”之叹。其实我们这些弟子心里都清楚，这些年杂七杂八的事就够先生应付了，先生那还有多少时间去搞他自己的科研呢！

四

先生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门徒弟子。先生对这些弟子的培养，倾尽了自己的心血；弟子们也十分崇敬、热爱自己的老师。1989年的1月11日是先生的五十岁生日。早在1988年初，弟子们就筹划着为老师举行一次热闹的庆祝会。但先生却说：不必大家费心了，去年《训诂丛稿》被评为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奖，有1000元奖金，到时我请大家到外面吃顿饭吧！可是谁能想到，癌细胞已在吞噬着先生的生命，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先生……

1988年10月底11月初，先生身体异常不适。11月5日上午，再次的B超检查诊断先生得了肝癌。那天下午我去看望先生，先生平静地对我说：情况不妙，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只可惜他们孤儿寡母的……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我震惊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先生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患上不治之症呢？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安慰先生说：不会、不会的……接着几天的CT检查、彩色B超检查，似乎出现了某种转机，诊断结论倾向于血管瘤。对于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地震后的人，这无疑是

个值得庆幸的消息。然而好景不长，11月7日我和师母去医院取验血报告，上面赫然写着：火箭电泳 642ng（正常值为 ≤ 20 ng）。这是一个不祥的数字，我们的心头又罩上了一层阴影。为了稳定先生的情绪，我们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他。

11月10日晚八时许，先生肝部剧痛，我和一新匆匆忙忙从黄龙饭店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和师母一起，把先生送进了浙江医院。值班医生诊断后，怀疑是肝癌肿瘤破裂（第二天下午开刀手术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是晚上，当时只采取了些止痛措施。病房没有空床位，当晚只得把先生安置在走廊尽头的一个临时床位上。初冬的夜晚，寒气袭人，走廊上风呼呼地，简直让人冷得发抖。先生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疼痛和寒冷一起袭击着他。我口袋里揣着值班医生开的病危通知单，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悲哀。第二天下午，先生接受了开刀手术，但因肝癌肿瘤太大，医生认为不宜切除，便缝了回去。手术刚结束，先生看到我，第一句问话就是：是不是血管瘤？我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告诉先生是血管瘤。我还说：手术很成功，肿瘤已经切除，请先生安心养病。在先生面前，我从不撒谎，也从没有撒谎。但在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六十多天里，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先生，我为此感到负疚和不安。如果先生九泉之下有知，该是会原谅我的吧？

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下，11月19日上午，浙二医院为先生组织了第二次手术。先生后来对我说，那天他是担心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的。但在进手术室前，先生显得分外平静；那天早晨，先生的食欲也特别强，他看到傅杰拿了一个包子给我吃，笑着说：“给我也吃一个吧（手术前是禁食的）！”先生谈笑风生，但我们却怎么也笑不起来。第二次手术是成功的，先生左肝上的大小三个肿瘤全被切除了。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手术后不久，癌细胞便迅速向右肝转移。虽然医院、学校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最终未能把先生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的病情不断恶化，身体也是日渐虚弱。但先生仍念念不忘他的科研工作，不忘他的学生。先生挂帅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先生说 he 出院后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争取尽早完成；研究生要毕业了，先生关心着他们的分配问题；学校评职称了，先生记挂着青年教师的晋升；小方

的论文迟迟不能发表，先生让我捎口信给编辑，先发小方的，他自己的论文晚些再发；小金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向学校要求延迟回国，先生让我回信，说他出院后马上找校长商量……最使先生难以忘怀的，是他和我们合作撰著的“敦煌学三书”。当B超检查显示先生得肝癌的那天下午，先生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给我和黄征写了一封遗书，希望我们努力完成“敦煌学三书”的撰著工作，争取把三本书出齐。

1989年1月8日，离先生五十岁的生日只有两天了，我对先生说：再过两天，就是先生的生日了，先生需要买点什么？先生回答说：什么都不需要了！

后来他对我说：你给我重新编个论著目录吧。那天先生还对我说：方以智的《通雅》是本好书，如果到了，给我也买上一本。

1月9日晚，是先生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晚我去医院护理先生。先生双眼紧闭，呼吸急促，前几天连续不断的咳嗽却意外地停止了，因而病房里显得格外的宁静。这异常的情况，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晚上十点多，护士对我说：郭老师情况不大好，今晚可能要出事，你要特别留神！

护士这一说，可把我的心提了上来。我把靠椅移近病床，守候在先生的身边。

先生偶尔睁开眼睛看看我，旋即又闭上了。夜越来越深，我那颗悬着的心也越来越感到紧张。好几次我想给师母挂电话，但又怕师母太紧张，拿起电话机又放下了。后来我想让蒋冀骋来医院，可偏偏学校研究生宿舍的电话好半天也接不通。那几天，我的左肩膀隐隐作痛，那晚上更是莫名其妙地痛得厉害，我真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实在痛得不行，我便向护士要了颗止痛片，凑着自来水吃了下去。晚上十二时许，先生让我给他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先生要喝水，我便让先生喝点参汤。先生喝得特别费劲，连张开嘴巴似乎都需要巨大的力量，好半天才喝进去一点点。望着先生那痛苦的神情，我的心底感到无限的悲痛。此后，先生就再也没有吃过什么，也再也没有说过什么了！凌晨四点左右，先生的血压突然降了下来，医生让我赶紧通知家属，并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但这时任何灵丹妙药都已经无济于事。

1989年1月10日13时10分，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先生走得那样匆忙，他没能过上他五十岁的生日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走了，先生永远地走了。他静卧在他深深依恋着的西湖旁边的群山中。他太累了，他是需要好好地歇一歇了。虽然我和我的师兄们不能再当面请先生为我们传道解惑，但我们能在他留下的著作里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

先生，您安息吧！

[返回目录](#)

清风留古道 春雨忆初阳 ——怀念朔方师

——杭州大学中文系 79 级 楼含松

我国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文系资深教授徐朔方先生于 2007 年 2 月 17 日下午与世长辞。在告别仪式上，我撰了一副挽联：“绛帐清风留道古，青衿凄雨忆初阳。”联语未工，但记录了师从先生的点点滴滴，也表达了我在先生逝世后的伤悼之情。作为他二十多年的学生，爰作此文，通过几个片断，感怀先生的教诲之恩，抒发对先生的深切思念。

“听不懂”的课

初识徐先生，是在我大学二年级。记得当时徐先生给我们上古代文学基础课，主讲两汉魏晋文学。当时徐先生年近六旬，虽然白发萧萧，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身材不高而敦实。徐先生进得课堂，没看他拿什么讲义，只是带着《古代文学作品选》和几张写满字的纸片，没有什么客套，兀自就开讲了。他的嗓音清亮而略带尖锐。

已经不记得徐先生当时上课的具体内容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就没有听懂徐先生的课。这固然与我的鲁钝有关，不过确实有不少同学与我有相同的感受，认为徐先生的课“听不懂”。

徐先生上课，并不像一般老师那样从时代特征、作家生平介绍开始，然后是作品串讲，进而思想与艺术分析，最后讲历史地位和文学影响。这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史的授课方式，久之习以为常，觉得文学史就是应该这样的讲法。但徐先生不是这样。记得是他讲《史记》，对于教科书上已经系统介绍的司马迁生平、思想，他没有重复讲述，简单带过，接着就讲作品。而讲作品，也不是逐句解释，大凡书中注释详尽的地方，他就略过不讲；而没有注释和注释不确切的地方，徐先生或作补充，或为纠谬。与后来读到的徐先生的学术论文思维缜密、

文采华滋不一样，徐先生上课并不追求耸动听闻的效果，即使一些极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也是要言不烦，点到即止。

要听懂徐先生的课，得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必须对所讲内容有相当的了解，至少应该大致浏览过教材，这样才能领略徐先生揭示问题的眼光、解决疑难的慧心。这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在当时，习惯了让老师牵着鼻子走的我们，面对徐先生这样看似略无崖际、不成系统的讲解，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还生出一些不满。但是也有一些同学十分喜欢徐先生的课。

认为这样的讲课，才是真正水平的体现，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到了期中，徐先生安排了一次测试，结果班里几乎有一半同学不及格，我的成绩也很糟，但少数几个同学却得了高分。下半学期，我逐渐适应了徐先生的讲课方式，知道一点读书的方法，也略窥徐先生治学的门径，才算品到了听徐先生课的味道。

我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后来成为徐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在闲谈自己的治学道路时，先生提到，当年他考进浙大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听了一位先生连原文带注释照本宣科讲解《庄子·逍遥游》的课后，他产生了与《牡丹亭》的女主人公相同的感受：依注解书，学生自会。就不愿再在中文系了，转学到了英文系，直到毕业。直到这时，我才领会当初徐先生给我们上课时的良苦用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尤其是大学教育，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我博士考试复试时，徐先生对我说了一番话：“我看过你写的一些文章，总的来说，文字功底还不错，表达还算清通，但思想深度方面不够。

要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学术目标和要求，要超越自己。”此后，无论进修课程还是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徐先生都有针对我的弱点，有意识地增加这方面的训练。跟徐先生读博士，随时感到有巨大的压力。他的课程，常常会布置一些具体的问题，要求学生自己去查找资料，独立思考，写出文章。其实，这时候徐先生自己对此问题已经做了研究，并写成了论文。他会指点材料的范围，通过什么途径去收集，重点思考什么问题，但不会事先告诉他自己的研究结果。这样做，就是要我们经历研究的全过程，而不是简单接受现成的结论。我们学生提

出的观点，常常与徐先生不一样，他就与我们辩论，引导我们研究的深入。有的时候，双方都不接受彼此的观点，徐先生也从不将自己的结论强加给学生。

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十分有效，并让学生养成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行走的“课堂”

“徐老师有一个毛病让我很难过，就是酷爱走路。在杭大时，他经常来到我的房间谈谈。他不喜欢坐着谈，不喜欢开空调，最讨厌老专家楼的沙发，夏天十分钟一过，冬天三十分钟一过，他就说：‘在外面走着谈谈吧。’我们从西溪路走到黄龙公园走一个半小时左右。各位知道，徐老师谈的内容很丰富，但表达很简要，而且还带有一点儿家乡东阳的口音，像我这样的外国人，面对面谈谈也不容易理解，徐老师走着谈话，我把全身变成耳朵，拼命努力听他的话，总有不少部分听不懂。回到专家楼，满身是汗，累得要死。对当时的我来说，西溪路到黄龙公园这一段路，是我的大学院，世界上教育最严厉的大学院。”

这是日本神奈川大学的铃木阳一教授在庆祝徐先生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他的话引发会场一阵会心的笑声。凡是徐先生的弟子，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徐先生认为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需要有充沛的体力支持，因此十分注意身体锻炼，夏天游泳，冬天跑步，到了七十多岁，出门还骑车。即便给研究生上课，他也喜欢边走边谈。徐先生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很少，因为他出的专业考卷很独特，内容范围很宽泛，问题角度不拘一格，几乎没办法通过常规的考前准备来应付，更不要说临时突击背书本。只有靠平时的阅读积累，加上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才能勉强通过。考徐先生的研究生难，是出了名的，很多考生知难而退，尽管应试的不少，能列门墙者还是寥寥。学校有关主管部门曾经向徐先生委婉提出降低考试难度，但徐先生照样我行我素，坚持宁缺毋滥。

因为及门弟子不多，徐先生也就不在教室正襟危坐地授课，而采用讨论的形式，通常是让学生定期去他家，讨论他事先布置的课题。但这样的讨论课一般总会从他家的客厅开始，在他的家门口结束。那时候徐先生的家在道古桥的杭大新村，等到二三个学生到齐，他开个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就会提议出门边走边谈。通常的路线是沿杭大路到宝石山下，再拾阶而上，直到山顶的初阳台，稍作盘桓即下山，有时是原道返回，有时会过紫云洞、黄龙洞而返，等走到徐先生家门口，大约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堂课也算结束了。

在徐先生看来，读书做学问，外在环境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自己能否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资料室“门虽设而常关”，徐先生不能正常进行小说戏曲的研究，就想到“借《史记》和《汉书》的研读，也许可能做一点有益于人的事”。因为他手头有开明版的《二十五史》，研究《史》《汉》无待外求。徐先生谦称自己只是把小学生的加减法运用到了文史研究中，把《史记》和《汉书》内容重叠或其他可以对比的部分，逐一比勘，详细列出两书的异同，分析探究其中蕴涵的曲折原因和文化信息。在许多学人专业荒废的“十年动乱”期间，徐先生写成了《史汉论稿》一书。此书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对于当时好发空论甚至歪曲史实的恶劣学风来说，无疑是一种无言的抗争和有利的反拨。

有一次徐先生问研究生有什么困难，那位学生随口说，早晨宿舍楼外的学生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又有一次，徐先生九十多岁高龄的老母亲摔跤骨折住院，需要有人抬着去拍片检查，几个学生赶去帮忙。学生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多分钟，徐先生当时正站在病房门边，手持一卷线装书看得入神。见学生来了，赶紧说：“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这话让几个学生面面相觑，因为谁也没想到带书本去。凡此种种，言传身教，令学生终身难忘。

徐先生博览群书，但自己的藏书并不算太多。一方面因为他所读的书、需要的资料不是寻常书肆上能够购得；另一方面，他认为书关

键是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我所有，即使家中坐拥书城，也不过是摆个虚架子。因此他的工作地点常常是在图书馆。到外地出差开会，他总要尽量挤出时间去当地图书馆访书；对于自己没办法找到的资料，就千方百计托朋友查找。他也常常到学生、同事家里借书。有一段时间，我家也在道古桥，离徐先生住处不远，那时候徐先生体力已衰，腿脚不便，已经好几次摔倒受伤。但他还是坚持走路，好几次独自登上三楼到我家，为的是借书。每当听到他那清亮尖锐的嗓音喊着我的名字，打开门看到他颤颤巍巍地站在面前，我总是又惊又愧，一来担心他走路不稳，怕出意外；二来看他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还坚持学术研究，除了钦佩，只有惭愧了。我每次和他说，只要打个电话，他需要什么我马上可以送上门去。但他总是呵呵笑着回答：不麻烦你！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的杭州大学中文系，老一辈著名学者王驾吾、胡士莹、夏承焘诸先生，先后驾鹤归去。徐先生是中文系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加上他本人学术造诣高，为人坦诚，在中文系具有极高的威信。但徐先生也是一个看上去不容易接近的人。我留校任教时，正值徐先生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等他回国，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登门谒见徐先生，因为他是我们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他还没见过我这个新助教。但徐先生听我说明来意后，马上说：“我已经不当教研室主任了，因此你不必向我汇报。”听了徐先生如此直接回答，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就是徐先生的直率。他从不客套，说话率真，不假辞色。在徐先生家，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正在与徐先生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有人敲门，徐先生总是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一条缝，问来人有什么事？不管是熟人还是生客，只要没特别重要的事情，徐先生一般不会让人进门，就隔着纱门，简单将事情说完，道声再见，随手就将门关了。徐先生平素喜走路，路上遇见相识，往往也是微笑点头而已，很少会停下他那急促的脚步，与人寒暄。这就是徐先生的风格，中文系的师生都知道他的脾气，也就见多不怪了。

在学术研究上，徐先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那就是“特立独行”。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是1956年关于《琵琶记》的大讨论。这一年的4月8日，他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琵琶记是怎样的一个戏曲》一文，在肯定这个剧本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戏剧创作的深远影响的同时，着重指出它的基本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的。同年夏天，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首都文艺、戏剧界人士以及上海、广州、杭州、重庆、青岛、长沙、武汉等地的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琵琶记》讨论会。会议从6月28日开始，7月23日结束，共进行了七场讨论，所有发言和会议记录汇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6年12月出版。前两场讨论中，所有发言基本上都对《琵琶记》持肯定态度。徐先生应邀于7月初赴会，参加了第三场以后的讨论。他重申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并作了更加细致的分析。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大批很有声望的学者都反对徐先生的观点，其中包括他的老师王季思教授。

作为一名三十三岁的青年讲师，徐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这种独立不倚、惟真是尚的学术胆识与勇气，贯穿了他的一生。徐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权威，晚年还发表过《汤显祖与梅毒》的论文，有人劝他不要发表，以为有损汤显祖的清誉。但徐先生说：“我有材料啊！”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个时代文人生活和社会风气，自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而不必为尊者讳。

熟悉徐先生的人，经常会听他说两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不知道。”在学术问题上，徐先生绝不苟同别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要经过事实的论证；他写文章也从不含糊其辞，总是思维缜密，论证充分，观点鲜明；但凡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他绝不会强不知以为知，不作无根游谈。有一次，徐先生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你的文章，‘也许’、‘可能’用得太多了，既然自己都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呢？”原来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加上这样字眼，修辞上显得委婉些，徐先生一针见血的批评，正是发现了我写作时的不自信。20世纪60年代初，徐先生完

成《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该书的前言。出版社来信，说“中央负责同志”（实即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了之后不满意，要求修改。

徐先生回信说自己只能重新研究以后才可以修改，怕他们急于出版，不能等待。出版社又来信说可以参考侯外庐（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最近发表的有关汤显祖的论文加以修改。徐先生读了侯外庐的论文后认为，他引用的汤显祖诗文，诠释理解往往违背原意，无法令人信服。于是徐先生写了论文对侯氏观点予以纠正，并告诉出版社，自己不能按照侯外庐的观点进行修改。徐先生的学术风骨，由此可见一斑。他在学校为庆祝他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上，笑称自己是个“捣乱分子”。这是徐先生特有的幽默，这种自我解嘲其实表露了他对自己学术个性的自信和坚持。但徐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从不自满，而是不断修改以至重写旧作。他晚年自我总结说：“我不急于争辩，哪怕在几年以至几十年之后，我也要重申并完善我的论点。”

在《琵琶记》讨论之后三十多年，我重又发表了《论琵琶记》和《高明年谱》。正如同1954年我在《新建设》杂志发表论文《马致远和他的杂剧》，三十六年后我又发表了同样题目的论文；50年代发表的论文《汤显祖和他的传奇》到1993年的专著《汤显祖评传》；1957年的《汤显祖年谱》到1993年收入《晚明曲家年谱》中的《汤显祖年谱》重写本都是同样的例子。”

其实徐先生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学者，对于认真与他商榷学术问题的人，他都青眼有加，给予热情的回应。他待人真诚，因此也赢得别人的由衷尊敬。这里仅记两件小事。一是他的《史汉论稿》中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份的考证，有一个附注：“在讲授《史记研究》选修课时，陈南民同学在课堂作业中对司马迁出生年提出一个极为简截了当的论证：如果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他就不可能出生在原籍龙门，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奉令迁居茂陵。这种政治性的迁居不允许只身来京，而把家属留在原籍。乐于补充并介绍如上。”这就是他对一位在校本科生的奖掖。

还有一件让我至今历历在目的事：在师母不幸病逝后，徐先生年事已高，孑然一身，他的生活令大家担忧。一天傍晚，我去看望先生，才走到门口，就看到中文系王元骧（林祥）教授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鱼，特地送来给徐先生。

王老师是徐先生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而且也是孤身一人。王老师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本不是徐先生的学术同行，但他多次在我面前提到徐先生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达对徐先生的崇敬之情。

当时的场景令我十分感动：这碗鱼汤，凝聚着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啊！

[返回目录](#)

令人终身受益的一课

——忆蒋礼鸿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张梦新

1978 年春，已经而立之年的我，有幸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一名学生。在四年的求学生涯中，有数十位名师硕匠给我们上过课。他们教我们做人，教我们知识，教我们学习的方法，使我们受益终身。

本文记述的，是 1980 年 9 月 3 日蒋礼鸿先生给中文系 77 级上的“目录学与工具书”这门课的第一讲，距今已逾四十年。笔者当年课堂笔记本的纸张已经泛黄，但字迹仍然清晰。兹予以照录，以与读者诸君分享。

蒋礼鸿先生当年给我们上课时，已经 64 周岁。那天，出现在课堂上的蒋先生身材中等，穿一件灰色的中式对襟衫，头发已现花白，但是精神矍铄。他用略带嘉兴口音的普通话，开始了他的“目录学与工具书”的第一讲。

这一讲，主要是讲学习这门课的目的和方法。

一、目的

1. 凡研究一门学问，必得有资料。

如搞古代文学，主要有三种：

- 1) 搞通史，如研究各家各名著；
- 2) 专治，如专搞戏曲研究；
- 3) 专搞一家，如研究杜甫。

专搞戏曲的，应知道明代臧懋循《元曲选》（杂剧），其他如《阳春白雪》、《乐府新声》，周德清《中原音韵》，徐步奎《汤显祖选集》等。

搞古汉语的，应看《说文解字》（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尔雅》、《尔雅疏证》（王念孙）等，很重要。传统分三部分：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

清代谢启坤有一本关于古汉语目录学的著作《小学攷》，是我的老师。

搞作家的，如研究杜甫，有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杨伦《杜诗镜铨》、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施鸿葆《读杜诗说》、钱谦益《杜诗笺注》，还有解放后著的。

除看这些研究著作外，还应了解李白、高适等与杜甫交往的人，读元稹的《杜甫墓志铭》等。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论到之人很多，“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说自己欲以屈原为榜样，只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靡艳诗风的后尘。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末句完全道出了李白诗歌的风格，说明源于庾信、鲍照，可拿其歌行体诗歌与鲍照的《拟行路难》比较。

杜甫的伟大在于他能“转益多师是汝师”。研究杜甫，一定要看六朝人的东西。李详《杜诗证选》，“选”——《昭明文选》，说明杜甫的诗很多来自《昭明文选》。确实，杜甫曾对其儿子说，要“熟读文选理”。

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权舆”：相当于现在“初稿”。此理学是《文选》理学，非程朱理学。

研究杜诗还要解决因不同版本而文字不同的问题。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的作“乃”，有的作“及”。我肯定说“及”对。因为这是喜雨、好雨。“及”，不先不后；而“乃”，词之难也，必先具备条件才会有的。如陆游《春雨》：“午夜听春雨，发生端及期。”端：的确。

2. 搞研究，其次是解决疑难的问题。

如王维《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还是“愿君休采撷”？应该是“休”对。

杜甫《北征》：“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被：加。

蔡梦弼《草堂诗笺》：“恩私者，谓天子之恩及于甫之私门也。”私：公私之私。特别。这种解释不对。

唐传奇《红线传》，节度使说：某某首领，系在“恩私”。私：爱一惠一德。恩私，即恩爱也。当连在一起，是并列的联合复词。

《汉乐府》：“寄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区区：热情状。

《邹忌讽齐王纳谏》：“吾妻说吾美者，私我也。”私：爱。还有“鸿私”、“殊私”等，也常可见。可查工具书《佩文韵府》。

如“殊私”，梁简文帝启：“特降殊私，温华曲被。”

“鸿私”，章怀太子《读修书表》：“伏乞俯从微愿，特降鸿私。”鸿私，宏私也。

“荣私”，陈子昂表：“先臣萦绶章，綬累忝荣私。”

清代诗人黄景仁：“长共衰亲向南望，手拈香瓣话恩私。”

再如“惭”，惭愧，但还有其它意思。

《敦煌变文·伍子胥变文》：“更蒙女子劝谏，尽足食之。惭愧弥深，乃论心事。”

《鸞子赋》：“一冬来居住，温暖养妻儿。计你合慙愧，却被怨辩之。”

张建材《酬韩校书愈打毬歌》：“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吾人一言惠。”所以“惭愧”应有感谢意。

另见杜甫《羌村》：“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到《水浒传》中，惭愧有“幸运”意。如燕青射中飞鸟，道声“惭愧”。

李贺《唐儿歌》：“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书空作‘唐’字。”王琦：“对值，犹匹偶也。”要引起注意的一是“对值”，“值”不读入声，此读音与“字”押韵。二是东家的“东”字，此由宋玉《登

徒子好色赋》东邻之子“登墙窥臣三年”而来。可查《佩文韵府》中“东家”注。或查《骈字类编》。

《元曲选》中贯云石《折桂令·咏纸帐梅花》：“夜半相思，香透纱窗。”字义好懂，但有一出处——唐代卢仝：“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如要能指出出处，有两种途径，一是博览丛书；二是翻工具书。如《渊鉴类函》《太平御览》《广群芳谱》。

3. 搞研究，要有自己的观点、看法。

这方面工具书不能帮大忙，但也可以帮一点忙。如李清照，都讲她是婉约派词人，工具书可帮助查出是谁讲的。我坚决反对说她是婉约派词人。

4. 搞研究，还有如何为文，如何写出来的问题。

搞古典文学的，应学会写古典诗词。

二、方法

1. 这门课是读书有限偷懒法。

但这偷懒绝对不能代替学习研究，只能提供些线索。

2. 工具书也不是没缺点没错误的。

如自己写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鹞子赋》：“口衔艾火，送着上风。”我根据另一篇《舜子变》中“艾”与“钗”相通，而通为“柴”字。后来在书的第三版时，根据“客时劾我病欲死，一夜转筋着艾燃”，“艾”与“艾”形近；我又见到李卫公（李靖）兵法中写道，把杏仁挖出，塞进点燃的艾绒，缚在燕子脚上放出去飞到敌营，以烧毁敌人的兵营和粮草。故“艾”应为“艾”。诗中“衔”则更显燕子的勇敢。

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

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钱钟书认为“分茶”即鉴别茶，并引用白居易的诗“应缘我是别茶人”。这是望文生义，把“分”和“别”作为近义词。这是不对的。

“分茶”在宋人文献中有两义：一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中的两义，一是餐馆，二是面馆；二是当时的一种戏茶游戏、技艺。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投壶、花弹、蹴鞠、分茶……风筝，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

杨万里《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诗：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
二者相遭兔瓿面，怪怪奇奇真善幻。
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
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
不须更师屋漏法，只问此瓶当响答。

……

屋漏法：书家的一种笔法。

3. 要打好基础。

如搞唐诗的，可阅余冠英《乐府诗选》、沈德潜《古诗源》，北大已故教授高步瀛《唐宋时举要》《唐宋文举要》，还有《绝妙好词笺》等。

还可读《昭明文选》、李白、杜甫等各家诗选。

（第一次课的课堂笔记记至此）

后记

四十多年过去了，但蒋礼鸿集先生的这节课，却在我脑海中记忆深刻，使我感动，使我敬佩，使我受益。

使我记忆深刻，是因为这节课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从诗歌、词赋、戏曲、变文、《文选》等各种文体，屈原、宋玉、李白、杜甫、王维、李贺、李清照、陆游、杨万里等著名作家，到《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尔雅》《尔雅疏证》《小学攷》《渊鉴类函》《太平御览》《广群芳谱》等多种工具书，仿佛给时读大三的我们开启了一座巨大的中华文化文史宝库，让我们惊叹其博大精深，从而激发学习、探索的兴趣和积极性。



使我感动和敬佩，是因为先生的博学多才和循循善诱。先生在文革中饱受折磨，而面对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他这堂两课时的第一讲，虽然倒的只是“一杯水”，但却倾注了一位老教师对教育的赤诚之心，寄予了对莘莘学子的热爱和期望，浓缩了先生数十年的教学与研究的心得，毫无保留地指示门径，金针度人。

使我受益，是因为先生教给了我们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应该怎样选择并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怎样更好地掌握学习与研究的方法。先生强调要打好基础，“转益多师是汝师”；应该很好地运用工具书，但与此同时，又要认清“工具书也不是没缺点没错误的”；对名家也不能盲目迷信，而应该

善于发疑、释疑。先生那种为阐明新见重考据、重实证，旁征博引、详细举例论证的做法（如论述“分茶”不是鉴别茶，而是当时的一种戏茶游戏、技艺时，引用了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和杨万里的诗来予以证明），使我印象尤深，仿佛窥斑见豹，见到了蒋先生那种老知识分子一丝不苟、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



蒋先生给我们77级上“目录学与工具书”时，还只有十几页讲稿；到给78级上课时，已有了数十页的讲义；而到与《咬文嚼字》一起合编收入《蒋礼鸿全集》出版时，

《目录学与工具书》已扩充到四万余字。1959年《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但是先生又不断修订补充，尤其是第四版后都是在先生年事已高、痼疾缠身的情况下进行的。到他1995年5月

去世前出版增补本时，已经修订了6次，成为一部敦煌学研究的43.6万余字的经典巨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因为出版《蒋礼鸿全集》，2016年又出版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第7版）。正是这种严肃认真、



精益求精的精神，使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深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而先生的这种不断探索和完善，也体现了先生的修养、人品和献身精神。

更不得不提的是蒋先生和他的夫人盛静霞女士，还把他们的遗体都捐给了浙大医学院，成为浙江省首对捐献遗体的夫妻。

本人毕业后有幸留在中文系任教，担任了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大学语文等课程的教学，备课、教学或撰写论文之际，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蒋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情景，想到先生教给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方法。虽然自己资质驽钝，但也能小有成就，成为了教授、博导和浙江省教学名师。这一切，都离不开母校和中文系的培养，离不开众多老师的教育和帮助。

在清明节的前夕特写此文，既是为缅怀师恩，也是希望先生们的谆谆教诲和“授人以渔”的教学方法能薪火相传，使我的同行和年轻的学弟学妹们，也能从中有所感悟，有所启迪。

愿蒋先生、盛先生和郭敏琍女士安息！

（张梦新，杭州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1984—1988年任杭大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1999—2005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另，本文中的插图系蒋礼鸿先生的公子蒋遂提供，特此致谢。）

[返回目录](#)

汪飞白先生印象

—杭州大学新闻系 94 级 陈欣文

读书的时候，汪飞白先生已退休赴滇。对我们 94 级而言，飞白先生更像是一个传说。

湖畔诗社创始人汪静之的儿子。

世界诗库的编辑者。一个会十几国语言的天才。

一个在师兄们传说中，上课时中文，外文一起来朗诵诗句的高人。

今天，在 84 经济张育学长的牵线下，我们在求是新村的小楼里，见到了已八十七岁的飞白先生。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聊天，先生之风已窥一二。



最让我动容的时候，当提到当年课堂上诵诗一段时，飞白先生说，他现在已经不能朗读了。因为朗读要动情，会引起血压升高。当下心中一动，这才是真正的朗读，每一次朗读都是用心在与诗交流。完全是物我两忘的境地。

临行时，飞白先生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诗集。每人一本，认真签字、盖章。看着先生一丝不苟地伏案签名，仿佛又读到老杭大那些先生之风。平易近人，毫无大师之架子。博学广闻，却乐于教授。

这就是我想象中和记忆中的杭大。

[返回目录](#)

在夏瞿禅承焘先生身边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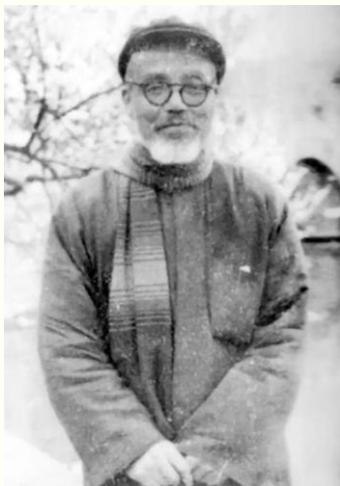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陆道先

一

先生，浙江温州人。忠厚长者，向无机心，不通政治，穆穆然，温温然，一学人也。

夏公不通政治，此举三例。

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鼓干劲，争上游，又红又专，组班子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公开出版，广受关注。一时间，复旦、北师大学子均有跟进成果。此风很快刮到了浙师院，中文系学生奋起效仿，提出了“超北大”的响亮口号，一鼓作气也赶出了一部。系古典



夏承焘先生 1974 年在西湖断桥

组教师谁人不知，“大跃进”乃党中央三面红旗的组成部分，是当时最大政治，切不可纯学术观点对待这一新生事物。说到原作得失，或附和，或委婉，莫不适可而止。唯我夏公直言不讳，评价不高，竟脱口说出了“超北大变成了抄北大”，当即遭到了学生的回击，终于被拔了白旗。

一是同教研室蔡义江兄告我，也是“大跃进”时，公问曰：“义江，三面红旗我知其二，国旗、党旗是也，唯第三面是军旗还是团旗，实不能定。”答曰：“全错。”公愕然。

一是1963年学期结束前，政治形势由于广州会议的召开，一度宽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报告引用夏公诗作“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来非等闲。一顶帽子飞上头，拿它不动重如山”，意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一时间，无论教研室政治学习会，还是私下交谈，都显轻松，同仁间又露笑脸。夏公这时早把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灭资兴无”的挨批、检讨的经历，丢在了脑后，未免又“放肆”起来。可好

景不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吹响，夏公对此，竟浑然不觉。

古典文学教研室老教授多，瞿禅公外，计有王驾吾焕镛、胡宛春士莹和平湖陆维钊诸公，济济一堂，向来是系甚至全校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开学后，第一次教研室的政治学习，本组教师外，还来了两位政治系（或马列室）的老师，校党委副书记兼中文系总支书记亲临主持，令人肃然，众皆默默。书记点名让我作好记录，要求原话一字不漏。我知不善，不禁惶惶，唯有领命而已。山雨欲来，风已满楼，久经运动，谁不谨言颂圣，唯我夏公仍唱暑期前之老调，毫不收敛。会后，书记嘱我带上记录到夏老家，让他认真审查一遍，不管他在会上原话如何，如想改，尽量改；不要马上带回，可以明天去取。书记的一番话，让我颇费斟酌，心思不定。这些话表面看来，是为批夏搞一份靠得住的材料作依据（经本人改定，难以推到记录之言非其本意身上），但我多年在他领导下工作，颇知他的办学理念和为人。凭这一句“想改尽量改”，似不难看出有些想放夏公一马的意思。怀着这样的心情，见了夏公。本想明确告知又一场批判风雨就在眼前，但实在不敢。问题是夏夫子实在太不懂政治了，他是政协常委，说不定在什么场合以表扬我的话说了出来，那我的下场比他老人家的被批，可就遭厄多多了。最后只能说一句“务必看看最近的报纸”，离开时又补了一句“别忘了啊”。本以为会有效果，谁料到修定之稿，凡改动处，都更直白、更明确、更露骨，让人啼笑皆非，徒唤奈何。后果自是可想而知了。

问题当然严重，可充其量也就是不容声辩的批判而已，对夏公而言，树大招风，这类经历已不止一次，多一次忧患，说不上伤筋动骨。坦然处之，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比起1957年反右期间，为保护自己早年博学多才的弟子任心叔铭善先生免受戴帽之罪，一度深夜失眠，多次劝任向党检查认错，并为其开脱而无果，弄得心力交瘁，公内心的压力与痛苦，恐不可同日而语。

二

这是 1963 年间的事，离开我不担任夏师助手而专职执教于古典组，已有五六年之久了。回顾前尘，我是 1956 年开始担任助手的，时间不长，不过一年多，是老人家提名把我要来的。可是听夏师的课，早在 1952 年调到浙师，以及 1958 年初中止此职，直到难以正常授课前，除了下放劳动，从未间断过。尤其当助手期间，总是堂堂必到，悉心受教。先生深沉好古，早岁即浸淫经史，规循两浙学术，博极群书，精研奥义。执教以来，先后授课《诗经》、《楚辞》、《左传》、《庄子》、《诗选》与《词选》等多门。追源述流，胜义纷纭，时令学子叹为观止。每次登门请益，入室所见，先生不是手持书卷，就是伏案撰作，扬摧风雅，纚纚忘倦。献身学术，感人至深。毕生所嗜，则诗词一途。作为词学宗师，讲诗、说词，更是如数家珍。各派各家，知人论世，从无时尚的时代背景、主体思想、艺术特色以及阶级局限之类的说辞，均为诗话词话式的，点到即止，引人入胜。授课间，常脱离讲稿，即兴发挥。说着说着，突然停顿，唉的一声后，随即妙语如珠，脱口而出，山阴道上，又入胜境。讲说作品，无论《诗》、《骚》，乃至唐宋以降，堂堂篇篇，必吟诵玩味，肺腑真情，沁人心田。说到高兴处，不时告示诸生，这句画一个圈，那句两个圈，多则三圈，带给学子们无尽的艺术欣赏和想象的空间。

作为诗人，先生少年取法随园（袁枚）和两当轩（黄仲则），并从林半樱公学为词。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公二十六七岁，与谢玉岑氏同执教于温州十中，结为莫逆之交。青年才俊，诗词唱和，均近于白石，业已声闻早著，为时传诵。谢氏早歿，公终生不忘。后，先生致力梦窗，晚年则出入苏辛。其尊高词体，自出机杼，从不为绮靡之作，《月轮楼词》之清丽温雅，匠心独运，广为学人所尊慕。当然，学人也往往是多样的，各有自己的性情与爱好。夏公从不冬烘，亦时尚。闲暇之时，偶与二三知己饮酒小酌，赋诗唱和，听听戏曲，看电影和汇演外，尤喜跳舞，且乐此不疲。上世纪 50 年代，社会上一度兴起交谊舞，一次夏公乘兴，在校礼堂跳到夜半仍不肯休，师母在家久等不

归，亲身前往，满脸怒容，硬把先生找回了家中。知其事者，一时传为笑谈。

夏师对我，悉心培养，关怀有加。词学极盛于两宋，向重体格与神致。跟先生学词，亲授词诵词法，多承警欬：强调研究诗词作家，以熟读、背诵各家作品，明音律、辨声调为先，重在基础，进而穷搜广求，细大不捐，综贯博考，勤于思辨，不拘于先贤之成说与时论，贵在个人之见解。先生重吟诵，曾为我详释吟诵节奏，一应本于原作情感，缓急、起伏之间，切忌雷同。诸如说辛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上篇写醉说梦，激扬奋发以身许国，紧接下片“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诸句，宜句句急下，一气呵成，不可停顿，以显示作者英雄豪壮之气，而末句五字“可怜白发生”则要拖长音节，一字一吟，方能力压全篇，与作者“老景沧浪，慨叹人生”，浑成一境，自成妙造。亲口咏诵，扣人心弦。其他如论稼轩词的“肝肠如火，色笑如花”种种，至今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谈到治学经验，先生不时强调，切戒浮夸，要下笨功夫，嘱我慎写文章，“说有容易说无难”。当时年轻少知，感受不深，可有一个鲜活的例证很快就发生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与刘肇熏操南先生受教研室委派，于1956年赴金陵参加南京师院举办的文科科研讨论会，有篇探讨最早见于《玉台新咏》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文章，作者上台报告，通过对该篇几个语词的考辨，认定作品时代不能早于“六朝”。我坐在离南京大学胡光炜小石教授不远处，先生年老耳背，话没听清，经身边助手相告，立即缓缓站了起来，斩钉截铁两个字：“不对！”当场朗朗背诵了几篇西汉碑文片段，文章所考几个语词赫然在焉。啥话没说，就坐了回去。无须讨论，这篇论文就被否定了。从此，“易难”之说让我终生难忘。随着马齿日增，读书越多越觉少，同样的课程越开越不敢开。

当助手期间，夏师曾应出版社之约，签订合同，出版倚声赏析之作。为此，每周由先生口述两三首，我记录，据之整理成文，最后经先生改定。日积月累，书稿即将写就，由于形势起了变化，没有印成。

日后，这些单篇先后发表在各类报刊上。撰写这类普及性读物的事，心叔先生并不认同，数次进言劝止，云从先生也不以为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夏公自有主张，以普及词学为己任，一直不为所动。

在系多年，绛帐春风，受益难以尽述。自惭荒谬愚慵，缺乏形象思维，质木无文，无所建树，空费先生心血。60年代起，为应教学需要，改攻先唐，尤以先秦为主，精力所及多在经子、古史、古文献之间，唐宋诗词之学日渐荒落，早已无从置喙，愧对先生教诲，难再弥补。

三

回顾夏师往事，内心一片祥和，总想避开“文革”，不愿涉及，却老是挥之不去。既然记忆清晰，仅就个人所历所见，也说上几句吧。

“文革”对夏公而言，可谓苦难多多，几遭灭顶。万幸，总算挺了过来。运动来势汹汹，高深莫测，小将外，谁不惶惶。可开始批斗时，在杭大中文系，还是有人敢笑的。记得1966年的秋季，“文革”号角已经吹响，萧山有场文艺汇演。主其事者，邀请中文系教师莅临，夏公亦与焉，坐大客车前往。事被批判，所有教师，无论老青、党团员或群众，全部台上站定，一位学生开口就是：“锣鼓声声，跳下一车牛鬼蛇神！”不分青红，一律成鬼，禁不住受批者一片笑声。又一位批得更绝：“什么教授、权威，一堆狗屎堆！”他把“屎”误读为“米”，又一次哄堂。从此，“狗屎（米）堆”三字成了牛棚中同仁的自嘲语。

“文革”初始，是省委领导的，对杭大很快就定下了打倒原学校副校长林淡秋（时已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中文系夏承焘教授的“林夏战役”，树了两个活靶子。二人立即陷入了全校师生共讨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几次批斗大会后，林困禁在杭大宿舍家中，小规模批斗、游斗、示众外，难得外出。直到造反派夺权后，才回到宣传部，与几位部领导关在了一起。夏公则几经周折，终被关进系的牛棚，大会小会，批斗连连。夏、姜（亮夫）二公，年近古稀，衰病缠身，劳动改造仍难获免，被命在校内挑担施肥浇地。一位血压不时

高得吓人，一位双目视力低下几近失明，都无从迈步，蒙兵管小将施恩，改为两人一前一后合抬半桶，一步三摇，粪尿溅身，状不忍睹。在牛棚，学毛选，念语录，熟读甚至背诵老三篇，写汇报，作检查，挨批斗，自是常课。一次红卫兵进棚，指定夏公背诵“毛主席四个伟大”，老人家哪里背得出。呆了半天，终于憋出了一句“伟大的毛主席”，想不到一个耳光，打了个既清脆又响亮。可他始终也想不明白，自己为啥挨了这一巴掌。有个阶段，集中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目的是让棚中人交代反党言行，认罪伏诛。唯我夏公最为当真，反复思考，终于“深深体会到”自己实实在在就是共产党的俘虏。话说得越真诚，听的人越其妙莫名，一位终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寰宇的教授，手无寸铁，从未与党和解放军为敌，怎么竟成了解放者的俘虏？这算哪门子的“体会”，而且还是“深深”的呢！

说到挂牌游斗，校园内已无印象，记忆清晰的是一次头戴高帽、胸挂黑牌招摇于三街六市。监管者为照顾老人和体弱者，批准彼等集中乘公交车，余众由大右派陈公企霞领头，敲着锣，不时高呼几声“我是牛鬼”，途经保俶路，沿湖畔，直奔市中心解放路十字路口南侧。一座高台业已搭就，上面方桌叠方桌，直到高顶单桌一张，上再加凳子一个。“牛鬼”一个个先后爬上，东西南北各鞠一躬，低头认罪，配以高音喇叭，揭发罪行。年轻人尚可勉强，对老衰者而言，真是危哉险矣。印象中夏、姜、王驾公诸老，蒙准未上高层，人身安全尚称无虑。可轮到老病号副系主任孔成九却难获免。不敢仰视，只能默默祷告。万一他唱了“伐子都”，这位1938年参加工作的曲阜孔老夫子后裔，就真的是有来无回了。上帝保佑，大家都平安回到了学校。

终于熬到副统帅折戟沉沙的“文革”后期，牛棚散伙，所有“牛鬼”大都回家不再劳动。想不到在中文系甚至全校几乎只剩下夏公和陈公企霞两位，或者还有我不知道的个别人，处境没有任何改变。陈的事，省里也做不了主，要等北京，那时江青还在风头上，谁都懂得。可夏公呢，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每天要跑一站路，到系的公共场所扫地，搞清洁卫生，风雨无阻，让人实在难以理解。禁不住跑去问系里负责人——“你问我，我问谁？你也不想想，这样的名教授，是系

里能做主的吗？！”自知他说得不错，可仍难解谜团，不死心。过后又当面问了校领导，回答同样无解：“学校无权，这是上面的意思。”话说到这个份上，谁敢再问“上面”，对普通群众而言也就到头了。以窃之见，校领导或者另有什么人其实知道而不想明说，那就不可强求，只能闷在肚子里。话虽如此，难免与二三友好私下议论，均以为问题应在于原省委决定的“林夏战役”，需要等待省里新的批示文件。

过后不久，1975年间，夏公申请离杭去京定居并获准成行。居京两年后，粉碎“四人帮”，大地回春，举国欢乐，1978年底终于告别妾身未分明的处境，等到了杭大党委为先生发文正式平反昭雪。晚年又逢盛世，旧交新知，社会贤达，宾客盈门。吟咏唱和，促膝谈心，广受尊崇。1986年5月2日以心肌梗塞住院，11日病危，期间，林乎加、贺敬之、吕志先、叶至善、王顾明等多位同志到病房探视问候。抢救无效，遽归道山，在京八宝山殡仪馆礼堂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四百多位各界人士参加告别，习仲勋、乔石、胡乔木、邓力群、张劲夫、张爱萍、赵朴初、叶圣陶等敬献花圈。先生的词学贡献得到了高度评价，享尽哀荣。

先生晚年居京十多载，心系故土，素有回杭意愿，平反后，学校不止一次派专人商谈均无果。1983年后窃因公赴京，校领导亲口嘱咐我以学校代表身份，再行探望争取，并谓原住房等诸多问题，尽量提出，全可妥善解决。见到先生，悲喜交加，恍如隔世。那时先生思路已不甚清晰，然其怀恋故土之情仍不能已，问长问短，话不外此。可有心无力，难以成行，也就只能徒唤奈何了。

先生生前虽未能再回杭垣，幸者遗愿实现，骨灰归葬于浙江淳安千岛湖青山丛林之间。享年八十有七，名扬中外的“一代词宗”，永远安息在湖光山色之中。笔者有缘，曾会同浙师院三位中文系首届研究生班老毕业生樊维刚、姜海峰、何均地，于1995年10月间赴千岛湖扫墓祭奠，距恩师仙逝已近十年矣。

（本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掌故·第二集》）

[返回目录](#)

云从先生二三事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陆道先



蒋云从礼鸿

回忆与蒋云从礼鸿先生交往，多受先生提携肯定，实愧不敢当。

接触最多的是编写《汉语大词典》期间。他是分省主编，统审全省词条，我是杭大编写组成员，以兼省编委，固有审阅本组本省词条任务。我一生干工作，无论本职还是并非本行，都能守住“认真”、“尽力”之底线，从不马虎了事。如今让我参与编写，虽非我所长，既已参与，就要一丝不苟，力求无误。为此，无论看书收词，还是撰写词条，乃至审阅稿件，所引例句皆一一查对，绝不放过；释词必尽量蒐集先哲时贤各家之成说，反覆考索，力得确解。凡遇古今有不同

意见，比较后，再出己意，并一一记识于原卡片之上。这些资料上报省组后，不少云从先生均能看到，收到了他的肯定与赞赏，是有原因的。不像我组一位外校调来的先生，学术水平颇高，已有相当造诣，不时有一流成果问世，彼编词书，虽非专长，却亦可称胜任。不料他可能心有他顾，不放弃自己专业，不惟成绩素称平平，有时竟会出现不应有的过错，致使云从先生大为不满，一度曾嘱其学生（博士毕业留杭大组之高足），专门审查其稿件。这期间，有两件事，让云从先生弄得我狼狈不堪，下不来台：

一是：省里出面，邀请蒋公做编写词书学术报告。他立于讲台上，台下前两排坐满各地、各单位年长的学者，我时为中年，坐在后排一隅。先生引经据典，意在阐述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在编写大型“源流并重”词书时的重要性。随口讲来，未见讲稿，几次板书引文，觉得没有把握，抛开台下前排诸长者不顾，直点我的名字，径问是否有误。此情此景，真是答然答否都难开口，令人尴尬。

二是：杭大组开会向省组汇报工作，云从公与另外一位省组领导参加，杭大组全体人员出席。当组长汇报到任务重、人手少时，云从先生突然发话：“不对。杭大组已有七八个人，不少了。盛静霞（云从夫人）只能教教诗词，让她写词条，有什么用！某某人（系领导夫人，大学毕业不久），也弄来编词典，笑话！”说到这里，眼睛扫过众人，不知还要点谁，谁料话锋一转：“像雪某人这样的，有两三个也就够了。”被点的人都在坐，批也好，誉也罢，谁能下得了台？余下未被点名的，包括组长在内，还不都是讨了个无趣。事后遇到盛公，谈到此事，老人说：“我已退休，又是他的老伴，说说无妨，何况是大实话。可对某某人，当场斥白，有何脸面。不看僧面看佛面，是要得罪人的啊！”盛公还安慰我说：“你也不必心存忐忑，他一向看重你，说的确是实话。你做人一向低调，改稿、纠错从不声张，组内同人谁不知晓，不必担心关系。”

蒋公之傲，人所共知。1963 年左右，有次系教师大会（不记得是什么会了），宛春和云从二先生分坐我之左右，台上一位讲什么话，早已毫无印象。宛春先生耳背，有个“友”字没听清，即低声问我。也不知怎么了，说个“朋友的友”，不就完了吗！可竟然脱口而出：“‘侯谁在矣，张仲孝友’之友”。还不知胡听清了没有，可在旁的蒋公拽了我一把：“我想他听不懂！”我吓了一跳，忙右顾胡公，幸好他面无表情，没听到。想胡公虽以话本小说、戏曲名家，其旧学功底均称深厚，何至于连普通《毛诗》诗句都生疏不解。蒋公之傲往往类此。他对王驾吾焕龛公也有不敬之语。可公之《韩非子选注》出书后，云从先生对其几处疏解，颇为赞赏，从此再无二话，亦见其读书人之性情。

先生为人、治学，一丝不苟。这种作风在牛棚中同样有所体现。他一度对毛选用词有所评析，为此打成现反，监督劳动，常专为某红卫兵（系大二学生）所用之厕所清除小便池之污迹。先生总是跪在地上，脸近池底，用小刀片一点一块，尽行刮除，再用水冲得干干净净，真真正正地称得上“刮垢磨光”了。

幸而换了代，推行改制，蒋公之学重见天日。先生之“刮垢”，竟成笑谈。余则每语诸生曰：“要想学好训诂学，看看蒋公刮厕所”。

（2010年7月6日记。本文刊于《湖山感旧录》中华书局2021年2月北京第1版）

[返回目录](#)

吴熊和教授的这四年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张广星



《吴熊和学术年谱》

吴熊和和蔡义江教授是我们在学四年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两人当时正在盛壮之年，是系里的教学骨干，记得蔡老师教我们唐诗，吴老师教我们宋词，都是最吃重的任务。当然他们都教得举重若轻，引人入胜，教学双方都滋滋忘倦，每堂课都是一种倾情的享受。不过，蔡老师和吴老师后来走了不同的路，虽然蔡老师还坚守在唐诗研究和《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园地，而且成绩斐然，但毕竟离开了学校，而吴熊和老师一直坚守在杭大中文系（后来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一直坚守着夏承焘先生的衣钵，

坚持词学研究，成就为一代词学大家，并培养了很多学术传人，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不断拓展词学的学术疆域，建构更加宏深的词学学术体系，李剑亮同学就是吴熊和教授门下杰出的词学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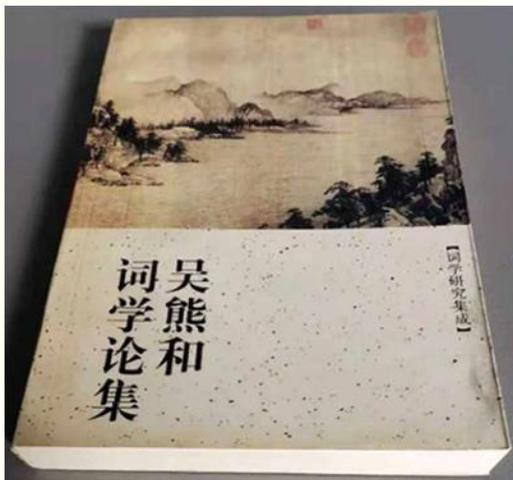
近日收到剑亮兄惠寄的他的大作《吴熊和学术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这是他献给恩师的一瓣心香。剑亮兄在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院长的繁忙行政事务中，能静下心来，钻进资料堆里爬梳剔抉，非常不易，这也是对恩师执着于学问的精神的传承。

我当然很关注在我们在校那四年吴老师的学术轨迹、动向和成就。我们是1980年秋入学的，当年吴老师四十七岁，在我们这些小毛孩学生眼中，吴老师们都已经是老教师了，而且吴老师在中文系那么多老师中显得资望很高，因为在我们入学前两年，他就已经是副教授了。而那时，很多有较长从教经历的人，都还是讲师，年纪轻一些的，还是助教。吴老师确实也有“老教师”的风范，印象中他个子较高，穿着中式对襟袄，头发有些花白，很符合我们心目中“教授”的形象。他很温文和雅，就是上课说话的声音，也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很有学者的风神。

其实，这些话今天在我嘴里说出来，都有些矫情，我本是很没有资格说这些话的。我要是有资格的话，我早就像剑亮兄成为了吴老师的高徒，成为了吴老师的词学传人了，看来班里只有剑亮兄有这番底气和资格。

从剑亮兄撰述的年谱来看，在我们入学的1980年到1984年这四年中，吴老师和蔡义江老师一样，既是教学骨干，也是科研

骨干。正是在这四年中，他们两位都取得了学术上的大丰收，奠定了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扎实的学术地位（吴老师在词学领域的地位，蔡老师在红学界的地位）。据剑亮兄的记述，1980年，吴老师继续深化词学的研究，早在这年的春季，就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重要词学著作《唐宋词调的演变》，说它重要，是因为它理清了唐宋间，尤其是由唐入宋后词调演变的脉络，我是外行，我想，这大概是词史研究的基本工程。如果连词调的演变脉络都不能搞清楚，则词学研究的基础都没有了，无法立论了。所以剑亮著的《年谱》中以较长篇幅摘录了吴老师文中的大段推论。



《吴熊和词学论集》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吴老师的词学学术到了爆发的年份，很多重要的成果都在这一年接连面世：谈宋词“苏辛词派”第一领袖苏东坡的《苏轼诗词的理趣》，在这一年的《名作欣赏》第一期发表。旨在普及、当世影响很大而现在仍有深远影响、被很多填词爱好者列为学词必备入门书的《读词常识》（与乃师夏承焘先生合作），当年四月由中华书局再版。而到了六月份，他与乃师夏承焘先生合作的另一本书《放翁词编年笺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由夏入秋，到了九月份，他与同事蔡义江、陆坚两先生合作的一本影响更大的阅读普及性著作、也是开了后来诗词鉴赏类辞书先河的《唐宋诗词探胜》，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转眼到了我们入学的第三年，也就是1982年，正该是吴老师给我



吴熊和与夏承焘先生在一起

们上课的这一年，他在自己的词学研究领域另辟蹊径，又向学界捧上了他的学术新成果，那就是当年发表的《两宋词论述略》。词论作为文学评论、创作评论的重要部分，是顺应词创作繁荣之势而起，而又促进和推动词创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前，吴老师多从词作本

身或创作者主体——词作者来进行研究，现在则从词论这个角度切入，对推进词学繁荣的另一种力量进行探索，他说：“宋词擅一代之胜，可是论词之作，并不多觐，显得冷落寂寞。评论之于创作，总是较为落后的。……大体说来，北宋风气渐开，时有短论；南宋各张一帜，渐成专门之学。”

这个时候，吴熊和老师以其丰富而扎实的学术业绩，在词学界、在中国古典文学界声名鹊起，崭露头角。而他在教学、科研之外，又有了第三项重要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带研究生。这一年，他带了两位硕士研究生：钱志熙和李越深。在《年谱》一书中，剑亮兄也大段引录了钱志熙对恩师的深情怀念：

三十年过去了，老师的一些具体的指导，我记忆得不太清晰。但有一句话，却是连着音容笑貌长存在我的脑海中的，那就是他常说的“要耐得住寂寞，耐得冷落”！他不止一次说过这句话，有在课堂上说的，也有一两回是跟我一个人说的。这是吴师的人生阅历之语，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格言，与他的整个一生是能相印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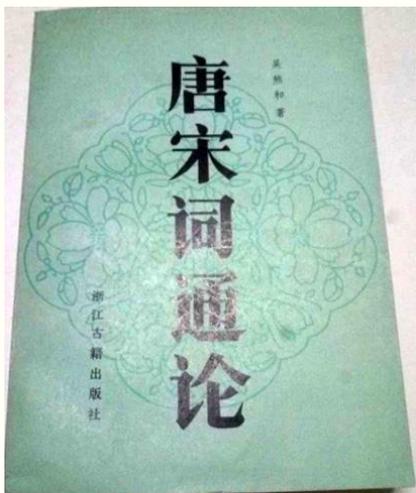
关于 1983 年吴老师的词学生涯叙述，剑亮在《年谱》中相对就显得简单一些，只说继续“在杭州大学任教”，而当年的年末，他到上海参加了由华东师大中文系举办的首次词学讨论



李剑亮与吴熊和老师的合影

会，并在大会上发言。当年还在一些期刊上发表了几篇关于词学的学术文章。似乎吴老师这一年的学术成果，并不特别显著似的，其实，他一生的扛鼎之作，巅峰之作，《唐宋词通论》正是作于这些年，而完稿于1983年。但正式出版问世，却是在1985年1月，所以这项空前的学术成果，在《年谱》里是系于1985年的，其实它的创作，是在1983年及以前的日子。

到了1984年，也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的那一年，其实吴老师教我们的课早已完成了，他不再有机会同我们见面。相信这一年吴老师还忙着《唐宋词通论》书稿的事情，修改好书稿，联系并交给出版社，排版校对，都是需要付出心血的。《唐宋词通论》为作者赢得了巨大声誉。有学者说：“书一经面世，反响巨大，随后便作为高等院校的词学教科书或古典文学学生的必修书而一版再版，影响深远。所以从传播的客观效果而言，此书也极大地推动了词学学科的理论化和系统化。”



《唐宋词通论》

又有学者指出：吴先生写毕于1983年11月的名著《唐宋词通论》，是一部承前启后的集大成之作，代表着当代词学发展的新水平。此书的出版，使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词学宏观研究的萧条局面得到很大的改观，也因此奠定了吴先生在当代词坛无法撼动的权威地位。

这一年，吴老师不仅继续《唐宋词通论》的修订完善和出版工作，不仅继续着词学领域的其它研究，有一些新的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还参加了一些全国性的词学活动，如十一月份，赴长沙参加了中国韵文学会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中国词学会常务理事。也是在这个月，吴老师和本系的徐步奎、陆坚等老师一起到北京参加了乃师“夏承焘教授从事学术与教育工作六十五周年庆祝会”。

这一年，正当吴老师的好朋友、同事蔡义江教授知天命之年，吴老师即作《蔡义江五十初度》二首以贺。

说起蔡义江教授，我想起我曾在海门老街周末书市淘到过一本印行于1975年文革末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注释》，很厚，当年不兴署作者名，但我知道这是蔡义江老师的作品，因为我还在杭大读书时，买到一本当年新版的《红楼梦诗词曲赋注释》，就署“蔡义江”名。这本书也可以说是蔡义江老师早年之作。但《年谱》在吴老师文革十年中的作为，没有更多的记录，大部分年头都只有一句话：“在杭州大学教书”。我想，后来成为一代词学大家的吴熊和老师并不是一夜之间速成的，在纷纷扰扰的文革岁月，吴老师究竟是闭关读书，还是积极参加了其他活动，《年谱》应该有所交代，否则跳过了文革岁月，吴熊和老师就已经成为了在词学上很有造诣的人才，这中间缺少一点铺垫，缺少一点联系，这是我觉得《吴熊和学术年谱》略有欠缺的地方。

向老同学剑亮兄致敬，祝他身健笔健，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返回目录](#)

夏承焘：词学冠今 书艺清雅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任平

夏承焘先生是一代词宗，在当代词学研究及诗词创作方面成就非凡。除了诗词，夏先生生平主要的爱好是书画。尤其是在书法方面，呈现一种清雅、潇散之风，一种学者和词人才有的文气。

夏先生祖籍浙江温州，曾居住在谢灵运故居的附近，故他有一个别号“谢邻”。他在温州完成了小学和师范学院的学业，较早参加了工作，曾在家乡担任



小学与师范学院的教师，后辗转严州（现浙江建德梅城）、杭州之江大学、龙泉浙江大学分校、杭州浙江大学、杭州大学任教，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温州地区古称永嘉。在六朝时期，谢灵运等北方籍文人使这里的诗歌文化大盛，成为享誉中国文学史的“山水诗”的发源地。之后的“永嘉学派”逐渐辉煌，又有孙诒让等国学大师名噪至今。就连大书法家王羲之也在此生活过。现在温州城里的“墨池”，是王羲之当年挥洒翰墨的遗迹。

人文环境的影响无疑会让夏承焘从小受到熏陶。

我特别欣赏郑重先生在《夏承焘墨迹选》的“序”里说的一段话。这段话的精彩之处，在于将夏先生的诗情与书意融为一体并做了解读：

就在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西湖泛舟，吟唱着髯翁的西湖小令。梦境与词境合一，美极了。醒来，忽有所悟，髯翁的词只有在梦里读，才能读出蕴含的味道来。转面一想，为什么没有梦到他的书法呢？唐代杜甫是诗圣，李贺是诗鬼，中间有一个李白，人们称他为诗仙。髯翁不也早就被人们称为词仙吗？正是他词中的那种仙气，使读者沉浸在梦幻之境，当然他的书法也就被词的仙气笼罩着了。

还没有见过一书法集的“序”中这么写的。但回头想想也是，多数人只知道夏承焘是词人、词学家，不了解他的书法艺术。所以“序”的作者，指出他的书法有词的“仙气”是有启示作用的。

夏先生的书法好，但从来不以书法而闻名。他的字，是比较典型的清末以来民国文人书法风貌。清末到民国，中国书法的现象大致有两种走向：一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以“大兴碑学”为旗帜，颠覆以往以帖学为圭臬的美学观念，从碑及写经残纸等出土文物中寻找古人传统，其后果是虽然大都是古朴之美，但也有字不成字的丑怪之作；二是以学人为主，在变幻的风云中坚守学术正脉，讲究人品、文品、书品的统一，不轻易丢弃文人的“清”“雅”之气，于是出现了一些看上去比较“低调”的文人书法。夏先生书法大致归于后类。

夏承焘从1929年开始习书。他先从篆书及行草入手，再写大字《文殊经》，也临过《集王〈圣教序〉》和孙过庭《书谱》。后来由于学业与教书的关系，他对沈曾植、马一浮的书法也有所取法。当时名满书画界的余绍宋先生，对夏先生的书法也有赞许。这些文坛与书画界的大家，对夏先生书法观念的形成与风格的成熟，都有不少影响。我们今天看夏先生的书法，不难发现在结体和用笔方面有沈曾植、马一浮、余绍宋的影子。当然，书法重“气”。夏先生书法之气，主要得益于他充沛的诗情和词学研究中养成的醇厚心境。

夏先生中年和晚年结交的书画家朋友颇多，互有取法得益。如曾经任浙江文史馆馆长的郦承铨、浙江考古所顾问沙孟海、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以及辽宁博物馆馆长杨仁恺等，皆有交往。其侄夏子颐，是

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的著名书画家、木版水印专家。与同样是书画爱好者的任铭善，则经常互赠书画。但夏先生擅长画荷花，任先生擅长画梅花，而任早年在之江大学是夏先生的学生，后来又同为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的教授，故来往甚密。夏先生有诗“戏”言：“事事输君到画花，墨团羞对玉槎枒。不如听我说旧梦，湖月圆时船到家。”（《为心叔画荷》）其中流露出浓浓的师生情谊，也展现出夏先生的谦和精神。

（2020年6月21日于北京）

[返回目录](#)

任铭善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蒋礼鸿

任铭善（1913-1967），字心叔，江苏如皋双甸镇人。曾先后以“爱斋”、“尘海楼”、“无受室”名其所居。父亲任雨楼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信奉教育救国，回国后在镇上办学，后来管理一县的教育事务。任铭善早年曾在南通中学就读，毕业后考入之江大学外文系，后转国文系，一九三五年，毕业并获文学士学位，留系任教；抗日战争后，从之江迁上海，即在上海任教，为讲师。此时与马叙伦相识，切磋学术，以后交谊很好。后在福建三元的江苏学院、浙江龙泉的浙江大学分校、无锡国专等处任教；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任浙大教授并指导研究生。解放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教务长、中文系教授，后在杭州大学继续任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文革”时期因肝癌逝世。

任铭善在之江大学读书及任教期间，步趋钟泰、徐昂、夏承焘诸先生之后，早年即崭露头角，有《春秋驹夹今文辨》、《古等韵八摄四流说》、《讽字臆说》等文，发表于《中国文学会集刊》上。所作《读曲笔记》，为夏先生所称赏。治学先以文字音韵为主。著有《说文解字建首小笺略例》，后以经学为主，始于读《礼》，迨及考《易》、《诗经》及西汉经学家数，著有《读张氏仪礼图记》、《观堂礼说存商》、《西京学三论》、《易古本考》、《豳诗征历》及《礼记目谢案》一书。曾在之江大学及无锡国专主讲《易》、《三礼》等课程。

抗战胜利回杭州这一时期，除继续从事旧业，在浙江学报上发表过《江氏定本四声切韵表跋尾》，还接触现代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研究了布龙菲尔德、叶斯泊森、高本汉等人的著作，并参与了汉字拉丁化运动，从事方言调查，同时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词乐、词律颇曾究心，有独到见解，在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中有具名“缪大年”

的《论白石谱中之折字》等几篇文章，以及已收入《中华文史论丛》的《郑大鹤校梦窗词手稿笺记》一文。

解放后，任铭善在学校除负责教务工作外，并主讲语言学概论、汉语史等课。解放初所著的《小学语法讲话》（近年又重版）、《小学语言教学基本知识讲话》等书，对普及语言学基本知识，提高教师语言素养水平颇有作用，当时影响很大。语言学界展开语法体系和主宾语问题讨论时，他写的几篇论文，分别收入《语法和语法教学》、《汉语的主宾语问题》等书中，颇受语言学界重视。同时，在校内指导现代汉语学术讨论会，指导浙江方言调查工作，讲授方言调查知识，为浙江方言调查积累了材料。一九六〇年、1961年及以后几年，参加《辞海》修订工作。一九六四年主讲汉语史，其中语音史部分经整理成《汉语语音史概要》一书，已出版行世。

任铭善先生于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皆造诣极深。所作诗词，有《尘海楼诗词》手稿；又工书法篆刻，青年时已成就不凡；晚年学画，能写折枝梅花。常与邝承铨、张宗祥、陆维钊等研讨书画与碑帖之学。

任铭善一生从事教学，成就后进颇多，约举之，如邵荣芬、管燮初、陈从周、吴广洋、林祥楣、施亚西等。其友好如徐震堦（声越）、王起（季思）、陆维钊（微昭）、蒋礼鸿（云从）等。

返回目录

云中鸿鹄自高洁 ——云从师与《汉语语源学》

—杭州大学中文系 87 级博士生 任继昉

一

1986年11月，《光明日报》上刊登杭州大学博士招生目录，蒋礼鸿先生的名字赫然排在前列。

对训诂学界大名鼎鼎的蒋先生，我可是仰慕已久了。从《辞海》的语词分册知道，该册主编就是蒋先生；他的《义府续貂》刚出版，我就买了一本，反复研读；他和任铭善先生合著的《古汉语通论》，是我求学的入门书和后来教学的参考书；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更是享誉学界。今年，他又出版了《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和《怀任斋文集》……

当时的我，正在河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还差半年多没有毕业，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以“同等学力”的身份报了名。

二

1987年，在“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的时节，我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先生的博士生开门弟子。

每天晚饭后，沐着夕阳，我踏上西湖北侧的山路，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思考着学业上的一些问题，构思着学位论文的框架结构。每隔三、五天，则去先生家一次，有时是与先生、师母一起，有时则是与先生一起，沿着杭大路散步、闲谈，顺便讨教一些学术问题。比如，“‘语源’、‘词源’，哪个名称好些？”先生回答：“‘语源’好。”

历时一年的两门外语课一学完，我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论文的写作。

按照原订计划，需要先组合出一个完整的汉语词族谱来，以作为全文立论的根据。这是全文写作的难点，我必须首先攻克它。根据第

一学期所作的卡片，我整理出“引章”——《汉语语源研究示例：“骨碌”词族谱》的前半部分，抄写工整后送呈先生。

过了一段时间，先生把文稿退还给我。我一看，前面附了两页纸，一页是先生用红色圆珠笔写的批语：“引用资料太多，使读者应接不暇，找不到使用这些资料的用意——论证些什么……”

另一页则是郭在贻先生用黑色毛笔写的批语：“证引资料过多，分析则嫌不足。此类文章不同于语词考释，应在理论上予以充分的阐述……”

师母盛静霞告诉我：“你的文章，先生没有看懂，就拿去给郭老师看了；郭老师也没看懂，他们就都写了这些话……”

当头棒喝！看来，我犯了个大错误，脱离了理论的阐述，只有这么孤零零的一点材料罗列，自然要使先生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

多么虚心、严谨、诚实的先生！

三

我调整了写作步骤：直接进入理论部分的撰写。

写作过程中，每遇疑难问题，免不了要去找先生讨教。待把完整的一章写完后，我再誊清送呈先生审阅。以后的三章都是如此。

北京来了一位朋友，听说此事，好奇地问：“蒋先生看不看？”

我说：“不光要看，还要批改哩！”

可不，在先生退回的文稿上，每每可以看到先生用红色圆珠笔写的批语。如第二章中“词族的形成”部分，因为是组合前人和时贤的有关论述，又打算把出处统一编号安排在后面的《引用书文目录》中，所以没有及时写明。这可急坏了先生，他在这一部分写的批语也最多：“此页最好出作者及篇名”，“这里写得没头没脑”，“庄子哪一篇，毛传什么诗的传，淮南、礼记哪一篇，文选二‘崎岖’见于何处，等等，都没注明”，“（提及《淮南子》时）篇中有时说‘训’，有时说‘篇’，不一致”……

对于我的一些明显的笔误，先生则径加改正。如在引用杨树达的一段话时，我把“弛懈”写成了“驰懈”，先生直接把“马”字旁改成了“弓”字旁。

值得一提的是，在为了我审阅文稿期间，先生曾因病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先生还是为我看完了长达二十万字的文稿。朱墨片片，是先生点点心血的凝聚？

四

1989年暑假，我将论文打印好，按照事先与先生拟定的名单，邮寄给全国各地的专家评审、评阅。

开学后回到杭大，我央求先生为论文作序，以便联系出版。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先生就把400字的序言交给了我。序言在回顾了汉语语源研究的历史之后说：

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结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实际，详细地讨论汉语语源学理论的著作，迄今尚不多见。任继昉同志的《汉语语源学》，就是为填补这个空缺而写的。他的书参考了几百种古今中外的文献，有条有理地把汉语语源学的理论展现出来，足备同行参考讨论。希望他更进一层，在汉语语源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作出更好的成绩来。

先生对后学的激励、鞭策、期待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五

金秋时节，我接到了北京市邮局的一封信，说我寄给吕叔湘先生审阅的论文，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无人接收，需要改投吕先生的家，要我改写地址。可是，吕先生的家在哪儿，我并不知道，这可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想起吕先生与蒋先生很要好，他还写过书评，对蒋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给予高度评价。对，就找蒋先生问去！

到了位于西溪路边的蒋先生家，我讲了事情的原委。先生二话不说，找出通讯录，查到了吕先生家庭住址，让我抄了下来。我满心欢喜，谢过先生，随口说了一句：“邮局还要我盖章，可我没章，只好用签名代替了。”

“噢？你等一会。”先生说着，打开抽屉，找出一枚印章来，走到门前，在水泥廊台上打磨起来。

我明白了：先生要为我刻章！于是赶紧说：“不必了，没有章也可以的。”先生只是摇了摇头，照旧用力打磨着。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只好赶紧接过章来，学着先生的样子，用力地打磨起来。

待把原有字迹磨平了的章交给先生，先生坐在客厅那张八仙桌旁，一手执章，一手掌刀，在章上刻一下，再吹一下刻下的石屑，一下又一下，认认真真地刻了起来。看着先生那一丝不苟的专注神情，我只好在一旁默默地等待着。

一会儿光景，先生站了起来，走到书桌前，把刚刻好的印章在印泥盒里按了两下，再体会到一张白纸上，纸上立刻显示出“任继昉印”四个底色鲜红的阴文篆字来。

我把章盖到了邮局要求寄回的纸单上，想把章还给先生。先生却摆了摆手：“你留着用吧。”

从先生家出来，我把还带着先生手温的印章紧紧地攥着，心里想：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呀，对这么一件小事也这么认真.....

六

1990年9月，毕业后执教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已经半年的我，接到了由蒋先生转来的重庆出版社冯克焕编辑来信。信中说：“我们正在研究尊著是否列选出版的问题，故特函奉达.....现值暑假期间，我不知你是否仍在杭大，故此信烦请你的导师蒋礼鸿教授转。”

我立即将储存于电脑中的《汉语语源学》第三稿打印出来，寄给了重庆出版社，并写信向蒋师致谢。先生回信说：“重庆出版社属转

之件，因当时不知道你地的邮递区号，耽心能否寄到，总算没有误事……”

在重庆出版社决定将《汉语语源学》列入“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第三批资助出版计划以后，我写信向先生报告了这一喜讯，并说明待书出版后，我将把先生所写《序言》的稿费寄上。也可能是我没写明白是“《序言》的稿费”，先生连忙给我写来了回信：

《汉语语源学》能出书，听了很高兴。你说如能得到稿费就寄给我，却使不得。是你的劳动，报酬当然应当给你，我怎能攘为己有？你千万不要做这种蠢事。我有我的人格，不容自己丧失，你可不要让我成为贪污犯，切嘱！

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的道德文章，堪称一流。门户列门墙，我从先生那儿学到的，岂止是文章、学术？分明还有道德、人格……

七

蒋先生自字“云从”，据师兄蒋骥骋分析，大概是取《易》之“云从龙，风从虎”的典故，合乎我的猜测。

《三国志·魏志·陌原传》“太祖征吴，（陌）原从行”裴松之注引《陌原别传》：“陌原所谓‘云中白鹤’，非鹤鹑之网所能罗矣。”《南史·刘訐传》：“族祖孝标与书称之曰：‘（刘）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刘）歊矫矫出尘，如云中白鹤。’”明·陈所闻《寿孔鲁川》：“大年不让云中鹤，劲节真如涧底松。”

鸿鹄又名“鹄、鸿、鹤、黄鹄、黄鹤”等。“鸿、鹄”又与“鹤”常并举或混用。如晋·王嘉《拾遗记·周灵王》：“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与世人绝迹。惟有黄发老叟五人，或乘鸿鹤，或衣羽毛，耳出於顶，瞳子皆方，面色玉洁，手握青筠之杖，与聃共谈天地之数。”“鸿鹤”指鸿鹄与仙鹤。后用以为隐居、出家或学道的典实。唐·陆龟蒙《奉和袭美初夏游楞伽精舍次韵》：“未为尧舜用，且向烟霞托。我亦摆尘埃，他年附鸿鹤。”比喻志向远

大。唐·高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诗：“且欲同鷓鴣，焉能志鸿鹤。”鹤，一作“鹄”。唐·李峤《攀龙台碑》：“时运未集，东皋息鸿鹤之心；天衢既亨，北面就人臣之礼。”左思《蜀都赋》：“其中则有鸿俦鹄侣，振鹭鸕鹚。晨鳧旦至，候雁衔芦。”

鸿、鹤皆是高飞的鸟，因用以比喻优秀且高洁之人。唐·黎逢《贡举人见于含元殿赋》：“今则凝神注目，无非绣户金铺；接踵比肩，尽是鸿俦鹤侣。”

蒋云从先生，不正像那品格高洁的云中白鹤、鸿鹄（天鹅）吗？

（1995年7月15日初稿）

（2001年3月30日第二版）

（2015年2月25日三文）

作者简介：任继昉，男，1955年生，河南固始人。1987年考入杭州大学文学博士（师从蒋礼鸿先生），中南大学文学院三级教授（退休），湖北大学客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议、鉴定专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学位中心评议、鉴定专家。主要研究汉语词汇史，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文化源流研究》、《释名诂林》等，著作有《汉语语源学》、《词语源流考》、《释名汇校》、《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在《光明日报》、《中国语文》等报刊发表《“伏羲”考源》、《“华夏”考源》等多篇学术论文。

[返回目录](#)

纪念恩师戚文彬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杂忆

—杭州大学化学系 79 级研究生 胡利

(2018 年 9 月 20 日)

师兄浦炳寅和师弟郭伟强很早就将纪念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有关活动事宜告知于我。但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自我感觉是朝不保夕，得的虽然不是绝症，但与大脑神经系统有关，记忆力衰退严重，头脑中只有模糊一片，自以为关于戚先生的纪念文字，与其写不如不写。

昨天，收到郭伟强的微信信息：“师兄弟们每人都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们知道你现在身体不适，是否就由你口述，辛苦嫂夫人或孩子记录一下，不论格式内容和篇幅。希望能在国庆前完成。”于是我想，这不就是要我写一点关于戚先生的文字么，且无规制要求，看来能填上一个空缺即可。既然如此，我何不也乐于一试？好在众师兄们早已经把戚先生平凡而伟大的事迹与形象，用真切感人的笔触都细细地阐述过刻画过了。

1978 年我正在贵州省纳雍县一所中学里教书，“四人帮”被打倒后，国内开始恢复研究生的招考，当年我仅复习了一个月，试考了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催化专业的研究生，结果名落孙山，但此考给我壮了胆。于是，我信心百倍地认真复习备考了整一年，1979 年我报考了杭州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戚文彬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至此，我与同年浦炳寅兄有幸成为戚先生的开门弟子。浦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高材生，他学的是英语，当时他正在教的也是英语；而我学的是俄语，当时正在教的是化学。

说起当年考研，记起一事，不免在此赘述，说明在冥冥中我与戚先生是有缘份的。招考目录中所列参考书中，有一本是张孙玮老师等编著的《有机试剂基础》，此书我手头正好有着，是我前一年回上海探亲时从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购得。一个在贵州教中学化学的老师，竟能拿得出这样一本还算“专”的参考著作，除了“有缘”是难以另作

别解的。另外，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也是有不小局限的，戚先生通晓多国语言，其中就含俄语，此不经意间，也有“缘”的影子。

戚先生对我的研究生学业是关怀备至的。我的第一外语俄语课与其它课程上课时间有冲突，为不影响我的俄语科目成绩，戚先生专门为我跑腿，与俄语教师协调商量，请他另找时间为我单独补课。说老实话，我的学术基础或者说学术潜质是比较差的。我对第二外语英语一点没有基础，这将给我的课题信息的获得和学术研究带来巨大阻碍。但读研只要能够正常毕业，今后的工作、生活条件都会得到很大改善。抱着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在读研的三年里，身上背负着很大的压力。由于精神过于紧张，有一段时间甚至得了功能性胃肠综合征，疼痛的时候人很难受。后来，还好，吃了一个多月的中草药汤剂，慢慢地缓解了。在此期间，戚先生和戚师母也多方给予关照，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我的几门研究生必读科目考试通过后，遇到的最后难题便是毕业论文的实验与答辩了。在戚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我选择了若干个比较接近实际应用的小课题。结果不但论文实验还算顺利，有的论文还在答辩前就已发表于国内的学术刊物，为毕业论文的通过抢得了先机。结果，不言而喻，在戚先生的悉心指点下，我在杭州大学的研究生生涯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被戚先生的神奇之手“点化”了，何去何从，我思考着。

研究生办公室征求了我个人的意见，将我分派到浙江省湖州市一所师范性大专学校，当时叫做嘉兴师范专科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湖州师范专科学校，直至扩建为现在的湖州师范学院。我比较喜爱教师这个职业，我的经历和知识结构也比较适合去当一名师范大专的专业教师。我到这所学校后，一直从事第一线的教学工作，所教课程几乎没有变过，《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分析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从我到校不久起直至退休，一直担任分析化学学科教研组长。学校后来升格为本科，教学任务中增加了指导学生做毕业论文的工作。我的教学特色为师生所称道，努力培养学生规范的分析实验操作技能和理论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我把当年戚先生教给我的上好每一堂课、带好每一次实验的责任心与敬业态度，自始至终地实践在我的学生身上。虽然，在职期间，我没能专业学术上有大的发展，但我在专业教学上同样作出了问心无愧的努力与业绩。学院专门发文宣布我为湖州师范学院某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这是对我的教学业绩的一种肯定。我把我在教学工作上的无私奉献归功于恩师戚先生的潜移默化 and 身教言教。

我被分配到师专不久，曾被推举为全国师范专科学校分析化学教学研讨会的秘书长。有一年的研讨会在江西九江师专举办，我邀请戚文彬先生到会作有关表面活性剂与分光光度分析学术报告，开始我还有点忐忑不安，怕先生因路途遥远和年迈而体力不支，后来先生一场精彩纷呈的报告做下来，仍神采奕奕，受到与会老师的一致好评，才如释重负。从此也可印证诸位师兄弟文章中一再提到的，戚先生身上有一股向善向美一切尽力而为的伟大精神！

我2005年从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退休，阖家回归上海。退休之后，初十年，大病不生小病没有，带外孙，打乒乓，不亦乐乎。这十年的好时光终于过完，之后，身体不是这里不适，就是那里难受，身体渐渐地“作”将起来，到现在为止，还只知道大概是神经内科方面的毛病，疑其或是帕金森综合症。对不起戚先生戚师母和众师兄弟，堂堂大师兄，纪念全国著名、世界知名大教授、大学者、大好人戚文彬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竟只能写出如此这般的文字来，罪过！

（选自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的《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返回目录](#)

含泪写金婚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师 盛静霞

我和云从（编者注：蒋礼鸿字云从）是1945年7月24日结婚的。到今年7月24日整整五十年了，婚前两年就认识，相处五十多年，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似乎该写下来，至于我这支拙笔，当然是不可能描绘出他整个的丰神气质的，希望能使亲朋好友们能聊见一斑吧。



订婚照

一、先通信，后见面

在我读大学的四年中，岁月蹉跎，竟没有找到理想的男朋友。有一位教《四书》的老师钱子厚和我是小同乡，很关心我，替我介绍了一位某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家里是大地主，我因他不搞文学，谢绝了，至于他家里有钱无钱，我是无所谓，因母亲说过，“不要贪人家的钱财，只要人好！”钱老师不高兴了，说：“你要是我女儿，我就硬做主了！”另外一位老师也替我介绍，是个县长，断了弦，有四个孩子，我一听，更加大大摇头。我在初中时就讨厌做“官”的，因有位姓杨的语文老师，忽然去做县长了。语文老师范耕研，一向有正义感，一面讲课，一面就借题发挥，讲到激动时，把脚一跺，说：“做官去

了！”在我的心灵上种下了做官不是好东西的影子。抗战时期，听到国民党的贪官污吏种种不法行为，对“官”更是讨厌。有一个中学同学，在中大读政治系，一心追求我，列出一张个人的人生道路表，最后赫然两个大字“做官”！我仿佛受了“奇耻大辱”再也不理他。

（一）天涯海角

后来，钱老师调离中大，临走时和我说：“你到底要找怎样的人，把条件告诉我，我到天涯海角替你找去！”我说：“三个条件：一是能写诗作词，能和我唱和；二是要未结过婚的；三是江浙人（生活习惯相近）。”因为我父亲少年时期到日本打工，娶了个日本女人，一直瞒着我母亲，到我哥哥十岁上，才带他们回扬州。春节只在我母亲房里住了一夜，就不再进房了。有一夜姐姐醒了，看见母亲还未睡下，拥衾坐在床上，两行泪珠挂在毫无表情的脸上，像个泥塑木雕的人。姐姐问她为什么哭？母亲说：“伢儿，你不懂！大起来，你就知道了。”姐姐出嫁后，告诉我此事，我们才体会到母亲在精神上被遗弃的痛苦！从此对重婚深恶而痛绝之。

钱老师到蓝田师范学校任教后，来了一封信，说替我找到一个人，条件完全符合，比我大一岁，并寄了一张二寸半身照，一张集体照，说“末座少年即蒋云从也。”我看了集体照，许多老先生中，果有一位少年，着白色长衫，坐在最右面，将两只长袖交叠在膝上，颇有些气度；半身照，五官也端正，立即答应先通信。

当时，我正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追求而烦恼。曾在扬州中学任教的孙雨霁、黄汝舟，还有词学大师唐圭璋老师，都知道我的情况。去做县长的那位杨，两次三番到白沙（当时我在白沙女中教书）找我，送这送那，心怀叵测，原来他断了弦，他已满头白发，比我约长二十多岁。唐老师等大为感慨，说：“佳人未属‘沙叱利’义士无能‘古押衙’？”将杨比作“沙叱利”了。杨曾是我的老师，我不能不理他，但我在敷衍他的时候，也对他加以白眼，他也就怏怏而去了。

此时我也希望能早些将终身大事定下来，第一封信是蒋云从（名礼鸿）写来的，字迹娟秀，还附了诗，我很满意，也回了信，附了诗

去。钱老师叫我在中大为云从找一工作，以便两人接近，增加了解。我将他介绍给国文系主任伍叔傥，该系正缺人，立即聘他为助教（我已由白沙女中调回沙坪坝，也在国文系当助教）隔了两个月，他从湖南，经过贵州，到达重庆沙坪坝。

那天下午他到宿舍找我，我一见竟是个“光头小和尚”（其实只是平头），面黄肌瘦，身材矮小，穿一件土布长衫，着土布鞋。和我想象中的“翩翩才子”完全两码事。我只好先打一盆洗脸水给他，要在别人，一定会受宠若惊，再三称谢，他却摆一摆手说：“不必了！”然后坐下，说了几句路上艰苦，就一言不发。我带他到饭厅吃饭，一路上他总跟在我后面，拉下好几步，我等等他，又拉下了，我心里没好气。晚上和同房间的陈芰香说起，陈说他三伏天从湖南来，住整脚旅馆，过险区千辛万苦到达重庆，你应该好好招待他，让他休息几天慢慢恢复过来。我想也是，就在办公室内多放一张桌子，暑假没事，我和他都在办公室看书，办公室内就我们两人，应该是谈恋爱的最好环境。

（二）格格不入

不料接连坐了几天办公室，他看他的书，一声不吭，最多我问一句，他答一句，只有一次，他看着看着，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我不去叫醒他，隔了一会儿，他自己醒了，向我笑了一笑，说：“困着哉！”好像自以为“失态了”，这是他第一次带有表情的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以后七八天，仍然是一言不发。钱子厚先生写信给他，问，“你们订婚了没有？”他拿着信远远给我看，脸上有些笑意，仍无一语，我想想真好笑，你不开尊口，难道要我说“好！我们订婚吧”？沙坪坝是从无此例的，一般都男方追女方。时间一长，我们只是看书复看书，毫不答话，更甭说“恋爱”了。我心里很难受，我是个爱说爱笑的人，要是成为夫妻，天长地久一言不发，肯定要将我憋死！

我十分矛盾，我提议他留分头，买一双皮鞋，风度可以和中大男生接近些。我又和他说：凡是朋友都应该并肩走，男在前，女在后，女的就是丫头；反之男的就是跟班。他总算开了口，说：“我和老师

同走，都要后几步，是尊敬师长，我是尊敬你。”我不觉笑了起来，说：“我又不是你的师长嘛！”。以后这些地方他都逐渐改了，但话语还是极少。

我想他大老远奔了来，不能就此散伙，也对不起钱老师！我应该主动和他接近，约他去看电影，我买了票，他也不谦让。看的恰恰是《人猿泰山》，男女主角都有半裸镜头，他端坐观看，毫无反应。我又约他到饭店吃饭，也是我点菜会帐，他毫不谦让。当时的风气，都是男的请客，我知道他不懂这一套，倒也不怪他。有一次，一位男生约我去吃饭，点了七八样菜，根本吃不光，浪费了一大半，我觉得那同学太俗气了，点那么多菜，难道是为了摆阔？难道因为你有钱，我就喜欢你？因此认为云从也有单纯的好处。

我和蒋云从相处了一段时间，仍是亲密不起来，我们的关系成了沙坪坝笑谈的资料！熟人中大多不赞成我们再延续下去。一位老师说：一个动，一个静，即使结了婚，也未必有好下场！老师中只有汪辟疆先生对他的学问是欣赏的，但也认为不是理想的夫婿，并替我另介绍朋友，我因不赞成钓鱼式的一手几根鱼竿，谢绝了。

一次，唐圭璋先生和几位中文系的同学约我们到嘉陵江对岸去玩，走进一家别墅，花丛中有一只非常漂亮的彩蝶在飞舞，一只花猫蹲在假山石旁瞪着它，好一会儿，却不捕捉。我们几个人驻足观赏，唐先生忽然说：“呆猫，抓沙！”大家都大笑起来，惟有云从浑然不觉，我十分尴尬！

又一次，和几位中文系男同学下象棋，都是我赢，我当然飘飘然起来。不料，和他一交手，他直杀过来，我大败亏输，就此罢局。我说：“不下了！”后来，一位同学和他说：“你怎么这么杀风景？我们都让着他呢。”他却说：“连下棋小道，都骗她，我不干！”这话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我想，这人也太蠢了，但确实是诚实的！

有一次黄昏时分，我约了一位高年级的女生和他一起到嘉陵江边去散步。嘉陵江的水像一条翠玉带一样，非常美。江边，很多一对对散步的情人。我和那女同学边走边谈，他仍一言不发，我只好找话题，问他：“你看我比熊化莲怎样？”熊是他大学的同学，也擅长诗词，

人相当漂亮，比他大几岁，曾主动送他一张大照片，大概他认为年龄相差较大，熊家又很有钱，熊似有意，但他不敢接受，就将照片退回去了。我没见过熊，因此我想了解了解，不料他不答。我又问了三遍，他仍不答，我实在气不过，就说：“你再不说话，我们就‘拉倒’吧！”我以为这下，他要软下来了。不料他竟说：“拉倒就拉倒！”我气得无话可说。大家一言不发，一直走到重庆大学附近，就散了。我想这下完了，我也没办法。平时他是星期六下午从柏溪（他已在柏溪分校上课）到沙坪坝来的，我想这个星期六他总不会来了。不料下午办公室门一推，他竟拎着个小布包进来了，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放心不下！”后来期期艾艾地说：“我不会说话，几千里跑来，只有一颗心。”此后，他回到柏溪，来了一封长信，大意是说：如果我们的事决裂了，他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只有浩浩长江中江鱼之腹是他葬身之地了！我看了大吃一惊，也很难受，将信给陈芟香看了，她说如果出了事，沙坪坝的舆论不会放过你，可不得了。

这段时间，我感到很苦闷，决裂吧，对不起恩师对我的一片深情，从数千里外，我将他调来，万一出了事，我的声誉将扫地无存。好下去吧，最难堪是他的不言不语，似乎谈不上对我的感情。钱老师也听到沙坪坝一些风言风语，来信责问我：“为何两人相处数月，仍未订婚？”并告诉我云从在篮田有“小圣人”之称，品质极好！还有人说他是热水瓶，外似冷漠，内心却极热烈。钱钟书先生是云从篮田师院的同事，很少赞扬别人的，对他的评价却很高，并说：“云从小字如簪花好女，人品亦如之。”

（三）拉开距离

我的一位同乡的爱人——章涛先生，和我很熟，他说：“这个人品学兼优，相貌也不错，你老大不小了，就定下来吧！”我仍表示不能勉强。他就给我出主意，说：“你俩虽然经常来往，但感情建立不起来，你也很苦，不如调个地方，拉开距离，大家都冷静下来，也会想到对方的好处，过一段时间，反而好起来，我看到有这样的例子。”我听了，觉得此话有理，就和白沙先修班联系，那里有我的几位熟人，

聘书很快就寄来了。系主任虽然有些不高兴，也同意放我，因他担心我以后不知道会惹出什么祸来。临去白沙时，我和他恳切地谈了一次话，约他明年五月到白沙来看我，要他一定学会讲话，只要改掉不言不语的脾气，我们的关系还会继续的。

我一走，沙坪坝的人都以为我们的关系完了。

这天凌晨，他从重庆朝天门送我上船，回去经过磁器口，交通船没有，只好沿江边山路走。路狭窄，泥泞不堪，跌了好几跤，连经常不离手的一只灰色小布包，里面有好几本书，都丢了。失魂落魄，好不容易才走到柏溪。

二、转变

（一）出于肺腑的小词

我到白沙后，住在单身宿舍里，那时白沙还没有电灯，对着一盏油灯，不禁有些失落感，隔了数日，收到云从一封长信，内附《鹧鸪天·次遗山薄命妾词韵》八首，其中有：

书欲寄，泪先流，不成一字只成愁。
冰霜过了春应在，忍把夭桃斫断休！

若容款曲心甘奉，直为相思病亦禁。

我大为感动，这几首词是我们定情的关键之作。

我们的通信、唱和逐渐多起来。先修班的教学要求非常高，每学期要讲好多古文，经常有语文教师因教课不受欢迎，被轰出去。我平时只爱好诗词，对古文不求甚解，就去信请他帮忙，他极其认真地将那些深奥的古文一一加以疏解，我在讲台上赢得好评，心里对他又多了一层好感。时光飞逝，到了五月初，收到他要来白沙的信。那天，他一进我的宿舍，我眼前一亮，宛然换了一个人，头发养长了，剪了分头，穿着一件青灰色绸夹衫（是早年任铭善先生送他的，他一直舍

不得穿），脚下皮鞋锃亮。尤其使我喜慰过望的是，他竟娓娓不绝和我谈起这几个月来的情况。我想“一见钟情”的“爱情”未必靠得住。一定要男方追女方，实际上是要男方拍马屁献媚，迎合女方的傲慢。感情可以培养嘛！我何不主动些呢？何况我给他的“约法三章”，他完全做到，我还有什么理由刁难（当时美其名曰“考验”）一个奔波数千里的极其纯真的青年呢？

（三）培养爱情

以后，我主动和他接近，谈诗词、小说、玩诗牌、下棋……漫游白沙附近的山村野寺，越来越投机。沙坪坝传说：这下子盛静霞可满意了，换了个朋友，这位谈吐儒雅，风度翩翩，不是那个蒋礼鸿！我们听了都笑起来。

先修班地处白沙镇，附近有一座地主庄园，主人早已离去。借作白沙女中校址，校内有池塘，池上有水心亭，花木繁盛，还有两株高大的红豆树，结实前，树顶开满白花，婆娑如披纱，远近咸来玩赏，校址亦以红豆树为名。冬季园内红梅盛开，花谢时，落英满地。我们经常徘徊在红豆树下，徜徉于月下花前，不啻人间仙侣。

三、订婚

（一）杀风景

我俩感情既已成熟，次年夏秋间，同往重庆南温泉订婚。在一家小旅馆开了两个房间。黄昏时，同坐在沙发上，正在喁喁耳语。不料茶房冲进来说：“宪兵来查房了，你们赶快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我想我们是正大光明的订婚，还没有到睡觉时间，难道不能谈天，有什么可怕？就不理他。一会儿，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宪兵进来了，翻开旅馆的登记簿，恶狠狠地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说，“你手里拿着薄纸，上面不是都写了吗？”不料他竟说：“我不认得字！”云从一听硬邦邦地说：“你怎么可以不认得字？”宪兵大怒，一把抓住云从的衣领，吼起来：“老子就是不认得字，你

敢骂人？”一面把云从往外面拖，一带喊：“带走！”茶房一听急了，赶快打躬作揖说好话：“这两位不是坏人，我看得出来，您老不必认真，算了，算了！”这才将宪兵劝走。我又气又好笑，不认得字，还要拿登记簿对名字，装模作样，还要逞凶。不过，我又和云从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跟这种人是不能硬顶的，果真被他拉到宪兵队那可倒了大霉。”我又一再谢了茶房。这一幕是我们情意绵绵订婚中杀风景的插曲，正是：“真鸳鸯误作假鸳鸯”，这批宪兵真混账！

（二）张冠李戴

那时，我们一直不敢结婚，因我们看到结婚的人，拖儿带女，衣食不周，太苦了！我们商量，物价飞涨，婚总是要结的，明年可能连拍张结婚照也拍不起了。不如先拍一张吧。于是，到理发店去，他理发，我烫发。理发师正替我卷发做花样时，突然旁边有人大喊：“抓小偷，抓小偷！”指着云从说：“你偷了我的帽子，叫警察来，带走！”我一看云从头上戴一顶礼帽，正端坐在理发的圈椅上，傻乎乎地欣赏理发师给我烫发呢。我大吃一惊，顾不得头发烫了一半，赶快跳下椅子，问云从：“你怎么带了这样一顶帽子？”云从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位理发师给我带的。我还以为是压发的呢！”那位理发师也急起来说：“不是你的，你怎么不说一声呢？”原来那顶帽子是挂在两张椅子当中的墙上，是“张冠李戴”了。我赶快向那人解释说：“不是小偷，小偷偷了帽子，早就溜了，怎么会坐着不动呢？”那人先还气势汹汹，后来也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过了些日子，我问云从：“你怎么专闯这样的祸呢？”他说：“大概恋爱时，男人总有些昏了头吧！”

（三）聪明？笨拙？

他读书颖悟力极强，而且要一字一字钻深钻透，但生活上则马马虎虎，有些事几乎一窍不通，姑举一例：

订婚后，一天我想烧点小灶吃吃，就去买了些鸡蛋，打算在邻居家炉子上做几只水氽蛋，请他先把蛋敲开，不料他“砰”一记，蛋打破了，蛋黄却跌到抽斗里去了。原来他没将抽斗关好，下面也没放一

只碗。他成天只抱着一本书，这些玩意儿从来不留心，长到快三十岁，还没打过一只蛋。数年后，在我的帮助下，他也能炒炒蛋了。不过天气变化，要加减衣服等，还是不大知道的。

（四）小南海的虚惊

订婚后，除暑假外，一般是他在柏溪，我在白沙。春秋佳日，他也会到白沙来。我们的感情已升到高潮，不见面时，书信也不断，有时几乎一天一信。白沙到重庆的江水中，有一个滩，称为“小南海”，其它季节都露在水面上，但春水涨了，就没入水中，看不见了，此时行船是十分危险的，一触礁，船就沉了。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要翻一只船，我清清楚楚记得白沙中学有一位老师和两位女同学，头一天还好好的，次日就暴尸岸边了。有一个水手被八个旅客抱住，他无法游泳，一齐淹死。翻船后江边常有穿丧服的家属来认尸体，哭声震天，惨不忍睹！我因云从天天有信来，倒也放心。不料一次四天没收到他的信，人也没来。恰恰又是天天翻船，我吓坏了，以为一定出事了。课还是照常是的，但回到宿舍，关起门来，就以泪洗面辗转反侧，不能成眠，认为肯定是出事了！一天夜里，朦胧睡去，忽然见他来信了，一张纸上，都是龙飞凤舞，看不清楚，好像有“平安”两字，才稍稍放心。次日上午，他竟翩然而至，我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问他为什么这几天不来信，他说：“我天天都写信的嘛！”我说：“翻了只船，死了许多人，我都吓死了！”他说：“我不是好好的么？”原来，他来时，船到“小南海”，就叫大家上岸，走了一大段路，过了险区，旅客再上船，这样旅客都安全了。我告诉他我做的梦，两人又喜又悲，下午，一下子收到他四封信。

四、结婚

四四年后，日本侵略军忽然进犯贵州独山，距重庆已经很近，大家惊慌失措。同事们都准备逃难，有人问云从：“你怎么打算？”他回答说：“到白沙去！”同桌的朱东润先生听了，笑说：“盛小姐在白沙，

你就只知道到白沙去。难道她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洒杨柳枝，就能吓倒百万敌兵，保你平安无恙么？”大家听了一齐哄堂大笑。

一九四五年夏秋间，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我们也准备结婚，



结婚照

七月二十四日在重庆沙坪坝、白沙各请两桌，我们几乎什么行头都没有，我只做了一件暗花的绸长衫。请酒，也没化分文，大家知道我俩穷，说总要热闹热闹，大家凑份子，蜻蜓尾巴，自吃自，一切由我们操办，你们只做现成新郎新娘好了。婚礼在柏溪举行，主婚人是柳翼谋先生，用一方红绸，大家签了名，我们各写一首《瑶台第一层》，这次是正式举行仪式了。

我们的洞房，安置在云从原来的单身宿舍里，我本不主张买床，准备就用原来的单人床，大家说：这太不像样了，就买了一张三尺半宽的新板床，有人说要油漆一下，我说抗战胜利在望，回家的日子不远了，何必破费呢！家具也是原来向学校借的，同事们实在看不过去

了，送了两只热水瓶，他表兄送了一对玻璃花瓶和一些塑料花，这样，房间里也有了些喜气，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只要两人情投意合，天长地久，一切物质条件都是可有可无的。

婚后，隔了几十天，忽然外面鞭炮大作，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先还不信，后来证实是真的，我大笑不止，竟发了两天两夜的高烧，云从说：“你这个人太容易激动了。”



婚后在杭州九溪十八涧

五、结婚以后

（一）对浑金玉璞的不断认识

我们婚后，感情日深，回想起来，是我对了这块“浑金玉璞”的不断认识的过程。在沙坪坝时，他闹了一些“笑话”，实际上是他对我很尊重，一心相爱，不生杂念，而且他从未恋爱经验，也不看这方

面的小说，只知道规行矩步，所以显得迂腐。而我则受前中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只看衣冠不看人”甚至对他有些苛求、刁难，几乎断送了一个大学者的前途，乃至生命！也包括我一生的幸福！如果他真的想不通，跳下嘉陵江自杀了，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我竟是如此的庸俗，幸好有好友、好同乡帮助了我，我才不至于犯大错误。

直至胜利后，我们双双回扬州，母亲、姐姐对他还是不大满意，据亲戚告诉我，她们背后说：“家里一些田产没有，见了人一点言谈世务不懂，‘堂堂二小姐’不乘飞机回来，让他在房里叠被，带回一个‘小当差’。”我听了也很生气，她们将他的优点：不会阿谀奉承，没有“大男子主义”当作缺点了。其实我母亲早就对我说过：“以后不要计较人家的家私房产。”不料抗战期间，她在上海数年，受到歪风影响，思想起变化了。其实云从不是不会说话，不过他经常考虑的是学术问题，不来说那些庸俗的寒暄而已。即使在我们热恋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理智的白天看书，晚上散步，大家都没有一头钻进恋爱里，什么都不管了。当时他正搞《商君书锥指》，孔夫子说：“刚毅木讷近仁”，他很欣赏这句话，最近他的学生说他有点“大智若愚”，有近似处。至于“大智”那是评价太高了。

我因他很少不看书时，有一次问他：“姐姐（他比我大一岁，却叫‘姐’）和书，如果二者不可兼得，你放弃那一样呢？”他怔了一下，费力地挤出一个字来“书！”我笑了，又问他：“如果心叔（任铭善字心叔，是他的好友，至今他还以‘怀任’为斋名）是个女的，你追求他，还是追求我？”他呆着脸，又是一声不吭。然后，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发怪问，真是匪夷所思。他却仍以诚恳的态度回答我，这也是他的纯朴之处。不过，我怀疑他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有些违心，当然是被迫的，我也不怪他。

（二）五十多年无龃龉

我们从相识起，到现在，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有人用“形影不离”形容我们的相爱，因他中年后有高血压，我常陪他散步、理发，有同事见了说：“呀！理发也要在一起！”我们用的扇子等物上写上

两个人的名字，也有同事取笑说：“扇子上也要并排。”当然这些小事，有的出于偶然，并不说明我们亲密无间。

（三）从两次小摩擦更见真情



全家照

五十余年来，我们几乎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更甭说瞪眼睛，拍桌子了。不过，也有两次摩擦：

一次是他打女孩，一个巴掌下去，五条手指印，我一看，心里很难过，认为孩子根本不该打，就发了脾气，我不会和他拉扯，无可发泄，就将一块砧板举起来，往厕所地上狠命砸去，那响声比他打孩子还响，他吓了一跳，就住了手。我说：“从此不许打他们，你写个字据下来，签名盖章！”他果真照办，从此两个孩子免了皮肉之苦。我们对孩子的错误都很严肃，但我不赞成用“体罚”，偏于宽容，以后他根本不管了。这对两个孩子的成长是有损失的。

另一次，大概是七三年，他到舟山小分队去，我和孩子在家，那时还是工宣队当家，示意要我到五七干校去锻炼，一期至少三个月，这一期是七至九月，天气最热，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实在不想去，又不敢不去，和孩子无可商量，一直等他回来，等等还未回来，我心烦意乱。那天他扬扬得意回来了，说学生很尊重他，对他很好，有个女生还送照片给他。我一听醋劲大发。其实我早知道他从来不对女人评头论足，胡思乱想，他是个“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思”的君子嘛！他一见我发无名火，也急起来，说：“你去问吴熊和！”边说边拉着我到吴熊和家（吴是和他一道去舟山的），捶着胸脯和吴熊和说：“吴先生，你替我作证，我有没有做亏心事！要有，天诛地灭！……”吴吓了一跳，连忙说：“蒋先生对盛先生是极忠诚的，我可以证明，你不要乱怀疑！”又说：“你们俩人都年过半百了，爱情还是那样热烈，真是难得！”后来，我也到舟山小分队教书，那位女同学热情来看我，我一看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当然误会是冰释了。这次是我冤枉了他，也冤枉了那位女同学，但也无法向她说明，只好作罢。

那时古典文学组正讨论封建道德是否能批判继承，吴说：“当然可以！蒋、盛的感情至今这样好，不是继承了封建道德了吗？这可是活生生的例子。”他竟将我们作典型了。

（四）约法三章

两人厮守五十余年，要说一点矛盾没有，是不可能的。有时为了一个字的解释不一致，对某一件事，看法不同，不免有小争执，但我们为了不使矛盾激化，就采取了求大同，存小异的办法，并学习了“不迁怒，不贰过”、“制怒”等古人养身之道，各自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等对方火气下去，平静下来，再分是非曲直。仍旧分不清，就再搁下去，有时一搁数年才弄清。我们相约：两人中有一人发火，另一人就回避。坚守此约，这样，我们相守五十余年，几乎没有争吵，孩子们说：“是爸爸脾气好，让妈妈，从来不和妈妈吵。”其实这一条还是我制定的呢哩。



在杭大新村寓所

六、证词唱和、道德熏陶

我们俩通信后，第一封信，他就和了我一首《如梦令》词，以后不断诗来词往，或和韵，或联句，写了不少诗词。唐圭璋先生曾赋《蝶恋花》其中末两句是“百转车轮肠自煮，天涯忘了侬和汝”我和云从都和了韵。“煮”、“汝”这两个韵都是很难和的。我和的是：“的心膏煎复煎，信他一刹能明汝！”（此句为夏承焘先生所欣赏，收入《天风阁学词日记》）；云从和的词是：“作茧缫丝甘九煮，织成绶带常围汝！”他的词很能体现他刚毅的性格和对我执着的爱情。

我们在诗词的互相酬和中不断增进了爱情，当时正是日寇疯狂入侵，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也写了不少反映人民灾难的诗词，编成集子，现在由我儿子燕遂用电脑打印出，我就不多说了。

他对我的影响，诗词还在其次，主要还是他立身为人对我的熏陶。如他曾对我说：修身不是为了给人看的，为了得到表扬而做好事，这就有了“私心”。“有心为善，虽善不赏”，要“慎独”，要“无愧于屋漏”。这样深奥的道理，我以前不去注意，不当回事。以为如果只剩了一个人，脑子里胡思乱想甚至放纵也未尝不可。现在连“屋上漏下的雨水”都要“无愧”，要求可太高了，也太迂腐，谁能做到呢？（注：陕西黄永年先生纠正说屋漏是房沿上透出的光线）后来我认识到，要求高，方向不会错，做到一步是一步，坚持不懈，何尝做不到？要求低，那就可能走向歧路了。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笃信身教重于言教，并不用教条来约束我，我是在他身体力行潜移默化下受到熏陶的。

我年幼时，受家庭影响，对烟、酒、麻将都很有兴趣，进入初中后，我主动将酒、麻将戒了，但烟一直是稍稍抽抽的，有人和云从说：“你为什么不管她？”云从说：“不能管，越管越抽多了！以后她自己会戒的。”果然，我后来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学了保尔戒烟的样，以后烟再未入口。这虽是小事，也可见云从知我之深。他既是学者、诗人又是君子，有优于一般人的气质，除了有时显得固执外，我几乎找不出他的缺点。特别是在学术上的成就，富于创见，精益求精，超过了许多同辈人。关于这方面，有多篇评价可以说明，我就不多说了。可贵的是他并不以此满足，仍旧孜孜矻矻，从不间断。自从八七年查出他肾上腺有先天性嗜铬细胞瘤，住院切除后，八九年又住院，九零年又大吐血四次（原因至今未查出）去年夏天又开始住院，近几个月又出院、住院数次，九年来医院竟发出九次病危通知单，家人吓得魂不附体，但他却履险如夷！每次出院最多休息一周，依然伏案写书如故，而且即使在高烧四十度的时候、手术清醒后，或挂大瓶时，他仍手执一本小说，病势减轻时，还叫家里找来《潜研堂文集》、《苏诗精华》等等，有一次在昏睡中，忽然叫：“我要起来！”我说：

“半夜起来，干什么？”“看书！”他指着墙壁说：“书架上，给我拿那本书来！”连医生都苦劝他甚至求他：“蒋老，你不能再看书了！……”他也不肯。他在年轻时读书是从兴趣出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中年钻研攻坚，要发扬光大祖国优秀文化，老年则已与古籍凝为一体，再也不能分离开了。

我曾戏赠他一联：“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几度死临头”，他笑了笑，毫不在意。

在他一生中当然也碰到过不如意事，他沉入书中，也就不当回事！他替我写了一些格言，贴在墙上，近年的一幅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黄征同志以为是他的自励，其实他早就心胸阔大，刚毅异常，他是不需要写这样的对联的。这幅对联对我启发很大，有些不愉快的事，一看到他那刚劲的笔锋，我就心情平静下来。



领取吴玉章奖金一等奖

七、惊人的毅力、无私的胸襟

他在医院注射药物时，因年老血管硬化，针头不容易插进，有时要刺四五针，有时针头逃出血管，两手多处青肿，但他从不哼一声痛或耍态度，只是平静地拿一本书看，由别人摆弄。九零年手术后的早上，我去看他，他笑着对我说：“又吃了一刀。”医院的医生护士乃至病友都说：“蒋老脾气最好，是我们医院的模范。”他在病中病情稍有缓解时就想回家，基本上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从不问：“我生的是什么病？”（其实想回家，也就是忘不了他两部未完成的科研项目）临上手术台时，也不关照这，嘱咐那（遗嘱是早就写好的）没有任何留恋、伤感的流露。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大家对他这种忘私利而又置生死于度外的纯而又纯的超然物外的学者风度，都表示极为钦佩。

回忆我们相濡以沫的一生，学习他不可及处，学到他优点的几分之几，就是对得起他，庶几无憾了！

他早已功名成就，扬名海外，还要写什么书呢？然而他仍旧放不下那两个课题！他要为祖国文化尽力到最后最后。

（以上一九九五年四月中旬写成）

八、尾声

此文原题《写在金婚前夕》，共五节，尚未写好，他就于五月九日长逝，距我们金婚只有一个多月，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在我写文时，他虽然仍住院，但病情似渐缓解，多次问：“我什么时候出院？”我儿子答应他四月二十四日出院，他很高兴。我想纪念金婚文已写好，他出院后，肯定可以搞一次简单而愉快的庆祝仪式了。医生早就说出院前要拍一张 X 光片，因春寒犹厉，一直不敢让他下楼。直到四月十九日，天气晴朗，就去拍了片，不料次日吐起血来，而且片子上斑点增多，说明病情仍在迅速发展，医生宣布：“不能出院。”

以后虽经全力抢救，病情仍一天重似一天。一次我去看他，一到楼上，我就头昏起来，只好闭目坐在沙发上，他问我媳妇：“妈妈怎么了？”小郭说：“头昏”。过了一会儿，他向我招招手，我坐到他身边，他说：“你容易头昏，车子又挤，以后少来来吧！”这是他对我的最后一句话，距离他逝世，只有数日，他还这样关心我！看着他日益消瘦的面庞，我只好忍泪点头。五月九日清晨，我去看他，他双目已闭，静静地躺着，再无一语了！我们半个多世纪，为许多人甚至不相识的路人所艳羡的神仙伴侣，从此人天永隔！这篇《写在金婚前夕》的短文，结尾改成了悼词，我只好含泪将题目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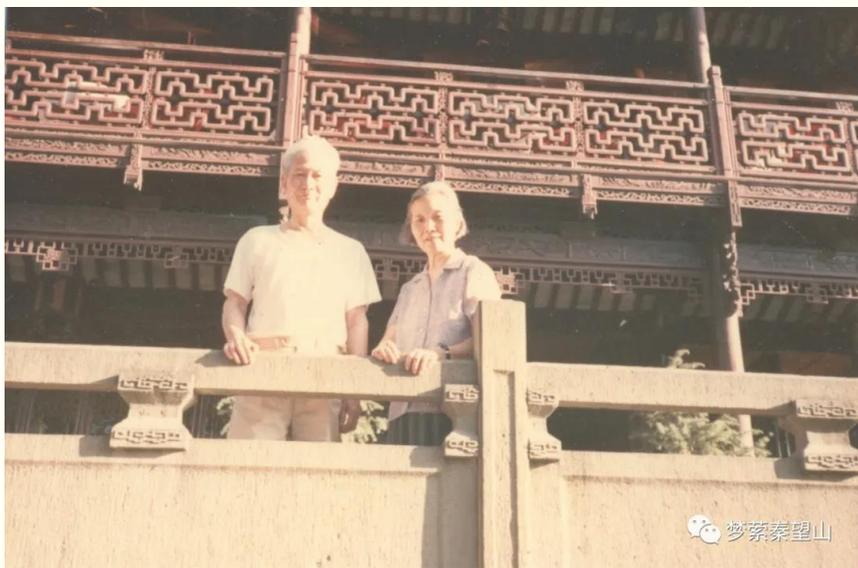
在蒋礼鸿衣冠冢前。前排左一是媳妇郭敏琍、右一是儿子蒋遂

（写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九日西子湖畔）

[返回目录](#)

忆云续录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师 盛静霞



有一天，云从（编者注：蒋礼鸿字云从）问我说：“你会不会折小蛤蟆？”，我说：“不会，我只会折‘大猪头’。”他说：“你先折个‘大猪头’给我看看。”我折了，他一看，就笑说：“太简单、粗糙了，你看我的！但是要找一张好纸。”找了半天，竟说：“都不好，不能用。”后来找到一只香烟壳子里包香烟的纸，说：“行了！这纸又薄又韧。”又把这张纸量了又量，裁成四面见方，没有一点长短的，然后折起来。花了好半天，才折好。原来是一只有四条腿的小蛤蟆，还把蛤蟆嘴剪开一点，粘上一小块红纸进去，和真的蛤蟆十分像，在蛤蟆屁股上一敲，还会跳起来，精工之至。我看了很喜欢，也要学着折，他说：“你不行，没有那个耐心！”我不信，一定要折，在他的帮助下折了一只，但是没有他那只灵活，不会跳。他说：“折这个玩意儿，要十分耐心！一方纸，要准准确确的方，不能有一点出入。折时，每一步都不能歪一点儿。”后来我折了几次，都不合格。

他说：“这是我们蒋家家传的，我是姐姐教的，看来以后要失传了。”后来，我们找到一张又薄又韧的纸，折了寄给东北的外孙女园园，她没寄回来。我再想折一只，已忘了折的步骤，折不成了。他以后没再折，真是失传了。折纸儿，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但他折得那样认真，他那一丝不苟的作风，真是无所不在。

逊生了园园，一岁后带来杭州，园园生得又瘦又小，但是很灵活，云从很喜欢她，刻了一方园园的图章，还替园园推小车。我们宿舍对面草地上，常有小蝴蝶飞来飞去，园园捉不着，云从就帮她拿了扇子去拍，两人拍得满头大汗。园园说：“蒋礼鸿姥爷和我好，不打我，不骂我，和我捉蝴蝶。”那时园园的语言很有趣，她说：“大雨哗哗下，吴老爷爷来电话，叫我去，我这就去。”

盛逊来信告诉我，她俩夫妇去看了吴中匡，他虽偏瘫，尚有续弦妻子（比他小九岁），一女四十几岁，未嫁，两人护理他，身体、精神尚好。书桌上放着云从的相片。自蓝田赴重庆时，缺路费，吴主动借了云从 300 元，此事，他至死未告诉我；又，他到重庆时，脚上穿一双布底土布鞋，我因学校无人穿此土头土脑的鞋子，建议他买双皮鞋，他照做了。后来隔了数年，我才知道此鞋系钟先生最小的女儿钟鼎替他一针一线纳成的，应永远留作纪念，我却不屑一顾。他到重庆是借了路费，又沿途极辛苦，我却一点都不知道，两人几乎分手，现在想起来仍令我酸鼻！

云从告诉我，他看到欧阳炯《浣溪沙》中有：“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膚”就用小字写了这两句夹在书中，被夏先生看到，就和任铭善说：“蒋礼鸿怎么这样风流？”任铭善却说：“他本来风流！”云从说，任这样讲不知有何根据？其实他那时还没有认识我，也没有和异性有任何接触，不过是认为这两句写得很细腻，就抄下来了，并无本事。我完全相信他的话，夏、任两位未免太拘泥了。

复原后，我们到杭州，见到任心叔，他给了云从一张纸条说：“此来气象非凡，望好自为之，以为他日相见地。”我们都不懂任的意思，现在想起来，当是看到云从衣履及神态的变化，认为背叛了“老古董”的气象，而且认为云从在母亲丧期未满足时结婚，所以大不

满了。不过，以后他俩相处如故，也无甚龃龉。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的恋爱地点，是在扬州或杭州，我们都未必成功。扬州，我母亲、姐姐一定反对；杭州，夏、任也会反对。恰恰我们两人都在四川，毫不受他人干扰，自订终身，这可是真正的自由。

他在之江文理学院读书时，因成绩优异，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在孩子们面前也说起过。我的儿子蒋遂，当时在初中，对父亲读书的精神很佩服，在一篇作文谈起父亲的荣誉，并说要向爸爸能刻苦学习的精神学习。不料老师认为这个孩子的思想这样差，这样崇拜美帝！要批他的作文不及格，还要将这篇作文拿到市里，举行全市批判会，消毒！实则，我们当时并不认识到教会办学校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那些教师勤勤恳恳地教书，学生努力地学习都是好事。孩子还小，当然更认识不到，对他加以教育是应当的，但到全市作为反面典型去批判，就过分了！何况蒋礼鸿并不相信教会迷信的那一套，还因此得了个“蒋怪”的绰号呢。后来因其他老师不赞成这位教师的做法，才没拿到市里去批判。

云从看上去很文弱，但有时也极勇敢。记得我俩住头龙头时，隔壁是何世臣、王兰秀夫妇。有一天，王在室内大叫（何不在家），我们不知何事，跑去一看，她家门开着，门口一条青蛇，正游动着堵着门，她出不来，所以吓坏了。那条蛇有一米多长，还吐着舌头，我也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忽见云从从容不迫地拿了一根木棍，一棒打下去，蛇竟死了！我大为佩服，说：“你还会打蛇？胆子这样大！”他笑笑说：“这有什么呢？听说‘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所以我对准它颈部打，一下，就死了。”王兰秀十分感谢他。原来那条蛇就是“竹叶青”，细长、碧绿，可是很毒！

我们搬到五幢四号后。有只大浴缸。一次一只老鼠跌到浴缸里去，我放水，想将它淹死。不料老鼠会游泳，在缸里乱跳，缸壁较滑，它爬不上来，吱吱乱叫，我又吓住了，只好喊：“云从，快来！快来！”他一来，三下五除二，就将老鼠打死了。同住的邻居陈纲同志笑我：“连老鼠也不敢打！”家里还闹老鼠，我们买了一只老鼠弓来，但我们不敢放饵。因为那弓很灵，一碰就打过来，弄不好，放饵的人手指都

会被打断。于是放饵的工作，也落到他身上。他既大胆，又细心，放得很好。一天，晚上放好了饵，我们正在看书，忽听“砰”地一声，赶快去看，原来三只小老鼠从三个方向来抢这块饵，弓一翻，三只小老鼠的头都被夹住了，我俩哈哈大笑。秋天，纱窗里有时钻进硬壳飞虫来，在房内乱飞，打虫，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有一次平惠善到我家，云从因事外出，我和平说：“蒋礼鸿和我的感情，毕竟和年轻时不同了，他自顾自看他的书，和年轻时对我的热情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否是我们爱情衰退的表现？”平说：“盛先生，这是你错了！男人年纪大了，总是以事业为主，这是正常的。”后来我和云从说起此事，云从说：“是嘛，现在如果我们还像谈恋爱时卿卿我我，那像什么人呢？”

1987年割除“嗜铬细胞瘤”后，他非常开心，当时注射了肾上腺素，也是一种激素，由于激素的影响，很兴奋。那天陪夜的是俞忠鑫，俞告诉我，平时他很少说话，这一夜却不停地和他说话，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我看了一部日本电视，一对老夫妇的感情很好，但妻子却说：“他从来没说过‘我爱你’！”我说：“他也没有说过。”一天敏莉从医院回来，在我耳畔小声说：“爸爸叫我代他和你说一声‘我爱你’”我们都不禁笑起来。手术后十三天，回家时，小汽车开到大门口，遂和敏莉扶着他进来，我听到声音，赶忙迎出去，只见他脚步还不太稳，满脸笑容。以后经常嘴里哼哼唱唱，连在小学里唱的“可怜的秋香”也唱起来，还唱抗战时期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出去散步时，一边走，一边哼。我写信告诉我女儿、外孙，他们都笑坏了，想不到姥爷心情是这样好了！

云从读的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办的，读高中时，校长总是希望学生去做礼拜，听牧师讲教义，他偶然也参加参加，不过敷衍而已。一次校长邀请听了有体会的学生，上去发言，他也上去发言了，不料，不但没说一句吹捧教会的话，反而将教会驳斥了一通，大家非常惊讶，于是送他一个绰号“蒋怪”。

他那时还没学过马列，但服膺儒家，他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把神和怪、力、乱放在一起。”又说：“‘祭神如神在’可

见孔子是不相信有神的。”他有朴素的唯物思想，所以不相信有鬼神。据他告诉我，他祖父死后，尸体暂时放在堂屋里，叫他去陪睡在旁边，他一点也不怕，和尸体头部很接近，他睡得蛮好。他从不说“鬼话”，不上坟，不烧香点烛。

云从经常容易感冒、咳嗽，从我俩见面后就如此，我很替他担心，他却笑笑说：“不要紧，关老爷会照顾我的。”我很奇怪，说：“此话怎讲？”原来，他一生下来就咳嗽，他家里人就模仿别人家的习俗，寄给关帝做义子，每逢关帝过生日去上香叩拜，这样，就受关帝的保佑了。关帝庙各地都有，香火很盛，当是关帝的威信在民间很高之故。云从是正统的儒家，当然不相信他的“义父”，不过家里人给他拜了“义父”他也随缘从俗，当笑话说说而已。但是对气管炎置之不理，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后来发展成哮喘，后来又招致“肺癌”与早年的长期咳嗽是有关系的。因他一直以毅力坚持与疾病斗争，并不在意，也无所苦，我在这方面也麻痹大意，现在愧悔也来不及了。

关帝庙各地均有，为其他任何神庙所不及。有一个传说，因魏忠贤当道时，各地奉命替他造生祠，这是有史可据的。后来魏奸一垮，来不及拆庙，只有将神的面孔抹上红色，一下子就变成关帝了！这也只能当笑话说说而已。

云从平时不苟言笑，在蓝田别人把他比作包拯的“一笑黄河清”，有些学生不敢和他说话，不敢到我家来。其实他也有很幽默的一面。他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一些笑话，告诉我，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如有一首歪诗：“媳钗俏兮翁颌首，哥罐开焉嫂棒伤！”原来这位嫂子很忌妒，见丈夫用罐养花，就一棒将罐子打破。还告诉我，一位官儿在衙门里值夜，吩咐不得打扰他，谁知夫人舍不得他在衙门里孤眠独宿，就来看望他，他却大怒，认为夫人破坏规矩，叫差人将夫人抓到牢狱里关起来。又有一位官儿，每次要和夫人“做爱”一定要穿起上朝的大礼服，请夫人上坐，自己在地上三跪九叩首，说：“下官欲与夫人‘敦伦’一次，不知夫人允许否？”

恋爱初期，由于我们的感情一时建立不起来，于是我说两人先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地考虑考虑。我在白沙先修班，他在柏溪，他以为

我们很难继续了，写了封长信，是手臂刺破的血写的，我看了十分难过。后来见面时，他将手臂上的疤痕给我看，约半寸长，我再三嘱咐他以后不可以如此！不料，我到白沙后，他寄了三首和元遗山薄命妾的《鹧鸪天》来，又是血写的。再以后，我们已经热恋了，他讲李后主和小周后的故事，特别欣赏“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讲得很细致。在他返回柏溪后，一次我在信末附上了一个唇印，附上两句诗：“芳笺偷印胭脂影，要使檀郎恣意怜”，他又用血画了一支箭穿过两颗心，以后我说：不许他刺血，他才不刺了。

我俩举行婚礼后，不料两人毫无经验，竟不能成婚。他只好去请教年长的同事，仍是不行，他慌了，不知自己有什么疾病，又不好意思去请教医生。我安慰他说：我俩现在不是蛮好吗？本来我就怕抗战未结束，生了孩子，不得了，不妨过一个时期再说。他听了很高兴，还说佛经里说三十三天的最上一层，男女以相视为乐，名为欲摩天。其次是以握手为乐。以后我俩做了两年的“精神夫妇”，感情一点不受影响。我还做了诗，其中两句是“卿有微疴依有愿，天教配作一双儿”（其他两句忘了）。此诗一直未给人看。抗战结束后，徐益藩、梁璆夫妇来杭相访，那时我一人独住科学馆一大间，就安排他们夫妇也住在这间里。不知怎的，徐翻看了我的诗稿，竟像发现了新大陆，笑起来说：“原来云从有病！”直到后来我俩回扬州，才听说：“不是病，是过度紧张所致。”我俩生活中的这段小插曲，也可证明我们是三十三天中人了。云从诗中常把我比作仙女、杜兰香、云英、天台仙女、紫玉彩鸾、散花天女、洛神、弄玉等等。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年两中，我俩实际上做了两年的“精神夫妇”但丝毫未影响我们的感情。

他爱看的小说有《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福尔摩斯探案集》，后者是研究破案的逻辑性，最喜欢的是《聊斋》，最不喜欢的是《红楼梦》，最讨厌的是贾宝玉的泛爱，还说：“该他老子给他一顿大板！”《聊斋》、《福尔摩斯探案集》一直到他逝世前，都未择手。他初到沙坪坝，我们曾闹过别扭，后来我将工作调往白沙，临走时诚恳地嘱咐他：“你一定要学会讲话，明春三、四月，你到白

沙来看我，如果会讲话了，我们的关系可以继续，否则，只好‘吹了’。”章涛先生还嘱咐他：“要多找女同事讲讲话！”三月份，他到白沙来了，一进我的房间，不但仪表变化很大，而且一开口就讲起一路的情况。晚上散步时，还讲《聊斋》故事给我听，他讲的《娇娜》等篇，讲得非常细致，娓娓动听。我也是个《聊斋》迷，但听他一讲，竟觉得比我自己看还生动有趣！自此，我们的关系就稳定了。其实他并非是迂腐不近人情，不会讲话，只是一向未和异性接触，腼腆而已。

我们俩都欣赏《娇娜》篇，最后异史曰：“余于孔生，不羨其得艳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这表明我俩都欣赏情色以外的感情，当然这种“友情”实际上已接近“精神恋爱”了。

云从不喜欢看《红楼梦》，我很奇怪，虽然他搞古汉语，但古汉语是为古典文学服务的。一个搞古汉语的人怎么不喜欢我国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呢？后来才知道，这和他哥哥有关系。原来他哥哥在电信局工作，当时算是薪金较高的，与几个少年同伴，以“风流”互赏。穿黑色绣花鞋，早就和一位小姐恋爱起来，而且“未婚先孕”，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那位小姐一急就发了神经病，蒋家当然赶快筹备婚礼。新娘已经有些疯态，不管众亲戚在场，自顾自弹风琴。婚后，病势更有所发展，甚至偷邻居家的东西，爬到邻居屋上去，蒋家老人气得要死！再后来，他哥哥随国民党军队去发报，嫂嫂在家乱吃东西病死。哥哥在外地得了肺病，可能还有乱来的行为，解放后被遣散。云从好不容易将他接回老家，上下火车都是云从背的。回家后，隔了两年就死了。云从提起他哥哥就生气。因此最恨年轻人“风流”，当然也恨透了贾宝玉，连带及于《红楼梦》了！

我和云从恋爱前，都有些小故事。如云从一位之江中文系同学熊化莲，人既漂亮，又有才华，四川人，家里也是大地主。她比云从大几岁，毕业前送给云从一张四寸半身大相片，似对云从有意。但云从却认为自己是穷出生，配不上，就将相片退还。但对熊很怀念，常以得不到熊的消息为憾。我俩结婚后，一次在南京，知道熊也到了南京，云从立即带我去见熊。熊见了我们，很热情，不断地叫“静霞，静霞！”

还送我一双很时髦的长统丝袜，我也回送她一双绣花缎子的拖鞋面。后来听说她随丈夫去了欧洲，以后再无信息。

夏承焘续娶的夫人吴无闻，是吴天五的妹妹，和我俩年纪差不多。云从在温州时，吴天五曾拟将吴无闻许配云从，吴家系大地主，并拟赠良田百亩为嫁资，云从不敢接受。我俩婚后，我与云从开玩笑说：“你本来应该带大地主帽子，这顶帽子，还是我替你摘掉的呢。”

我和云从确定关系前，不知不觉之中，和一位同乡很好起来，云从也和他往来。他还参加了我们的婚宴。云从也知道我和那位过去关系密切，但并无醋意。还有一位，由老师介绍，已通信，但后来因多种原因，“吹了”。云从到外地开研究生答辩会时，去他家拜访过。后来，他也到杭州来开会，云从认为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不高兴去，云从说：“你们以前的事，我不清楚，但总该见见面。”我只得和他一道去了招待所，见了那位一面。

我俩相互都不以对方在订婚前，有过一些影影绰绰的事为嫌，云从尤其宽宏大量，我们都反对那种“不成亲便成仇”的狭隘气量。最可笑的是：我不止一次，梦见云从替我做介绍朋友的参谋，说这人如何如何，那人如何如何。他竟然以兄长身份出现。这固然是我在婚前挑拣，所以反映到梦里，也是他经常像兄长一样关心我所致。有时我也将梦境告诉他，他一笑置之，并不在意。他还说过，你最多在脑子里胡思乱想，但绝不会胡来，由此可见我们相知之深，确非一般人所及。

云从在一旧信封背面书云：“‘三分割据行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句句说实话。”此系杜甫《咏怀古迹之一》。此两句究竟如何解，他生时曾与我谈及两句颇费解，惜我们未仔细研究。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找了《读杜心解》，对此两句解释甚详，盖诸葛虽可比美伊吕、萧曹，无奈“运移汉祜”，其功只能是万古云霄中之一羽毛而已，故云从云云如此！

云从逝世后，我们经常梦中相见。最近一夜，梦见与他并枕而卧，他靠左，我靠右。大家闲谈，他忽然说：“我现在不想那事了，而且有些‘怕’，这样也罢。”我说：“这样不是蛮好吗？”两人都笑起

来。他的言谈、微笑，和平时一模一样。其实，我们早就将两张小床摆成丁字形，并枕而卧还是年轻时的习惯，不知何以反映到老年夫妻梦中来？想起那宛若平生的情景来，不禁泪下。

读《谁怜落日》（P442），至谊和她丈夫说：“最美丽，最感人的故事情节，必须是最直接的，最简单的，最不需要诸多解释的。那就如一男一女忽然地发现他们原来非常匹配与相爱，那才踏实、那才漂亮。是不是？”由此得出启发，我与云从正是如此，“一见钟情”最能吸引年轻人，然而，那完全靠不住，不过是“以貌取人”而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大了，遂成连理，也靠不住。幼小的孩子懂得什么？不是后来很多夫妇又离异了么？只有真正相互了解了，踏实了，那才靠得住！我和云从是经过这一阶段的。而且，至今我认为任何人，包括和我有过爱情关系的，都比不上云从！他是我的“唯一”！

[返回目录](#)

青鸟不传云外信，白沙如今是蓬莱

—杭州大学数学系函授生 蒋遂



父母亲蒋礼鸿、盛静霞在重庆

这两句诗，是唐圭璋先生在我父母亲婚礼上的贺辞，取自李中主李璟的成句“青鸟不传云外信”，镶嵌了我父母蒋礼鸿、盛静霞的字：云从、弢青。

父母亲在抗战的风云中相识相爱，携手走过了 50 余年的人生之路，直到 1995 年父亲逝世，他们的爱情生活才悄然落下了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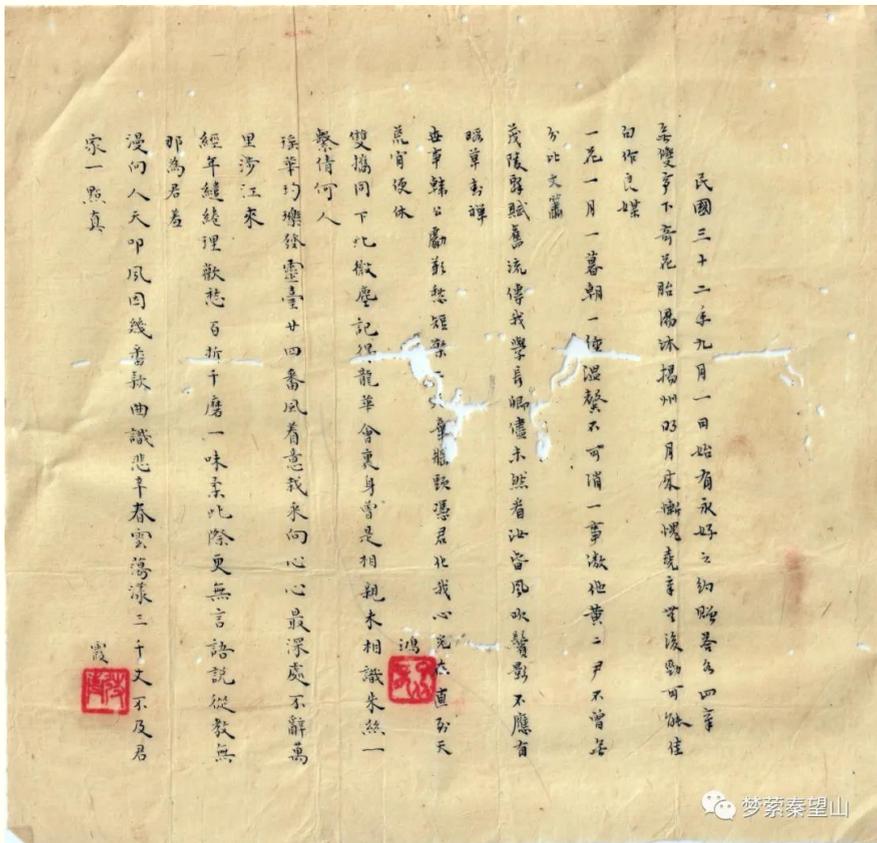
父母亲在恋爱、新婚以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两人诗词唱和，琴瑟和谐，留下了很多诗词。以后母亲为之结集为《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其中《诗词唱和》卷一和卷二，约有 190 余首唱和。其中父母亲订婚时填写的唱和《瑶台第一层》原稿还经历了一段旅程，由台湾回归大陆。此话怎讲？

2013年10月27日，一封出自台湾台南市新化区，郭长城教授寄给我的信。信里唯有一张塑封的书法，乃是《瑶台第一层》。据郭长城教授给黄征教授的信有：

黄教授：

您好！偶於網路知悉先生徵集蔣先生之手稿資料，敝人忝為敦煌學研究者，素仰姜、蔣二先生之學術成就，今將所收藏之蔣、盛訂情手稿掃描複製，電傳與先生，還乞笑納為荷！

郭長城敬上



《瑶台第一层》手迹

释文：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一日始有永好之約贈答各四章

蔣禮鴻

無雙高下奇花胎，湯沐揚州明月來。
慚愧堯章無後勁，可能佳句作良媒？

一花一月一幕朝，一種溫馨不可消。
一事傲他黃二尹，不曾無分比文簫。

茂陵辭賦舊流傳，我學長卿儘未然。
看汝昔風吹鬢影，不應有暇草封禪。

世事韓公劇歎愁，短檠無光棄牆頭。
憑君化我心光在，直到天荒肯便休！

盛靜霞

雙攜同下此微塵，記得龍華會裏身。
曾是相親未相識，朱絲一繫倩何人？

瑤華玳瑁發靈臺，廿四番風隨意栽。
采向心心最深處，不辭萬裏涉江來！

經年繾綣理歡愁，百折千磨一味柔。
此際更無言語說，從教無那爲君羞！

漫向人天叩夙因，幾番款曲識悲辛。
春雲蕩漾三千尺，不及君家一點真！

[返回目录](#)

缅怀仓修良先生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钱茂伟

2021年3月5日，仓修良先生突然离世。因纪念稿约，重新梳理仓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学术特点，写成本文。有关仓先生生平的基本事迹与学术贡献，他的自述、访谈多已涉及，这里不多重复。笔者随仓先生治史，近十多年又在建设公众史学，所以重视当代学人的学案史资料积累。2012年，我们在主持编纂《执着的史学追求：仓修良教授八十华诞庆寿文集》时，曾对仓先生的学术活动及资料做过整理。笔者另一个计划是做《仓修良口述史》。仓先生记忆力相当好，口齿清晰，表达力强，语速适中，比较适合口述史。可惜仓先生一直不肯接受访谈。2018年6月，我在看望先生时，曾做过一个小时的口述记录。他不谈自己的往事，只谈与学界名流的交往，这属交往记忆，自然也是好事。遗憾的是，2019年3月，笔者的电脑被黑客控制，导致所有文档被锁住，这份录像也在其中。2020年1月，鉴于先生快90岁了，笔者决意给先生做口述史，已经分配了团队分头采访任务。无奈适遇新冠疫情，未及执行。3月，仓先生入院。等8月知道消息时，仓先生讲话已经吃力，只得作罢。

一、仓修良的学术道路

2012年，做仓先生的学术活动编年时，仓先生坚持从1979年开始。他的理由是，前20年没有什么大的学术活动，不必写。收入《史志丛稿》时，将学术活动编年下延到了2017年。收入《仓修良文集》的年表，已经从1954年上大学开始了。

（一）本科出身的学者

1933年3月6日，仓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泗阳县仓集镇一个农家，有七个兄妹，他是老二。据师母口述，他爷爷欣赏这位孙子，让先生

的三叔带他到镇江读书。仓先生在家乡读过两年私塾，到镇江以后发奋读书，连续跳级，读完小学、中学。1951年9月入镇江中学读高中，1954年9月入浙江师范学院历史学本科，1958年8月毕业留校。这年5月，浙江师院并入新成立的杭州大学，于是他成为杭州大学的老师。先生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嬗变，从泗阳到镇江，再从镇江到杭州，不断地向南迁移。到镇江读书，是先生第一个人生转折点，考上浙江师范学院并留校任教，是第二个人生转折点。在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之前，只有一小部人读过研究生，多数人是本科留校，仓先生即属本科留校者。他一生甚至没有机会读助教进修班，仅当过黎子耀副教授的助教。此后，完全靠自己的勤奋而逐步成长。

（二）由中国古代史而中国古代史学史

1958年，仓先生留校任教，时年26岁。工作前5年，他十分用功。仓先生心细，读书时容易发现小问题，敢于发表主见。最早刊登的文章是《范仲淹生平事迹订误》^[1]、《〈补农书〉评介》^[2]、《潘季驯》^[3]。他发表文章刊物的起点高，直接在《光明日报》发文章；从研究时间段来说，偏重宋以后。

仓先生的史学史专题研究始于1962年，从胡三省、章学诚、郑樵、顾祖禹4人开始。这显然与1961年教育部要求开设中国史学史课有关。1962—1963年，他接连发表4篇论文：《胡三省和他的〈通鉴注〉——纪念胡三省逝世六百六十周年》^[4]、《章学诚和方志学》^[5]、《问题解答：郑樵的生卒究竟为哪一年？》^[6]、《顾祖禹和他的〈读史方舆纪要〉》^[7]。这些研究，从时间段来说偏重宋以后，从空间来看偏重浙东，体现出仓先生重视明清史学、浙东史学的特色。对范仲淹、胡三省的考订，表现出仓先生的考辨特点；而对章学诚、顾祖禹的研究，体现出先生的研究范式是经典的史学史研究范式。

仓先生作为本科出身的助教，在留校任教后5年间连续发表7篇论文，其中《江海学刊》2篇，《光明日报》《文史哲》《实践》《历史教学》《浙江日报》各1篇，说明他在学术上出道是比较早的，也说明新中国初期的本科教育质量比较高，当然与仓先生个人的勤奋

与聪明也是分不开的。凭这些成果，他完全可以评讲师了。1963年前后，他有一次晋升机会，因为系里人事内耗，结果谁也没上。

1964年“四清运动”中，仓先生受冲击。“成了清理的重点对象，整整批了三天三夜，批我整天钻故纸堆，鼓吹封建文化，美化封建人物；经常追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后（我确实喜欢向老一辈师长们学，除了本系外，中文系和校外，如陈训慈、夏定楫等先生处，常去请教，甚至谭其骧先生来杭或我去上海，总要去拜访）；反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在当时来说，可了不得。”^[8]

1964年，仓先生下放诸暨劳动一年。另一方面，“从1964年起，在精简大学课程声中，史学史被精简掉了，我已改教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选课了”^[8]。此后10年，仓先生受到的打击相当大，他不敢再写论文，未见文章发表。

（三）进京任《历史研究》编辑

1973年，毛泽东提出要《历史研究》复刊。^[9]1974年8月，先生被上级领导点名，成为《历史研究》编辑。科教组下发（74）科教办字220号文件《关于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的通知》明确指出，复刊宗旨是：“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为适应批林批孔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需要，在斗争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队伍的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史学阵地，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10]

这次复刊，不是恢复原来学部主管的编辑部，而是由国务院科教组主管教育部工作的迟群主持，实际上是“创刊”，具体由教育部办公室主任曹青阳负责，参与复刊的专家有章开沅、庞朴、施丁、仓修良等20余人。杭州大学历史系入列，仅仓先生入列，证明当时先生有较高的知名度。这一年，仓先生与魏得良合撰的《王充的反潮流精神》^[11]发表。这篇文章有“批林批孔”风格，但选择的对象是王充，这是先生浙东学术研究的起点。先生性格倔强，喜欢发表己见。譬如，原来的刊名“历史研究”四个字是郭沫若题写的，仓先生说，好好的题字为什么不用。“由于在讨论许多重大问题时，我发表意见常常与当

权者相悖”^{[8]5}，因此得罪领导，被要求早日离开。仓先生任《历史研究》编辑的时间不长。他说有“半年”，最迟在1975年2月上旬回到杭州。

仓先生是反“四人帮”的，有《“思鼎”与篡权》一文^[12]可证。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他应《杭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约，与魏得良合撰《利用历史进行反党的黑标本——评江青及其御用文人吹捧武则天的罪恶目的》^[13]。任《历史研究》编辑这段经历，一度成为他的罪状，系里说他是“‘四人帮’的黑爪牙”。文章也因此被压到1978年初才发表。此后，他被下放绍兴“五七干校”劳动。干校领导见他身体差，让他养鸭子。他自称“鸭司令”。在“五七干校”两年间，他得以集中精力研究与写作。1977年12月，全国十所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编写会议在杭州大学召开，系总支通知他参加会议并参与编写，他理直气壮地拒绝了。会议期间，他回杭州看望了朋友，朋友建议他放弃史学史，改治断代史，他没有同意。这种执着精神确实难得。

（四）1978年以后进入学术高峰期

1978年是仓先生学术活动的新起点。“北京学术界许多朋友得知我当时处境，都很关心，为了使我尽快摆脱困境，《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都以很快速度为我发表了《从章学诚的史德谈起》和《顾祖禹生卒年辨证》两篇文章，等于让我在政治上亮相。”^{[8]5}

如果说1976—1977年间发表的文章仍属反批判文章，政治味仍浓，那么，《从章学诚的史德谈起》^[14]和《顾祖禹生卒年辨证》^[15]则是纯粹的学术论文。这两篇高端刊物论文，标志着仓先生学术研究的重新起步。1978年，他也终于评上讲师。从1958年至此，已当了20年助教。

据《仓修良教授学术论著编年》，1979—1987年间，仓先生发表论文数为：1979年5篇，1980年3篇，1981年5篇，1982年5篇，1983年6篇，1984年8篇，1985年6篇，1986年6篇，1987年3篇。据浙大人事档案，仓先生1978年评为讲师，1983年3月评为副教授，

1988年9月评为教授。从今日五年一评职称的眼光来看，仓先生的职称评定比较顺利。不过，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职称评定没有时段限制，只要有成果就可申报，他的职称评定仍是不顺的。他有成果、有实力，完全可以破格评审。不过，1963年来以来欠的职称陈账太多，他的先生们也要上高级职称，他自然不太可能先上，所以屡次申报失利。

（五）著作之路始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

1978年，“中国史学史”课程恢复，仓先生重新授课。他较早写出了详尽的讲义。当时没有新编中国史学史教材。1979年，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向他约稿。1980年10月，《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定稿并送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此前，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于1980年1月出版，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于1982年出版。仓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新写新出”的通论性史学史著作。书中《后记》曾说，过往史学史是“历史编纂学史”，说明他参考过同类史学史书，并有所突破。这是该书新颖所在。此书最大的特点是按分期法编纂，分为四大时期，朝代是第二层次的划分。而朱杰勤、刘节二书，仍是按朝代排序。此书体现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撰写要求。全书以史学发展的内容（如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与形式（如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为主线，结合中国社会演变的特点，将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大的时期。每一个时期又抓住重要史体的发展、史著的产生、史家思想的影响等，分别加以评述，线索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教与学。这部书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史学史编纂的新水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报考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必读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也成为仓修良老师评副教授的代表作。

（六）出名于浙东史学研究

仓先生的专题研究重心在浙东史学。1978年，发表《章学诚的历史哲学——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一》^[16]。1984年，出版专著《章学诚与〈文史通义〉》。这部专著在中华书局出版，级别较高。这本书让仓先生成为著名的章学诚研究专家，也是他评教授的代表作。其后，他想写成一部《浙东史学》。1993年，仓先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浙东史学和明清文化”立项。尚存9页《浙东史学》写作提纲，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浙东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二章《金华、永嘉、永康三大学派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第三章为《四明王应麟与天台胡三省之史学》，第四章为《宋濂、王祜与胡应麟之史学》，第五章为《清代浙东史学》，第六章为《清代浙东(江)其他史家》。叶建华作了微调，于元明清每章下增加“概况”，下面增加“邵廷采”等节，然后上报国家社科规划办。这份提纲，可见仓师对浙东史学的理解。它是从南宋浙东学派说起的，下迄清代浙东史学。这体现了仓师80-90年代初对浙东史学的理解。仓先生念念不忘浙东史学研究，但为什么没写出书稿？据项目成员叶建华说，有三个影响因素。一是出版社约稿多，导致分心。二是身体不好，精力有限。三是当时出版社追求市场营利，对学术著作的出版意愿不高。那时，仓先生仍持出版社导向观念，于是就没有正式动手写作。但一直念念不忘要撰写《浙东史学》，直至2020年8月，叶建华去医院看望病中的仓老师，他还说要撰写出版《浙东史学》一书。虽然该书未成，但主体成果已经完成，体现在相关论文中，弟子们的相关硕士论文也体现了先生的理念。

（七）由章学诚研究而方志学

仓先生的方志学研究，始于章学诚方志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他曾写过20万字的方志学初稿，不料多年心血结晶连同资料卡片竟都毁于十年浩劫。80年代，方志学兴起。1981年，仓先生率先为本科生开方志学课程。他采用老办法，先写出详细的讲义，然后边讲边修订。1985年，杭州师范学院组织方志培训班，他任主讲老师。他对于方志

的起源有自己的看法，与复旦大学黄苇教授的观点不同。1986年春节前，他完成了《方志学通论》并寄到齐鲁书社。遗憾的是，当时出版业不景气，直到1990年才出版。2000年以后，方志学成为仓先生关注的重点。他提出了一系列方志编修理论，为指导新方志编修作出了贡献。

（八）由史学史而谱牒学研究

仓先生的谱牒研究，始于1983年《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17]，第2篇是1997年的《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18]。由于20世纪80—90年代出版业不景气，《谱牒学通论》一直被搁置。他在杭州大学主要是给研究生做专题讲座，在宁波大学给本科生开过两次课，没有如早年那样写出详细的讲义。2007—2008年间，仓先生又发表6篇谱牒学论文。201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在陈凯、鲍永军的帮助下，完成了定稿，2017年出版。《谱牒学通论》集中了仓先生的心血，将中国谱牒思想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这是先生封笔之作，溯本求源、内容翔实、脉络清晰、观点鲜明、研以致用。^[19]叶建华称：“仓著对最早谱牒《世本》的剖析，对唐代敦煌姓氏族谱残卷价值的发掘，对宋代欧阳修、苏洵两家谱学理论异同辨析，对明代方孝孺谱学理论的阐述，对谱学新体裁年谱的全面分析等等，都是谱学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填补了谱学学科建设的诸多空白。”^[20]仓先生与他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出谱学不等于家谱之学，而是兼及年谱诸体。相关话题虽也有近似文章，但仓先生有独到见解。

（九）退而不休

1999年，仓先生退休。退休后，他坚持研究与写作，学术活动可归纳为几方面：一是修订旧稿，二是方志约稿，三是朋友书序，四是完成专著计划。2000年后，适逢方志学大盛，他的精力也转移到新方志研究，仍是方志学界红人，对新方志展开评价与研究。因为他人的赠送，他得以接触不少新编方志。他创造性地发明了“特色过眼录”模式评论新编方志，不必面面俱到地评论。这是一种好模式。近者，

笔者主持公众历史作品评论，也拟用此法。后又出版《仓修良探方志》一书。2000年以后，仓先生的旧著得以修订再版，新出了《谱牒学通论》，另结集出版4部文集。他一直著述立说到老，学术周期相当长。从1958年算起，有近60年的学术生涯。

（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给先生提供了核心展示交流平台

仓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然而，中国史学史研究会一直没有成立起来。1979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仓先生是创会元老，成为理事，1983年成为常务理事，1985年担任副会长。此后直2017年才退下来，当了30多年副会长及名誉会长。所以，他的学会活动主要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近十多年，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宁波大学主办中国史学史会议活动，他也会参与。他参与的方志学活动，主要是各地方志编纂大纲讨论或志稿评审会，学术会议参与的反而不多，仅2001年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方志学术会议。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年会是从2010年开始的，其时仓先生年龄已大，所以不再参与了。

（十一）内外受人尊重

因为仓先生1989年、1997年两度评博导未成，且他在《八十自述》中对此事作了清楚的说明，给人感觉，仓先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其实这是错觉。他在校内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学者。1989年申报专门史博士点时，校长沈善洪教授拉仓先生做两个梯队教授之一，说明沈校长肯定仓修良的学问。1992年开始，仓先生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新任的郑小明校长将他视“校宝”“省宝”，鼓励他申报博士生导师。近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百年求是学术精品丛书”，收录了仓先生的《史志丛稿》。这套丛书收录了夏衍、王焕镛、姜亮夫、陈桥驿、徐朔方五位大家的文集，表明仓先生在校内学术地位之高。

在校外，《学林春秋》收入了仓先生《我与中国史学史》，将其与相关前辈名人并列。近年，商务印书馆将出版 10 卷本《仓修良文集》。华东师大帮助他出版了多部图书。这些是仓先生自我满足之处。

在学术界，仓先生的人缘很好。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及其他单位的学会人，都十分感恩他、惦记他。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他的威望十分高，仅次于张舜徽，可以说是学会的精神领袖。

二、仓修良的学术特点

仓先生在《史志丛稿·前言》中将自己的治学特点归纳为三条。此处略加延伸，总结为八大方面。

（一）执着的史学追求

“执着的史学追求”，是仓先生学术的最大特征。仓先生的史学研究，表面上有三大方向，实际上只是“史学”一个方向。仓先生的研究，一生没有脱离“史学”二字。从空间建构单位来看，国史、方志、家谱，是史学的三大支柱。他的史学史研究偏重中国古代史学史；方志学研究主要在中国方志学史方面；谱牒学研究也集中在中国谱牒思想史领域。三者均是大史学史内容，只是分成不同的专题而已。所以，我们主持的祝寿文集，名为“史学”。此间用的“史学”，是大史学，包括方志与谱牒。善弃，不贪多，坚持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执着，不跟风。这是他对自己治学经验的总结。“执着”，是指学术精神的追求一生未变。

（二）教学科研结合

仓先生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正处于新中国史学史建设初期。1961年，全国曾开展史学史大讨论。他参与了当时的史学史建设活动，边教学边研究，逐步进入史学史界。这个方向成为他一生的奋斗方向。1961年，杭州大学根据教育部要求，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早期

由黎子耀教授上，他当助教。后来他独立上课。为了备课，他编纂了讲义初稿。左手是科研，右手是教学，两相结合，这是他的特色。他的方志学研究也是从编教材开始的。谱牒学研究则由于没有写出详尽的讲义，也没有出版社来出，而拖延了出版时间。教学科研相统一，这是杭州大学历史系的特色，也可能是新中国学苏联而形成的专业教学科研特点。

（三）问题意识强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仓先生的学术研究就显示出问题意识强的特点，后来一生未变。他的写作都是有感而发，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关于这一点，他在多个文集的前言中，特别是在《史志丛稿》的前言中已经详述，此处不再展开。

（四）善于寻找新的增长点

仓先生的学术研究不追求热点，更喜欢寻找冷点。他主张“做学问不能赶风头”，是有自己的经验教训的。1974—1976 年间，他一度从事批判时文写作，1977 年以后放弃了。另一个表现，就是不追求学界研究的热点学术话题，尽量寻找新的学术话题，如对于王世贞、胡应麟的研究。这些选题，除了他自己写之外，多成了他指导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

（五）擅长新型框架体系建构

先生是擅长搭框架之人。这正是现代学术不同于传统学术之处。仓先生擅长建构框架，尤其会写详细的讲义。这正是他能写出《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方志学通论》的原因所在。

更为重要是，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规则。《后记》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反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不同时代总是要出现为这一时代服务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学术流派以及相应的各种学术著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反映论。我

正是用这种观点，才建立起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自己的思想体系。研究方志学自然也离不开这个观点。”也就是说，由时代而史学研究，要将学术回归到时代中加以考察。

方志学是历史学下属学科，曾长期被史界认为没有独立的学科理论，难以建立方志学一级学科。近年，笔者开展公众史学研究，提出当代历史记录理论，由此对方志学理论与学科建设有了全新的思考，可在“历史”大类下建立“历史记录”一级学科，下分方志学与公众史学两大分支学科。历史学既然从一级学科升格为“历史”大类，完全可增一个偏当代记录的一级学科。

（六）个人独撰与集体主编同步

中国人文学科研究的主体模式是个人奋斗型。仓先生也如此，喜欢独著。他偶尔也找人合作，早年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90年代写二部《章学诚评传》时各找过一个合作人。另一方面，除了史学史、方志学、谱牒学三大主线，他也主编了不少图书。如《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史记辞典》《汉书辞典》《二十五史警句妙语辞典》。他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与《史记辞典》《汉书辞典》，为此花费了不少精力。在此之前，他还参与主编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说明他主编辞典是有渊源的。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社为了寻找商机，喜欢编纂辞典。1982年，山东教育出版社提出编写“二十五史辞典”的计划，列入国家八五出版计划。198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文选》时，仓先生是下册主编。他推荐张舜徽任“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编辑温玉川先生通过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长、武汉大学阙勋吾教授，找到了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教授。当年10月的开封年会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讨论合作事宜，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感觉难度系数太大。张舜徽先生说，我无法一人主持，项目时间长，怕完不成。提出分册出版，设立分册主编。会后，让仓修良先生代表学会，负责协调联系。从“前四史”开始，仓修良负责《史记辞典》《汉书辞典》二卷，张舜徽负责《后汉书辞典》《三国

志辞典》二卷，此四史篇幅小，很快完成。最后，只有《宋史辞典》《明史辞典》拖得时间长些，主要原因是篇幅太大。这是大工程，前后30多年才完成。在做“二十五史专书辞典”的过程中，山东教育出版社又提出了《中国史学名著评介》计划，于是有了三卷本《中国史学名著评介》。这是出版社的计划推动了他的学术工作。“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与《中国史学名著评介》这两项活动，可以视为史学普及工作。这些工作，既是大事、好事，也制约了他的专著出版计划，《谱牒学通论》因此被推迟了，《浙东史学》最后未完成。也就是说，仓先生的学术活动，既有个人专著，又有集体主编。

（七）重视自我作品的完善

仓先生的著作几乎都有修订本。这项工作始于《章学诚评传》，此书相当于《章学诚与〈文史通义〉》的修订本。《方志学通论》出了两个修订本。其他如《中国史学史简编》扩充成《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由三卷扩充为五卷，《文史通义新编》扩充为《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先生不断地出修订本，主要是出于学术完善之心。仓先生追求完美，不想让自己的学术作品留下遗憾。先生走上学术道路处于新中国学术发展初期，当时不太重视学术规范，故在写作中会有些小弊端。譬如《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用的是夹注，只引古代典籍，多不及当代学人的论著。因为有不少是转引，偶尔会出错。先生爱惜羽毛，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十分看重，别人能证明其书的硬伤，他会乐意接受。如陈凯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生期间，读《方志学通论》时发现有不少错字，他将错字或引文差错一一列出，给仓先生写了信。仓先生对此十分感谢，收他为弟子。后来，陈凯成为他晚年出版编辑校对的助手。他在晚年也接受了笔者在明代史学研究上的一些说法。再版工作扩大了他作品的社会影响度，让他保持了学术热度，让仓先生有一个较长的学术周期。

三、小结

学术是仓先生的全部生命所在。他向来的名言是，学术高要求、生活低要求。凡与仓先生交往过的人都会发现，他多谈学术，少谈生活琐事。

仓先生学术地位如何定位？至少可以有几个第一代。

他是新中国史学史学科第一代建设者。他从1961年就开始关注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此后一生钟情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1983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此书奠定了他在新中国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建设者地位。

他是新中国章学诚研究最权威的第一代专家。围绕这个选题，他出版了5本书。

他是第一代浙东史学研究专家。虽然此书最终未成，但主要成果已成，只是分散发表，未能汇总而已。

他是方志学第一代建设者。《方志学通论》三次再版，加上《仓修良探方志》，让他在古今方志研究上成为开创者。

他是谱牒学第一代建设者。《谱牒学通论》虽然2017年才出版，但主要论文从1983年就开始发表。

叶建华称，“仓氏三通”之作，对史学史、方志学、谱牒学三门学科建设都是奠基之作，可谓功德无量。[20]这个评论基本到位。

参考文献：

- [1] 仓修良. 范仲淹生平事迹订误[N]. 光明日报, 1961-12-10.
- [2] 仓修良. 《补农书》评介 [J]. 实践, 1962 (2).
- [3] 仓修良. 潘季驯[N]. 浙江日报, 1961-07-23.
- [4] 仓修良. 胡三省和他的《通鉴注》——纪念胡三省逝世六百六十年[J]. 文史哲, 1962 (4): 78-80.
- [5] 仓修良. 章学诚和方志学[J]. 江海学刊, 1962 (5).
- [6] 仓修良. 问题解答：郑樵的生卒究竟为哪一年？[J]. 历史教学, 1962 (10): 56.

- [7] 仓修良. 顾祖禹和他的《读史方輿纪要》[J]. 江海学刊, 1963(5).
- [8] 仓修良. 八十自述 [M]//钱茂伟, 叶建华. 执着的史学追求: 仓修良教授八十华诞庆寿文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9] 徐思彦. 口述史的有效与有限: 以《历史研究》复刊为例 [J]. 云梦学刊, 2009(4): 23-24.
- [10] 宋德金. 《历史研究》: 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缩影(下)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06-30.
- [11] 仓修良, 魏得良. 王充的反潮流精神 [J]. 理论与实践, 1974(2).
- [12] 仓修良, 魏得良. “思鼎”与篡权 [J]. 杭州大学学报, 1976(2).
- [13] 仓修良, 魏得良. 利用历史进行反党的黑标本——评江青及其御用文人吹捧武则天的罪恶目的 [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1): 19-28.
- [14] 仓修良. 从章学诚的史德谈起 [N]. 光明日报, 1978-07-18.
- [15] 仓修良. 顾祖禹生卒年辨证 [J]. 历史研究, 1978(5): 93-94.
- [16] 仓修良. 章学诚的历史哲学——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一 [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3): 101-111.
- [17] 仓修良. 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 [J]. 文献, 1983(2): 207-234.
- [18] 仓修良. 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J]. 历史研究, 1997(5): 139-151.
- [19] 张前永. “谱学不等于家谱学”——仓修良《谱牒学通论》之“谱” [J]. 图书情报研究, 2019(4): 5.
- [20] 叶建华. 不靠谱的“谱学”——读仓修良著《谱牒学通论》 [N]. 市场导报, 2017-11-09.

[返回目录](#)

学必求其心得

从论文批注看仓修良对研究生的培养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叶建华

恩师仓修良于 2021 年 3 月 5 日永远离开了我们。参加完追悼会回到家，站在书房里，翻阅恩师送我的著作，特别是翻出保存几十年的自己当年的硕士研究生论文手稿，读着恩师在每页稿件上留下的那熟悉的红色批注评语。仔细一数，竟有 128 条之多。小的如改一个字、一句话，大的则是补充一段一段的资料，更多的则是一条条评语和修改意见。当时恩师因高血压眼底出血治疗还没有痊愈，却依然如此认真一字一句地审改我们的论文。此时此刻，恩师培养我们研究生的点点滴滴，在脑海中浮现，历历在目。而师弟师妹们也都追忆起恩师培养自己的往事。

一、读原著，悟心得

论文批注：“你原著还未读透！”“符合事实吗？此书我看过，编纂杂乱无章！写文章要对读者负责。”“疑古有否材料？”“有价值的材料有多少？若只是这样罗列参考哪些书，则不足以服人。”“要多用一手资料。”“你理解什么叫可读性？所举例子不能说明这一问题。”“这四句话是王夫之所提出的。朱氏是否真有此观点，不要乱套。”

我是 1984 年考上仓修良老师的研究生的，同届 3 人，是仓老师的首届研究生。一开学，仓老师就要求我们从读史学经典原著入手。他说：因为大学本科时，你们都学过了中国历史文献、中国史学史等课程，而研究生关键是培养独立学习、自主研究能力，从事学术研究和撰写论文的基本方法就是先从读懂读透原著入手，获得学习心得，并在详细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分析和评判，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结论来。他要求我们每学期读两本经典原著，每读一本，必须

写出一篇心得体悟的文章。先读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赵翼《廿二史札记》、司马迁《史记》等，再读《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通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我们的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读原著、悟心得而培养训练出来的。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是《朱熹史学研究》，仓老师在我的论文初稿批注中多次指出我对原著还没有读透，没有真正领悟作者的思想，一手材料掌握还不够。于是我就再一次认真反复阅读了朱熹的著作及文集，果然对朱熹史学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硕士论文最终以优秀成绩通过专家评审和答辩。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又相继撰写并发表朱熹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10余篇。在研究其他课题时，我也都毫无例外地、自然而然地先从读透原著入手，出成果非常快，这个方法确实十分有效。果而被学生们称为仓老师培养研究生的“秘诀”。

学生钱茂伟（宁波大学）回忆：仓老师要我们从读原著入手，一开始似懂非懂，但几部原著读下来后，突然会产生许多心得，自然形成许多研究选题。通过读原著，我们很快养成自主研究、独立思考的习惯。学生陈鹏鸣（人民出版社）回忆：仓老师指导我进行学术研究的“秘方”是重点研读四种原著——《史记》《廿二史札记》《史通》和《文史通义》。我研读《廿二史札记》后，又研读了赵翼的《陔余丛考》等其他著作，颇有学习心得，写成《赵翼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研究》和《经世致用：赵翼史学的价值取向》两篇文章，后分别在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和《清史研究》上刊登；我研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同时研读了仓老师的《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及其他相关论著后，发现章学诚多年在私塾教书，对于教育有一些不同于时人的论述，其中有些看法在今天看来不无借鉴意义，于是在仓师的指导下，写成《章学诚教育思想简论》一文，在《浙江学刊》发表。后来进一步确定以章学诚作为研究对象和硕士论文选题，最终写出《章学诚史学思想研究》的硕士论文，并在将主要章节分成四篇论文分别在《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仓老师通过指导我读原著写心得，教会我从事学术研究和撰写论文的基本方法。学生文善常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回忆：仓老师告诫我们，研究史学史的关键是读懂、读透史家的原著，了解史家的成长经历和学术背景，多掌握第一手材料，用第一手材料说话。

仓老师还时常对我们进行励志教育，鼓励我们勤奋好学，不虚度光阴，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他反复告诫我们的一句话是“要凭实力说话”。学生鲍永军（浙江大学）回忆：仓老师曾举例说，农村妇女摔倒了，爬起来时还要拔一把猪草。也就是要求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勤奋学习。学生刘连开（浙江传媒学院）回忆：仓老师常对我说：“做人要有志气，以实力说话。”他自己勤学不辍，日夜著书立说，即便是在一只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也不停止。教书育人，未尝懈怠。这是最好的一种人生励志方式。学生郜晏君（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回忆：老师当年在专门赠予我的《章学诚评传》扉页上所题的词是：“希望晏君同学学习传主‘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的治学精神”，我以此自勉，不断鞭策着自己的做人与做事。

二、访名师，善交流

论文批注：“把你们送去北京、上海拜访名师，他们的学术成果都应该好好消化传承。”“关于《文心雕龙》，你应该去请教中文系蒋祖怡教授。”

仓老师十分注重文化传承和学术交流，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机会，将学生推送出去，广博求学，或拜访名师，或参加学术会议，或参与课题攻关，或推荐论文发表，或推荐工作等等。他的研究生培养思想是十分开放的，并没有关门培养，把研究生视为自己的私有、让学生整天围绕自己的研究领域转。他常对我们说：做学问，切不可有门户之见。闭门造车，就难成大器。他主张学术开放，开门办学，这在当时称得上是学术思想解放的。

仓老师在上课时，时常会介绍其他学术名师的成就。不论这些名师是仓老师的前辈，还是同辈，甚至是晚辈年轻学者，只要他学术成就显著，仓老师就会表扬推荐他们，让我们以之为榜样。在研二时，

仓老师会要求学生走出去，拜访国内学术名师。临行前，会给每位名师写一封信让我们带着，作为拜见名师的介绍信。记得当年我们上北京拜访白寿彝、朱仲玉、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等名师；去天津拜访杨翼骧名师；特别是派我们到上海驻扎一个月，拜访华东师大史学研究所吴泽、袁英光等大师，并请袁英光教授专门给我们 3 人上了近一个月的课。我们除了拜访多位学术名师外，还在各大图书馆查找到了许多珍贵资料，都是在杭州查找不到的资料。我的硕士论文课题的大部分资料和观点都是在拜访名师和游学期间获得的。仓老师还安排我们到浙江图书馆请何槐昌专家给我们作专题研究讲座。我在修改《文心雕龙的史学批评》一文时，仓老师又在稿件上批注要我向杭州大学中文系蒋祖怡教授请教，并亲自给蒋祖怡教授写信叫我带着，登门求教。蒋先生是刘勰《文心雕龙》研究专家，出过多种研究论著。我到杭州大学南区宿舍找到蒋先生家。蒋先生非常热情，把多年的研究资料全都提供给我，毫不吝啬。特别是其中有一份他自己手写的资料也提供给我参考。我用好后，赶紧归还给他。这种对后学的无私帮助，实在令人感动。

陈鹏鸣回忆：研二时我开始了人生难得的一次万里访学。根据仓老师的安排，我拿着仓老师的介绍信件，远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地，拜访了吴泽、桂遵义、赵吉惠、吴怀祺、瞿林东等学术名家和前辈，向他们请教如何进行史学史研究。特别是吴泽教授当时已年过八旬，虽满头白发，但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认真了解我硕士论文研究方向，传授宝贵的治学经验。此次访学，对于今后学习和工作裨益良多，在工作之后我依然得到各位名师的随时提携和指导，而这一切，都是仓老师周密安排的结果。文善常回忆：1988 年，仓老师介绍我们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拜望了一代文献宗师张舜徽先生，使我等有幸目睹大师风范，聆听大师的治学方略，获益匪浅。

推荐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和科研项目，是仓老师开放办学的又一特色。他说：要争取各种机会尽可能让你们在各大学术活动亮相，多参与一些科研项目，这对你们的成长十分有意义。比如，推荐

大家多次参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其中叶建华还被一致推选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他主持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丛书”等重大课题，也都尽可能的推荐我们参加，使我们得到较多的学术锻炼和提升。鲍永军回忆：只要有机会，仓老师总是带我出去开会，如方志评审会、学术会议、历史文献年会等等，开拓我们的眼界，科研能力也在学术交流中不断提高。

为促进学生尽快成长，仓老师还热心推荐学生的文章到各刊物发表。许多研究生的人生第一篇学术论文都是经仓老师推荐才得以发表的。比如我的学士学位论文《论〈文心雕龙〉的史学批评》，就是经仓老师修改，然后推荐给《杭州大学学报》发表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工作后，我的许多学术论著也多是恩师推荐给各家报刊和出版社的。鲍永军回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经仓老师推荐在《浙江学刊》上发表，并被全文收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还得了学校董氏优秀成果奖；我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慷慨赐序，并联系推荐至人民出版社出版。仓师自己发文章，从不求人，也无需求人，但为了我能发表文章，却多次向学界朋友推荐。学生张勤（浙江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回忆：我的硕士论文完成后，仓老师说写得不错，节略修改后推荐给《浙江学刊》发表，发表后即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也是我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我还记得仓老师得知此事后开心欣慰的笑容。

对于学生毕业工作去向问题，仓老师也是最为上心的。研究生临近毕业，仓老师便会动用自己的所有资源，多方推荐联系。刘连开回忆：到了临近毕业，想想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也未可知，就有些发慌。特别是留校名额有限，竞争激烈，更是想都不敢想。但仓老师为了争取我留校任教，早就在校、系领导之间呈报告、做工作，终于让我如愿。他一向清高，却为我的就业跑上跑下。鲍永军回忆：为了将我留校工作，仓老师多次与校、系领导沟通，并与徐规先生分别写了推荐信，终于获得批准。文善常回忆：1989年是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困难的一年，仓老师为帮我找工作，写了不少推荐信。

三、重创新，勇批判

论文批注：“这些有何新意？你自己的观点在哪里？不要人云亦云。”“做学问不能赶风头，千万不能随波逐流以趋时尚，否则就很难得到高深的造旨。”“上次已指出这是错误的观点，为何还没改？要知错即改。”

仓老师培养研究生，既重学术传承，更注重创新能力，鼓励我们大胆创新，独树一帜，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常对我们说：写论文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既不可信口开河，也不能人云亦云，无病呻吟，更不能以讹传讹。要有批判精神，勇于对错误的学术观点提出大胆的批评。每当我们提出一些创新的学术观点，仓老师总是赞扬有加。他曾表扬我对于新观点、新事物的敏锐性：“为了更好地完成《章学诚评传》，便约叶建华同志和我共同撰写，因为年青人对于新观点、新事物都更为敏感。他是我的首届研究生，勤奋好学，已发表、出版学术论著70余篇（部）。”^[1]

2013年，浙江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将《浙江通志》中的《民营经济志》《工商行政管理志》《商品市场志》3卷交给省工商局承编。我兼职担任其中《民营经济志》《工商行政管理志》的副主编，负责两部志书的篇目设计、内容统稿修改，以及概述等篇章的编写。当我拿着篇目设计初稿向仓老师请教时，他十分热情，认真仔细地审阅，对其中的一些体例创新之处，随时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了许多珍贵的修改意见。后又在应邀出席的《浙江通志·民营经济志》篇目设计专家论证会上，再次强调指出体例创新是该志篇目设计的一大优点。目前，两部志书出版在即，许多创新内容都是秉承了仓老师的学术创新精神。

钱茂伟回忆：仓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开场白，目标定得十分远大，希望培养比较多的研究生，以后能学有所成，最终创立一个全新的独立学派，自成体系。此话让我深受鼓舞，决意好好随仓老师学习，发扬光大仓老师的学术事业。仓老师还时常教导我们做学问必须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去研究，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

新。而写论文必先搭好框架结构，是否有创新、是否有价值，一看你的框架就清楚。学生殷梦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回忆：仓老师十分支持学生的科研创新，从未因学生毕业离校而有所改变。我到北京工作后，仓老师和出版社的徐蜀老师精心指导我责编一部大型文献丛书《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全套共33册，包含现藏于日本的稀见方志三十余种；2003年又出版了该“丛刊”的“续编”共20册）。以此为起点，经过30年的积累，珍稀方志文献的整理出版逐渐成为我社一个重要的出版方向和优质的出版品牌，并形成了“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方志专题史料丛刊”“旧志集成”等多个系列，至今已整理出版珍稀方志文献3000余种，在业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仓老师始终为这项事业提供了不遗余力的支持指导，不仅对选题选目进行把关，还亲自为多套丛书赐序，更不厌其烦地撰写专家推荐函，向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领导机构热情洋溢地推荐我社的地方志精品项目。

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仓老师一直教导我们做学问的又一条原则。仓老师学术的一大特色是富有批判精神，他毫不讳言自己做学问的这种“好辩”的批判精神，他说：“我认为从做学问角度看，‘好辩’未必是件坏事，对学术界的历史悬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的研究结论自己有不同看法等等，通过辩论搞个水落石出就什么不好呢？做学问就是要能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否则老是作无病呻吟的文章有何价值？”^[2]

在勇于开展学术批评方面，连我这个学生常常心有余悸，不敢直言，而仓老师却往往义无反顾。1998年，中国方志学界发生了一场“哭笑不得风波”，方志学家来新夏组织了多篇文章掀起了一场大批判，矛头直指仓老师，甚至开展对仓老师的人身攻击。这时，我站出来，连续写了《也谈方志批评——从“哭笑不得风波”说起》《警惕“文革”学风回潮》等多篇文章，予以反驳。虽然我是客观公正展开评论，但却也担心由此得罪来新夏等学者，以后见面尴尬，所以，当时竟然连真名都不敢署，全用笔名发表。^[3]

现在想起来，学术批判精神真是比不上仓老师啊！鲍永军回忆：仓老师精研章学诚之学术，大力表彰章氏的独创精神、敬业精神与批判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仓老师同样具有这三大精神。古往今来，歌功颂德易，直言批评难，仓老师尤其具有批判精神，不怕得罪人。譬如遇到挡路石，有些人绕过去就算了，仓老师却是尽力将它们一一搬走，以方便后来者。面对学界不正之风和错误观点，本着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敢怒而且敢言，“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具有侠义风范。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仓老师同样具有坦荡的自我批判精神，敢于直面自己的学术错误，从不讳言。仓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学无止境，人无完人，做学问不可能不发生错误。关键是要敢于面对错误，承认错误，并及时改正错误。这是对读者、对社会、对自己负责任的学术态度。他在《中国古代史学史》自序中开宗明义花大篇幅，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一些错误，并郑重向读者道歉。他说：“从今天的回顾来看，那本书（指所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有些结论显然是不太恰当，有些甚至是错误的，还有个别史料征引上有错误。所有这些都无疑都曾对读者产生过误导的作用，在此有必要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我想有必要首先在此对那本书中明显的错误列举几点，以示向读者作一公开的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应有的责任感。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慢慢养成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即‘永远追求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并在做学问过程中，一直以此自律。”又说：“既然有这样的机会，还是应当公开向广大读者道歉，相信广大新老读者朋友，对于我这迟到的道歉，也许会给以谅解和接受的。”接着他一列举错误，并反复道歉。如此言真意切的道歉，需要何等宽广的学术胸襟啊！其中有一个学术错误还指明向他的研究生道歉，就是对朱熹的认识和评价。他说，原来他对朱熹“其人其书都作了非常不公正的评介，有的结论还有违于历史事实”。“最明显的错误有两点”，一是关于《资治通鉴纲目》的作者问题，“由于自己未作过深入研究”，沿用了古人“纲为朱熹自定，目为其门人赵师渊所作”的说法；二是将《资治通鉴纲目》说成“毫无史学价值”，“其影响和

流毒却是十分深远”。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接着他详细引述他学生的研究成果，来否定自己的错误观点：“20世纪80年代，叶建华同志跟我读研究生，并确定研究朱熹在史学上的贡献，研究过程中发现此说不可信，于是便在我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中，对《资治通鉴纲目》作了评介。文章第一部分就是对该书编纂过程作了详尽考证，指出朱熹主编《通鉴纲目》，绝不像我们今天那些挂名主编，他是实实在在参加该书的编纂工作的，从制订凡例，到列出大纲，从编写初稿，到修改定稿，都有他亲自参加的劳动成果，实际上当年只差一簣之功，就引来身后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议论。为了把问题说明清楚，叶建华同志特地于1994年在《文史》第39辑上发表了《论朱熹主编〈纲目〉》一文，对朱熹在编纂《通鉴纲目》中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论述，用历史事实否定了《四库提要》的作者和全祖望所下的结论。这么一来，总算将长期以来后人加给朱熹关于《通鉴纲目》编修方面的不实之词，作了一次清除，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由于这一不正确的说法影响非常广，加之自己也直接传播过，更有必要在此予以澄清。”又在书中论及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时，反复详细引述我的观点否定他自己原有的错误观点。至于将《资治通鉴纲目》说成毫无价值，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公平的”。仓老师又引述他的研究生钱茂伟的研究成果，来纠正自己原有的学术偏见：“值得高兴的是，这些早已被人们所遗忘的通俗史书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如钱茂伟同志在近几年出版的《史学与传统文化》和《明代史学的历程》中，均已列有专门节目，介绍这种通俗史书发展的情况，无疑这是可喜的现象。”^[4]

其实，在仓老师对我的论文初稿所作的百余条批注中，确实也有失之片面之处。比如“他（笔者注：指朱熹）要把史学作为经的附属物，为经服务的。这就取消了史学的独立性。”“此话本身就错误，医者治病哪有给砒霜与病人吃的？岂有这种医生？”“这就是朱氏讲理的核心，他的理性史学有何等价值，望慎重考虑！”“正因为他处处事事都以这个‘理’来对史学，于是史学也就完了。”“以义理求真理，如何做到真与实？”“正统论就是主观任情褒贬！”等等。他后来

确实觉得这些评价对朱熹并不公正，于是对朱熹史学越来越重视，并进行了一系列纠正：力排众议，将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视为“史学名著”收进《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在自己的著作《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八十自述》中反复承认自己对朱熹史学成就的错误认识，虚心接受并采纳学生的观点，并向读者道歉等等。学术胸襟如此宽广！

大多数人对于自己文章和著作中的错误，采取能回避则回避、能隐瞒则隐瞒的态度，最多悄悄地改正。而仓老师则敢于主动公开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坦言而绝不回避自己的错误。这需要何等勇气！这分明是高度学术责任感使然。

四、严文风，禁不端

论文批注：“你引用人家的话语不注明出处就等于剽窃。这点望务必牢记！”“要承认历史事实。望将我那本书再好好读读！”“我讲的课你们都未听懂！”“这一点你也分不清是非，还研究什么史学史？！”“前一页刚用‘充分体现……求真求实精神’，仅隔几行（又用同样的话），如同老太婆讲话。”“谁肯定的？不要随心所欲讲。我已同你讲过，要冷静，实事求是评价。研究历史要有全局观点，要照顾到左邻右舍，如同今天排位子一样。”

从这些批注中，可看出一个字“严”！仓老师在文风和学风培养方面对我们一直从严要求，教导我们做学问必须具备优秀的职业素养和学术品德，做一名“良史”。

要踏实文风，实事求是，反对贪慕虚荣和随心所欲评价历史的浮夸学风。学生金伟（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回忆：仓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做学问要发扬“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二冷”精神，专心致志，甘于寂寞，不慕虚荣。其实，先生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当时的我也许并不能吃透“二冷”精髓，时至今日方能真正领悟。鲍永军回忆：第一次上课时，仓老师就说：做学问要先学做人，我的学生首先人品要好，正直坦荡，不计较名利。做学问可能出名，但不会有几个利可图。想以做学问来谋求名利，是行不通的。

我一向奉行实力政策，治学就得坐冷板凳，潜心钻研，不浮躁，扎扎实实地写出有分量的论著，自然会得到学界的尊重。仅将科研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不得已而为之，就感受不到快乐，甚至痛苦不堪，是不会有有什么成就的，不如早点改行。

要端正品行，坚决杜绝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仓老师最痛恨那些东拼西凑、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恶劣文风，时时教育我们凡引用别人研究成果，必须注明，绝不可抄袭剽窃，并将其作为一条治学纪律。同时，他自己绝不占有学生研究成果，都是无私提携，无私推荐给各大刊物，绝不把自己的名字私署在学生前面，变为自己的成果。只有学生沾老师的光，他的文稿、他的思想，叫学生帮助整理一下，他就一定要署上学生的名字，而且发表后，一定要分一半稿费给学生；而学生的文章，哪怕他付出了极多的时间精力修改，也绝不会挂名发表。鲍永军回忆：仓老师为了支持我，与我一起申报了 3 个省重点课题，最后出成果时却执意都让我单独署名。刘连开回忆：仓老师常对我说，走捷径、投机取巧，搞歪门邪道，固然也能有所渔利，但昙花一现，终归贻讥天下。钱茂伟回忆：在学术品德培养方面，仓老师是“严”字当头，严禁我们抄袭别人成果。他经常把别人抄袭他成果的文章，用红笔划出来，指给我们看，要我们引以为戒。他还时常教导我们要以历史上的“良史”为榜样，具备“良史”的优秀品德。

五、细关怀，悉照顾

论文批注：“给你母亲准备了几种高血压药，下次来别忘带走。”

在带给我的论文初稿上，仓老师竟写下这么一条特别的“批注”，其实应该是条留言。因为平时聊天时，仓老师经常会问起我的父母身体好不好，家人生活工作如何等等。在得知我母亲也检查出患有高血压疾病后，他每次必问母亲的病情，并且关照该如何控制血压，饮食起居应注意事项等等。还经常推荐疗效好的药物，甚至准备好药物叫我带给母亲。后来，我也不幸患上了高血压，仓老师更是每次千叮咛

万嘱咐。就在离世前两个月，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还主动问我血压控制得怎么样。这种关心和照顾真是无微不至！

学生取得一点成就，仓老师和师母往往都会高兴不已。连仓老师老家的兄弟姐妹也很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学术成就。他们说，仓老师经常跟他们谈起每位学生所取得的成就，并引以为豪。仓老师时常留我们在他家吃饭。师母也非常热情，一定要叫我们吃完饭再回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一届一届研究生，隔三差五经常在他家吃饭，师母十分辛苦不说，家里要被我们吃掉多少伙食费啊！而仓老师家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甚至仓老师生病住院，师母和女儿晓梅都不肯告诉我们，不想让我们去看他，说大家工作都忙，不便打扰大家。有时我们知道他住院了，问师母和晓梅住哪家医院几号病房，她俩都不肯告诉。

邢舒绪（宁波大学）回忆：每次上课前，先生总是先给我吃东西，夏天是棒冰，冬天是水果。这一点使得我在同学中着实地骄傲了好几年，因为每次上课回来，都要跟同学炫耀一下今天去先生家又吃了什么什么，然后看着同学艳羡的样子而颇觉得意。

金伟回忆：先生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自不待言，但是，品尝过先生亲手做的“麦糊烧”的人恐怕不多。先生版“麦糊烧”香脆可口，是我至今一直学做而没有学会的。通常我们在饭店吃到的或自己在家做的“麦糊烧”是软软的，但是先生做的，应该是在锅子里煎过的，色泽金黄、口感香脆，一顿简单的午餐，让我惦记了近30年。在校读书虽然只有3年，但是毕业这么多年来，与先生的师生情，似乎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转而成为了父女之情。这么说也许不准确，因为我做的离作为“女儿”的要求，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我是觉得在我的感觉里，是家人，是亲情。每次我去看先生，先生和师母总是拿出这样那样的小食，把我当孩子，我也很享受这种父母般的疼爱。每次我离开先生家，先生总要亲自送到楼下，或叫师母送我到楼下，哪怕我再三拒绝，也一定要送，还总要叮嘱我路上小心、骑车小心、开车小心，怎么不像父母叮嘱自己的孩子？我女儿出生后，师母专程来看我，现在我女儿都读大学了，我记不清小女吃过多少师母买的巧克力，怎么不像外公外婆疼爱自己的外孙女？先生的教诲，先生的所言所行，始

终影响着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与先生结下的师生缘成为我一辈子享用不尽的财富。

张勤回忆：仓老师为人刚正，信念坚定，敢于发声，以至于有人认为他严厉不好相处。实际上，他是脾气温和、很有些可爱的老人家。我是仓老师招收的最后一名研究生，20多年来，他和师母一起给予我宠爱，长此以往，我在他们面前，自然就像和家人在一起一样，随意得很。经常一边坐在仓师左手边沙发上和仓老师聊天，一边吃着师母喂到嘴里的各种零食。我儿小时乳糖不耐受不宜吃奶粉，一次仓老师问起小儿近况，我无意间说起国外似乎有种奶粉可供食用，没想到仓老师当天就打电话给在国外工作的大女儿仓咏梅，让她去打听。很快咏梅打电话给我，告之相关情况，并给我寄来两罐先试试。近年因我血压不稳定，仓老师、师母、晓梅都多次叮嘱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及时检查、服药，仓老师还以他自己多年经验告诉我，血压务必要降下来，且不必对用药过于担心。这点点滴滴，涓涓细流般，融入了仓老师的无尽关爱。如今，他的嘱咐还在耳边，他的笑容就在眼前，可我又向何处依凭，一想起来，就难抑心痛，泪湿满襟，无法平复……

这真是师父恩重如山，师生情深似海。

参考文献：

- [1] 仓修良，叶建华. 章学诚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491-492.
- [2] 钱茂伟，叶建华. 《执着的史学追求：仓修良教授八十华诞庆寿文集》[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9-10.
- [3] 叶建华. 也谈方志批评——从“哭笑不得”风波说起[J]. 上海修志向导, 1998, 63(6): 18-19.
- [4] 仓修良. 中国古代史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

（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返回目录](#)

师恩绵长 博大昭明 ——怀念恩师杨招棣先生

——原杭州大学副校长 张金山

我于1963年进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曾亲聆杭州大学团委书记杨招棣先生的报告。那时，在我们这批新生中，先生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因为他是共青团中央1956年派去苏联留学的二十四人之一。

恢复高考后，国家教委组团去英国考察高等教育。先生时任杭州大学教务长，是考察团成员。回到北京后，由先生主笔起草考察报告。一天，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国家教委的招待所条件较差，能否帮助解决一下吃住问题。我当时在空军政治部工作。当即向政治部首长作了汇报，并向空军大院管理局提出申请。首长很重视，很支持，马上得到批准。专门从尚未启用的家属楼拨出一套三居室的套房，安置了床、桌及办公用品。并例外批准在空军政治部食堂用餐。记得同来的还有复旦大学教务长，成都工学院院长。

相近一个月的时间，我才真正和先生有了较长时间的接触。我抽空就去看望先生，交谈频频，聆听教诲。先生知识渊博，视野宽阔，我们谈人生，谈教育，谈历史，谈书法……一次，在谈到史学时，先生说，如果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的话，那么历史学就是通贯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因为，所有的学科都有一个“史”的问题。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一个例子。我虽学的是历史专业，但长期只囿于历史学的本身。先生的这番论述着实使我大开眼界。深为先生广阔的学术视界而折服……。

传奇顿消，榜样就在面前。

杨招棣先生信仰坚定，阳光豁达，一身正气，富有亲和力；博学，儒雅，睿智，务实，集儒释道精髓于一身；关爱他人，提携后进，有求必应，无求也应，具有一颗仁爱之心……。先生这些高贵品德和脱俗情操给我留下了难于忘怀的深刻印象。

正因为此，我的人生之路上，凡有转折，或有疑难，必先向先生请教。先生总是谆谆道来，指点迷津，化瘀解扣，终得释怀。可以说，我的成长之路得各个节点上，都留下了先生得心血。

斯人已逝，顿失良师。博大昭明，高山仰止。

杨招棣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18年3月12日）



2009年7月25日杨招棣（左）和张金山（右）
在亲友欢聚晚会上。

[返回目录](#)

一位学者型领导 ——纪念杨招棣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 60 届 薛家柱

1956 年秋天，我考进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还是浙江师院）。

一入学门，就听同学们在无比骄傲地炫耀学校领导与教授班子。一听教授名单，全是国内一代名宿：敦煌学权威姜亮夫，古汉语专家任铭善，一代词宗夏承焘，北方左联负责人孙席珍，明清小说专家胡士莹，先秦文学专家王驾吾。除了这六大名教授，还有刚从苏联（今俄罗斯）中央团校留学归来的学校团委书记杨招棣。他提倡大学生要会学习，也要会生活，校园生活要丰富多彩。第一件事：周末要开舞会，学生要学会跳交谊舞。这对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来说，确是件新鲜事。

因为我们这一届中文系学生有不少师范生、文工团员甚至专业文艺团体来的，因此，校园的文体活动搞得非常活跃。

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电影界拍摄了一批献礼影片：《老兵新传》、《青春之歌》、《林则徐》、《聂耳》、《林家铺子》、《杨门女将》等。国庆节 3 天，让我们好好享受电影大会餐，一部接一部地观看，把穷学生不多的零用钱全花在电影上。回来校门已关，就逾墙而过。

受此启发，我们这群爱好文艺创造的中文系大学生，就异想天开地想把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改编成话剧，在舞台上演出。说干就干，在裴正琮同学领衔下，很快将剧本编写出来了，并由他担任导演。演员就从全年级同学中挑选。

这件事得到校方大力支持，校团委书记杨招棣异常关心。他了解苏联大学生校园文艺活动非常丰富多彩。他赞成一般演员由同学饰演，女主角林道静则建议由外文系青年教师瞿燕芳担纲。男主角余永泽由我们班上的一位男同学担任，但他和瞿老师对手戏感情出不来，临时

该请浙江话剧团的史崇仁来救场（后改由张维国），张维国还协助导演。

史崇仁、张维国毕竟是上海戏剧学校表演系刚毕业的高材生，很快把剧本背熟，进入了角色。排练休息时，大家一边围着火炉，搓着冻僵的手脚，一边听张维国朗读苏联小说《一封未发出的信》，真把我们这些业余演员迷住了，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台词，如何细腻表达感情。我们这群少男少女成了他忠实的粉丝。

《青春之歌》正式在校内演出了。大礼堂兼大饭厅里立即人山人海，观者如墙，连桌子上都占满了人。演出得到全校师生热情赞扬和喝彩。谢幕后观者还久久不肯散去，成为杭大校园一大盛事。

消息很快在社会上传开了，各单位纷纷要求《青春之歌》能到他们那儿演出。我们就在省军区礼堂连续公演了半个多月。于是，在一段时间内，杭州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都津津乐道杭大演出的《青春之歌》。林道静、卢嘉川成了他们的青春偶像。卢嘉川扮演者陈坚同学挺拔的身材、潇洒的风姿、动人的谈吐，迷倒了很多青春少女；就连扮演王晓燕的李如珍同学，也在半个月内收到雪片般的求爱信……

在《青春之歌》的创作和演出中，我们看到了文艺的力量和作用，正式踏上了创作和研究之路。陈坚成了著名的戏剧教授，裴正琮后来也到浙江话剧团当编剧，演戴瑜的娄瑞槐分配到杭州话剧团后调舟山越剧团，李如珍成了全国普通话特级语文教师，我也开始了影视剧创作。

毕业那一年，杨招棣书记又找我们传达省委精神：为了迎接省党代会召开，要我们创作《卧薪尝胆》话剧，配合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我们又动用了原班人马，演员、乐队可扩大到全系挑选。导演由浙江电影厂老演员卢业高（叶高）担任，他还担任剧中勾践这个主要角色。叶高原是上海电影厂与舒适、李维一起支援到浙江的。抗战时曾在重庆参加了陈白尘、阳翰笙的中华剧艺社，与金山、张瑞芳、舒绣文等演出过《屈原》。他一出场声如洪钟的一声“吴士亭！吴王渡……”台词就把我们这些学生演员征服了。

正式演出放在人民大会堂，观众全是省党代会代表，场面极为宏大。《卧薪尝胆》得到省委表扬，还派来浙话大明星周贤珍来抄剧本。这也可算是杭大中文系 1956 年级的毕业创作与演出吧。因此我们几个主创人员托福得以留在杭州文教界工作。后来杨招棣成为杭州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还常常谈起杭州大学呢。

改革开放后的市委、市政府，本着一切为人民办实事的宗旨，扎扎实实地干着一项又一项工作。首先是治理中东河这项民生工程，把杭州的“龙须沟”变成清澈的市河；再是治理交通问题，兴建中河高架桥；同时还把搞好意识形态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市委、市府新的领导班子，都是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书记厉德馨是原浙江日报的总编，副书记张浚生、杨招棣是来自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的教授；市长钟伯熙是当年杭州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们都很了解与理解知识分子。

1984 年，市委、市府决定召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前，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我清楚记得，当时杨招棣要我们在宝石山下简陋的坑道会议室召开作家座谈会。厉书记和张浚生、杨招棣都轻装简从地来参加，同大家一起谈心，毫无一点领导架子。大家都是老熟人了，我们很多都是浙江日报老作者，也是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杨招棣更是我们的团委书记，领导过我们创作，排演校园戏剧。于是大家就无所顾忌地座谈起来。

作家、诗人虽然作品写得好，但自身都有一些“短板”，无非是一些政治成分、出身和历史问题。听了我们所谈的苦衷，几位领导都相继表态：读者看的是你们的作品，而不在乎其它。邓小平同志已经在全国文代会上宣布：不再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是为工农兵服务。所以过去的历史问题就让它过去，都不必斤斤计较了，而是看重当前表现吧。

于是，杭州市第二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在文革前召开），决定在 1984 年“红五月”召开。市文代会由宣传部和文化局具体负责筹备。筹备组放在清泰旅馆，进行代表的产生，与一系列文件政策的起草。我参加了具体工作。

结果，各单位都很支持。五月份文代会如期召开，代表们都从杭州市四面八方赶来报到。除了少数年轻人之外，老的一代文化人包括曾经错划为“右派”也愉快地前来参加。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时写作锋头正健张廷竹却意外地没有前来报到。他苦恼地打电话给我说：单位不同意他请假来参加市文代会。当然，主要原因是他写了一系列反映父亲及他自己命运的“伤痕文学”作品，单位的领导有看法。啊！这怎么行呢？其它代表听了也一片哗然。（……因为张廷竹写了一系列“伤痕文学”作品）省里负责文艺的同志思想很“左”，因此张廷竹所在的大河造船厂也有看法。我连忙向负责大会的杨招棣同志汇报了。他和张浚生同志商量了一下，就给厂里打了电话，并派车子去把张廷竹接了来。当张廷竹出现在会场时，全场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一片欢呼，同他握手。会后，他们还亲自上门，叫张廷竹不要紧张，安心创作，人家不要我们要。

自此以后，张廷竹就在政治上不断努力。杨招棣还到他单位大河造船厂做工作。后来他参了军，去河南二十一军担任文化干事，并为老将军杨成武等写革命回忆录。入了党、提了干，还参加了老山战役的新闻报道，成为山东军区的师级干部。退伍后，他也担任省厅级领导，兼省作协副主席。他没有辜负领导的关心与培养。

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的红五月，杭州市第二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市委领导厉书记、张书记、杨书记与全体代表济济一堂，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市委书记厉德馨亲自作报告，并让市里各部位负责人也来参加文代会。因为厉德馨同志认为文化事业不光光是文化部门的是，要全社会来关心。

这真是杭州市文化界的一次历史性的盛会，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厉德馨书记代表市委、市府在大会提出了“文艺十条”，引起了很大轰动。这十条，除了在理论上强调文艺的作用外，还落实在一系列的文艺政策上。领导认为不要光是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要有实实在在的具体措施。

例如有一条：强调要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与营养问题。

过去，杭州市几个剧团演员都没有宿舍，连团部都没有像样的房子。歌舞团、话剧团的团部附设在破旧的中苏友谊馆，越剧团在红星剧院，杂技团在新中国剧院，曲艺团在工具厂，滑稽剧团在胡雪岩的破房子里。演员也没自己的宿舍，很多是睡在舞台的幕布后面。男女演员之间用布帘子间隔一下。鼎鼎大名的《十五贯》昆苏剧团，周传瑛、王传淞等 5 户人家，最初都睡在“解放剧场”的舞台地板上。晚上女演员要洗下身，只得用雨伞遮一下。

市委决心要为剧团建造团部，也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住房问题，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很快，一个个团部造起来了，作家、艺术家的住房也相继得到解决。大学路新建造了一批机关公房，首先分配给刚调进市文联的专业作家李杭育、徐孝鱼。从桐庐越剧团合并到杭州的包朝赞、谢群英等人也住进市里新的机关宿舍，与市委、市府领导干部住在一起。

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大的方面解决住房问题，小的方面也充分考虑到了。其中，牛奶一事最为轰动！即市委、市府决定：给剧团每一位练功的演员，每天补贴一瓶牛奶。厉书记在会上很动情地说：同志们，那些舞蹈、杂技演员每天练功有多辛苦！我们补贴他们一瓶牛奶难道不应该吗？一瓶牛奶只有几分钱，我们市里又不是付不起……听到这里，全场爆发出雷动的掌声。那些年轻的演员都激动地跳了起来，不住鼓掌、欢呼！从这件小事，都能看到市里领导对文化界的关心与爱护。

其次一条，为了繁荣创作，市里决定设立专业作家编制。这在全国省会城市绝无仅有。李杭育、徐孝鱼、曹布拉、谢鲁渤，和我等 6 名就成为杭州市首批专业作家。

杭州市的文艺十条很快在全国各大媒体传播，特别是一瓶牛奶事件更是轰动全国，传为佳话。各地都纷纷到杭州市来学习取经。

打这以后，市委、市府又制定了“文艺新十条”。两个十条合并在一起，就是经典的杭州市“文艺双十条”。

新十条，延续了以前的十条，在关心人才、作品，和奖励政策方面又进一步扩大与发展。明确提出：大力引进文艺尖端人才，进一步

打造杭州历史文化名城。并在西溪湿地建造人才房，作为名人工作室。并聘请海内外文化名人共二十多位，作为杭州市的文艺顾问，使杭州成为文化人的天堂。因为文化名人是文化发展的引领者。

于是，余华、麦家成了杭州首批引进的专业作家，并分配给他们人才房与工作室。其它海内外文化名家，冯小刚、刘恒、潘公凯及港台艺术家蔡志忠等人纷纷落户西溪。这些文艺顾问起到很好的“智囊团”、“思想库”作用。

文化凝聚了杭州的历史，文化代表着杭州的未来。从改革开放 40 年中，我们亲身感受到杭州文化发展的迅速与积蓄的力量，令国内外瞩目。这纪念杭州文艺精品、创作硕果累累，这是一个城市文化综合优势最直接的体现。

现在，我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作家了。从进大学到成为专业作家，我很多时间都在杨招棣先生领导下进行创作。G20 时，我回忆杭州的文学专集《风雨芳菲话杭州》出版，招棣先生还在医院病榻上翻阅拙著。当他看到《青春之歌》这篇时，很想再把当年的主创人员召集在一起叙叙旧。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兴奋地准备再来聚会，连在金华的演林红的程又新也准备随时前来杭州。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杨老师已离我们而去……啊，我永远感恩与怀念这样一位学者型的好领导！

[返回目录](#)

夏承焘先生说词

—杭州大学中文系 59 级 吴战垒

听夏承焘先生说词，是一大享受。四十年前，在课堂上听他说稼轩词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如在眼前。夏先生说词不用讲义，娓娓而谈，庄谐杂陈，课堂上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真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夏先生这种授课态度，与另一位授课的任心叔（铭善）先生的严肃正经大不相同。任先生是夏先生在之江大学时的老学生，被夏先生视为畏友，他曾劝夏先生在课堂上要严肃一点，夏先生却说本性如此，无法改变。

夏先生的说词，潇洒从容，举重若轻，能入而能出，能放复能收，如东坡之作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止”，有水流云起、触处生春之妙。我觉得这正是切于词境的最佳阐说方法，似乎词中三昧，不如此则不能道破。

夏先生本性为词人，他以词人之道说词，宜其有从容自得之乐，且能以之感动听众，与人同乐。心叔先生平生专攻经学和小学，且生性刚直，不苟言笑，其讲课之庄重严肃，亦正与其本性及所治之学相当。

夏先生说词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深入地剖析词境和体会词心，他决不“拆碎七宝楼台”，咬文嚼字，见小失大，而能由浅及深、由表及里地引人入胜，把一个完美的词境展示在你的面前。比如他说稼轩的《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指出这首词是词人隐居上饶带湖时，夜行黄沙道上的感受。上片写晴，下片写雨，而各有深浅主次之分和心情急缓之变。首句“明月别枝惊鹊”，写夜空明月乍出，鹊儿见光惊飞，“别枝”者，离枝也，与苏轼诗“月明惊鹊未安枝”同意，而非唐人“蝉曳残声过别枝”作“另一枝”解之“别枝”。先生所说切合情景，故能片语解纷。次句“清风半夜鸣蝉”，虽在夜半，蝉鸣不止，可见天气十分闷热，则为下句写雨作伏笔。“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二句，为上片主笔。夜半无人，“说丰年”者，既不

会是农人，也不是词人自言自语，而是随着稻花香四溢的那一片蛙声！这种侧面烘托之法，比正面抒写对丰收的喜悦更为生动而深刻。下片写雨和遇雨心情，极有层次。“七八个星天外”，写雨前空中起云，密布的云层中透漏出几颗星星，预示未雨而已有雨意；“两三点雨山前”，写夏天阵雨初来景象，数点飘洒，滂沱随至，它不同于春雨之随风潜人，悄然无声。“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写行人遇雨的心情，先是焦急，骤雨急至，急于找一个避雨的地方，记得在那土地庙树林边有一另乡野茅店，可以去避避雨，歇歇脚。于是急急忙忙过了溪桥，那盼望中的茅店果然出现了，其心情的欣喜也可想而知。“路转”也正是心情由焦急而向欣喜之转折，由此一转而戛然收束，则使词情跌宕而生波澜。这类小词，看似平淡无奇，先生却善于把词中的意象贯串起来，提挈意脉，于无字处看出内在的关连和情感的逻辑，从而把一个完整的意境再现出来。

这种善体词心、善解词境的说词功力，来自先生深厚的词学修养和文史底蕴。他撰有《唐宋词人年谱》，熟悉唐宋词名家的身世遭际和创作历程，知人论世，善于把词作放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上进行观照，又能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进行印证和想象，还能毫不费力地征引前人的作品参互比较，因而使人感到切理饬心，既熨帖深刻，又亲切有味。如先生说稼轩《清平乐》“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即与通常以“醉里”谓词人带醉者有异，而谓词人听到有人带着醉意用柔和娴婉的吴音在交谈，初以为是一对青年男女在谈情，定神一看，却发现是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年夫妇！用倒装章法，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出乎意外，才令人于惊奇之余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类似相声“抖包袱”的艺术效果，不但使得词的节奏跌宕有致，而且通过幽默的口吻，也不难体会到词人对这对农村老年夫妇恩爱和睦生活的深情赞美。夏先生的说解入情入理，十分中肯，倘能起稼轩而问之，亦当笑颌。记得周汝昌先生也对此深表赞赏。

夏先生说词，既能洞悉词心，细致入微，又能放眼词史，宏通阔大。其说敦煌曲子词、花间词、温韦词、南唐君臣词、苏轼豪放词、易安词、清真词、稼轩词、放翁词等，均能以小见大，通过具体作品

点示出诸如词乐的变迁、词风的同异、词调与声情、寄托与无寄托之类词学要义。读者于赏词之际，得此良师导引，不惟能体会词心之曲折，词境之深美，且能获得不少具体生动的词史和词论知识，并领悟到学词的门径。

夏先生被誉为“当代词宗”，他治词史、词论于一炉，而本身又是一位杰出的词人，多年的治词心得与丰富的作词经验，使他对古人的词作在章法、句法、字法、过片、结束、用典等方面有十分深切的体会，在说话中，即随宜点出，金针度人，嘉惠后学不浅。（先生拟就此撰为专著，名曰《词例》，已属稿若干，惜未竟其业。）

先生说词，颇赞赏常州词派“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主张，他常从一点生发开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中引申出一些深刻的艺术和人生的哲理来。四十年前，我从游于先生，杖履追随，得亲罄欵，每闻谈词，辄有醍醐灌顶之感。记得有一次，先生说张玉田《清平乐》中的两句词：“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他从《淮南子》“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谈到唐人诗演化为“一叶落知天下秋”，又谈到杜甫的“一片花飞减却春”，娓娓不尽，胜义纷纭，由此而点出文人敏感的心灵，见微知著，以及艺术表现上“一”与“多”的辩证关系等等，短短两句词，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其时先生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边摇边说，悠闲自在，此情此景，历久难忘。曾有句志感云：“弥天花雨纷纷落，满座春风再再生。”

先生说词，必先吟诵，其声情随词情而变化，长吟短咏，抑扬顿挫，使人为之动容。曾听他吟诵陆游的《夜游宫》，上片激昂慷慨，回肠荡气；过片声情凄咽；至结尾数句，又复起伏变化，声调凡三转：“自许封侯在万里”句，高亢振起；“有谁知”，陡然一顿，作短暂休止；接着以摇曳激楚之声吟出“鬓虽残，心未死”二句，叹惋悲凉，抑郁不平，放翁之心声宛然可闻。先生的女弟子琦君（潘希真，台湾著名散文家），对先生的吟诵十分倾倒，说经先生一吟诵，诗词的意蕴已领会大半。我于此深有同感。可惜当时无录音设备，不能把先生的吟诵录下来。有一位懂音乐的同学，曾把先生吟诵几首诗词的声调记为简谱，但后来也散失了。这是一大憾事。

这本《唐宋词欣赏》，是四十多年前先生为广大读者欣赏唐宋词的需要而说解的，大半由先生的助手怀霜记录整理，经先生改定，发表于杭州、上海和香港的报刊上。这些记录下来的说词文字，与无拘束的谈说相比较，其鲜活的意味似乎有所减杀；又因当时环境所限，有些话不能说得很畅，且难免说几句套话，但其见解的精警和说词的鲜明特点仍然存在。它虽然不同于先生的词学专著，却能为大众说法，深入浅出，可读性强，使唐宋词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这也是先生的一大功德。

（辛巳木樨开候，于西子湖滨）

[返回目录](#)

春风时雨活水流 ——追念夏承焘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 57 级 陆坚

西溪路旁、西溪河南、道古桥边的杭州大学教职工宿舍，今名杭大新村，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是一方学术高地，是一艘人才航母，也是一大唤醒不尽记忆的文化宝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位中央首长说过：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杭大中文系是“富农”。而“富农”成员，都曾是杭大新村的住户。2018年4月下旬，蒋遂同志微信嘱我写点有关杭大新村的文字。我当即乐而应允。然近来身体一直不适，难能静心握笔，只好重录往日短文数篇，稍作改易，藉此再次表达感谢杭大新村诸师长的谆谆教诲之恩和殷殷未了之情。

夏承焘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词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名家。作为教育名家，夏先生在教育教学中发表的许多警拔秀异的妙言佳句，充满着理趣睿智，开人心胸，耐人回味。一九六一年夏天，我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考取研究生，师从夏先生研习唐宋文学。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即去杭大新村登门拜访夏先生，向他汇报我四年大学学习中，可能有一年多的时间搞“运动”，忙“批判”，真正读书的时间恐怕不足三年，基础差，根底薄。夏先生坐在门边的藤摇椅上，听了哈哈大笑地说：“你是大学毕业生了，我还没读过大学呢！”接着又说：“做学问，没有什么窍门，就是要学会吃苦耐劳！”然后还风趣地打比方：“我一生没有孩子，我把培养孩子的精力都用在做学问上了。一个人如果能把培养孩子的那种吃苦耐劳的心力和精神，都用于做学问，学问一定能做好！反过来说，以做学问的心力和精神培养孩子，不一定能培养好。还是吃苦耐劳地做学问保险！”

这是我考取研究生后，夏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课！夏先生出生于温州一个渐趋破落的商人家庭，父亲经营布业，资本不厚，而家里人口较多，常有入不敷出的窘况。他曾亲眼看见母

亲病在床上，因为没有钱，无法去买药。他还多次亲眼看见长辈遭受的讨债之苦，特别是每到过年，讨债者几乎不绝于门。为避免讨债的不祥之兆，年夜饭往往不得不拖到半夜之后才能吃。到了成人之后，家中当年的生活困窘状况，夏先生还常常浮现于眼前，形之于梦中，甚至有时还从梦中惊醒！为了摆脱贫苦的困境，夏先生的父亲很想培养儿子成为“读书人”，但又无力供给两个儿子同时读书，很长时间心中踌躇不定，十分为难。据说夏先生两岁时头上生了异疮，昼夜哭闹不停，有一位姓金的长辈，抱他朝门外走，他见到门两边的对联，即破涕为笑，而且盯着对联上的字，目不转睛。这位长辈感到很惊奇，就对他父母讲：“这么小的孩子，就欢喜看字，将来必定会读书！”他父亲听了乐滋滋。在夏先生六七岁时，父辈又有一位老友来他家，问他：“你喜欢读书吗？”他立即答道：“我喜欢读书！我要读书！长大后做一个顶顶有学问的人！”他父亲听了更是高兴，于是决定让他读书，而他哥哥则自愿放弃求学，随同父亲小本经商。此后，每当回忆起这件事，夏先生总是感慨不已：“如果不是哥哥牺牲学业，我哪能安心读书做学问！”这种回忆就像一条无形的鞭子策励他奋发努力，不敢懈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无家学渊源，又无经济实力，更无社会背景，而要做一个“顶顶有学问的人”，就只能靠自学。于是夏先生坚定地走上一条艰难而坎坷的自学成才之路。

他数十年如一日，潜心词学，继往开来，成就卓著；他谦抑宽厚，润物无声，低调为人；他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学界的高度推崇，蜚声海内外，“赢得生前身后名”。

夏先生生前，曾由全国八个单位联合发起，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了“夏承焘教授从事学术与教育工作六十五周年庆祝会”。与会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学者、教授、新闻界、文艺界人士，都高度颂扬了夏先生一贯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高风亮节，在学术和教育工作上的杰出贡献。中央电视台在次日新闻联播节目中对庆祝会做了报道，新华社发了消息。

夏先生逝世后，于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乔石、胡

乔木、邓力群、张劲夫、张爱萍、赵朴初、叶圣陶等以及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和文化界、学术界人士送了花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等向夏老师遗体默哀致敬。当日新华社发了长达一千五百多字的消息。

习仲勋同志称夏先生为“一代词宗”，胡乔木同志称夏先生为“文坛先进，词学宗师”。

夏先生赢得如此崇高的“生前身后名”，这在当时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似未多见。

夏先生从教六十多年，先后在小学、中学、大学任教，讲授过“中国韵文选”、“专家诗”、“专家词”、《诗经》、《左传》、《庄子》、《楚辞》、《文心雕龙》、《文赋》、“诗选”、“词选”、“曲选”、“书法”等十多门课程。担任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导主任，大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研究室（所）主任等职务，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

夏先生待人谦逊作风，和蔼慈祥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引人入胜的教学，一直深受学生的崇敬和欢迎。特别是他那些闪耀着哲思长辉、令人警醒的教育箴言，一直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

“督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

夏先生认为，好学生不是责骂出来的，而是鼓励出来的。他常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说明在教育过程中，表扬比批评更重要，特别有两件事使他终生难忘，也影响了他一生的成长。第一件事，是在读小学时学写诗词，有一天在一位同学处看到一本《词谱》，兴之所至，就按照《词谱》试作了一首《如梦令》，最后两句是：“鸚鵡，鸚鵡，知否梦中言语？”（意思是，鸚鵡很会说话，可是我梦中所说的话，总该学不了吧？）国文老师看到很为赞赏，就在这两句词旁边用朱笔浓浓地画了几个红圈圈，这给他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受到巨大的鼓舞。从那以后，填词的兴趣更浓了，一有时间就背诵东坡词，还工工整整地把《白香词谱》全部抄录下来。几十年来，他眼前仍常常浮现着国

文老师给他加的那密密的朱笔红圈圈，甚至认为这与他走上写词和治词的道路有一定的关系。

另一件事，是夏先生十四岁那年，报考孙诒让创办的温州师范学校，当时报名者有两千多人，但只能录取四十人。他以第七名的好成绩被录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作文写得好。作文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他自己也觉得文章做得比较满意。这种无声的鼓励，就在他心中埋下了爱好文学、勤奋学习的种子。

在平时的教学中，夏先生很少当面直接表扬一个学生。他每次讲好课后，总会留有足够时间叫学生提问题，有时叫学生先讲，他后讲，然后再讨论。对于学生好的意见好的见解，总是要学生多讲一遍，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有时在课后，在随便交谈中，发现学生有好的看法，他总是记下来，在适当的场合让其他学生也知道。

“南面教之，北面师之”

夏先生从来不摆权威的架势，也不抗颜为师，与学生平等相处，不刁难学生，把学生视为朋友，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对于学生在写文章、作诗词或谈学业中所表现出来的优点或进步，总是热情鼓励和表扬，希望学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教导学生要有超越前辈的志气和闯劲。他曾说：“第一流的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往往是第二流的，而第二流的教师反而能教出第一流的学生来。”他希望学生不要产生对老师的迷信心理，鼓励学生充分发挥学习主动性、创造性和超越性。他还认为不是名师出高徒，而是高徒出名师。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是夏先生在之江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在一篇日记中，夏老师曾这样写道：“朱生豪唐诗短论七则，多发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夏先生经常对学生说：“现在是我教你们，以后你们要教我；若不能教我，就不是我的好学生。”有一次，有一位学生请夏先生写字，他虚怀若谷地写了八个字：“南面教之，北面师之。”（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后有“南面称师”之说；晚辈之位称“北面”（面向北），后谓行弟子敬师之礼为“北面”。这句意思是，既做学生的老师，也以学生为老师。）

语言学家任铭善（字心叔）先生，也是夏先生在之江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他们亦师亦友，相携相勉，夏先生说：“我们之间关系就是切磋学问，就是南面教之、北面师之。”在老一辈学者中，夏先生是守正图变、务实求新的一位。解放后，他力图用新观点新方法写作学术论文，他认为任的思想敏捷，接受新事物快，较早读马列主义书籍，讲授过政治课程，所以他常常把写好的学术论文先让任看了提意见，然后再发出去。在一首《为心叔画荷》诗中，夏先生写道：“事事输君到画花，墨团羞对玉槎丫。”他还撰写过一副寿联祝贺任铭善先生四十岁诞辰：“念尔嘉名，取人向善，与人为善；是余至乐，南面教之，北面师之。”

“案头书少，腹中书多”

有一天，夏先生到我寝室来，见我桌上堆满了书，便问：“这么多书都摆在面前，哪一本是你天天读的？”我一时未能言对。夏先生说：“书当然读得越多越好，但对于搞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还要学会读书，善于读书。有的书要天天读，有的书要常常读，有的书只要泛泛读。天天读的书要摆在桌上，放在眼前，反复读，认真读，读懂、读通、读熟、读透，这是看家本领的书；常常读的书，是促进读好看家本领的书，不一定天天放在眼前读。比如，主攻目标是杜甫，首先必须读懂读透杜甫诗集，要天天读，反复读；同时也要读李白诗、白居易诗、全唐诗、宋诗，还要读《唐书》等，常读这些书，就能有助于理解杜甫诗，辗转增益，促进专精。”那时我们有一门课程是《资治通鉴》，我桌上也放着好几本平装本《资治通鉴》，夏先生拿起一本翻翻说：“如从事杜诗研究，不是写作相关论文，这类书泛泛读就行了。”

夏先生认为，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既要多读书，又要力忌贪多不精。一般地说，世界上的书是读不完的；但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就是走进很大很大的图书馆也觉得书太少。读书一定要分主次，不能没有轻重，泛览无归。他曾说过，有些老先生，读了许多书，知识很渊博，令人佩服，但终生没有专业，没有成果，那也是很可惜的。所谓“案头书少，腹中书多”，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个人一生能真正读

懂读透一两本书，也是很不容易的。要把案头极少的、天天读的书读好，自然腹中的书也会多起来。如果案头书多，东翻翻，西看看，就不能专精，腹中的书也就不能多起来。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徒弟总是希望早点掌师傅的“秘法”，学生总是想尽快从老师那边探得一些“窍门”。我们刚做研究生时，欢喜问问夏先生：“读古书有什么捷径？”“研究古代文学与研究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夏先生总是笑笑说：“不用着急，水到渠成。”

夏先生看我们在研究室只看书，不读书，整天听不到“书声”，他觉得不好。有一次谈到苏东坡时，他说：“苏东坡贬官海南岛后，作过一首听邻童读书声的五言古诗，读之令人神往。‘书声’是一个饶有诗意的辞汇。可是现在我们大学里却很少听见书声，好像把朗诵看作是一种不正常的事。其实，‘诵读’、‘朗诵’，就是学习古文的捷径，就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特殊性之一。研究古代文学而不诵读、不朗诵，那就不能体会到作品的许多好处，也辜负了作者许多苦心。从来都说‘读文’、‘吟诗’，没有说‘看文’、‘看诗’的。要培养对朗读的兴趣，通过朗诵，不断加深对作品的印象和加强对作者感情的领会。”

夏先生还说：“不懂的古书读多了，就能逐渐了解它的语法、修辞规律，贯穿它的上下文，即可体会其具体意义。随着诵读遍数的增加，思考次数的反复，全文也就会理解了。这就是‘书读千遍，其义自见’。”

夏先生认为，无论是诗歌或是散文，古人都在它的音节、声调方面花了很大功夫的，即使一个虚字，他们也不肯轻易放过。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开头两句本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为了在句中需要加两个“而”字，他特地派遣驿马追回已经送出去的稿子。夏先生说，读者在这些地方不可辜负作者的苦心。通过诵读、朗诵，可以交流作者和读者的思想感情，也可以考验一篇作品的思想感情的深与浅。有些缺乏感染力的作品，就是朗诵不

起来。有些好作品，教师只要一次朗诵，学生往往就能了解它含义的十之七八，有时可不必多费口舌作讲解。通过反复诵读、朗诵，容易了解作品，也容易记住作品。前人早就说过，“古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

夏先生还曾给我们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听说过去北京大学有位美国女教师，给学生讲莎士比亚的作品。起先，她花了很多时间对莎士比亚作品作具体而深刻的分析讲解，讲完之后，却发现有的学生并不理解。这位女老师便决定不再先讲，而是让学生去反复诵读课文。在她的指导下，学生们读了一遍又一遍，并且一边诵读一边体会，结果越读越感到有味道。最后终于明白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奥妙”所在。一个外国人，也理解我们中国人做学问的“窍门”：“书读千遍，其义自见。”

夏先生平时讲课讲到具体作品时，一般多是要朗诵的，有时应听者要求还要朗诵几遍。五六十年前，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我们都没有能把夏先生的朗诵录下音来。他的家人可能也没有他的朗诵录音。据我所知，夏先生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朗诵过宋词，也许还留有那时的录音。杭州大学中文系1963届一名喜爱音乐的同学韩长庆，曾把中文系多位老师朗诵中国古代诗词的声调记为简谱，并油印成册。夏先生曾为之题写书名《诗词朗咏谱》，其中收录夏先生朗诵的宋词有：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陆游《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当年夏先生曾经想出资将《诗词朗咏谱》正式出版。因有人以“不太合时宜”而劝止。（有人说，此书“散失了”，不确。）

关于朗诵方法，夏先生没有给我们系统讲过，只是他在朗诵诗词时，顺便说几句。现在能记起的，大概是以下几点：其一，要用各人自己的家乡话朗诵。上世纪五十年代，夏先生曾向国家教育部提议，“请各地老先生用各地腔调朗诵旧体诗词，把它录下音来，便可作为诗歌朗诵的百花齐放”。其二，诗眼、词眼之处，朗诵速度不宜过快。

这些地方咬音吐字尤要清朗明晰，让听者有更为深刻一些的印象。其三，词过片处的朗诵，要把作者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词是音乐语言与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殊艺术形式，它的过片处，是音乐最好听的地方，也是作者声情表达最为集中的地方，前人填词都特别注意这关键之处，因而朗诵时不能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

“只读不记，如雨落大海，珍珠抛地”

俗话说：“眼见千遍，不如手记一遍。”“最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好的记忆。”革命老人徐特立说过一句名言：“不动笔墨不看书。”夏先生很同意这些看法，他也非常重视读书做笔记。他认为读书时动笔写动笔记，长期坚持下去，就能使书中知识深深留在脑海里，需要的时候，它们就会纷纷涌向笔端，听候调遣。如果不记，很快就会忘记。正如苏东坡有首西湖诗中所说：“作诗火急迫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也说：“或得一联一句，率而成篇，境过即忘，亦不复追索。”因此，读书若不即作笔记，就如雨落大海，没有踪迹，也像珍珠抛地，宝物散失。

夏先生根据自己的体会，把做读书笔记概括为三字诀：小、少、了。所谓“小”，是指笔记的载体要小。早年夏先生用大本子做读书笔记，结果不易整理，不易携带，后来改用小本子，小纸片，可装在口袋里，随时随地可记，常常是一事写一张，好比现在的卡片，便于整理和检索。所谓“少”，是指笔记的内容要精。读书笔记不是摘录，而是要通过自己的思考，经过咀嚼，然后才落笔。如果不经过消化，一味抄书，抄得再多，也是徒劳。顾炎武著作《日知录》，自比在山中采铜，往往数月只有几条，可见其精炼之功。夏先生所说的“少”，也指每条读书笔记字数少。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条数自然也会多起来。孤立的一小条也许看不出学问，许多条汇集起来，就能成一个专题，甚至可扩充为一篇论文。所谓“了”，是指笔记的目的，要有助于解决研究工作的实际问题。夏先生举了清代骈文家胡天游的例子，据说他临死时，家人从他枕头边发现一个字纸篓，里面一大堆小字条，都是记的冷僻典故，他每天临睡时都会把这些字条温习一遍。这样的

工夫不能说不勤，但这样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意义，只是炫博矜奇而已。我们做读书笔记，即使记一个典故，也必须记那些在头脑中会发展的东西，能起“发酵”作用的知识。如果不动脑筋作笔记，就是天天记，也难有多少心得，那只能叫作“书抄”，或叫作“知识的流水账”，严格的说不是“读书笔记”。有人说“读一书，写一文，了一事”，夏先生认为这也是很有道理的。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夏先生常说，前人主张为学要“优游浸润”，做学问要用“文火”，不能专用“猛火”。宋朝时，学生跟老师时常在水边林下边散步边谈论学问。夏先生喜欢晚饭前散步，也喜欢在散步时谈论治学。有一天我陪他从道古桥散步到黄龙洞，返回时穿过曙光路后，他和我讲起爱因斯坦的故事，说有一天爱因斯坦推着婴儿车散步，走到交通路口，突然想起相对论中的一个问题，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纸笔，站在路口就写了起来，以至差点儿把自己的孩子都忘了。接着，夏先生轻声吟诵了五代词人牛希济一首《生查子》词中的两句：“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夏先生问我：为什么这两句广为传诵？我随即说：联想巧妙，把分别时爱人穿的绿色罗裙与常见的绿茵芳草联系起来，因而别后见绿草，就想到爱人。这比直写思念，更含蓄幽默，也更深一层。夏先生对我的率而所答并不满意，也没批评。他站到路边仔细说道：“你这样的解说，自然不错，但只是通常的说法。对于搞专业研究的人来说，还应该有更广泛一些的感悟和联想。我们平时都要多思考一两个专业问题，要学会带着问题听课、看书报、与人交谈、观察事物。这样脑子里就像有一块吸铁石，遇到相关知识就能吸住，而不是让知识像水从管子里白白流掉，这未尝不可比为‘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几个星期后，夏先生又和我讲了一个与此相关的故事。清代学者戴震说过，第一流的老师教不出第一流的学生，而二三流的老师却可教出一流的学生。夏先生对于这句话，总是感到不好理解，思考了好几年，也记了不少笔记。有一次在北京开会，夏先生与一位安徽朋友

闲聊，那朋友谈到江永、戴震师生治学风度，夏先生听了顿觉眼前一亮。江永是一位乡村的穷教师，教书很注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师生间的相互辩论。戴震做江永学生时，在学术上有不少自己的见解，江老师从不以“权威”自居，他们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戴震论音韵的观点不同于老师江永。后来戴震的学生段玉裁注音韵表又不同于老师戴震。师生们在学术观点上各有各的长处，一代代向前发展。这是乾嘉时代皖派学术的好风气。所以，老师不以第一流“权威”自居，不自己学术的框框限制学生，学生的成就才会超过老师。而慕名拜“权威”或大人先生们做老师的，他就不敢在老师面前标新立异，不敢向老师提意见，那“权威”们的权威越大，学术就难得创新发展！

“十件事做到七分好，不如把一件事做到十分好”

在我们做研究生期间，夏先生只要不外出，几乎每天都到研究室上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夏先生，有时就坐在他身旁听他吟诗，帮他找书，看他写文章。有时他文章写了一半就让我们看看。除了讲课之外，夏先生平时问我们最多的是：“最近在看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写什么文章？”“学术界有什么新动态？”他不希望我们今天看这本书、明天又去读另一本书，今天觉得这个题目好写、明天又转过去写另一篇文章。他反复告诫我们：人的经历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知识无穷，一个人能做好一种学问就很不容易。研究目标一定要明确，注意力一定要集中，要持之以恒，不能见异思迁。他不止一次意味深长地说：“十件事做到七分好，不如把一件事做到十分好。”至今我还记得他所举的一些生动例子。

比如，他说近代扬州有位读书人叫李详，少时家贫，买不起书，就整天读一部《文选》，每天贴一页在桌子上，深思钻研，反复琢磨，结果熟读成诵，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触类旁通，脑子里好像有许多钩子，一遇到相关的知识，就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后来就成了有名的《文选》专家。

再如，夏先生常常讲起苏联时期的汉学家艾德林教授。他花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坚持不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别对陶渊明和白居

易都有独到的见解，对诗人写作每一首诗的目的、环境、背景很注意。为了深入研究和精确翻译陶诗，他特意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专程访问了陶渊明故乡和陶渊明做官的地方，还寻得了陶渊明墓。艾德林教授在陶渊明家乡遇到一个小孩，问他姓什么，答说“姓陶”，他听了很高兴，并将此事告诉了夏。夏先生当即写了两句诗：“道逢姓陶人，使我心悠然。”艾德林教授看了拍手大笑说：“白居易！白居易！”这使人惊叹艾德林教授对白诗的熟习程度！夏先生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像艾德林教授这样专心致志地深入研究，对于我们这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不能不深感惭愧！”他还举了袁枚诗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说：做学问的精神也应该如此，即使研究一个小题目，也要以全副精力去对待它，把它做得很好，十分好！

悠悠往事，历历在目。每当走到杭大新村，夏先生学问高深、为人低调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作为大学教授，夏先生五十多年一直在教学第一线讲课，他认为做教师是平生最大快事，教书有无穷滋味。作为“一代词宗”，他出版的二十余种、四百多万字的学术著作（很多遗稿亟待整理），都是在坚持教学工作的同时完成的。作为教育家，他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感悟出的教育箴言，是他治教治学经验的高度概括，虽然时过境迁，但今天读来似仍有春风时雨、源头活水之感。

返回目录

西子湖头忆恩师 ——忆夏承焘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 56 级 王尚文

1956 年秋，十七岁的我从衢县师范毕业考上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中文系，到学校正式报到入学。我个子矮小，稚气未脱，生怕师范毕业到小学教书镇不住学生，哪里料到喜从天降，可以报考大学，而且顺利考上了，从此可以继续求学，走上新的人生道路。兴奋激动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大学四年，我真正爱上了古典文学，其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夏瞿禅老师。毕业后的五十多年，每回杭州，都会真切感受到杭州的巨大变化，但不变的是我对恩师的怀念。他走了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但他却永远活在我的心间。

我的伯父是他在温州教中学时的学生，从伯父处我看到了夏老师一些诗稿，其中有一首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自赠》：

古如无李杜，我亦解高吟，
莫拾千夫唾，虚劳一世心。
江湖秋浩荡，魂梦夜飞沉，
脱手疑神助，青灯似水深。

也往往从读李杜开始；现在竟然有人敢说“古如无李杜，我亦解高吟”，该是何等气魄，何等胸襟，何等修养！我不禁悚然若失，因为它把我超拔到一个全新的境地，回看原来的我是何等无知，何等渺小！当然也让我肃然起敬，产生“高山安可仰”的惶恐。

入学不久，我准备了几个问题，于一天晚饭后到他家拜访了他。我的问题之一就是，此诗的颈联和上下文是怎么衔接的。他对我的提问并不以为浅而不屑回答，反而兴致勃勃地讲开了：此承“莫拾千夫唾”而来，意思是自己要到广大无际的外在世界和灵动变化的个人内心去开掘、发现，写出仅仅属于你自己的感受来，顿时让我豁然开朗。

问答间，来了五六位助教和研究生，我正想告辞，但他却笑着挽留道：“我们一起谈谈。”我只好拘谨地默坐一旁。他们谈得非常热烈，也许是他发现了我的尴尬，就指着我介绍说：“这位同学是浙江遂昌人，汤显祖曾在他的家乡当过五年县令。”——这句话让我特别感动：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夸奖的，就通过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硬是把我和汤显祖拉上了关系。是的，我是遂昌人，几百年前汤显祖确实在遂昌当过县令，但对我这个人又能说明什么呢？我知道他是怕大家冷落了我这个低年级学生，才故意这样说的。于是他们纷纷问起汤在遂昌的一些情况，我变得从容多了。原来他是如此平易近人，如此体恤学生。从此，我开始走近这位诗学宗师，开始走近古典文学。

在杭大读书的四年，我常去向先生求教，每次他都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解，有时还要额外地谈一些他自己的治学经历、经验，从无倦意德色；而且，每次出来，先生都要把我送到门口。他师范毕业后，曾到一所小学任教。该校有五位老师，每天早上见面，“我们五个眼睛都布满红丝，相互看看都不禁发笑。他们是夜里叉麻将，我是读书背书。他们笑我不会生活，我笑他们浪费光阴”。说到背书，十三经，除了《尔雅》他都会背。有一次，背着背着，居然从椅子上跌了下来。他多次对我说：“案头的书要少，心头的书要多。”做读书笔记，要“少，小，了”，意思是感想心得要经过深思筛选，篇幅宜短不宜长，但一定要把意思写清楚，不能贪图简省而使日后查阅时不知所云。他说，人要直，文要曲——天上只有文曲星，没有文直星。说罢，他自己也大笑起来。他读书之多，涉猎之广，诗学之深，有一例可见一斑。入学不久，有一同班同学曾特地从一本清人冷僻诗集中抄出两句，向他“请教”：“这是宋代哪一位诗人的作品？”他一看，说：“这不是宋人之诗，是清人某某某的作品。”这位同学回到寝室，连连大呼：“服了，服了！”

“人要直”，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1945年的《放顽》，小序云：“浙大师生写帖索还费巩教授，予署名其间，戚友或为予危，作此示之。”诗曰：“一士头颅索不还，千夫所指罪如山。乌峰埋骨宁非幸，白简临门要放顽。”矛头直指国民党特务。1949年后，他难免

为严苛的政治运动所裹挟，但他还是有底线的。57年反右，他的学生朋友任铭善老师——当时杭大的教务长被打成右派，批判高潮迭起，他一直没有参与。他的温情主义在同学中是出了名的，而且有关方面认为，只有夏老师出来批判，斗争方可收兵，由此可见他所承受的压力。一天下午，系里又要开批判会了，而且传说夏老师要发言。对他的发言，大家都特别关注。发言内容，主要是说任有严重的名利思想。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到解放前，一次浙大竺可桢校长来找任老师，要他担任中文系主任；任不在，竺找到了他。任从外面回来后，“我告诉他，我已帮他回绝了。当时他的脸色非常难看，足见他是想当这个系主任的”。我想，当年浙大要他当中文系系主任，说明他的学术地位；能够代他回绝，说明他们关系之深。在某种程度上说，夏老师是勉为其难曲意回护了他。“文革”后期，我曾经去看过他几次，一次当我问起任铭善老师时，他一脸悲愤地说：“他是被斗死的！”我从未见过他这种表情，印象特别深刻，至今仍然仿佛就在眼前。他摆脱不了他的“温情”。我曾听前辈说，抗战时期，汪精卫曾有意请他到南京伪中央大学任教，他大义凛然，丝毫不为所动。其间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他得知一友人居然下水，当即严厉斥责，不假辞色；但胜利后，此人在苏州狱中胃病甚剧，他又寄钱恳托苏州朋友时时买饼饵馈之。他的温情，基于大义，基于人道，更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体察，这事可以说是他的温情主义最好的诠释。他后来出诗集、词集时，环境虽然有所松动，可能仍然心有余悸，据我揣测，被删者肯定不少，尤其是写所谓温情者，说来让人不胜慨叹。

说起他和任铭善老师的关系，我忘不了任老师四十初度时他送的一副寿联：

念尔嘉名，取人为善，与人为善；
是予至乐，南面教之，北面师之。

后来我教语文教学法，讲对话论，总是要引用这副对联作为例证。别说对任这样的大学者，就是对我这样懵懂无知的学生，他也总是采取平等对话的真诚态度。1975年我路过杭州去看先生，顺便拿了几首

在火车上写的习作请教。他看后拿出笔来，说：“我们商量商量。”这“商量”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记得其中有两首绝句是写苏东坡的，一首他加了双圈；另一首有“梦里乌台西子雨，东依牛舍筑茅庐”两句，他问：“你怎么说是‘东依’？”我答道：“他自己不是说‘家在牛栏西复西’吗？”他笑了，亲切地说：“‘东’还是改成‘来’吧，怎么样？”此处“来”当然比“东”好多了，我连忙点头称是。他又接着说：“写诗有时不能太落实，要空灵一点。”由“东”而“来”，虽是一字之差，但我却觉得自己前进了一大步。现在我感觉到“东依”真是一个笑话，把我的幼稚浅陋暴露无遗；他却毫无嫌弃之意，仍然谆谆善诱。

我的习作中有一首是写黄龙洞的，先生就提议一起去玩玩。快到黄龙洞的拐弯地方，看见一个烂脚的老农民坐在门前，他就走过去问用了新药后病情有无好转。原来——无闻师母告诉我——这位老农民是孤老头子，在散步时熟悉的，先生时常给他送钱送药。我们在走近黄龙洞山坡一片竹林时，他说前人曾有这样的句子：“直将一身穿万竹，忽然四面立群山。”其实夏老也是写景的圣手，如他描写莫干山的句子：“云气黑沉千嶂雨，夕阳红漏数州山。”比前人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总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读他已经出版的日记，几乎无页不有他称道前辈、同辈和后辈之处，其中我熟悉的，除了任铭善，还有如蒋礼鸿、吴熊和、蔡义江等老师，令人赞赏不已。

1959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要发我一篇关于李白的论文，同时提了五个问题要我进行修改，于是我去请教先生。不料他正卧病在床，他就在病榻上写了一个条子请胡士莹教授给我辅导。同年，我因病休学，先生又特地带我到精通中医的陆维钊教授家里，请他给我按脉开方。他还要我特别注意营养——当时正值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我信口发了一句牢骚：“山区连油也缺呢。”他笑笑，嘱我离校返家前再去一趟。我去了，他拿出事先包好的一捆香肠给我，说：“这东西里面有点油的。”1960年夏我毕业时，先生送给我一幅他自己画的泼墨荷花，并在上面题了一首五绝：

月底疑无色，箫边恍有香。
西湖更可爱，红透映朝阳。

1984年初，先生给我寄来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写的一篇关于苏轼的文章，连我自己都忘了。四、五万字写在灰暗粗劣的稿子上，我正后悔当时年少无知，竟然会拿这样的东西去消耗老师宝贵的时间、精力。看着上面他亲笔写的许多批语和改的错字，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真切感到先生是希望我学有所成的，但我却辜负了先生。在七十岁完全退休后，我勉强写了一本《后唐宋代诗话》，并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我在该书后记里写道，自从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中师、中学任教；业余爱好古典文学，私心希望从事苏东坡研究。教学工作自问还是认真的，负担也不轻，读书时间实在不多；后来就是十年文革。文革后期，有这样一个问题时时纠缠着我，挥之不去：为什么我们这些好端端的学生会在一夜之间丧失人性，残酷无情地去迫害教师，甚至把教师、校长活活打死？我想，不能把责任往‘四人帮’、‘五人帮’身上一推了事，教育本身难道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吗？经过几年的挣扎、酝酿，我终于决心专注于语文教育的探索，于是把有关苏东坡的书籍和相关读书卡片、笔记和文章初稿全部捆扎起来，于一天夜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我在苏东坡像前摆了几碟水果、一杯水酒，默默向他告别。当我想起苏东坡远贬海南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致力于普及文化教育，我觉得我并没有远离东坡，而是真正走近了他，不禁流下了眼泪。

1988年，我调入浙江师范大学任教语文教学法，此后，孜孜矻矻，心无旁骛，所有时间精力一付于此，直到2008年满七十时彻底退休。退休之初，原想休整一些日子，然后继续做点语文教育方面的事。大学读书期间及毕业以后，夏瞿禅老师、马骅老师、吴熊和老师、蔡义江老师等一直很关心我，虽然联系不多，但我深感有负于他们的期望。数十年来，我总觉得还欠他们一份应交的作业。本来时隐时现的愧负之情，不想竟在此时淹没了我。现在不补这份作业，更待何时？于是

开始酝酿这份作业的具体内容，终于决定钻研现在这个题目。我深知于此道自己已荒疏多年，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兴趣一经重新被点燃，一股莫名其妙的勇气（其实是傻气）竟不断推动我不顾老迈奋力向前。感谢夏瞿禅、马骅、吴熊和、蔡义江诸位老师，有缘成为他们的学生，是我一生的幸运，自然就该交这份作业。虽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夏老师已去世多年，没能见到我这份迟交的作业，是我永远的遗憾”。

哲人已逝，风范长存。几年前，我写过一首诗聊表对他的敬意和感激：

诗国风流一脉传，余波织就永嘉篇。
心通孔墨充寰宇，气夺苏辛极泰巅。
天下门生承玉液，掌中皓日泛虞渊。
春风夏雨深蒙惠，片片丝丝绕梦边。

近年来，我常有机会来杭州和我以前的学生在西子湖畔散步、品茶，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先生对我的关爱和教诲，我由衷希望他们能够学有所成，真正实现先生对后辈的期望。

[返回目录](#)

缅怀夏承焘老师

—杭州大学中文系 59 级 沈洪保

我听过夏承焘老师的课，也曾求教于他，但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那些往事已经尘封，并都已淡忘了。夏老师在我的脑子里定格的形象是：夏天，穿着纺绸衫，面带笑容，一副儒雅的学者风度。

夏老师给我们讲辛弃疾的词，娓娓而谈，庄谐相间，讲到兴浓处，他会情不自禁地高声吟唱。如“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那抑扬顿挫的吟唱，会把我们带入词的意境，会使我们感受到词的艺术魅力。在他的课堂上，常常会爆出意会的笑声，听他的课，真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这种从容自得自然流淌的讲课境界，真乃是学识与艺术的完美的结合。

我曾问他我们学生如何学词，他说能背二三十首名篇就可以了，就能感觉到词的特点了。若想进一步研究，那是要花大工夫的。说倒吟诵，他说：“你是瑞安人，瑞安话是温州话的标准话，用瑞安话吟诵是最好听的。”说到治学，他曾说：“有所失才有所得。一个人的精力与时间都是有限的，研究的面不能太广，应该放弃一些其他爱好。”他说自己笨，但他能下笨工夫，所以会有点成绩。有一次，夏老师从北方讲学回来，他说北方的学者做学问比南方的学者踏实，南方的聪明的多，但不大愿意下苦工夫。夏老师的平易近人、言传身教的作风，自然而然地影响到我们这些懵懂青年学子的人品与学风。

词是音乐的文学，但宋人没有留下乐谱，只有南宋的姜白石留下十七首词调曲谱。夏老师有大著《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老师对姜白石研究得是很深透的。有一次，夏老师说，你懂音乐，可以去研究研究姜白石那些词调曲谱。我说，我这样低水平的，哪能去研究那神秘的音乐密码？姜白石写在十七首词边上的那些旁谱，夏老师已作了考辨破译，并写出《白石歌曲旁谱辨》，大概他认为还有作深入探讨

的地方，所以会有这样的提议。确实，这是一个难题，杨荫浏等名家对那些旁谱已有译释，但许多人对他们译谱的准确性总存在怀疑。

有一次，夏老师送我一本《珊若精选玉虬诗》，线装，宣纸，直排，深蓝色封面，很是古雅。夏老师说，这是他朋友的诗作，是他的夫人精选的。珊若，钱珊若，是玉虬的夫人。玉虬，是唐鼎元的字，是位医家与诗人。他与许多名家都有交往，与夏老师也是至交。他的旧体诗写得很好，解放前知识界对他的诗作就有很高的评价。后来，我读玉虬的诗，其中七古、七律较多，许多是写抗战的，激越昂扬，充满爱国情怀。可惜，这本书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

1962年9月16日，《浙江日报》第四版刊登了夏老师的论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夏老师是继学者余嘉锡第二个提出《满江红》不是岳飞的原创，而是后人伪托的观点的。一石激起千重浪，当时有很多读者来信，夏老师就把这些来信交给他的得意门生吴战垒。我与吴战垒是同寝室的，我们就一封封拆开，看了内容，给以分类。大部分来信都是谩骂的，说夏老师饭吃了没事情去写这样的文章，有些还骂得很难听。只有谷斯范等几个人是用文章与夏老师辩论的。也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浙江日报》平时是不发表长篇论文的，那时为什么突然发表夏老师的论文呢？当时听吴战垒同学说，因为有一位日本的学者到杭州拜访夏老师，在交谈中说到岳飞《满江红》词的问题，夏老师说这样的文章发表会有困难，那位日本学者提出给他带到日本发。后来上级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觉得这样不行，这样不是给人家认为中国没有学术自由了吗？所以决定抢先发表。放杂志上发要等好长时间，于是就在报纸上，可以马上发。这就是《浙江日报》突然刊登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来了浙江第一仗：林夏战役。林，指林淡秋，杭州大学副校长、散文家、翻译家，说他搞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说夏老师是反动学术权威。一位是宽厚的校长，一位是德高的学者，都被揪到几千人的大会上批斗。后来夫人吴无闻为保护夏老师，以养病的名义，把夏老师移居到北京，才使夏老师见到“四人帮”的粉碎，才能平静地生活到1986辞世。

胡乔木喜欢词，而且词也写得很好，他钦敬夏老师。文革前，他到杭州都会去拜访夏老师，他曾多次说夏老师是“一代词宗”、“词学宗师”。

夏老师的坟墓在千岛湖深处的羡山林木中，那里有青山绿水，正合夏老师爱山恋水的情性，那里才是词学大师安眠的好地方。夫人吴无闻给夏承焘墓碑上面写了这样的对联：“浩荡天风宇宙神游词笔健；苍茫烟水湖山睡稳翠花香。”这是对夏老师的赞颂，这也是对夏老师的慰藉，这同样表达我们这些学生对夏老师的深切的怀念。

[返回目录](#)

夏承焘先生给我们讲宋词

—杭州大学中文系 57 级 顾志兴

我是 1957 年考入杭州大学。那时考大学根本没想过什么学校要大、房子要高、校门要气派。选的是学校的老师，有哪些名教授，说白了是奔着老师的名气选学校。当时有个说法，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是“地主”（言名教授多，名气大），而浙师院则是“富农”，夏承焘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我读过他的文章，是十分敬佩的，所以斟酌再三就报考了这所学校。读过一篇文章，说是 1950 年代北京大学有几名洋人留学生，他们是马寅初任校长时考进来的，当临别毕业时马寅初已遭批判，被迫辞职，他们发现毕业证书上校长的签名章不是马寅初，而是另易其人，这些洋人留学生还闹了一阵子事。由此看来，上大学读书，选名校长、名教授倒是中外同理，是学子的共识。

到了 1959 年，我们已经是二年级了，但夏承焘教授还没有给我们上过一堂课。那时运动多，除了和社会上共同的反右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而外，大运动中，大学里还有小运动，诸如教育革命、红专大辩论、向党交心等等，大家都忙于运动。我在新近出版的《浙江印刷出版史》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那时是杭大中文系的全盛时期，名师众多，然而运动也多，批判不断，那些老教授在我的印象中似乎相当谨言慎行。有次开大会，我坐在夏承焘先生的边上，他摸摸我的头发说：“你的头发黑黑的，浓浓的，真好！”不谈学问谈头发，是那时的“实录”。夏先生没有给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上课，却给全校师生“上过大课”，现在回想起来，时间大约在 1959 年，是夏老师向党交心，我们不在主会场，是拉出线的大喇叭传出他的声音，他检查和交心说是读《毛泽东选集》，感到引用《论语》和《孟子》的地方很多，曾产生过用孔孟的思想来解释毛泽东著作，接着深刻地批判自己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起初我还听不懂，毛主席的著作确是引用前人的著作很多，夏先生为什么要检讨、交心？过了几天才悟出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粹，是发展了马列主义，而那时

“顶峰论”已是呼之欲出，将之与孔孟思想并提，并作研究，确是罪莫大焉！夏先生在这一阶段写过一首很有名的打油诗，我还记得两句：“一顶帽子飞过来，推他不动重如山！”这首诗是不是这次交心时吟的，我记不真了。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了。

1961年，我们将要毕业了，屈指算来有多位教授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尤其是大家倾慕已久的夏先生也没有给我们上过一堂课！这岂不有点空入宝山，令人扼腕痛憾！不知是有人反映了我们这批即将毕业学生的情绪，还是别的原因，也许是学校感到有点对不住我们，一日，中文系传出消息，将要为我们开几门专题课，全年级听大课。现在记得起来的有林淡秋校长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比较研究，王驾吾教授的毛主席十九首诗词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研究，就中最使我们为之雀跃的是夏承焘教授讲宋词。林淡秋校长也是我所尊敬的一位学者，他讲的主要是《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的文学结构上的比较研究，由于我没有读过托翁这部巨作，所以对两部书的结构异同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王驾吾先生擅长的墨子研究，这个讲题本身就有点难为他了；印象最深的是夏先生讲的宋词。

夏先生讲宋词，实际上只讲了范仲淹的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流）、《阳关曲》（暮云收尽溢清寒）、《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四首词。进大学四年，等来夏先生的四课时的授课，一百多名学子全神贯注倾听夏先生的讲课，课堂里一片寂静，只听见刷刷的记笔记声。我那时有点懂事了，知道笔记本迟早要丢掉的，我拿了一本龙榆生先生选注的《唐宋名家词选》，先生讲到那里，我就在这首词的天地及空行间密密麻麻书写老师讲课的内容。如今翻到夏先生讲的词，耳际似传来夏先生的永嘉乡音，他不只讲这首词的内容，而是让我们更多地掌握一些宋词的知识，重在词的艺术特色。例如我在范词《渔家傲》下记有“渔家傲，词牌名，今失去调意，只剩音乐上的关系。范词流传至今尚有六首，北宋小令中不可多得之作。每句用韵，在小令中亦不多。音调沉重，心情与词调相合”。又如首句“塞

下秋来风景异”先生说一个“异”字领起全首内容，“异”是塞下，不同于内地，“异”字要体味。我知道先生不是在讲一首词，是教我们今后如何读词。接着为我们讲了苏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念奴娇》（大江东去）。这两首词，我们比较熟悉，夏先生讲词调，讲背景，例如说《水调歌头》调名来自大曲，水调歌头是大曲水调的一部分，和此调类似的还有《霓裳中序第一》，并以苏词“沙河塘上灯初上，水调家家唱”（在杭州作）以证水调在当时之流行。又举《水浒》武松醉打鸳鸯楼中的张都监所蓄家妓所唱即为此调，然后又作断语：“在八月十五写月亮词中，宋词当推此为第一！”

在夏先生此次讲课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的苏轼怀内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他说“用词写夫妇之情，《江城子》是第一首。《花间集》中写妇女多为被玩弄之妓女，最多是友情（如柳永），而东坡第一次用词写妻子，怀念已逝的妻子。这样就提高了词的境界，廓大了词的内容。”“苏轼之前，人们怀内只有诗来表达，怀内诗前人写得很多（他举了几个例子，我没有记下来）。”这看似很平常的几句话，什么是学问？这就是学问！夏先生如果不通读北宋和唐、五代词，怎能说得写出怀内词苏轼是第一人，我虽不学，但这点是深深体会到的。后来我教书，常常以此语对学生讲，要多读书，任何一句话都要有根据。夏先生又从艺术形式来分析这首词，此词用平声韵，言调和平、婉转，词调“七三三四”均有，长短句都有，配搭匀称，字句复杂。复杂、婉转的情感适宜，内容与形式配合得很好。他又边吟哦，边讲解“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此写梦境，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亮，短松冈”，此为东坡醒时语。大学中文系四年，听了夏先生四课时的讲课，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当时就想不虚在杭大当了四年学生。

夏先生曾为我《浙江藏书家藏书楼》题写过书名，我在《后记》中有如下一段话：本书书名恭请先师夏瞿禅（承焘）老师题写。一九八四年冬，杭州大学等发起为夏老从事学术和教学活动六十五周年在北京召开纪念会，我亦应邀与会。当时就想请夏老题写书名。时夏老身体已不太健康，我担心他一时不能动笔。回杭后和杭大陆坚兄谈起

此事，陆坚兄说可先和师母吴无闻先生商量一下，我们就给师母写了封信。去信后不久即收到她的来信，同时附来夏老题写的书名。夏老是我的老师，是我所尊敬的长者，他为我的这本小书题写书名，既是师生之谊，更是前辈对后学的鼓励和鞭策。令人惋惜的是，夏老已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一日逝世，这本小书的出版，只能做一瓣心香，敬献于夏老师的灵前。

夏老师仙逝的讣告我是收到的，因工作关系无法送老师远行，只能遥望北国，送老师驾鹤西行。我平时不注意保存信件等，只是这封讣告信放在抽斗内保存得好好的，这也算是永远的纪念吧。

返回目录

难忘蒋礼鸿先生的言教身教

—杭州大学中文系 57 级 黄金贵

蒋礼鸿先生是公认的著名语言学家、敦煌学家和教育家。作为教育家，按今日的标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生每年都可被评为全国百强名师。蒋先生也是我一生中接触最长、受益最多的贤师。难忘蒋先生的言教身教，是他的教诲影响、规正了我的人生道路。

在大学（杭州大学中文系）阶段，就听说蒋先生是系里年轻而富有才学的严师，1959 年看了先生的新作《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听过先生几次课，很是钦佩，但不敢单独接触。1961 年毕业留校，系里把我和另一位同学分配到语言教研室蒋先生手下学教古代汉语。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很胆小，古文献基础又不厚，在严师手下，我担心上不了课。但没有想到，蒋先生布置我们的任务是：三四年内不上课，随班听课，下班辅导答疑。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愧。此举在全系各教研室是个特例。那一年留人最多，遍布各教研室，新助教都要上课，连本室的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二门课新教师都是第一学期就安排授课的。我们一点不上课，助教不助，等于加重先生的负担，心也不安。而且事后还知道，先生正在开拓敦煌语言文字学，不断增补《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下简称《通释》），科研何其繁忙，最需要时间。但先生却对我们坚决作出了与全系不同的安排。先生说一不二，后来果真让我们随班听了先生三四轮多即三四个学年的课，到第四年才让我第一次走上讲台，但只是几节课的试教。这一举措，充分反映了先生把教学质量放在首位，对教育事业的极端负责精神，也展现了先生对年轻教师的关爱，为留给他们更多进修时间，自己多挑重担的高尚风格。

这三四年听课从学古代汉语，从我的角度说，无疑是先生对我们如何当一名称职的古代汉语教师的无数次的言教身教。先生首先使我懂得：上课必须有教材，教师要有编写教材的能力。

听课前夕，首先遇到教材问题。我留校参加第一次教研室会议就是复议新学期的教学计划，其中主要难题是三年级将要开设古代汉

语新课，至今仍无教材。我想：这是全国性难题，人家也没有；只要多板书，让学生记好笔记不解决了吗？但是我听到蒋先生的铿锵话语，好像句句都冲我而发：“一堂课，教师不停板书，学生埋头笔记，此谓之上课？计划规定的课，总要开；开课必须有教材，没有就自己编！”我听了感到不解：新课程编教材，一无蓝本，一无依傍，完全是一项开创性的科研工作，而先生既无助手（先生时为讲师），又无大块时间，一个人要编到何时？这个年级怎么赶得上？其实，我是无知而杞忧，先生积累丰厚，早已成竹在胸，故有胆量采取化整为零、边写边教的方法。于是马上开始了紧张的流水作业。古代汉语一周有两次课。先生写好一章，我们立即拿到教材科，旋即由刻写高手蜡纸刻写；刻好即取来大家分工校对；校后再回教材科、修正、油印；印好后即取来发给先生和学生。到先生和学生手里，务必在下一堂课之前。先生对自己和我们下了死命令：必须让学生每堂课前拿到教材，一次都不可脱。一个学期，先生就这样编教并行，写一章、刻一章、校一章、印一章、教一章，环环相扣，最后真的没有一次因愆期而调课。记得有一次先生屙恙不适，我劝先生调一次课，但先生说：“快完了。尽量不调课。”还是硬撑着写完一章交稿。到第二年即1962年4月，加上任铭善先生的音韵部分，由杭州大学函授部出了铅字印刷本，才有了一本内部教材，解决了教材荒。自编教材一直使用到文革开始。文革后八十年代初，才名《古汉语通论》公开出版。后人只知其为古代汉语教材之林中有特色与影响的一品，却不知其惊世骇俗的来历：主要编写者蒋先生当年还是四五十岁的老讲师；编此教材是古代汉语拓荒的宏业，也是先生为保证教学质量，主动紧跟学生前进脚步，用业余时间日夜兼程、“厚积薄发”顽强拼搏的壮举；如此奇功却前乏一分资助，后无一丝表彰，而先生从不抱怨、炫耀、邀功。每忆及此，我都会慨然动容：这是老一辈教学第一的绝唱，后无来者，即便当今SC1和大奖的“专业户”，面此也将自愧不如！

这三四年的听课，是我们对先生古代汉语教学的数十百次观摩见习，先生的数十百次身教使我懂得：教好古汉语，但学蒋先生。中文系的语言课都比文学课难上，学生打瞌睡、交头接耳的，司空见惯，但是蒋先生的古代汉语课，课堂肃然，堂上先生铿锵有力的一种

声音，台下数十百双闪烁的眼睛。何有此奇观？先生既不作冗长的板书，也不凭滔滔不绝的灌输，更不用哗众取宠的噱头。先生有他的教学“三字经”，亦即先生教课的三个特色。

一是“正”。所谓“正”，是内容规范。详略有无一遵教学大纲，每堂课的容量按教材分配有定。这样，从不会出现发挥失控、赶进度、拖堂等现象，保证课堂每分钟的最大效益。

二是“精”。所谓“精”，是表达规范。话语精练，阐述精辟，释词精准。这样，讲解语句的容量大，可信度高，学生爱听。

三是“证”。所谓“证”，是阐述规范。讲课主要是阐述，语言课的阐述不同于文学课，言必多证。蒋先生的课举证丰富，无证不言。证有古诗文证、现代词语证、成语证、吴语区方言俗语证、古代文化证等。但证丰而不滥，能证即止。

先生的古代汉语课分《通论》和《文选》两部分（都有自编教材），交替进行。先生讲《通论》，围绕教材按几个论点循序阐述。多用“是”“不是”，几无“也许”“可能”；设疑和判断搭配，废话和赘语俱灭；不用“这个”“然后”延宕，唯以抑扬顿挫调合。堂上必补证（补教材例证），口俗语随手拈来，古诗文口诵如流。一堂课，起承转合，环环相扣；虚实结合，证论相间，记下来，加上标点就是教材的通俗文。讲《文选》，则文境和语境交合，即通过字词句循文疏解，析解入微；又突出疑难词语，呼应《通论》知识。一堂课，如行云流水（疏解），间有奇峰突起（难词、妙语），又峰回路转（释解）。有时全文通解后再提出重点词句说解。

通过先生无数次的示范，我明白了成功的古代汉语课，必须做到“正”、“精”、“证”。而要做到这“三字经”，实不容易，除了学习先生的表达技巧，包括音量、节奏、不用延宕词“这个”“然后”等等经验，最根本的，一是必须熟悉古代重要典籍；二是必须对古代文献词语有所研究，先生丰富的举证很多来自他的科研成果。课堂教学是教师科研的一面镜子。

先生的身教使我对自己的进修有了方向和动力，对走上讲台不断增加了底气。

那几年，除了听课，大量时间是原地即校内进修。一留校，当时系党总支领导就要求年轻教师与老先生建立师徒关系，强调年轻者要虚心学，老先生要“传”、帮”、“带”。蒋先生自然是我们的指导师，只是与带研究生不同，没有写论文的要求，而且先生反对我们写论文。他多次对我们说：“不要急于写文章，现在抓紧时间多读书、打基础，以后文章有得写。”“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成前好用功。”“甘坐冷板凳，功到自然成。”有一次还顶着寒风特地来我们寝室送来他漂亮的篆书书写的条幅：“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勉励我们勤奋读书。先生不仅谆谆告诫，而且还具体指导我们读书。先生首先给我们开了书单，先秦典籍为主，有《论语》、《孟子》、《荀子》等，方法是以杨伯峻《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为读本，结合旧注通读二书。我都做了，收获不小，既熟悉了旧注，又揣摩了怎么注解古书，一举两得。第二年又要我们学习《说文解字》部首，给我们讲述一二次，并给我们看他用精致小楷写的未发表的几篇读《说文》札记，要我们读王筠《文字蒙求》，以后争取读《说文段注》。一段时间我对《说文》兴趣大增，作了540部首系联表，朝夕观看、背诵部首，选读了《说文段注》。第三年，要我们看《汉书选》，并对照《史记》，结合旧注阅读。然后定期到先生家里汇报，听取指导。这样的活动有过几次。每次都是我们汇报几个疑难词语的理解或发疑，先生作评点；然后提出几个我们没有注意的字词，简要讲解。最后一次，印象最深。先生带我们进他的书房，书桌上有一叠叠卡片；《通释》待补的词条手稿，有成品和半成品；散放的夹着许多纸条的几本古籍。先生结合自己所作敦煌文献疑难字词的研究，说明读书中如何发疑和联想，以及释词如何找例证。先生说：“例证并非一次获得，不要一俟难词有了新解就到处找例证写文章。平时读书要善于发疑、存疑，以后看书中不断发疑、联想，自会出现题目。我是成熟一条，就写一条。”先生举“抱”字例说，平时看《汉书·李广传》“因抱胡儿马”，而《史记》同传作“因推堕儿”，可见“抱”就是“抛”。还有几处，如今成语“抱薪救火”（《史记·魏世家》）都是“抛”义。今看敦煌文献，有些文句“抱”不能如字解，马上联想到传世文献中几个当作“抛”义例，遂定下“抱”字条。然后再扩

大例证。先生接着拿起刚写好待补的“抱”字手稿，将例证一条条说明从何处获得，如何联想，并给我们看书和卡片。这一次，除了告知读书方法，还“授人以渔”，告知我们训诂文章如何定题和扩大例证，使我大开眼界，大受鼓舞。我估摸现在先生“开禁”了，可以按先生的方法读书，注意发现文章的题目了。

但是，世道多变。正当经过蒋先生三四年的言教身教，我准备走上讲台和写文章时，“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一场空前的人间“浩劫”开始了，我们的师徒关系自然解体。为教育事业如此极端负责、呕心沥血又淡泊名利的贤师，却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扫进“牛棚”。我也辜负了先生的言教身教，脱离专业十多年。好在世道又变，科学的春天来临，我叶落归根，又回到蒋先生手下。但这时先生已是白发苍苍、行走迟缓的古稀老翁，我则是一贫如洗、腹中空空的不惑浪子。先生不鄙不弃接纳我。于是又有得到先生教诲的机会。

首先受教的又是教材之事。文革后，王力《古代汉语》已陆续出齐，我回教研室时，先生已毅然放弃当年拼搏出来的自编教材，而改用这套新的部编教材。这么一改，先生麾下的所有教师都必须放弃原先熟悉、多年积累的教法，从零开始，去研究新的教材和教法。我感到“炼狱”后的蒋先生依然一切从教学大局考虑，淡泊个人名利。事实证明，这一改变是非常正确、及时的，不仅对本科，而且对后来各种专业、层次的古代汉语教学都与全国一致，有利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改用王力教材，如何处理“古代文化常识”，是“割用”还是“真用”的试金石。王力教材是通论、文选和文化常识的三结合体系，与其他教材最大的不同是教学内容增加了“古代文化常识”。我早闻知很多单位和教师对此很不认同，于是虽用王力教材，但以教时不够和师资缺乏为由，将这一块改为学生自学，实是排除，此谓“割用”。但先生是真用，坚持这一块不能删，最后讨论决定设专人主讲，分立一课，与古代汉语同步。这真是落实王力教材三结合体系的好方法，充分表明蒋先生完全、真诚接受并落实王力教材的三结合体系，不避难就易，依然对教育事业极端负责。我闻之深为感动。

但是，这个“专人”怎么落实？我算算本室无人兼搞“文化”，只能求助历史系……而待我短期进修回来，才知这个“专人”竟是我。

先生单独找我布置任务：“王力教材的古代文化常识，必须专人负责，请你执教这一块。”我一下愣住了，第一反应是门类多，不熟悉。我结巴着说：“这一块……自己多不懂。”先生说：“哪有天生就懂的？先学习、准备起来，下学期的课，来得及。”并告诉我，最近教育部来个文件，针对下面使用王力教材中古代文化常识天文方面施教的困难，特委托北京天文馆举办一次全国性天文学习班，对象是古代汉语教师，有一个名额，我可以去参加。我听了心里一宽，最难的天文解决了，其他门类还学得懂。“不懂”解决了，但接着出现改行的担心。因为教学的分工也代表了相应的科研方向，我转教文化常识，岂非要我改行研究文化史？先生似乎透视到我的内忧，耐心开导我：“古汉语中这一块也重要，可以帮助读懂古书。其中有不少词汇、词义问题，也可以研究。”

这么点拨，我顿时眼前一亮，看着先生真诚、充满期待的眼神，我爽快地承命：“好的。我会努力，先自己学起来。”这是先生第一次布置真正的教学任务，却规正了我的下半生。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不能再让先生失望，更应“将功补过”，遂日夜兼程，追赶时间，高标准从事先生布置的教学工作。结果将文化与语言结合起来，学、教了许多文化知识，也研究了许多文化词语；不仅自己研、教，还拖博士生“下水”。至今乐此不疲。这是一个掉队浪子对先生言教身教的报谢，只是太迟了。

注：

黄金贵，1961年7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后任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第三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著《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

[返回目录](#)

朱良璧：杭大史上最牛讲师

—杭州大学新闻系 94 级 陈欣文

2021 年 11 月 20 日晚 8 时，年纪最长的老杭大人，数学家朱良璧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 108 岁。朱良璧先生，1936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留校任助教。1958 年，陈建功到杭州大学担任副校长，朱良璧随之到杭州大学，还是担任讲师。她主讲《高等数学》，对各个系开放，相当于现在的公共课。一届又一届学子和相关各系新老同事，总记得先生的温厚。



中青年时期，朱良璧撰写并在《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发表过两篇论文。她也是在《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数学新进展》（Inventiones Mathematicae）、《数学学报》（Acta Mathematica）和《美国数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即称国际顶级四大数学期刊上全部发表过论文的中国科学家，也是迄今唯一在《Annals of Mathematics》发表论文的中国女数学家，堪称杭大历史上最牛讲师。

翻开数学系的老照片，不时能见到朱良璧年轻时候的身姿，秀美而宁静。而修竹一般的身影下，则是一片科学报国的赤子情怀——温厚又热忱，至纯又强韧。

从上世纪 30 年代初一直到 50 年代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一提起浙江大学数学学科，学界会异口同声说到“陈、苏”，即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陈苏学派，又称浙大学派，在 20 世纪 40 年代蜚声中外，与当时美国芝加哥学派和意大利罗马学派三足鼎立于国际数学

界。陈先生和苏先生是爱国主义者，早年留学日本时便立下宏志，要为我国创办一个具有高水平的数学教学科研结合的基地。数学系秉持“严师出高徒”，课堂缺席者的学号次日会在校刊上“发表”；如一学期缺课时数超过限额，要扣减学分；辅导课上，学生轮流做习题，做不出就会“挂黑板”；在四年级开设“数学研究”课程，是一个学生由单纯学习走向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过渡阶段，被誉为“中国有数学讨论班之始”。

可见当年的浙江大学数学系，入学不易，毕业更有门槛。而朱良璧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求学于浙大数学系的。1932年，朱良璧考入浙大，数学系该年级8月入学注册的总共10位学生；1936年7月，朱良璧毕业了，该年级能够按学制时间如期毕业的，仅6位学生。朱良璧不仅稳居其中，并且，留校任助教了。



1937年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合影（前排左3为朱良璧）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杭州告急，浙江大学被迫走上西迁之路。朱良璧毅然追随学校西迁，与数学系风雨同程。朱良璧在此奋力迁转的历程中，经受颠簸，耐住长途跋涉，走出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文军长征”。

学术之醇，臻于极致。1939年9月，浙大增设理学院理科研究所数学部，亦称数学研究所，数学系从此可招收研究生。1941年9月，数学系由遵义再迁至湄潭南门外朝贺寺。“浙大数学研究所在湄潭的近六年中，共完成一百二、三十篇论文，均刊登在高级别的中外学术

刊物上”。当时整个中国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度日艰难，师生吃穿住行都是困难重重，但学校教学秩序井然，学风甚盛。朱良璧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里，考上数学所，成为了陈先生的研究生，渐渐地两个人也产生了感情，走到了一起，虽然双方年龄相差 20 岁，但他们的感情很好。

1943 年 9 月，朱良璧与陈建功在湄潭结婚。此后的岁月里，朱良璧先生、陈建功先生用对彼此的真挚感情，谱写下两位数学家平常又不凡的婚姻家庭生活。

淡泊名利，心宽有天地，是朱良璧老人给学生、后辈留下的长久印象。四十年代，朱良璧已被聘为讲师。1952 年院系调整，朱良璧调入复旦大学，担任讲师。1958 年，陈建功到杭州大学担任副校长，朱良璧随之到杭州大学，还是担任讲师。她主讲《高等数学》，对各个系开放，相当于现在的公共课。一届又一届学子和相关各系新老同事，总记得先生的温厚。

为感恩师母也是师长的朱良璧老人，昔日弟子、后来毕业留校的一位浙大教授曾专门为当时“新晋”百岁的老人撰文《“没脾气的”朱先生》，温馨回忆朱先生协助丈夫默默帮助学生，从来没有跟同事“红过脸”，晚辈来拜年一定会送出门……笔墨不出千字，一位温厚师长、贤惠内助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可以说，朱良璧以一位数学家典型的至纯至简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伴侣终其一生的信任和支持。1962 年后，陈先生兼任杭大教师升等委员会主任，领导全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主张以学术水平为唯一标准，使教师升等真正成为激励教师奋发向上的良性机制。为避嫌，在夫人朱良璧升职一事上，陈先生把朱先生“雪藏”了，直到退休，朱先生还是一名讲师。这在原杭州大学数学系老师中间是一直流传的真实故事。

“原来在我们那个时代朱先生就已经在国际顶级数学期刊《Ann of Math》中发表了论文。”“如果把这个成绩放到现在，她或许可以申报成为院士了。而这一切都是为陈先生牺牲的。”在同事们记忆里，“从未在朱先生那里（因职称等事情）听到一句抱怨”。



纪念陈建功先生诞辰 100 周年时的合影，前排左二为朱良璧

原杭大数学系副系主任郑士明说，我是陈建功先生的研究生，朱良璧先生是我的师母。朱先生在学生时期就是一个勤于钻研的好学生，曾在国际顶级数学期刊发表论文，是一名优秀的数学家。后来也是陈先生的贤内助，家里家外、一手包揽，使陈先生可以心无旁骛投身学术研究，产出大量优秀成果，极大推动了浙大数学学科的发展。我们作为学生，由衷地尊敬、钦佩和爱戴我们的好师母朱先生，为她的去世感到深切的悲痛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永远的怀念！

追求极致的数学世界，归于简朴的烟火生活，老杭大人朱良璧先生历经风雨艰辛而始终葆有一颗平常心，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

大道至简、以德垂范。

[返回目录](#)

第六章：同学

同学叶航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赵红

叶航当年在杭州大学政治系读书的时候是七八级的，比我低一级，他后来在杭大教书时是晋川的同事和好友，自然也是我的好朋友。每次见到叶航，都会为他的激情澎湃所感染，同时，脑子里叠现出当年读书时他的身影和风采。

历史的阴差阳错，恢复高考后的 77 级大学生是在 1978 年春季入学的，而 78 级是在当年秋季入学。当时的印象已经模糊，只是觉得过了暑假开学后，课间休息时在教室外小憩的同学突然多了好多，不久后就听闻七八级有个同学叫叶航，是 1976 年清明节杭城民间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的组织者。

那时的叶航平日里应该是晚睡晚起的人，反正很少在课间见到他，只是在同学们的指点下，几次在非上课时间，看到他骑着自行车一闪而过的背影，或是同一帮男生们在一起说笑时晃过的侧影。

终于有一天同叶航打了一个照面！记得那天下午，我从寝室走向教学楼，叶航正好从对面走过来，夕阳映照下，高高的个子，身穿一件淡褐色军用雨衣，黎黑而健康的脸色，泛着自信和沉着，雨衣的下摆随着大踏步向前而左右掀动，透出一股明快的青春朝气。叶航当时并不认识我，脸上露出若有若无的微笑，像一阵风从我身边经过。多年后，那天留下的印象一直印在脑海里，可以说是我年轻时遇到的最为帅气的青年形象之一，用网络时代的话来说就是：“男神”。

叶航仿佛很忙，常和其他同学组织讲座，讨论各种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我有几次慕名而去，虽然不太听得懂，但因觉得自己也跻身于那些学术兴趣浓厚的同学之中，而感到兴奋。叶航在这类场合，照例是侃侃而谈，说着一口好听的普通话，中气十足，能言善辩。除了在学校读书，叶航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经常写各种政论文章。我印象深的有两篇，一是《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社会》，一是《时代伟人毛泽东》。文章引经据典，观点新颖，抄成大字报，贴在原来杭州市

人民大会堂的外墙上，那时候叫“民主墙”，引得民众纷至，排队观看。我去看过几次，随着人头攒动的队伍，边看边慢慢往前移。有一次偶尔回头，看见叶航和另外一位同学，两手抱胸站在身后不远处，似乎在观察着现场人群的反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社会掀起了思想大解放的浪潮，叶航与政治系的旭昆、兆和、冯钢和历史系的周明、卫平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办了一本民间杂志《思考》。

杂志是油印刊物，用金属尖笔在铺在钢板上的蜡纸上刻成字稿后，用手动的滚动油印机印刷，再装订成册，整套出版流程自然是由同学们自愿义务完成的。有一天，我班的杨同学，拿着钢板蜡纸来到我家，说希望帮忙刻蜡纸，我也没多问，就应承了下来。虽说只刻了一张蜡纸，但在当时仿佛有一种电影里参与地下活动的神秘感，那种小小的激动，至今记忆犹新。过了一阵子，风头转向了，民间杂志一律停办。后来，有关部门来系里调查《思考》杂志，有人拿着一张名单来问，史晋川是不是杂志编辑部成员，叶航照实否认。大概因为晋川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被认为是编辑杂志的活跃分子。

叶航帅气，便传出了许多故事。有一年春暖花开，我和其他几位女同学，在我们系附近的文二路照相馆租了一架海鸥牌 120 型照相机，各人带着多套行头，跑到后孤山的放鹤亭一带去拍照片。大家正兴头上，只见远处有一位男青年牵着一个女孩的手正在悠然散步，女孩仿佛害羞的样子，让我们明白这是一对恋人。仔细一看：那不是大名鼎鼎的叶航吗？那时的社会氛围，现在实在难以想象，男女生谈恋爱的场景极为少见，更别说在大白天男女青年手拉手了。望着走远的恋人背影，大家羡慕地议论了一番。几年后，那位牵手散步的姑娘，成了叶航的妻子。

临近毕业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叶航的死党 Z 同学，暗恋七七级的一位女生，向叶航等一干好友透露心扉。几人一听：还有这事？便决定为好友助力。几位“狐朋”策划了一番，商定用集体炮制情书的方式向女生发起攻势，每星期写几封，频率如何措辞怎样。就这样，一封封经过精心打磨的情书，按计划以 Z 同学的名义寄给了这位心仪

的女生。据后来叶航自己回忆，那封封情书写得真叫言辞恳切，感天动地，一段时间下来，女同学似乎有点被打动了。岂料，就在这当口，情书终止了。原来是小 Z 见女同学迟迟没有回应，便心灰意冷停止了攻势。那时不像现在，有事没事发个微信，联系十分快捷方便，而是通过写信这一主要方法，这其中就有时间和传递等方面的信息误差。几十年风飘云散，大家均已释怀，只是想起年轻时的这种“两肋插刀”式“壮举”，有趣得令人发笑。当然，这些故事细节都是多年后当事人酒后的坦白。

叶航现在早已是国内行为经济学及神经经济学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从事着自己最为心仪和擅长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可是，回顾当年，叶航大学毕业时，曾被认定为不适合在大学当教师，从事教育工作。

大学里参与了太多的社会活动，叶航毕业分配时无法留校任教，被分配去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人事处工作，管过银行职工的成人继续教育。叶航心底的愿望就是去大学教书做研究，一直心有不甘，一门心思要离开银行。大学毕业后第二年，他便报考了母校杭州大学经济系经济思想史的硕士研究生，希望通过读研究生回到大学，然后再毕业留校教书。那年，杭州大学经济系在经济思想史专业有 3 个招生名额，叶航考了第 2 名，但是，却被干预说不宜录取。学校很是为难，总不能跳过叶航，而直接录取第 4 名，于是就调整招生方案，当年的经济思想史专业就只招收录取了 J 同学一位研究生。这么一来，叶航虽然有点心灰意冷，但想去高校教书的愿望还是未变。杭州大学是不可能进了，便通过同学联系了杭州电子工学院马列室，去试讲都通过了，最后对方还是没有同意调动进校工作。

之后，叶航改弦易辙，一头扎进股市去炒股票，很快赚了钱，拎着第一桶金又去海南投资房地产。当时，海南的房地产非常火，传出来的信息都是“钱多、人傻、速来”。叶航却在这当口敏锐地注意到了，时任总理朱镕基 1993 年 10 月初有关宏观调控的讲话，他立即从海南抽出了资金，回到杭州，避免了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

回杭州后，叶航心底里去大学教书的愿望又一次翻腾起来。当时晋川在杭大经济系当系主任，同叶航有过多次交流，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持，认为叶航天生就具备当大学老师的素质，三番五次去找沈校长和薛书记，谈叶航工作调动的事。当时，两位校领导对叶航的情况还是蛮了解的，也是蛮犹豫的，就说等一段时间再看看。到了1995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整个社会氛围进一步宽松，叶航在外面漂泊了十三年后，一直潜藏在心里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调入杭州大学经济系工作，回到了大学校园。为此，叶航也下了很大的决心，终止了手头上所有商务项目，包括一个已经签约的预期可赚数百万元的合同。这就是叶航，为了理想，毅然决然。

叶航可能是杭州大学第一个开着桑塔纳小轿车来上课的老师，这在当时的校园里着实轰动了一阵子。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年轻的叶航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初到杭大，他便要求去教《资本论》课程，同时还上政治经济学课程。教着教着，叶航就觉得这些理论有点太老套了，天性中不安分的东西又开始冒头。叶航很快转向接触和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记得当年还跑到我们家里，将整套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借去研读。读了许多书后，叶航似乎又产生了挑战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的念头，很快就转向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生物经济学（Bio-economics）。

经济学研究人的决策行为，而影响人的决策行为的因素，既有后天的社会性，也有先天的生物性。叶航最初是从爱情经济学着手来做生物经济学研究的。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是：恋人和夫妻双方相处时间一长，同生物性有关的性爱带来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而由社会性带来的情爱的边际效用有可能是递增的，也有可能是递减的；情爱在递增的情形下，就像老酒，储藏的时间越长，酒越醇厚。如果一对夫妇情爱的边际效用递增得太慢，同时性爱的边际效应递减得太快，那么这对夫妇的婚姻前景不妙。反之，如果一对夫妇在他们共同的生活里，情爱的边际效用递增的量，持续地大于性爱边际效用递减的量，那么，这对夫妇的婚姻关系，相对来讲会比较稳固。生物经济学研究涉及到

人的决策行为的生理机制，其中神经系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于是叶航又转向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研究。

叶航研究神经经济学，起初研究的重点是人的基因与利己和利他行为的因果关系，研究过程中，道金斯《自私的基因》这本书对叶航的启发很大。叶航的研究借鉴了美国桑塔费学派的思路，通过模拟基因与行为的演化得出的研究结论说，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人不能全部是自私的，全部自私的人组成的社会是无法维系的，实际上，现实社会中本身就有很多人们出于利他动机的合作。但是，一个社会的人也不可能全部是利他的，如果全部是利他的话，人们就会为了照顾别人，不把自己的真实偏好表现出来，这样的话，这个社会的效率反而会很低，社会的长期发展和人类的生存都会有问题。所以，一个社会中，利他的人和利己的人最好有一定的比例。利己的人占70% - 75%，利他的人占25% - 30%，大多数平头老百姓是利己的，其中也有少数雷锋，这个社会的人群结构相对均衡，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些年，叶航同汪丁丁教授合作，在浙江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研究中心。近年来，他与浙大理学院唐孝威院士联手，借助医学脑科学和医疗设备仪器，研究大脑的不同部位在人们投资的风险决策中的生理机制，即当人们在投资决策活动中，应对风险时是脑区当中的哪部分在起作用。叶航的研究团队在神经经济学研究领域，已经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許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神经科学角度探讨了人的许多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比如损失厌恶、不公平厌恶、羊群效应、信任与合作、诚实与欺骗等等行为背后的心理和神经机制，让经济学能够更好地洞察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规律。其代表作有《超越经济人》、《理性的追问》、《人类亲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等。

这里所讲的老同学叶航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活，以及我们曾经年轻和火热的青春。

返回目录

忆陈建平同学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邓梅妮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听说 78 级日语班的陈建平同学过世了，心里一阵唏嘘不已，没想到这位我曾经的聊友在人生的路上竟然走得这样匆忙……

早就想提笔写一写这位昔日的同学加好友，可感恩节，圣诞节，春节，情人节，一个接着一个，忙得我不亦乐乎，心总是静不下来。现在这些节日都过去了，静下心来，往事就一幕接着一幕涌上心间，恍如昨日……

我打小就对文史感兴趣，七八年高考填专业时，我在中文与历史之间犹豫，最后还是填了历史系。高考分数下来后，可以改一次志愿。我妈不由分说的要我改成外语系英语专业。当时我已跟着广播电台自学日语两年有余，便嘟哝着说：“那我改成外语系日语专业好了。”我妈说：“不行，英语比日语更有用。”在我家我妈就是慈禧太后，任何事情她说了算。就这样我被阴差阳错地录取在了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往后的事实证明了我妈当时的决定不仅英明正确，它还助我圆了历史梦，当然那是后话了。

进入杭大后，学英语的同时，我仍未放弃日语。年级日语班的教室离我们的只有几步之遥，可谓近水楼台。每每碰到日语上的问题，



陈建平——后排右起第四人

我就往日语班跑，向日语班的同学请教。这样一来二去就与他们班的上海籍同学陈建平熟识了。

陈建平，瘦高个儿，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能侃会聊，人极聪慧，但又有几分放荡不羁或玩世不恭。他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没有南方人惯有的口音，不过我更喜欢听他说上海话。那时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精读课结束后便会从教室里搬个凳子去校园中间的草地上背单词读课文，被陈建平撞见过几次后，他便天天来找我聊天。我们聊的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知识面很广，也见识了上海人的会侃。后来，只要他去草地上没见着我便会来我们教室的窗下等我下课。几次以后，只要他一出现在我们教室的窗口，我班同学的头便会齐刷刷地转向我，于是我就让他以后别在我们教室的窗下等，免得别人误会。没想他听了我的话撇了撇嘴：“谁爱说说去，我才不在乎呢！”“可我在乎。”虽如是说，但我内心里却十分欣赏他的这份洒脱和磊落。

有一次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提到香港有一款日语词典很好用。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回家后就说与外婆听，最疼我的外婆二话不说即提笔写信，让她在香港的弟弟买一本这样的日语词典寄我。我当时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一封上海海关寄来的信，大意是说从香港寄给我的日语词典是台湾编撰，内容反动，故予以没收。看完信后我的整个人象掉进了冰窟窿里，从头凉到脚，不争气的眼泪也落了下来。胆小怕事的外婆则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对我说：“算啦算啦，就去外文书店买一本词典吧，反正日语也不是你的专业。”

第二天早上我象往常一样又搬个凳子去草地上念书，没几分钟陈建平来了，见到他，我没好气地说：“你走吧，今天我没心情聊天！”他睁大了眼睛吃惊地盯着我：“咋啦？有人说闲话了？”“没人说闲话，我就是今天不想聊天。”我转了个身把背对着他，希望他赶快离开，也希望他没看到我快掉下来的眼泪。没想他的牛皮糖劲上来了：“你不说原因，我今天就不走了。”听了他的话我是又好气又好笑，只得转

过身来，简单地述说了事情的原委。他听后略微沉思了一下，一改平时的嬉皮笑脸玩世不恭样，严肃地说：“我姐姐在上海海关工作，据她说，一般从国外寄来的词典或书被没收后，过一段时间都会被送往上海各大学的图书馆。我建议你给上海海关及上海市委各写一信，申诉一下，既然这些工具书大学的图书馆能用，你也是大学生，为什么你就不能用呢？”听了他的这个内幕消息我很震惊，也很气愤：对啊，既然上海的大学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当晚我就给上海海关，上海市政府，以及国务院各写了一信。三封信寄出后的一个月我就收到了上海海关寄来的日语词典。尽管不是香港寄给我的原书，是没收他人的同一款词典(词典的扉页上有寄赠人的留言和签名)，我还是挺高兴这失而复得，心里也非常感激陈建平。

后来我决定报考历史系的研究生，这就意味着我得自学历史本科的课程，还得抽出空余时间去历史系旁听蹭课，而我学的日语已进入了高级阶段，继续学需要占据我大量的时间，为了圆历史梦，我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了日语，这样一来，我去校园草地上读书的时间就有限了。再后来，班上的一位男生走进了我的心里，便再无时间去校园的草地上念书了，我与陈建平之间的接触与交往也减少了许多…

最后一次见到陈建平是在2017的年级聚会照片上，他还是那么瘦，鼻梁上还是架着副黑边眼镜，只是人憔悴多了，也老多了。听说他身体状况不太好，果然没多久便传出了他因病过世的消息。

陈建平走了，步履匆匆，他就象瞬间划过我人生轨道的一颗五彩流星，短暂、耀眼、温暖，使人过目不忘。与他曾有过的纯真友谊会在我的心底永远珍藏。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聊友！

返回目录

刘军，很高兴在杭大遇见你

—杭州大学历史系 88 级 李娜

刘军，你好吗？

庚子之年注定了会有悲伤，只是没想到第一份悲伤发生在年初四，是来自于你离我们而去的消息。

去年和欣文聚会的时候，听他说起你在北京治疗，胰腺癌，我的心就不由得抽紧了，因为身边有两位朋友的母亲和父亲在前几年就是得此病故去的，大致明白这个病不光是凶险的，也是极折磨人的，到了最后时光疼痛难耐，而且一旦发现大多晚期，时日不多，大概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晚上回家和老三（杨继军）说起，叹惜不止，立刻和你们四兄弟中的老四赵晨通了话，了解了大致的情况，当时说你术后精神尚好，赵晨第二天还给了我长华的电话，但考虑到欣文说你和长华不希望太多人去探望，所以我们就没急着安排，总觉得还有些时间。

到了年末因为母亲中风住院需常去照顾，我和老三又打算年前搬家，所以计划着年后能见面，但谁料老天却收走了这个机会，那份难过和痛心无以言表……

这一个月来，我一直在自责为什么没能早点安排过去看看你，不都说是有一年左右吗，为什么走的如此匆匆……

我想天上的你一定会原谅我的，就像当年我还是校园里的那个疯丫头，和你们四兄弟中的几个玩在一起，行事说话没轻没重，每每鲁莽冲撞，你最多也就是笑着点我一句：别过分啊丫头。真的，你的笑和那段时光一直深深地刻在我记忆的碑上。

当年我和老三是在杭大广播台认识你的，虽然广播台是由宣传部管理，你也刚留校团委不久，说不上指导工作，在我们眼里当时也就是刚毕业不久的师兄而已，所以自然没了那份该有的敬畏，更多的是当作哥们儿的熟络。你招牌式的发型和茶色眼镜更是成为我们时时调侃的对象，记忆中从认识的那天开始就和其他广播台台胞一起喊你“Z

书记”，每次见你打趣是必不可少的流程。你的回应是我如今回忆中都能听见的朗朗的笑声。

平时你来台里不多，但只要来了，看见柯虾一弹吉它或是李欣实一吼摇滚，你就会在播音组办公室呆着，和我们混成一片，有几次我们还在组里烧着电炉，煮煮雪菜方便面啥的打个牙祭。当时的大学生都不太富裕，虽然学校明文规定不能用，但这也算是广播台台胞的“福利”吧，你看了也就含蓄地笑笑，从不批评。所以在我印象中，和你从没有那份校内老师的生份，反倒是多了几分“同流合污”的交情。

后来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我和老四赵晨认识了，屁颠颠地跟着这位大哥玩，就此进入了你们的兄弟圈，认识了老大张志鹤，也认识了你的另一面。

当时赵晨在团市委工作，结交面很广，我这个哥也喜欢热闹，好组织个聚会啥的，所以我们时不时地会去他的宿舍包个饺子吃个饭，喝点小酒后。你们几兄弟还有团市委的其他几个年轻伙伴就开始天南海北地侃啊。主角一定是老四赵晨，口若悬河，大话题大都是他起的头。你是老二，像个稳重的哥哥一直笑眯眯地看着他，偶尔插几句。酒到酣时，老大张志鹤有时会 and 赵晨互怼一阵。你呢，还是那样以笑应万变。有时老四故意拿你做靶子一顿调侃，说些事故意模糊，你也不恼，最多一边笑一边说：你他妈别胡说八道……

这话若是别人口中说出总免不了有些粗俗，但从你的笑容里夹带着京韵京腔地“骂”出总觉得有别样的韵味，老四也就坏坏地大笑以作回应。

你们的兄弟情就是那样包容和喜乐。这份感觉一直到二十年后，即便你去了体育学院做书记，晨哥回来后兄弟见面聚会，已在青岛湛江发展得不错的他依然会故意调侃着说要找你这个项目来做做，你依然是盈盈一笑，四两拨千斤地回到：我他妈这儿没你要的大项目……又是一句国骂，但听着就是觉得亲切。晨哥会笑着回击：瞧这胆小鬼！兄弟们又是一通互怼，酒桌上笑语连连，这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时光飞逝，这几年来杭大有些校友也已经离开了，我越来越刻意地想回避这样的生死离别，但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有些回忆涌上心头，不思量，自难忘。

其实这一个月里，我梦见过你，真的，早上我和老三说我梦到刘军了，他沉默不语。在梦里，你穿着白衬衣，依然是大背头，茶色镜，在杭大的大草坪前走着，笑意满满着……

说来也是缘分，我在你同学发的几张照片里见到了我和老三熟悉的朋友，候为、赖姐，也看到了我一直想去看但没能见上面的瘦削的你，当时鼻子有点酸……

虽然毕业后我们联系并不密切，见面也是隔几年见一回，但原来你一直在我的身边，你的同学好友的回忆让我渐渐地了解了你的另一面，原来你就是那样的人，一直没变。

人生重要的朋友未必一定朝夕相处，却或多或少会一直在影响着彼此。

很高兴，在杭大遇见了你，很想念时刻微笑的你，很遗憾没能为送你送别，天下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宇宙很大，某一天我们终将再见，彼时，一定好好地好好地拥抱你。

[返回目录](#)

第七章：校园

忆杭大生物系

—杭州大学生物系 82 级 褚建君

《小重山》

总是无聊闲散人，徘徊频起卧，掩重门。
无端旧事乱纷纷，清秋里，白日若阳春。

播种种无痕，栽花花不发，草如茵。
一茎扁豆绕浮云，高台上，共我舞黄昏。

1982年的9月的一天，大概是14号吧？我去杭州大学报到入学。我舅公和我爹，陪我到学校去。我舅公年轻时从家乡诸暨出来，在杭州工作，开枝散叶，住在众安桥。我爹是个诸暨乡下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俩陪我进入天目山路的校门，当我在新生登记处递上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接待的老师嘀咕了一句：“一家三代都来了。”当我在一个大教室里面，填写完入学的表格出来，我爹第一句问话就是：“户口转了伐？”

我们生物系，是个“分部”，隔着文三路，在本部的西北方，其实也就是不到1000米的距离。我们女的新生住在生物系分部，而男的新生，是住在本部。生物学是实验科学，我们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做实验。第一学期的实验是植物形态解剖学，每个人都发给一个铝饭盒，里面是解剖针、放大镜什么的。这样，这个饭盒就必须在本部与分部之间端来端去。我是灵机一动，把这个饭盒交给住在生物系分部的一位同学保管。这同学，自然是女同学，自然是美丽的女同学。结果，下一个星期做实验的时候，我们的后来的班长（绰号“胖桶”的），犹如铁搭一座屹立在我的面前，把我委托别人保管的饭盒还给了我，说：以后不许这样！自己保管！

我这个乡巴佬进城，真的是土得可以。乘火车的时候，本来以为铁轨是中间有凹陷，轮子在里面不会滑出来，没想到是铁轨是没有凹

陷的，思考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其中的原理弄明白。我也知道世界上有足球，却没有看见过真的足球。当我第一天在生物系的校园里面走，看见一群人，把一个皮球“波”地踢过去，又“波”地踢回来，就知道那个就是足球了。但是心下想，这个球有什么意思呢？一大堆人跑来跑去，抢这么一个球，真的是毫无章法可言。当我穿着这辈子的第一双皮鞋，还有带着喇叭口的裤子，在生物系的操场上走过，暗暗地问自己：这就是大学吗？

很快就知道，杭大的后门的地方叫做“上宁桥”，上宁桥有个副食品店，里面卖酒。当时，我们读书是不要学费的，学校还发给助学金，分为10个档次。我作为乡下来的贫下中农的子弟，拿到的助学金是最高的。虽然，助学金是以饭菜票的方式发放的，但是吃不完，可以换钱和粮票。我就用吃不完的助学金，换成钱，去上宁桥沽酒。粮票可以换西湖牌的烟票，于是我也弄点“蓝西湖”吃吃，而“金猴”与“杭州”是不需要烟票的。那时候，蓝西湖4毛3分，金猴7毛1分，杭州7毛2分。实在不行，就买3毛9分的“大红花”。按照实足年龄来说，我上大学只有16岁，却在校刊上发表了诗歌《0》。这个诗歌的题目是“0”，也就是“零”，分为3段12行，得到的稿费是12元。12元什么概念？就是一个月的伙食费。所以，虽然当时的物质条件有限，我的求学生活却不悲催。由于我“会”写诗，就被吸收为杭大“晨钟诗社”的社员，并且在毛建一老师的关怀下，成为诗社的第一届理事。之后，在班主任和生物系团委书记李亚楠老师的支持下，成立了生物系的“彼岸”诗社。师兄姐妹们纷纷加入，出版刊物，盛极一时。

一个人，无论出身与教养是多么的不同，但体内荷尔蒙的分泌则是相同的。在荷尔蒙的作用下，我感知自己喜欢的异性。那时候，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要是弄出点什么具体的事情来，被抓个“现行”，一定要被开除掉的。于是，我十分地小心。我想给我喜欢的妹妹传递消息，却不让别人知道。但是，消息传递的速度又不能太慢。我是日思夜想，抓破了脑袋，终于想出一个省钱而快速的示爱方式。当时，市内寄一封信，要2天时间，花4分钱的邮票，而青菜只要2分钱1

碗。我直接就把写好的信，塞进对方的信箱里。信封上贴的是用过的邮票，寄信人的地址写得比较含糊。于是，我能够看着我的恋爱信，被某某班的某某人取走送给某某人。嘿嘿，我现在无聊的时候看谍战片，那些地下交通员，明明知道收信人的地址的，却还要花钱去寄信，多出一个不安全的环节，真的是愚蠢无比啊。

大二的时候，学校开展了教学大论战。说的是，旷课好还是不好。这下被我逮住了机会，决定旷课。虽然实验课是一个萝卜一个孔，无法逃避的，但理论课不点名，我自然就逃之夭夭了。我背着一个发黄的帆布书包，里面放着香烟和诗集，去到本部的经济楼亦或是旅游楼，去找兄弟唐剑。我从大教室的后门溜进去，找到兄弟唐剑，坐在一起，抽烟。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们吐出一口烟。玩了一会，刺激消失，便逃离教室，到外面潇洒去了。虽然，当时没有手机，很快我们便会聚拢同道者，开始海阔天空。

钱少敏是我的美学的启蒙人。他比我大 4 岁，是我真正的大哥。当时，他的书法已经非常有名，在中日建交的时候，作为少年书法家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他每周带我去西泠印社或是美术学院。西泠印社与美术学院的展览，每 2 周更新 1 次，这样，我们，每周都能够看到新的展品。在钱少敏的指导下，我对于艺术类的东西，开始有了初步的感觉。我们这一群人，其实是个性很强的。虽然，似乎是环境条件不如现在这般的自由，居然都有机会很好地发展了自己的个性。朱睦元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的时候，邓丽君的歌曲是被禁止的。有一天，朱老师来我们宿舍视察，我三哥的放音机里正放着邓丽君的歌曲，而那盘磁带上写着：台湾救济大陆灾胞委员会赠。我说：朱老师，这个歌好听伐？朱老师说：好听。我始终觉得，我们的班主任朱老师，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人。

1985 年 12 月 5 日的下午，阳光灿烂，我是大四，正在宿舍里面与“咖啡夜”诗社的诗友喝二锅头。有人来说，“毛细胞”（我们生物系的副主任，姓毛，教细胞学的）不允许某某某某某某报考研究生，正在系办对峙。我说，我们走。一去就想掐毛细胞的脖子，问：为什么不让同学们报考研究生。毛细胞说：这些人个个挂了红灯，肯定考

不上的，会影响我们系的考研升学率。我说，我手头有印刷机器，今天是12月5日，等12月9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于是，那些不被允许考研的同学，被允许了。天地良心。这些不被允许的人中，至少有3位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吧？

杭大，是我的母校，把我从一个放牛娃培养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虽然。毕业之后的路，依然漫长。但是，在每一次的痛苦与欣慰之中，都会想起杭大。那是我的深深的眷恋，那是我依依的回望。

[返回目录](#)

我记忆中的杭大河南宿舍

—杭州大学外语系 60 级 林珍珍

在我印象中，河南宿舍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从校门口出来穿过小桥向左拐，沿街有两幢三层楼的教工宿舍。这里住的大部分是杭大的教师，也包括少量职工。面对西溪路南面的房子，则有一排三层楼房，这便是被人称为讲师楼的宿舍。此外便是一幢幢鳞次栉比、小巧玲珑的洋房。它们就是所谓的教授楼了。顾名思义，教授楼的主人大都是杭大的教授、副教授，外加部分校领导。教授群体是学校的主心骨，人们总是怀着崇拜和敬仰的心情仰望他们。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久，学校的大小权都落到所谓的造反派，也就是后来衍变为革命委员会的手中。在当时的形势下，造反派对这些诲人不倦，十分敬业的教授们极尽大不敬之勾当，除了要写大字报批判他们外，还要教授专家们写检查，写交代。此外，造反派对教授们的居所也多有觊觎，一心想占为己用。后来，大约在 1967 和 1968 年期间，当时的掌权者作出决定，教授洋房要让出一部分房间。因为这些洋房一般都是三间房，当时的决定是让住在里面的教授及校领导每户分出一个房间加上过道，让给一些年纪较轻的教职人员入住。

教授们除给学生上课之外，多数时间是在其居所做学问度过的。这些孜孜不倦，埋头做学问的教授和专家，一方面家中拥有数以千计的书籍；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一定空间进行思考、撰写论文。现在一声令下，每家每户只得腾出一些空间，让素不相识的，或者半生不熟的一家人堂而皇之搬进来，心里即便有十万个不愿意，又能对谁去诉说呢？说时迟那时快，当时的河南教授宿舍几乎每家每户都搬进一户新邻居。于是教授们便成了斗室中的窝居者。

杭大河南宿舍群里设有一个级次齐全的杭大幼儿园，该园承办幼儿学员的半托和全托事宜；又分有大、中、小三班，给全杭大的中、青年老师解除了后顾之忧。我的两个孩子都在该幼儿园度过了快活的童年。回想当初忙乱的双职工生活，每天清晨煞像一场紧张的战斗，为了不误早上七点半进课堂上课，七点一过，就把嘴里还含着最后一

口早餐的孩子，拖曳着往办在河南宿舍近旁的幼儿园赶路。下午四点半开始，就见教师们三三两两地从校门口往河南宿舍走去。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是桩乐事。回家时不必象早上那样赶时间，一路上和孩子谈东问西，待回到家中时，她们在校一天的情况也就了如指掌了。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国旅游访问团来到杭大幼儿园参观。这是幼儿园的一大盛事，老师们忙忙碌碌地将孩子们打扮一新。那天早晨我刚好没有课，送完孩子后就问老师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一位老师突然说，要不你在门外的黑板上帮我们写几个英文字。我自然欣然答应了。于是我用彩色粉笔写了：

WELCOME TO OUR KINDERGARTEN

七十年代中、后期，外语系有许多老师住在河南宿舍。故我时常找机会前去拜访一些同事。记得在孩子上幼儿园期间，有那么几次因自己临时分不开身赶去幼儿园把孩子接回来。只好委托家住在河南宿舍的庄老师把孩子先接到他家，我们在晚饭后才前去把她领回。我的小孩小时候颇为腼腆，但是却很喜欢去他们家玩，所以托他们临时代管一下我心里十分踏实。回忆起这些难忘的经历，我依然感到有股暖流缓缓涌上心头。每当回想起当年同事之间的情谊，左邻右舍的相互照应，居住在杭大校内第二幢教工宿舍的外语系教师，相互帮衬，不分彼此的那种情分，令人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往昔的日子。

我的河南宿舍的记忆还包括自己曾经在那里上班的经历。事情是这样的：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外语系几位老师，受译林出版社的委托，为该社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英译中文学翻译比赛担任初审评委会评委。记得这个评委会由五人组成。评委会组长由外语系馮昭筠教授担任。组员四人是由译林出版社出面邀请的。四人包括宋兆霖老师（浙江大学）和杭大外语系另外三位老师，他们是朱炯強老师，郭建中老师和我本人。我们四人，即浙大宋老师和我们三人之所以被选入评委会，是因为我们当时都是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分会的会员。我们被吸收加入作协分会是因为我们当时都已至少有两部长篇文学作品由省级以上出版社正式出版，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学翻译工作当时已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我们评委会的任务，是从几千多名参赛人员中选出 50 名优胜者。我们将这 50 名优胜者推荐给译林出版社组织的终审委员会。再由终审委员会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等奖以及鼓励奖各若干名。由于这项评选工作不在杭州大学工作范围之内，因而无法要求外语系安排工作场所。经过讨论，冯先生十分慷慨，把自家的客厅腾出来，让我们几个人下午到那里阅卷。我们在那里每天下午从一点工作到五点半。我们的评选工作第一步是淘汰那些不合格的作品。评选标准则是沿用文学翻译界普遍采用的三大标准：信、达、雅。初评工作历时三个星期之久。也就是说我们在冯先生家里叨扰了他整整十五个下午。

杭大河南宿舍在我心中留下了颇深的记忆。尽管我现在身处异乡，离开杭大已长达三十三年之久，有时仍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在杭州大学，在外语系度过的那些时日，其中也包括孩子们在河南宿舍的幼儿园所度过的幸福童年。

（2021 年 9 月 24 日）

[返回目录](#)

第八章：荟萃

杭大 1990，离歌 1990

—杭州大学中文系 91 级 朱瑾



这里的 1990 是指上世纪 90 年代，如果你也是那个年代在杭大读书的，那我们穿过了时空在此相见。

换二十多年前，在杭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想到自己会在二十多年后写关于杭大的回忆，肯定要遭到自己和飞来峰文学社同好们的嘲笑。

那个时候我们崇尚创作，能写小说才是牛逼的。如今写小说变成了说大书，穿越盗墓宫斗，争奇斗妍。可当我开始回忆的时候，才发现手中的牌是那么的少。不要说同花顺，连一个炸都没有。所以我定义那个年代为大师远去的时代，大师远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想要读书做学问的都成了学校里的孤儿，只能看大师留下的等身著作了，当遗书看。

亲炙和看书区别大了。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和下面听课的一帮青年才俊们说：诸位顿悟能力高，离开和我的见面和谈话，就平下去了。——没有木心的亲炙，陈丹青还是今天的陈丹青吗，不好说。

如丧考妣。不过那个时候还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傻呵呵地交友联谊，游山玩水，十二年寒窗结束了，再不放纵就老了。

一、杭大周边

九十年代的杭大其实算不得很大，北面文三路南面天目山路，东面保俶路，三条路这么一夹，西面还是农田，就是杭大了。不过我们真正活动范围的杭大要像水墨画那样从校园涸出来那么一点，北面包括文三路往东快靠近莫干山路的中磁会堂。

杭大那时没什么会议中心的配置，印象中比较高级的全校会议都在中磁开。有一年还在那里连映了三天的国外原版无字幕内部观摩片，就是有露点的那种，宽银幕。外语系直接在前面打手电看小纸条口译，中文系哲学系还有什么系的在后面观摩，轰动极了。一天三部，看到吐，虚脱，累。然后第二天开始就有人在文三北门十五块钱一张收票，才知道这是文科生才有的免费特权，有人卖，也有很多人宁肯作废也不卖，怕毒害理科生。

从中磁会堂看了电影散场回来，走到保俶路口，那时的水流像溪，比今天的沟要宽许多。贴着校园围墙开着一家月光书店，树荫蔽日，月光自然也看不到。在店里淘书，可以听流水潺潺，斜对面来师傅的饺子负有盛名。再往回走，北门正对面是一家黑池舞厅，楼上录像厅，包办了我们的夜生活。没钱跳舞看片，剩下的就只有轧马路了，经过生物系，一望无际的农田。

我现在还是对文三西路比较模糊，因为那个时候走到这里就是断头路了。《晋书》中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都觉得他太过敏感，我们每晚走到文三断头路会向着穷途末路发出野兽般的嚎叫，然后兴尽而返。也就文三路，文二路文一路比现在的文三西路还要模糊。只记得有个兄弟失恋，陪他走这几条路走过一晚，听他说了一路的忏悔，回到寝室身心俱疲，四年里再也没有走第二回的冲动和机会了。

第二天侵早，从学校北面跑到南门，顺着杭大路跑一段，到西溪路打卡，再跑回来，至少大一是如此，被锻炼身体。女生从南门以东的宿舍跑到那里基本只是男生三分之一的路程，这个跑步路线设计真是没啥说的，太过完美。每班的体育委员拿一个私刻章六点以后在那里等待着衣衫不整的男男女女上前盖戳，我也曾经做过盖章这样的事，掌握了不少女生的卡片。

杭大的校园有时就像一个迷宫，随着你的心情变大变小，有时甚至会迷失其中，真是很奇怪的事。

想象没有BP机和手机的节日，你和一个女生约好去中磁看电影。结果去女生宿舍找她的时候，同寝室的女生说她和男生出去了；当你踉踉跄跄由南到北走到寝室时，同寝室的男生又和你说有一个女生来找过你，听说你和女生出去了，就走了。你想破头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不算很大的校园里有这样的错失。

天意的小捉弄很让人有些沮丧，也让人产生了一丝莫名的倔强，不想再互相寻找了，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寝室等待，结果可想而知。后来碰到了，两人也不想解释发生了什么，从此僵了，直到毕业很多年后才把这个梗当作笑话来讲，是12月24日的夜和杭大校园一起策划了这个残忍可笑的情人劫。

二、聆听大师讲课

杭大南面的范围只到西溪路，不再下去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溪路莫干山路中间就是河南新村即杭大新村，大师们都住在那个地方。西溪路像一条弯弯长长的手臂，把大师们的住所妥妥地揽在自己的怀里。

有一天，在阶梯教室，听说一位中文系的大先生要给我们讲始业教育。我和同寝室的晚到了，坐在后面，看到大先生果然是大先生，块头很大，和我们印象中仙风道骨，长髯过膝的大师想象相差很远。大先生干脆连胡子也没有，脸庞方正，面皮白净，倒像是一个工厂的

厂长或体面的车间主任。已经忘记当时他穿的是什么，总之比较普通，没有什么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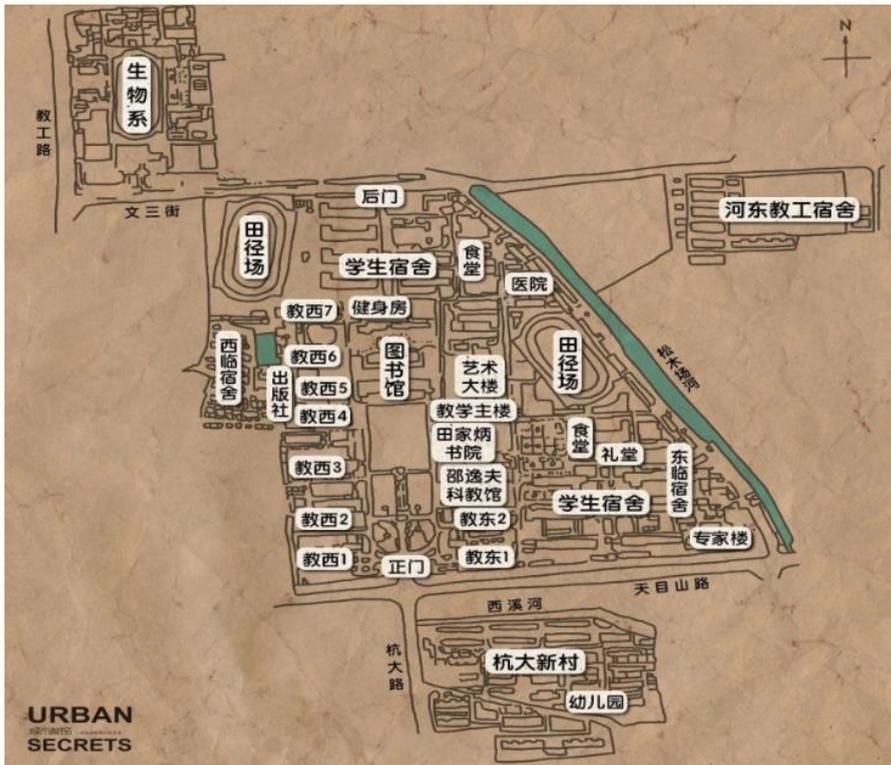
大家一开始还叽叽喳喳的，大先生一说话，声若洪钟，坐在后面都听得一清二楚，会场自然就静下来了。大先生讲了两点，我一直都记着，一是中文系的系训：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句空；二是读书不求甚解，先能够整本读下来再说，待以后有机会了再慢慢消化。

后面两年就再没见过这位大先生——吴熊和了，先生年届高龄，只能带博士生了。直到大四的时候，看了他的《唐宋词通论》，才明白他在始业教育上跟我们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光是这本四百多页的专著，做得密不透风，滴水不漏，无一字无一句无来历。做学问真是可以这样的，以前这样的事只会当作传奇来听，现在忽然见到真神，还真有点不适应。毕业处理图书，我专门在中文系别的寝室里捡到了一本《唐宋词通论》，如获至宝；还将课本朱东润先生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配齐了两套当作遗产带回家。

吴熊和先生的始业教育是在东一的阶梯教室里讲的，从此我有一个把大师和阶梯教室联系起来的奇怪联想。



老杭大外语楼阶梯教室 图自©城秘特邀插画家 夏超



杭大校园的格局是分东西两列，东一中文系，东二东三这样下去；西一西二西三也是一样，中间是一路草木最高楼，杭大图书馆。

东一和西一都有那种超大的阶梯教室，比较适合大师的气场。一般能在大教室里讲的基本可以算是大师了，看那纵横捭阖的气势，旁若无人的神情，举重若轻的讲演，面对黑压压的人群，颇有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凌云志气，这才是大师风范啊。这样的讲演我印象深的有两场：

一场是哲学系主任陈村富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好像在西一的大阶梯教室里。陈村富，当时哲学系的人称他老陈，好像都很喜欢他。因为说老陈不只学问好，还能让哲学系的老师们日子过得滋润。前一点好理解，后面这个就不太了解。据说老陈将两希文化（希腊希伯莱文化）作为哲学系的研究重点，争取了不少国际学术基金和科研课题经费，哲学系的生活就好起来了，比中文历史都要好。

我们也是道听途说，只是觉得搞文科还是个搞哲学的能活得那么好，太天方夜谭了，和中文系说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是不一样的境界。说起来也只能是希腊哲学的祖师爷泰勒斯能做到的事。传说他为了证明哲学家也是能赚钱的，知道那年雅典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村所有榨橄榄的机器，乘机抬价狠狠赚了一笔。不过榨橄榄机和哲学没半毛钱的关系，老陈的两希文化本来就是西方文明哲学之源，既研究了学问又把钱赚了，比泰勒斯成功多了。

所以我们都把老陈作为完美人生的楷模，早早地去抢座听他的演讲，整体来说老陈的长相风度都没有让我们失望，不过我也就记住他的第一句话，二十世纪哲学是从尼采开始的。

余式厚教授是哪个系的我已经忘记。大专辩论赛纷起那阵子读过他的《趣味逻辑学》，大为折服。听说他也在大阶梯教室讲座，抱着追星的狂喜就去了。记得讲的是幽默，最后和听众互动，说你们说说看身边感觉幽默的事。有几个人讲了，我也举手讲家里蟑螂为患，有一天我终于逮着个大的，一脚踩死，叫母亲来看。母亲看了一惊，踩了跺脚说，可惜了，可惜了，这么大一只蟑螂！

我讲完了全场鸦雀无声，只有余式厚老师鼓起掌来说，嗯，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幽默的一个段子，为什么？一是原创，不是哪里看来的；二是有生活气息；三是有幽默感，虽然很冷。谢谢这位同学和我们分享。

散场回到寝室大家都说我交狗屎运了，获得了大师的首肯。我说你们不知道，余大师听过的段子太多了，我这个虽然不咋样，可对他肯定是最新鲜的，不是吗？这也算是投其所好了。

有老人家故世，大人会和小孩子说，你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小孩子对死亡这件事是懵里懵懂的，要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一辈的离去对他意味着什么，大师远去的情形也有点像这个。

三、小时不识月

我1991年考大学，第一志愿不是中文，是外语系。因为觉得文科里面只有法律和外语才有点技术含量，其他的都是扯淡。当然后面的

事实教育我说，少年往往会有很多不成熟的浅见。不过，也许那一年抱有我这个想法的人很多，杭大法律和外语系的录取分数线超高，所以我就被调剂到中文系了。后来发现被调剂到中文系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可见当年中文系生源的基本情况。

开学不久，以前杭高的两个女同学约我去看文科班的语文宋珊苞老师。她们总分和外语单科都比我高，考上了杭大外语系。虽说自己有点自惭形秽，还是在一天饭后硬着头皮去了学校南门斜对面的河南新村，距离近也是成行的一个主要原因。

河南新村靠杭大路的街面以前开了一家超大的杭州书林书店，在那个时代多是受鲁迅作品影响的后生，窃书不算偷，书店贴了很多小纸条横幅来震慑想要顺手牵羊的莘莘学子。如果在今天一个探头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总之，感觉店老板不是太友好，也许是被偷怕了吧。

我们进了宋老师家的客厅，大而且气派。一个老头在那里穿着背心牛头短裤，摇着一把大蒲扇，在看电视新闻。宋老师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家的老先生。脸孔红通通的老先生气色很好，向我们颌了颌首就继续看电视了。我们在客厅一个拐角处和宋老师话旧，宋老师开口就低声地对我们说，我们家老先生就这个脾气，一点也不讲究的，我和他说了好多次，哪怕有女同学上门他也是这样我行我素，没办法。语气半嗔半笑。

宋老师在杭高最后教了我一年，关系不算是很深，但我知道她是一个讲究面子和仪表的老师，天天都会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体面，不过杭高的女老师基本都这样，为人师表为人师表，不是应该的吗？只有个别的男老师有时胡子拉碴的会来上课，受学生们的诟笑，这条定律到了大学就不适用了吗？宋老师特别问我，听说你是中文系的？我说是啊。宋老师暗暗地指了一下那个《水浒传》里不修边幅的老先生说，我们家这位也是中文系的，姓徐。见我没搭语，宋老师也不往下讲了，就和两个女同学寒暄了。

临走前，我们三个经过徐老先生身边，老先生歪了头问我们是哪个系的，我们都说了。他点了点头说，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我电视只看新闻不看别的。后面这句像是自辩，我们频频点头，心里想这还用说，高中政治课老师早讲过了，如果不了解新闻，高考就要吃亏的。



徐朔方先生，杭大中文系教授。

2000年左右，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在大陆出版，这人是汉奸没错，但他的文字能迷倒张爱玲，更别说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了。里面胡兰成在温州永嘉避难化名张嘉仪时有和夏承焘与徐步奎先生交往的描写，把二十多岁的徐先生写得极好。说在同事里和他相处最好，心思干净，聪明清新，有点像张爱玲。志气清坚，光阴没有一寸是雾数糟蹋的。还听他唱“游园惊梦”袅晴丝，徐先生年轻时大概皮肤白皙，胡说他在灯下唱戏，如满放的花。总之，在胡兰成的眼里，凡徐先生的都成为好。世上张爱玲第一，徐步奎就是第二了。后来为了这个，多年以后，徐先生还专门写了他和张嘉仪的交往，说当初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大汉奸，“不禁让我大吃一惊”，有点像他那天为自己看电视自辩的意思。

如果2000年以后读了《今生今世》的我再去宋老师家，那我肯定不会和宋老师聊天，我会和坐在客厅里的徐先生聊一聊张嘉仪的事，看看还有什么没写到公开发表文章里的内幕，可是这已经不可能了，宋老师后来生了绝症，我和当初的女同学又去看了她一次。

那是一个午后，老师在家里剥莲子一样的东西，说这个对身体好。我们只坐了一小会儿就在老师的劝说下离开了，我们好像知道这应该是最后一面了，直到听说她在2001年去世。那天，客厅里的老先生不在，有事出去了，留下空空荡荡的房间，只是宋老师瘦瘦小小的一个人在那里。



如今的河南新村（杭大新村）

若干年以后，我在报社工作时，和我同龄的一个拍卖行老板把故宫博物馆的研究员史树青请来杭州鉴宝，结果那个老板陪他逛今天已经拆迁的岳王路花鸟市场，走了两三摊就走不动了。那些个摊主层层把史老先生围住，让他看看自己卖的东西是真是假，其实很多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的。然后拍行老板说明天都去人民大会堂，一件五十块鉴宝费。老板不赚这个钱，把这些悉数给了史老先生和他五十多岁的继室。他和我说老先生在岳王路让他花三百块钱买了一个石头疙瘩就让他赚翻了，据说是北宋苏东坡时期的砚台。

刚好我要去北京采访，拍行老板托我路上照顾一下年近八旬的史老先生。老先生在万米高空上和我说，小朱啊，有没有印章啊？我一个做新闻的哪有这玩意儿，便说没有。老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一个文化人怎么可以没有印章？这世上只有两个人治得一方好印，吴昌硕可以算是一个，如今的刘江呢只能算半个，不过如果你能得到他的印章也是世间难求了。

我认真地看了老爷子一眼，他说吴昌硕刘江的口气就好像这些死了的活着的大家都是他家的邻居发小。去了北京我才知道老爷子真正的家其实在故宫，虽然他住在魏公村。他告别时和我说，小朱，去故

宫吗？报我的名字就直接进去好了。我说万一您老不在呢？老爷子笑了，在和不在，报我名字，都一样的。

然后和徐先生的桥段一样，过了几年我看到了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才知道史老先生年轻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沈从文做了几年的同事和晚辈。里面有很多回忆的文字。唉，早知如此，我还去什么故宫呢，聊天直奔沈从文先生就好了。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可是看过全套十六本沈从文文集的，绝对的粉。

所以，星星要照到你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远去的大师就是星星一样的存在，如果你埋头日常不仰望星空，还是注定会和他们错过。

四、老师们的开关

大师如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大师的弟子就如同灯，按时上课，你就能遇见，不过，如果你不知道开关在哪里，还是白搭。

比如有一位古文字的老师叫俞忠鑫，他的开关是半部康熙字典。说自己年轻时全国上下搞运动无书可看，不知从哪儿捡到半部字典逐字研究，后来高考恢复就上榜了。都说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也是夸张；可俞老师的半部康熙治学问我是亲眼得见，不由得你佩服。

我还依稀记得俞老师带我们去杭大最高楼参观书库的情形，白色



的图书馆在杭大就是一个中央地标。很多人晚上会去那里抢位子做作业，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三楼以上甚至到了七八楼以上都藏着些什么。俞老师带我们去看中文

系的藏书，白天去的，最上面没有电梯，走消防通道的楼梯，朝圣的心情。

一个班的学生鱼贯而上，前面就有好事者从长长窄窄的窗户里东张西望，一览无余，看到下面有男女在草树丛中卿卿我我，于是怪叫起来。下面的人知晓了，用手指向上面作了一个动作，然后大声回应：渴死你们。上面的也不恼，哄然大笑，应了当年的一个夸张的说法：杭大的每根草儿下面都藏着一对情侣，空气中满是荷尔蒙的味道。

1. 陈东辉老师他的开关是书。

我在中文系“知了书屋”当店小二那会儿，陈老师老到这里来找新书和特价书看。作为回报，他会和我讲点学术界的八卦，煞有其事的样子是书店前面一道不变的风光。“知了书屋”是一个铁皮亭，开在食堂和女生宿舍中间，奇怪的是来这里的男生比女生还多，一小半是来买书，一大半是来约会泡妞的。据说有一个中文系的诗人，毕业了还常在那一带出没，在一棵大樟树下无目的地寻找心中之爱，受到在读生们的普遍鄙视。

2. 蔡良骥老师的开关是电影。

他有一次给我们看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净化版，第二天又把被净化的部分放了一遍，让我们领会自然美人体美是怎么回事。这要是放在现在，极有可能被学生举报。事隔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天堂电影院》这部电影，我们亲切地叫之好马（良骥，好马也）的蔡老师早就用上这手了。蔡老师给我们上美学课放片的地点在东临，东一再往东，基本要到保俶路东门的围墙根了。东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周边有很多没有编号的楼房，还有一个泥地的篮球场。

3. 李咏吟老师的开关是一个“诚”字。

大学三年翘了不少课，到大四忽然觉得要回归课堂了，不然毕业了就没课可上了。身边同学为了实习找工作翘课，我反倒坐回到教室里，认真上起课来了。李师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刚开课他立下君子协定，爱来不来，他是不点名的。结果到了第二节课，只有我一个人来了，他看看我，我看看他，然后说你一个人，干脆到我屋里喝茶聊天去吧。



照片里右手边的矮房子，就是以前的青年教师宿舍，靠近松木场河边的校门。

然后我就去了他的青年教师宿舍，从上课的东面小教室到李师的宿舍其实不算太远，可是好像感觉走了大半天。暗暗的筒子楼里，师生两人品茗清谈了半日。毕竟大四了，我口吐莲花的功力又精进了不少，临走前我好心提醒他，还是得点名，不然下次又得来喝茶聊天了，

虽然这样也挺好。

4. 廖可斌先生的开关是“香烟”。

徐先生的弟子中有廖可斌先生，成了我的明代文学老师，湖南人，风流倜傥，不可方物，是女生眼中的男神。每次上课你别想抢到头三排，都是去看人的。不过时间一长，我就知道廖师的开关在哪里：香烟。

他烟瘾重，下课必到漆黑的走廊里抽上一袋烟过过瘾。走廊黑，是借了西面心理学系的楼上课。我们大一就被心理学系的小姐姐们带到这里一楼做过心理测试，还有小钱可以拿。说是心理测试，也就是看看色彩分辨图填填表格啥的。不过那个楼绿绿的，一般测试又是在晚上，总有点疹得慌。

听说有一个工业心理学大师陈立就是他们的系主任，有九十高龄了，感觉他住在心理系楼的塔尖里，不明觉厉，神秘莫测，从来也无缘得见。哪怕在这里的教室里上了廖师好久的课。



心理楼

我在课余间隙不失时机地给廖师递上一颗烟，或者一包，看要和他谈什么。有一次套近乎就和他谈，你的先生是徐朔方，我的先生是宋珊苞，那我们就是同门师兄弟了，考试你可要放我一马。他也就笑笑。

穷学生也没钱，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搞了一包开封硬壳，封面做得和中华完全一样，今天话讲是山寨得很成功。我在他眼前晃了晃，然后抽了一支给他，他点了火，也没说什么。我说今天这中华感觉如何？廖师说，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直到快上课了我忍不住给他看手上的烟，他像湖南人那样爽朗地大笑了起来。于是我把整包烟给他，也不值几个钱。

上课了，廖师作为回报就点我的名字回答问题，说弱水三千的弱水是什么意思？我那时满脑子的萨特加缪存在主义，哪里知道弱水是什么？廖师也不以为意，说弱水就是一根羽毛也不能浮起来的河流。我倒是觉得挺有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于是课后和廖师说，马尔克斯说拉美有两条河流一条是倒流的，一条是沸腾的，和弱水也是差不多的。廖师不置可否，不过看得出来，他是喜欢的。所以年终大考最

后一题，汤显祖牡丹亭的读后感，我就把杜丽娘柳梦梅和萨特的生死之墙扯在一起胡诌了一通，得了高分。现在想想，真是汗颜。可见老师对我们有多宽容。

后来知道廖师的一些八卦，说他家里的夫人是湘西女子，长得和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一样，去过他家的人都这么说。我们也没见过翠翠到底长啥样，只是一个文学想像，可是应该想得出廖夫人有点黑，小个子，很俊。

5. 黄征老师

黄征和廖师年纪好像差不多，可是脾气性格完全不同。黄征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有些人是装的，他是来真的。我从来没看过他生气，或者讲一句重的话。只是讲归讲，听归听，大家自便。

他研究的是敦煌学，讲变文什么的。说自己去过欧洲博物馆用微缩相机拍写卷回来研究，我问过他之前做什么？他说研究鲁迅。我心里说气质不对啊。接着他也慢悠悠地说，后来我发现鲁迅研究的文章已经太多了，都写完了，很难有突破了，敦煌学是新材料，可以做出自己的东西来。也不知道是黄征成就了敦煌学还是敦煌学成就了他，看他处世不惊的那份超然，真是从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来的。

前几年我才首次造访敦煌莫高窟，看那间没有咱家卧室大的一间小屋，居然产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敦煌学，不由回想起黄征老师和我们说过的王道士斯坦因故事，说过的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心想他选择敦煌学肯定也不完全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吧。

6. 方一新老师

中文系当时的中青年后起之秀里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人物。允许我也夹点私货，点一下班主任方一新的名字。

研究中古汉语的方一新和他夫人王云路温柔敦厚得像是白雪公主森林里的两个小矮人，整个人仿佛透明。我从来不敢用调侃的语气和方老师说话，因为他会当真，然后和你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在这样

的老师面前装高明一点都不好玩。他们一脸诚恳不谙世事的表情马上会让你缴械，老实说话，老实做事，才是正经。

7. 余荇先生

难道就没有对自己打击很大的老师？有。余荇先生。

我从小学到中学高中都是在语文老师的喜欢里长大的，可是余荇老师教写作却不喜我的文章。听说他是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我想自己的高考作文还好没在他手上过，不然，杭大也考不上了。他的否定对我的打击很大，过了好几年我才慢慢缓过劲来。

记得上课时讲《诗经·蒹葭》在水一方，有同学举了卡夫卡城堡的例子，说也是求而不得不能抵达的意思，余荇老师予以激赏。我们这些受鲁迅全集熏陶的孩子都愣了，课后开始恶补卡夫卡、米兰·昆德拉，一国一国的文学在晚上的西二阶梯教室里扫雷似地排看过去，轻易不敢落笔写什么东西了。

写作上了一年结束，与余师相忘于江湖。直到很久以后的一天，系里的钱诚一老师找到我说余荇老师要搬家了，你叫两个人来帮帮忙怎么样？我于是就去了，记忆中全是书，搬了大半天，从学校南面的教师宿舍搬到杭大新村，也就一炮仗路，来回好几趟。

每年迎接新来的女生都是骑着三轮车走这条短短的路，都不想驮男生，因为那意味着要从天目山路的南门穿过整个杭大到北门的宿舍。男生比女生要重好多，行李比男生又要重好多，路上备感辛苦。于是让男生把行李放三轮车上，人肉就跑在后面跟着。女生宿舍路短情长，有时连行李女生爸妈全部拉上也就五分钟的车程，何乐而不为？帮老师搬家更是义不容辞了。

事后余老师要给我五十块钱，我推开就走。第二天，钱老师说你不收钱余老师过意不去，他拿了三本书送你作个纪念吧，我就收下了，全是鉴赏辞典一类的大部头。很多年以后我才对自己的写作有了一点信心，知耻而后进，不是余荇老师的打击，也许我也不会去拼命读世界文学吧。

8. 任平老师

中青年老师们是怎么看待前辈大师的？我的书法老师任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是中国硬笔书法特等奖的获得者。我父亲，七十年代杭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大学生，杭钢上班空闲的时候老拿一枝弯头钢笔在那里临他的作品。考上大学见着任师了，才发现年纪还远没父亲大呢，可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有一次他带我们去参观一处碑林，有一个硕大的龍字，惊叹之余我就问任师，这是沙老几岁写的？他刚在和别的同学介绍，斜着头就瞪了我一眼，反问我，几岁？能这么问大师的年龄吗？真是....他又把头转过去，不理睬我了。我就知道大师在老师心目中的份量，这份敬重甚至让我感觉有些生畏和不好意思。

五、星散夜空

然而，杭大消失后，大师们终究还是离我们渐行渐远了，星散夜空。

毕业了，没有考研，选择去混社会了。我怀念那个大师像太阳一样照耀后生的年代；像灯光一样点亮黑暗的年代，那真是一个万物生长最好的时光啊。

现在呢，我们只能在星光漫天的夜里走走停停了，虽然我们也不会因此自怜自艾，但总觉得缺少了那么一点儿心气——那种根苗从土壤里拔地而起的“源始”力量，亲聆教诲言传身教才得以传承的浩然之气。

所以我怀念大师们层出不穷的年代，我怀念那个我从未有过的时代，我甚至怀念所有素未谋面的大师。

我，怀念，他们。

（原载《城市秘密》2020年6月14日）

[返回目录](#)

杭大，我的家

—杭州大学数学系 78 级 谢作涵

和众多 77 级、78 级校友不同的是，杭州大学留给我的记忆不仅仅是那 4 年的大学生活，它还是我的家。它伴随着我的童年、青年、中年直至如今。那是一份永远抹不去的回忆和眷恋，不思量，自难忘。

我是杭大子弟，父亲谢瑞淡原是杭大政治系（后改为经济系）教授。从我记事开始到 1978 年考入杭大数学系，杭大 10 幢 2 楼 210、213 南北两间房就一直是我的家。昔日的 10 幢还居住着不少当时的年轻教师，其中以数学系居多，如孙达传、郭孝英、童志通、谢秉章、纪鸿德等老师都是我的左邻右舍，还有一些像施咸亮、王传国等数学系的老师则是父亲的围棋棋友，经常来我家和父亲对弈手谈。

那时候的筒子楼，厨房就在走廊上，各家都敞开着房门，关系特别融洽。我从小屁孩开始就一直叫邻居的老师叔叔、阿姨，直到大学上课时还改不了口，常常引起同学的诧异。

当年从杭大的南门进来，两旁是对称的大飞檐教学楼。东门一带是食堂、体育馆和操场，东南角和北面散落着风格一样的 10 幢三层宿舍楼。20 世纪 60 年代建造的 9 层图书馆是当时杭州的最高建筑，北面就是一大片水稻田。

校园里还有两个小湖泊、一个打靶场，犹如一个乡间田园。我常常到渠里抓鱼，墙角边捉蚰蚰，大樟树下打鸟，操场上看露天电影，其乐无穷。我在杭师附小（现学军小学）读小学，在杭大附中（现学军中学）读中学，1978 年进杭大数学系。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当年高考的事。1972 年我高中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杭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木工车间当学徒。当年的一汽运是杭州运输界的龙头企业，那个年头能进国营企业当个工人还挺牛。进厂时我还没有完全发育，身高只有 1.65 米左右，瘦瘦的。我师傅 57 岁，是厂里技术最好的老师傅。我是他的关门弟子，上面还有 5 个师兄。作为小徒弟、小师弟，早上我必须早到半小时，把师傅、师兄的

茶水泡好，刨子、斧头等刀具在磨刀石上磨快，锯子的锯锋用锉刀锉利。

70年代的大卡车，后面的车斗都是木制的，有的卡车驾驶室也是木头外面包了层铁皮。一般两三年车子大修时，就要重新打造车斗或修理驾驶室。当学徒的三年，我就是干着这又重又累的大木匠活。到学徒期满，我已经能独立完成包括车斗新造、驾驶室修理在内的所有木工活。

记得满师第一年，金工车间要新增一台金刚镗床，厂里不知道从哪里淘来一套废弃的金刚镗床铸件的木模和几十张蓝图，卸到木工车间后问：“谁能修复这套木模？”车间的师兄及工友面面相觑，无人应答。厂长看着我说：“小谢是高中毕业生，这个活就交给你了！”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我在众目睽睽下接下了这个活。其实当时我也不会看图，幸亏那时厂里一个北航毕业的大学生与我住同一宿舍。在他的指导下，经过连续几个晚上熬夜研究，我看懂了图纸。两个月后，我交出了整修一新的全套铸件木模，顺利地浇筑出了金刚镗床的所有铸件。由此，我的大号“木匠小鲁班”也在厂里叫响。凭借这“一技之长”，厂里把我调到翻砂车间，专门做木模。这让我离开了重活。每天看图做一些小铸件的木模轻松多了，我为此得意了好长一段时间。

到了1977年，还住在筒子楼的我最早获悉恢复高考的信息。那年的我毫无准备，在父亲及左邻右舍老师的“撩动”下，稀里糊涂地报名参加了，居然稀里糊涂地通过了初试，但在复试中，什么都不会的我也理所当然地名落孙山。说真的，也许是因为我打小就住在杭大校园内，校园生活对我没有太大的诱惑。再说那个时候我也已经满师，又在国营企业工作，每个月30多元的工资花着也挺潇洒，并没有其他校友那种考大学的迫切心情。要不是第二年的一次事故，也许这辈子我与大学就无缘了。

那是1978年3月的一天，春寒料峭的杭城特别冷。早上磨刀具的水池里还有层薄冰，其他车间可以有火炉取暖，我的木模小板房内为防火不准有炉子。那天碰上有台车子“羊角”（卡车前桥铸铁转向臂）

断了，需要做一个模具翻铸，我拿着斧子在一块木料上劈砍粗取胚样，因为寒冷，手感到麻木僵硬，抡起的斧子突然失控砍到了踩在木料上的左脚背上，锋利的斧刃砍破我脚上的劳保工靴，在脚背上砍出 5 公分长深可见骨的大裂口。到医院处理完毕，医生开了 3 个月的病假，回家养伤。这年我 24 岁，已工作了 6 年。

回到家中，按医嘱不能下地，我实在无聊，突然冒出了再考一次高考的念头，于是便向考入大学的同学要来了一套数理化的自学丛书，开始了复习。当年我虽说也是高中毕业，但由于处在“文革”中，说实在的，也真没好好学习，尤其是数理化，底子特别差。幸运的是，我有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不出家门，不去高复班，左邻右舍有的是数理化的辅导老师。我记忆特别深刻和要感谢的是我家隔壁的孙达传教授，每当我有不懂的地方时，只要叫一声，他都会来我床前不厌其烦地给我解惑。哪怕是物理、化学上的问题，孙教授也能给我一一道来，并一再给我鼓气，帮我树立信心。就这样，在养伤的几个月中，我临阵磨枪填鸭式地恶补。到了 7 月 20 日，我又一次走进了高考考场。这一次我虽然不是踌躇满志但至少是有备而来，所以五门课考下来，也没觉得哪门特别好或哪门特别差，反正是按照邻居老师的叮嘱，会做的不会做的都写了，不留空白。

高考结束后，我的脚伤也痊愈了。我又回到厂里的木工小屋做朝八晚五的小木匠。没多久，分数下来了，总分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 340 分多吧，但数学是最高的，考了 76 分。当时这档分数杭大理科专业都能进了。左邻右舍的老师说，既然数学考得最好就进数学系吧！于是，我就填报了杭大数学系。报到的那天，袋里揣着通知书，我空着双手走到大门口，不用分配宿舍，不用太多手续，同班同学宿舍是 9 幢，我家在 10 幢。由此我开启了校园里的走读生活，并按国家规定，工作满 5 年的我可以带薪读书。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40 年后，当校友们都在感叹离开学校久矣，我的生活还在这里。每每漫步于杭大校园，看着那些似曾相识又面目全非的建筑和景物时，追忆起这大半辈子亦家亦校的往事，感慨万千，不胜唏嘘。杭大，我的母校，我永远的家。

特殊的年代 永恒的情谊

——与 1970 级俄语专业同学相处的点滴记录和回忆

——杭州大学外语系老师 许高渝

计划招生

1970 年 7 月，学校送别了文革前招收的最后两届（即 1969 届和 1970 届）毕业学生后，把当年秋季招生作为学校开展教育革命的主要工作之一。8 月 12 日，学校向省里提交了关于一九七〇年下半年招生工作请示报告（校工、革[70]032 号），提出下半年招收师范普通班新生 1010 名。分配给外语系的名额为 170 名，其中俄语 20 名（嘉兴 3 名，金华 3 名，杭州、绍兴、宁波、台州、丽水、温州和舟山各为 2 名）。在请示报告的附件“各系培养目标”中，要求外语系学生以学外语为主，兼学中文，毕业后既能教中学外语，又能教中学语文。一个多月后的 9 月 15 日，省里正式下达了招生（试点）学员名额，因新加了海军学员，故俄语新生名额增加到 30 名。之后，又增加陆军俄语学员 10 名。

迎新准备

为了迎接新生的到来，学校要求各系迅速制订教学大纲，并准备好上课使用的教材。我在外语系领导的安排下，参加俄语教材大纲的制订和教材编写等准备工作。每天的工作十分忙碌。

在我 10 月中下旬的记录里，有两天是这样安排的：

“一早就回到学校里开介绍信，准备到本市一些中学去征求他们对我们编写外语教材大纲的意见，我和外专的同志组成一个组，先后到军区、反修中学、四中、机床厂五七学校进行调查。四中因为昨天开了运动会，今天休息，所以明后天还得再去一趟”。

“编教材的任务很繁重，白天劳动，晚上讨论到九点多。讨论时很有意思，大家各抒己见，争辩得面红耳赤，一次不行，就推倒再来，

每一篇教材都要搞上好几次，到现在为止，一课教材都没有落实。不过，新型的教材也只有有这样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产生。”

进入 11 月份后，我们在继续编写教材的同时还为迎接新同学的到来做各种准备。

“开了一天大会，上午是学军中学一个指导员（姓王）的长篇报告（三个多小时）。虽长，很精彩，也很风趣，听了以后有启发；下午，学校革委会高培明副主任传达省教育革命组经验交流会的精神，主要是为迎接新学员做准备。”（11 月 2 日记录）

“最近，我们教师也更忙了，要出宣传栏，搞大批判，接待工作，环境布置，更多的工作是编写教材，下个星期还要到中学听课，取经，成立党支部，我这几天一直在外面跑，一是联系下星期去本市先进的中学听课，二是去军区、空五军、20 军，聘请工农兵讲师团。”（11 月 8 号家书摘录）

在新同学来到前，为了布置宣传栏，进行路线斗争教育，俄语组领导蒋忠全老师叫我负责一个班子写一篇我系的两条路线史的材料。系革委会宋阳主任则要我领一个小分队于湖州来的新生报到那天到余杭瓶窑去迎接步行来的工农兵学员。后来因为时间有冲突，最后未去瓶窑。

新生初到

根据学校的计划，11 月 13—15 日新同学到校报到，18 日参加省里欢迎大会，20 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后是三天的形势教育，一个星期的阶级教育，两个星期的路线教育，一个多星期的突出政治的教育和制订“四好”规划。外语系在形势教育之后决定于 11 月 25 日到市郊乔司 6515 部队完成其他三项教育，同时参加军训、开始部分的专业学习。我也随新同学去了那里，主要任务仍是编写教材。在去之前，我很想承担教学任务，所以得知我主要承担编教材的任务时，思想有所波动。我 11 月 21 日晨所记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思想和转变的过程：

“原来我认为和同学编在一起，应该多和同学多接触，多了解。前几天又听说，我并不去教书，而是编教材，思想上就松了下来，感到上课的同志，才应该多去走走，我的主要任务编好教材就是了。其实，现在新学员刚来，有许多情况要了解，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因此不管上不上课都应该和同学多接触。同时，编教材也决不能脱离同学的实际去编，否则又要走老路。再则，到同学中去，也是向他们学习的过程，决不能把自己当成单纯地去做他们的工作，所以从各方面看，都应该到同学中去。”

野营行军

1970年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11月24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

主席指示传达后，学校决定遵照主席指示安排师生分两批进行野营训练。第一批野营训练在1970年12月29日至1971年1月19日进行，历时22天，行程800余里。我们外语系属第二批，于2月8日到3月5日实行了野营训练，历时26天，途径余杭、临安、富阳、桐庐、建德、浦江、义乌、诸暨、萧山等九县，行程830里。

外语系师生为第一营，营长是工宣队胡锦涛队长，宋阳书记是营教导员，下分两个连，我们俄语班属一连，沈志跃师傅被任命为副连长（无连长），周宗复老师担任副指导员（无正指导员）。

在26天的野营训练中，我们听战史报告、搞了夜行军、急行军、传口令、紧急集合、防空疏散等战备训练；访问南堡、俞家大队等先进模范单位，参观富春江水电站；访贫问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整个营设立了“土广播站”和文宣队。一路上，边行军，边进行外语教学的实践，从野营训练第一天起，就开展了教学活动，用俄语学习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教导，这种边走边教，边走边学的形式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后来被写入了学校第二批野营训练总结《千里野营炼红心》中。

走路行军，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我在3月6日野营训练结束后的第二天的一封信中写道：“最后两天我们每天行军80里路，昨天当我们走过钱江大桥，重新踏上市区的柏油马路的时候，简直是难走极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有的同学脚上泡上加泡，最多的打了十几个泡，很多人都跳秧歌舞了，我还好没有起泡，只是脚底痛些”。

近一个月的野营训练的收获是满满的，包括思想的提高、意志的磨练、体力的增强等等诸多方面。通过野营训练，我和同学们同住、同吃，一起生活，一起参加参访、开会、讲用、劳动等各种活动，在行军过程中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增加了师生间的了解和友谊，这是26天的野营训练对我来说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收获。

教学感受

野营归来，我所在工农班的俄语教学从“流动课堂”转到了固定教室。当我站在讲台旁，手捧着和教学组其他老师一起编成的油印讲义，注视着同学们专心听讲，努力吸收新的知识的眼光，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我之所以特别兴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1963年8月大学毕业后即到浙江省党校集中培训，11月中旬起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时间长达两年多，到1965年11月才回到学校担任俄语助教工作。1966年初新学期开始后，担任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听力课。当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之后四年多无课可教。所以1971年3月教精读课，是我平生第一次。

诚然，在教学过程中，会产生许多需要不断解决的矛盾和困难，如课文思想性和俄语学习的深浅程度如何协调，学过俄语的同学和没有学过俄语同学的需求如何分别满足，学生课前课后的自学和老师的课堂讲授如何配合，同学间互帮互学如何组织和开展等等。但正是通过这些矛盾和困难的解决，使我的教学能力不断改进，教学水平不断提升。我自3月13日起，住到了同学宿舍，希望通过和同学朝夕相处以进一步了解同学的想法、要求。这是我从教以来第二次住进学生的寝室，第一次是文革尚未开始的1966年初。

我的努力受到同学们不断的鼓励、支持和配合。7月13日，我们三位下班任课的老师根据系领导的要求，参加了同学们“四好”初评工作。在经过三天的动员、学习环节后，于7月16日上午到班上讲用。我讲了为革命教书还是为教书而教书、改革教育和改造自己、在改造世界观上的主要矛盾等三个问题。当天下午，安排同学们投票评选，我因写教研组总结而未出席。事后得知，班上同学对我的教学和讲用给予了极好的评价。

虽然当时我是二班的任课老师，但因为海军班和陆军班的教室都离得不远，在课后休息时也会不时到部队班的教室走动，交谈。在教师们交流时，也了解到了部队学员学习的一些信息。

友谊永存

暑假期间，我作为第二批学员于8月17日起到学校设于安吉的“五七”干校学习、劳动。9月25日（星期六），我第一次轮到回杭休假，下午一回到学校校园，就去找老师和同学，结果发现大家都在听备战报告，一个人也没有见到。于是第二天星期日一早又到学校看望同学，先后到了男同学和女同学寝室，见到了鲁青、淑华、杨钊、小苗等许多同学。我们虽然离别时间不长，但大家都像久别后见到亲人那样激动。

1972年春，因招收第二届工农兵学员的工作需要，学校通知我提前结束干校学习，到绍兴地区参加招生。完成招生任务回校后，被系里安排到第二届工农兵学员的浙江班任教。虽然我未能再次和原来任教的二班同学相处在同一个课堂，但同学们刻苦学习的形象始终留存在我的心中。

1973年夏，二班同学们毕业后，我和他们都因忙于各自的工作只是偶尔巧遇或有零星联系。但每当听到同学们一星半点的消息，都会让我高兴几天。2015年春，我得知浙大俄语专业将在5月举行俄语校友联谊会换届大会，就把消息告诉了有关同学，徐永明、秦晓莺、李红鹰、卢成富同学于3月22日在永明家商量，希望乘这一机会尽可能把全班同学召集起来，举行毕业后的第一次聚会，那天我也受邀参加

讨论。后来，有 16 位同学（除前面提到的四位同学外，还有杨钊、保仁、仕兴、祖福、金花、鲁青、淑华、桂萼、春晖、晓红、赛花、春仙等 12 位）参加了 5 月 16 日的校友联谊会大会，次日，又在杭市公园举行班级聚会。在这两天的活动和聚会上，我见到了许多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同学，兴奋之情难以形容。2016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因头晕未来杭参加校友联谊会大会的余小牛同学邀请大家到他的家乡——淳安姜家镇聚会，12 位同学（其中有未参加 2015 年聚会的张国梅同学）和几位同学的家人参加，我有幸受邀参加了那次难忘的活动，并和仕兴同居一室。这次活动在小牛的精心安排下，内容丰富，收获很大。2018 年 9 月 11 日，外语系 73 届部分同学在杭州举行活动，再次见到了金花、赛花、淑华、永明、红鹰同学和海军班的永海同学、希峰同学，我们一起合影，聚谈，虽然时间短暂，但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一年多后的 2019 年 11 月 23 日，俄语专业举行成立 70 周年庆典活动，除大部分工农班同学参加外，未曾参加前几次活动的梅娇、金盈、希文、克云同学也出席了，看到多年未能有机会见面的他们，虽然因会务忙碌，未能和大家畅谈，但心中充满的喜悦之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今年，在我们的同学群里，又十分高兴地见到如曾、绍富、咸斌等同学，并通过微信和电话相互交谈。至此，还有几位我们大家的同届俄语同学尚未入群。借此机会，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让他们尽早加入到我们共同的朋友群中，和大家见面。

大千世界，人生相遇，纯属缘分。我能有机会和原本并不相识的同学们在 50 年前的杭州大学校园相见认识，并通过俄语的教授和学习，结缘成友，此实为我一生之大幸。真诚祝愿 50 年前我们共同种植的友谊之树常青！永远常青！

在我们同学中，小苗、春晖、建国和培阶同学不幸离世，我深深地怀念他们，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于我的心灵之中。

返回目录

那个时代我们这样交流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吕建明

我 1984 年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读书。那个时候，是一个物资短缺的年代，跟今天大学生应有尽有的现状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精神层面，则快速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匮乏到无限丰富的过程。那时候，通向世界的闸门刚刚打开，从欧美翻译的新书每天都会潮水般涌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去选择。我们的思想已经太饥饿了，几乎是什么新鲜看什么，逮到什么看什么，新华书店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图书馆。我们没有别的想法，社会也比较单纯，从来没想过未来还可以去做与中文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真心想做学问。老师也特别喜欢跟我们交流。大家经常到老师家里去讨论问题。我经常去两位老师家，一位是陈坚老师，一位是王林祥（王元骧）老师。吴秀明老师当时是我们班主任，住得离我们宿舍很近，我们也经常去他家。王林祥老师特别喜欢和我们争论，争论成为了一种学习方式，大家在争论过程中确实产生了很多火花。导致现在，虽然我已年过半百，想法还是特别多。

大学时代，我喜欢一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皮亚杰，他写的一本很小的小册子《发生认识论原理》，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我经常思考他研究儿童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发生的，又如何固定下来成为“范式”。我们一直说学校的教育目的不在于灌输了多少知识，现在知识的获取已经非常方便，能让学生创造一种“范式”，获得处理知识的最强大的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直到几十年后的一天黄昏，走到皮亚杰雕像之前，还突然觉得遇见了一位故人。

大学时代，还有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王林祥老师似乎对他不怎么感冒。我们进大学以前完全是一张白纸，所以看到弗洛伊德很新奇，特别喜欢。王老师是把马克思主义美学诠释得特别好的一位教授，我个人认为他是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第一人，把整个理论体系讲得非常圆满。特别是把“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

化”讲得出神入化。但是，对于“什么是人的本质力量”，他感觉我有些怀疑。

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睡懒觉的习惯，为了吃早饭上课就要迟到，不吃早饭连上三节课又饿得吃不消。王老师就经常和我们各种斗智斗勇，上课时只要我不在就点名。我上课的时候喜欢在笔记本上画小人，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也在我的笔记本上画画。我画长头发的，他就画光头，反正都是反着来，然后在画的旁边写一句：“弗洛伊德研究得怎么样？”。我们就这样结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师生关系。有一次我们几位同学课间溜出去吃早饭，被他发现了，他说要期中考试。考什么呢？什么都不考，就是把笔记本收上来，在笔记本上打分。我的笔记本是空白的，所以只能是零分。到了晚上，王老师来到我们寝室里。我正躺在上铺看书，王老师说，你不用下来，现在给你补考，用两个字来区分美和崇高。我答不上来，于是这次期中考试就真的成了零分。当然，这次特殊的期中考试没有记到最后的学期成绩里。那个时候的老师是非常开放的，把我们学生完全当作一个知心朋友一样来沟通。因为逆反心理的缘故，我看弗洛伊德的书非常的多。本科快毕业的时候，曾经想写关于弗洛伊德对当代中国文学影响的论文。那时候，确实不只我们大学生喜欢《梦的解析》，很多作家都受他的影响，写梦，写一些象征的东西。我有一次和陈坚老师讨论过这方面的话题。陈坚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而且特别善良的教授，给我的自由度很大。他认为现代文学的课程对我来说可能太简单了，允许我不来听课。文学界一直有关于曹禺剽窃的话题，有一次我偶然接触到，专门问陈坚老师借了两本内部印刷的参考资料，因为这让我想到了皮亚杰。五四以后，第一代白话文作家奉行拿来主义，有人说是抄袭。我想到皮亚杰关于儿童期的认知的研究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所帮助。当时的新文学运动，是一批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完全厌倦了传统的文学样式，对西方文学有一个生吞活剥的简单借鉴的阶段，这是一个发生认识的问题，有一个重新塑造“范式”的过程。陈老师听后鼓励我写这个。于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写了《曹禺的戏剧艺术思维》。陈坚老师把这篇文章拿给钱谷融教授看。钱教授看后说，这个方向很好，“是会引起轰

动的”，应该把它写下去。陈老师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把这个课题做下去。问题是我的英语很烂，我觉得可能考不上研究生。同时，工作对我吸引力很大。但是很多年，心里还想着写这本书，书名应该叫《中国新文学运动文艺思想探源》之类的，却一直没法动手了。后来，陈老师把这篇文章做了删节、修改和大量的完善补充，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

这个思维范式的研究一直影响了我此后三十年对社会和文化的认识。今天，我眼前有两条曲线。一条是三十年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变化的曲线，另一条是我们这些有人文底色的人，内心当中的一些冲动的轨迹。上大学时形成的思考与批判精神，融入我一生的人生价值中。

[返回目录](#)

祝贺中文系建立 100 周年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 慎海雄

母系各位师长学友：

你们好！

古人说“学贵得师，亦贵得友”。我在杭大中文系求学四年，遇到了一众好老师，结识了诸多好学友，实为人生大幸。一晃三十多年，至今引以为傲。

回望校园点点滴滴，于我最感珍贵的，不外乎三条：一为求实，二乃创新，三是包容。求实，就是为学之严谨、严密、严格，不大而化之，不随波逐流，更不搞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创新，就是鼓励学生海阔天空想、脚踏实地干。当年我创办《杭大学生报》时，不过是名大二学生。学校和系里，无不鼓励支持。包容，就是不求全、不责备。我在大学这四年，创新的事不少做，娄子也捅得不算少。中文系老师们乃至系总支，却如一片蓝天呵护了我，至今心存感激！

昨晚接到胡可先学长的信函，很感温暖。静夜回放在校的一幕幕，王元骧、徐步奎、蔡良骥、陈为良、郑择魁、邬武耀、张大芝、桑义麟、颜洽茂、陈坚、余荇、金健人、徐岱、何春晖、任芝瑛、潘一禾……历历在目，感恩之情涌动。

祝母校母系和诸位师长永葆青春活力！

（2020 年 12 月 4 日于出差途中）

【作者简介】慎海雄，浙江湖州人。1967 年生，1989 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辑。

[返回目录](#)

难忘西溪 ——半个世纪的记忆片断

—杭州大学中文系 61 级 洪定国

岁月蹉跎，往事如烟……半个世纪倏忽而过，当年西溪河下、道古桥畔共剪一窗烛的伙伴，或两鬓染霜，或黑顶尽谢，而今一朝故园重游，无不唏嘘再三。然而，任凭世事沧桑、光阴如梭，梦萦魂绕、挥之不去的却是这半个世纪的拳拳思念。啊，西溪，啊，杭大，我亲爱的母校！您可知道——我，一个年近古稀的您的儿子对您深深的依恋。尽管徜徉于如今浙大西溪校园的林荫、花径，遥想当年师友们的一颦一笑，不免使人颇感恍若隔世，然而半个世纪的记忆碎片此时也一一映上脑海，诉说不尽的是我对您的深情眷恋……

抢座

我在进校前，早听说中文系是“富农”，意思是说中文系师资超强，教授、副教授特多。这使我一个因家庭因素而背上“该生不宜录取”政审结论却意外被中文系录取的新生颇感几分安慰。当时的浙师院中文系的师资在全国真称得上凤毛麟角：既有原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之江大学的一批专家教授，又有 1952 年院系调整后陆续调来任教的不少学者名家，其中有被誉为“一代词宗”的唐宋词专家夏承焘、楚辞和古文字研究专家姜亮夫、先秦散文专家王驾吾、明清小说专家胡士莹、古典文学与书画名家陆维钊、著名外国文学教授孙席珍以及蒋礼鸿、徐朔方、刘操南、钱南扬、蒋祖怡等一大群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而且正值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刚结束，上面一声号令，专家教授全部上课堂讲课，谁敢不从？这就好了我们这一届新生，系里所有顶尖的学者教授全部给我们开了课。187 个同学在 201 大教室场场爆满，每天听课都要提前到大教室抢座位。

这天上午正好是夏承焘先生讲宋词，又是讲我最敬佩的苏轼的豪放词。我早早来到大教室，不料比我来得早的比比皆是；好不容易看

到二排左边角上还空着一个位子，我就把自己的笔记本放在桌面上，然后去洗手间。等我从洗手间回来，转眼功夫，一个面容姣好的温州女娃已坐在我占的那个座位，嘴里呜里哇啦说着我如听天书似的温州话。我只好装出绅士风度去后排寻座。在教室角落居然发现一张方凳，我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地到前排边上就座。不料那凳子是拐脚的，刚坐下去就歪了；我也不管，把破凳紧靠在边座上，两腿紧张却又全神贯注地听了夏老两小时的讲课，可心里是甜滋滋的。

右派“先生！”

进杭大不几天，我想给教我高三课的中学老师写写信，说说进大学的感慨，也表表我对老师的敬谢之意。信刚开了个头，一位考上浙大的中学老友从老和山下步行来道古桥 1 号宿舍看我。看到我在写信，说：“别写了，此信怕是不能寄过去了。”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高三的几位任课老师有三位被划为“右派”，一个是“现行反革命”，我要去信感谢的那位老师恰恰是“右派分子”，已被责令离校回原籍，即便信寄过去也无法收到，闹不好给我自己弄个“敌我不分、立场不稳”。我只好作罢，留下一个终生的遗憾。心里还想：这么好的老师，怎么都会成“右派”呢？那时，中文系反右运动刚结束，学生中也颇有几个出了名的“右派”。不知怎么的，我对他们不但没有恨，还觉得有几位颇有文才。嘴上当然是不敢说的。

一天下午，和一个同学有事去中文系办公室，在走廊上，看到一个年近五十的人在扫地，弯腰曲背挺费劲似的，见我俩要过去，他就停下来让我们过去。他无意中朝我看了一眼，我感到他并不算老，只是眼神分明是压抑的，也带着几许和善，大概是感觉到我还是个“小孩”吧（我年龄小，个子也小）！我正在诧异，同伴小声告诉我：他就是中文系的极右分子任铭善，很有名的。我“哦”了一声，心想：任先生是颇为有名的语言学家，怎么也成右派了？（我大伯和朱自清、夏丏尊等人是朋友，我父亲曾是上海新华艺专学生，师从潘天寿等大师，书香家族的熏陶使我在中学里就知道了学界的不少名人。）

为此事我耿耿于怀。我有了一个大胆而又幼稚的打算。我要去叫他一声“先生”。在高中时，我们管自己所尊敬的、喜爱的老师叫“先生”；一般的呢，就光叫他“老师”。那几天，我有事没事就往中文系走廊上过，因为我知道任先生的落脚点在资料室。终于有一天，我从走廊东侧走过去，任先生拿着水瓶迎面过来。我心跳也快起来了，等他距我二三步的时候，我就怯怯地冲他叫了声“任先生”。他可能认出我这个“小孩”来了，又朝我露出了和善的笑，同时又向我摆摆手，示意我别叫他了。我又低低地说了声“保重”就赶快走过去了。

我冲“右派”叫“先生”，这在当时可能是很“另类”的举动了。这个秘密我也保守了整整50年。反右那年头，报上把右派说得凶神恶煞似的，人人犹恐避之不及。而我脑海里至今仍留着任先生那和善的笑和他朝我摆摆手的一刹那。任先生若是九泉有知，还记得我这个不知名的称他“先生”的“小孩”吗？

那一串眼泪

我酷爱戏剧，进杭大不久，校话剧团招生，我和同班的童汀苗（后来成为国家一级编剧、浙江省话剧团团长）、王福基（退休前是嘉兴市文联主席）两位同学都考入了杭大话剧团。1958年，杭大话剧团排演的是杭大中文系学生创作组根据杨沫小说《青春之歌》改编的话剧《青春之歌》。记得最早扮演女一号林道静的是外语系翟燕芳老师（不久改由外语系史佩珍同学主演），男一号是把小说中卢嘉川、江华两个人物揉合而成一个角色的革命者江华，由中文系比我们高一级的陈坚同学扮演。我们还请来了浙江省话剧团的资深导演骆可任话剧《青春之歌》的导演。后又由老演员史崇仁担任指导。80年代后，史崇仁多次在影视中主演聂荣臻元帅，形神毕肖，声誉颇高。

在他们精心指导下，话剧《青春之歌》一炮打响，在省军区礼堂首演时，在省市文化界及高等学校中为之轰动，至有“满城争看林道静”之盛。不久，杭大话剧团又先后到宁波、金华、嘉兴、湖州等地演出，盛况空前；后又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之邀到上海演出。一时间，沪上各高校师生以一睹杭大话剧团的话剧《青春之歌》为快，林道静

也成了当时大学生们追捧的偶像。那两个“校花”级的女主角还收到过不少上海大学生表仰慕之意的来信呢！

我在剧中只是演一个小角色，倒也有过一段小小的花絮。我演的是一个情绪低落、颇有点颓废色彩的东北流亡学生，叫于一民。剧中第三幕，说的是“九·一八”以后，一群东北流亡来北平的学生，除夕夜聚在白莉萍住处，想起家乡沦亡遭日寇铁蹄蹂躏无不黯然泣下。我的台词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夜里我的爸爸妈妈又在想念儿子啦！可爱的松花江啊，你那清清的水浪，还是那样美丽吗？”按说，我一说完这一段，全场离愁别绪、思乡忧国之情全都激发起来，在场的人哭成一片才好。可是无论我怎么练，导演对我这段台词总不满意，说气氛出不来。那一天，导演下了死命令，说：“小洪，三天之内你再说不行，换人！”呵，乖乖，那不就要断了我的后路，破了我的演员梦？我向童汀苗兄讨教，他说：“你这两天少玩，别去打球，也不要和别人说笑，空下来多想想你难受的事。”天哪，那不要憋死我？没办法，为了过一把做演员的瘾，那几天我成天哭丧着脸，别人来跟我说话我也只好爱理不理的。几天苦下来，咳，我还真找到那种感觉了。演出那天，我在上场前，一个人像著名演员白杨演祥林嫂那样，躲在一个角落，想着三四岁时我舅舅用担子挑着我一路逃难的情景。一到上场，情绪已快憋不住，两句台词还没说完，一串眼泪就挂了下来，还把大家都引哭了。下了场，导演拍拍我的肩，说：“今天不错！”

入另册的历练

我们大四的时候，正赶上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9月，系里决定：四年级各班到绍兴县农村湖塘人民公社劳动锻炼。四个班级分别落户到六个生产队，我们（1）班被分到鉴湖生产队落户。我的好友童汀苗所在的（2）班分在邻近的中联生产队。我和同班三个同学落户在一位叫“阿根哥”的贫农社员家里。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的绍兴湖塘可是个好地方了：公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别墅式的楼房鳞次栉比，光鲜夺目。附近是名闻遐迩

的风景区——香林花雨，一年四季游客如云。可是我们去劳动锻炼的那年月，农民缺吃少穿，到后来，连“糠菜半年粮”都无法保证了，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我们这些大学生虽有国家给的生活保障，但日子也不好过。在不忘阶级斗争的“左”的思潮指导下，学生群也是按家庭出身、思想倾向分等级的。（当然，这种思想等级的划分也是按某些人的主观臆断为依据的，因为有的同学什么表不满的话都没说过，也被列入了“思想偏右”的行列。）像我这一类家庭出身不好的，是无庸置疑地被列入另册的。哪怕你在劳动中用出了十二分的努力，能说你“有了一点点小小的进步”，已经算不错了。那年12月，寒冬到了，家里因重大变故断了给我的接济，我衣衫单薄，冻得直发抖，手脚都开了裂。同班华侨生蔡再生同学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脱下自己的棉外套给我穿上。我的裤子破得裤腿前后通风，我自己找针线乱七八糟缝上。（今天回头看看当年偶尔留下的那些照片，怎能不叫人心中发酸？）还好，领头的人看到我那近乎乞儿的破烂相，对我说了句“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好话，我只好苦笑。为了尽可能减轻“家庭出身不好”给人的坏影响，所有这些入“另册”的同学，在劳动中努力找苦活、累活干，也真是诚心实意地改造着自己。我从大学读书到中学教书，几十年来，参加的劳动不计其数，每每碰到最苦最脏的差使我就会自告奋勇。大学时，到半山筑铁路，有我；到狮峰挑矿石，有我；到安吉背毛竹，也有我；来到绍兴教书后，我带学生开过荒山，拆过荒坟，抬过石板，修过水库……

大四时在绍兴湖塘的那一个寒冬，真是历练人！我学过的农活，除了农民不让我干的犁田（怕牛不听使唤弄坏犁），什么都学过。记得第一次学耨河泥，因为我的两脚控制不好船的走向，风从身后吹来，而我还未能把耨杆拔起，结果是连人带耨杆弹到河里，成了个落汤鸡！一开始，这样的笑话是很多的，练得多了，慢慢也像个农村青年干活的样了。生活上倒的确是和农民兄弟打成了一片：有一次，我和三个农民摇船出去割草积肥，傍晚，船到了绍兴县钱清镇上，船上草已堆满了。舱里只睡得下两个人，一个老农民和一个小孩就睡在舱里，我和一个小伙子就睡到钱清镇上一家酱油铺门口的街沿边。第二天早上

我是被早起的路人踢醒的。那时节，谁会想到睡在石板路边的是一个号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呢！那真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啊！当然，这种历练对我自己也确实实是终生受益的，它的价值是那些一辈子躲在父辈避风港里的人所不能企及的。

光阴荏苒，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就这样一页一页徐徐翻过。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这一代学子也渐入古稀之年。西溪依旧，故园犹在。每当我们这些杭大、浙大的“孩子”流连西溪河下、伫立竺老像前，忆及往昔在道古桥畔、老和山下的苦读生活，无不万千感慨缠绵于心，使人久久难以释怀。诚然那岁月的光影里，有灿烂，也有阴霾，有欢笑，也有苦涩；诚然那逝去的一幕幕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不可逆转，然而曾在这个菁菁校园里以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演绎过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卷的人们，那一颗依恋母校的童心却永远不变。“儿行千里毋忘娘啊”，——是的，无论我们走到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无论上苍会有一天来召唤我们去天际重聚，去拜见我们的众多前辈，去再次聆听竺校长、夏教授们的教诲，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说一句早已铭刻在心的见面话：“我是杭大人！”

[返回目录](#)

参加物理学系 90 周年庆典感怀

—杭州大学物理系 65 级 周亚平

今年 5 月末我特地从苏州去了一趟杭州。因为物理学系向我发了份 90 周年系庆的邀请函，我去参加了母校物理学系 90 周年庆典活动。

这次 90 周年系庆来了 4 位院士系友。物理学系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 5 位中科院新院士中，原杭大物理系出了 3 位本科院士系友（按国际惯例以本科为统计口径，以免重复）和 1 位硕士系友；原浙大物理系培养了 1 位本科院士系友。

这次物理学系 90 周年系庆比较低调、务实，但庄重、喜庆。整个庆典活动以学术年会为主。系庆的规模也不大，向每一届学生发出的邀请函不多。像我这样既无显要社会地位又无突出学术贡献的系友能受到邀请，则是始料不及的，这让我感慨万千。

我是在 1965 年 8 月以下乡仅一年的往届生知青身份考入杭大物理系的。由于当年的社会政治环境关系，在今天看来易如反掌之事在那时却“难于上青天”。因为参加高考过程中须过诸多“难关”，譬如高考报名关（必须由当地政府开具“同意报考”的证明）、复习关（要边劳动边复习）、考试关（比如，1965 年数学高考试卷中第一年列入《平面解析几何》内容，且占分百分制的 33 分，对我这位未学过这门课程的往届知青生简直是灭顶之灾……）、临场发挥关、政审关（对往届生及知青的政审更严）、录取关（往届生及知青限录院校及录取分数线上提等）、举报关（如各种原因而向省高招办举报）等等。这个过程中只要有一“关”被卡，就会使一切努力尽付之东流。

记得那年 8 月 30 日，我赴校报到。在物理系的新生报到处，接待老师一看我的录取通知书上的姓名，立即和善地对我说“请你先到物理系党总支办公室去一下”。看到我前面报到的同学并无此程序，马上领悟到我可能遇上麻烦了。到了物理系党总支办公室，系办陈主任说：“作为知青考生，你所在的当地知青联名写信给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举报你下乡仅有一年，违背了上级关于上山下乡知青必须

满两年才能招工招生的有关规定，并反映你表现平平等情况。省高招办责成我校我系去实地调查你的相关情况。目前暂停你的大学录取资格，等待外调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恢复你的大学录取资格”。我在头脑昏昏、精神萎顿的状态下迷迷糊糊地跨出了物理系党总支办公室的门槛。

眼看着同寝室的其他同学报到后领取教材资料、参加新生体检、出席开学典礼、进行始业教育等一系列活动，而自己只能头脑一片空白地整天躺在床铺上，数着时间一分一秒地在身旁缓缓逝去！此时此情，真是五味杂陈、思绪万千：很可能几天后外调结果出来，我的大学录取资格被取消，那么我只能像高尔基一样，去读社会这所“无限大的大学”了……

终于在焦躁不安、万般无奈的境况中度过了恍若一年的一个星期。一天，一位同学来寝室转告我“系党总支办陈老师要你去一下”。我怀着忐忑不安、七上八下的等待宣判一样的心境，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向物理系党总支办公室。一进办公室，党总支办主任陈老师对我说：“外调结束，你去补办入学手续吧”。我如遇特赦一般，一周来始终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赶紧拿着陈老师开给我的条子去补办各项入学手续。

恢复我的大学录取资格，也可以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走向。按当年的社会政治环境，取消我的大学录取资格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国家确实有上山下乡知青必须满两年才能招工招生的规定的。原杭大物理系在外调后同意恢复我的入学资格，既“破了格”又冒了一定政治风险。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自己也迈入了老年。由于家国历史与个人命运之使然，我没有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但也没有给母校母系当年的“破格”录取抹黑：我获得过省级优秀科技成果奖；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技术论文 50 余篇（其中 2 / 3 以上为全国性期刊，10 篇为全国核心期刊，且有多篇被国家级、省级学会评为优秀论文）；发表科普文章 5 篇（其中的《未来的计算机》不仅被其它书刊转载，还获得不少奖项）；发表社科文章包括散文等 50 多篇（其中的《鲁迅

与周恩来同为周勃后裔新考》不仅多次被转载或引载，还获得诸多奖项；另有多篇散文获得若干奖项）。而值得我自慰的是，我发表的所有文章全部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

我是怀着虔敬之心参加 90 周年系庆的。在参加系庆的学术年会听取学术报告时，我仔细听、认真记，犹如当年年轻时当学生一般。90 周年系庆结束，当我别离物理学母系所在的十二教学楼时，恋恋不舍之意油然而生。挥手自兹去，学子深深情！

[返回目录](#)

“俗家弟子”的杭大情结

—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91 级函授生 裘一琳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坐落在富阳“六谷湾”的场口中学，还是在全省农村高中中享有盛誉的，“山乡千里马”的美名在莘莘学子心目中还是很神圣的。

1986 年高考，我考出个数学 29 分。在“大学生”还令人艳羡的“包分配”年代，我与高校彻底地绝缘了。

尽管高考“烤糊”了我正规学习深造的前景，但却“拷”出了我百折不挠的小性子。

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放下了对高校的痴心妄想，我手不释卷的热忱却不减反增。做了两年半农半工的“自由职业人”，我就决定收心求一份固定职业，尤其想做一份和文字打交道的工作。只因从小在书香家风中耳濡目染，对文科情有独钟，还素以“舞文狂生”自诩，诗词歌赋都有涉猎。1990 年，我还真顺利考进了自家所在的乡政府的广播站，当上了一名专职报道员，吃上了“皇粮”（有正式编制）。

写新闻稿子可不是填词赋诗，不能由着平素的性子胡来，得循着新闻规律着手。这时候就向往能有朝一日让自己接受正规的新闻学培训。因着这样的自我要求，我参加了 1991 年的全省函授考试，走进了当时的杭州大学，成为一名新闻专业大专班的“俗家弟子”。

寺庙里的“俗家弟子”可以带发修行，而我们在单位的政策鼓励下可以“带资函授”，心里那个美啊！

当时，在富阳长途车站花 4 毛 5 分钱，乘车到杭州松木场终点站，再走百十米路，就到了杭州大学。

大学，对于我这样的人，是何等的高山仰止而心向往之！尽管已是如愿以偿成为了杭州大学的函授生，但和校园内青春飞扬的正牌“天之骄子”相比，总觉得自己不伦不类，很是自惭形秽。

记得第一次进校园，拿出入学通知书在门口值班室登记，神色很慌张，也很忐忑，生怕有人瞧见了鄙视我、嘲笑我。后来有了校徽和

学员证，可以不再接受盘问和登记而昂头出入校门了，但那份自卑心理还是隐隐约约挥之不散。

同学来自全省各地，新生报到时应该不下于 50 人吧。到了课堂上一看，除了杭州市区的学员外，就数我们富阳籍的学员最多（我记得当初有 17 人）。可到最后，只有 20 来人坚持到毕业（毕业照上仅 18 人），我们富阳籍的还是最多——3 人！

说到底，还是因为“函授”的缘故，不是全日制的正规大学生活，所以让很多同学觉得不那么重要，无法保持持续的热忱去完成学业，半途而废了。

三年函授生涯，让我有机会认认真真学了点专业知识。当我毕业那一年，我已从乡镇报道员调任富阳报社新闻部记者。正值基层新闻事业大发展之际（县级政府相继开办了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社），杭州大学半工半读的函授经历，给了我相当的新闻专业知识储备，工作得心应手，虽然起早摸黑采访、写稿很辛苦，但富有成就感，内心自信满满。

那三年，也让我深刻感受到杭州大学浓郁的教学氛围。我们的老师，有年长的老一辈专家、教授如张大芝、邬武耀、张梦新等，也有只长我几岁和我一样同为“60 后”教坛新秀。他们对我们这些“俗家弟子”一视同仁，教得认真，我们学得也认真。尽管面授的机会很少，但他们对待每一个学员平时的作业和学期考试，都一丝不苟，关爱有加。老师们知道大多数学员都有工作，平时忙于事务，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学习函授课程，于是在每学期有限的几次面授后，都尽可能地腾出时间接待学员求教，耐心解疑释惑，教会我们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的方法和思路，开拓我们的眼界，培养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辨能力。

渐渐地，我不再因自己是杭州大学的函授生而感到自怯。一种深深的和大学殿堂相融相契的归属感慢慢充盈了我的心灵。那段时间，我很喜欢印有“杭州大学”四个字的“文化衫”，一件普普通通的白色短袖汗衫，印上了红色或蓝色的校名，在我眼里显得很神圣。1994 年初夏毕业前，我还特地穿着这样的文化衫，在校门口留了影。

而给我最深刻感触的，是我和老师、同学结下的“同门”情谊！

毕业 26 年过去了，我仍念念不忘和沈爱国、徐忠民等老师的师友深情，也时刻牵念着同学，视他们为同怀、手足。

结识了沈爱国老师，才知道所谓“才情”是怎么回事！认识到过去自己的年少轻狂，只是井蛙自足，太微不足道了！于是自惭形秽，而后以偶像视之，崇敬至今。而与徐忠民老师的结交，让我对生命、对情感、对事业，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久而久之，也让自己的言行举止，多了一份厚重感。

记得开学不久，同学间刚刚厮混熟了一点，我就叫钟慧同学为“妹妹”，因为她跟我小妹同龄。这一叫，果真是兄妹情深，她那声“大哥”，每每让我听了眼眶湿润。有几次到杭城办事，我得空就会联络她，有时也约她出来见个面，聊聊天，俨然同胞兄妹间的坦诚、自然。进入网络时代，我通过社交平台的照片传递，“认识”了她的宝贝女儿“青儿”，还有缘认识了和她极具夫妻相的“爱人同志”。尽管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很少，但彼此间的那份关心、关注和祝福，会时刻荡漾在心灵深处，弥足珍贵！

气质儒雅、才华横溢的吴丹同学，年岁略长于我。2000 年左右，他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合作项目管理层中的一员，到富阳来发展。毕业后第一次相见，我开心得不得了，脱口而出就叫他大哥。随后，我把自己在富阳最亲近的几个小兄弟介绍给他认识，他一时间有了一帮小弟、弟妹，也很融入，好多次酒酣耳热后，放达情怀，谈笑风生，没把富阳作他乡。

当时还是电台播音员的成钢，是我们同学中的“小字辈”，却是我们的班长。他的高个儿让我仰面以望，他的活泼开朗、幽默风趣更让我折服得五体投地。俯仰之间，凝结出了我们同学 30 年来时刻萦怀的醇厚情愫。前些年的一个夏末，他携爱人路过富阳，给了我和陈雪平同学一个接待他一顿晚餐的机会。20 多年不见，这小子丰姿更胜当年！手机留影中，他依然是那么的高不可攀。

在我的手机相册中，还珍藏着温恩蕴同学的一张玉照。2014 年 5 月 28 日，我在 QQ 动态上看到温恩蕴和同伴出游征服一座雪山的照片，气概豪迈，英姿飒爽。我一时兴发，诗以赞之：“叱咤雪域动风雷，巾帼原不逊须眉；待得凯旋放眼看，香汗欢欣一囊背！”

很多次午夜梦回，我都是在杭州大学旁边的小酒馆（大排档）内，和同学、老师就着炒螺蛳和瓜子，喝酒唱歌。我或者唱着自己写的歌，或者用筷子敲打着碗碟，应和着同学和老师的歌声。那份青涩的张狂，虽然随着时间的流失早已烟消云散，但此情此景，不管过去多少年，都将在记忆中定格，成为隽永！

我还时常想起其他同学，尽管毕业后再没有见过面，但当年的他（她）们各自的长相，我还是记忆犹新的。对了，还有潘云峰同学。几年前，我还在桐庐县任杭州日报记者站站站长时，随县党政代表团去平湖考察，我向当地干部打听潘同学，很快就在会议现场见了面。那次随团外出，让我有了意外收获，值得一记。

我们富阳籍拿到毕业证书的“同学仨”，就是陈雪平、王强和我。从事新闻工作30年，我现在在杭州日报传媒有限公司富阳分公司从事经营工作。辗转经年，岗位换了不少，但工作30年来，我从未脱离过“码文字”的行当。陈雪平同学一直在富阳广播电视台工作，广告一新闻一广告，几度播迁，初心无改。因其忠厚、务实的人品，是个受人尊敬的元老级的广电台中层干部。王强和我，还有一位没有坚持到最后的同学张志龙，都是乡镇广播站报道员的“同出身”。现在他们两个都转岗了，成为各自单位的业务主管。我们虽然同在富阳，但世事纷繁，也是难得聚首。然而不管怎样，只要彼此间一声召唤，大家都会呼应啸聚。因为我们除了曾经是同行，还有一层“同门俗家弟子”的关系，那分量，是相当沉甸甸的！

人生易老情难老！杭州大学早已没有了，但“杭州大学”仍是我们心灵深处的美好记忆。毕业分手了，但师生、同学情分，像一粒充满生机的种子，从离开校园的那一刻起，便在彼此心间生根发芽。“岂无长歌悲秋雨，犹有桃花笑春风！”人生苦短，人事无常，好在我们还有一颗不曾老去的心，携程与日俱增的“同门”情结，同频律动！

谨以拙文，致敬我的大学——杭州大学！致敬老师！致敬同学！

（于2020年6月16日晚）

（作者简介：裘一琳为杭州日报传媒有限公司富阳分公司总经理）

岁月无题

—杭州大学中文系 62 级 戚平岨

岁月不居，毕业杭州大学中文系转眼 50 足年过去了。大学于我，是一次人生的经历和启蒙。大学曾把我带入一个视野开阔的境地，高远深邃，斑斓绚丽。“闻道闾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如今，美好的杭大母校已经远去；而且远去的倩影，也已经十分恍惚。对于吴王苑内花，留给我这一夜秦楼客的记忆也已留存无几。如今回头再作记录，名之为“岁月”，似又不足以抒怀；而怀中究有何物，却又显得莫名。故借大诗人莫名之名，得文题为“岁月无题”而未知其可否。

一

直到 1980 年代之后，与新入学或刚毕业的一些大学生接触，我才有了一个差不多所有大学都有自己的品牌宣传的感觉。例如某大学说自己的校门为铁打，进得来者决非等闲之辈；而今后再去欧美深造，仅是入菜园子笆门而已。说来洋洋得意。又如某专科生出来说，我们的学制虽只 3 年，但完成的学业却是 4 年本科，而且任课老师的水平又是如何如何，显得志满意得。这样的所闻，实在是对我杭大中文系经历的一种冲淡。

当年我们刚入一年级时，就听到了北大中文系是地主而南大杭大中文系便是富农的说法，意即我系名师荟萃师资力量的强大；还听说 1960、61 年中华书局修订《辞海》，抽调全国大学的中文系教师，南大和杭大各有几把刀子是编辑中的台柱，年轻讲师也是头角峥嵘如何了得，我记得所传说的就是都曾给我们授过课的蒋礼鸿先生和祝鸿熹先生。只是一到文革，这种曾经的骄傲和荣耀便立即变成了受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污淖；曾经以此称颂过“富农”与“刀子”的系党总支部书记毛逸先生，更是多了一条向牛鬼蛇神投降的罪状，这是后话。

回过头来看，“文革”前杭大中文系的师资队伍确实蔚为壮观，胜于今日所称之富豪。尤其在古代文献、古典文学和古汉语方面就有姜亮夫、夏承焘先生那样的泰斗和大师；孙席珍、任铭善、蒋礼鸿、胡士莹、王驾吾、徐朔方、刘操南、蒋祖怡、盛静霞、吕漠野、王维贤、王荣初、张仲浦、蒋寿强等等先生是某一学科或专题的学术权威；更有祝鸿熹、蔡义江、吴熊和、郭在贻、平慧善等等当时还相当年轻的一大批学术新锐殿后，“文革”之后这批先生便更显得光芒四射了。

二

大学授课，不按固定教室。我们 62 级学生 60 多人，专业课大多在 227 教室，济济一堂。讲台和黑板跟中学相仿，学生不设课桌，只在椅子上设右边的扶手，扶手上固定一块放讲义或做笔记的平板；若有他物，可挂在椅子的背上。上中共党史等公共课则安排在 201、218 等几个大教室，同年级几个系一起授课；那里是长排的阶梯教室，长排座位前是长排的放书簿活动案板。外语课等则安排在小教室里，供一二十不等的学生上课使用。

因为分大小课堂而不可能有固定教室，所以学生上完一堂课，下来就换下一个教室或回寝室；自修课和晚自修，或在寝室或去大教室找位置坐下，只要教室不上课，坐来自修是无限昼夜的。

全校作息信号统一，上午 4 节下午 3 节课，每节 50 分钟，中间休息 10 分钟。主要课程大多两节一连，有紧凑感。除学生外，总会有多位同教研室的老师坐在旁边或后面听课，相互观摩切磋。

三

我没有统计过每门功课或每个学期到底有多少位老师给我们上过课。几年下来，大致是几十位吧。俊彩星驰，回忆起来，已显凌乱。

文学概论应是一年级的第 1 门主课。绪论部分讲授文学即是人学的便是比我们年长 10 岁左右的王林祥（元骧）先生。王先生一表人材且温文尔雅，其文采风流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网络时代。王先生在第 1 堂课里就对全学期的授课计划和授课老师说了安排，说到最后的某一章节时幽默谦和地说，“这一章让大家委屈点，由我来讲”，我记

忆至深。讲授文学概论课的有不少位老师，可惜除了蔡良骥、陈志椿等少数几位，我大多已经失记。

顺便一说，此前和此后的课程教学，我只是听到学校里强调学生的“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我们在开课后不久，就听到记不起是哪位老师首先提到的“三基”，第3个基即是基础理论。中文系的基础理论，文学概论所授者是也。对于文学艺术的审视，需要有一种哲学思维来统率，于是“美学”一词也渐次明瞭其大致涵义。临近“文革”，班里贺圣谟、唐森灿等同学购得美学问题讨论书籍，谈论起什么是美和美的本质等话题十分起劲。记得当时的国内美学理论分成吕荧、李泽厚、朱光潜、蔡仪等流派，姚文元的“照相馆里出美学”说也算一家，相互论辩不休，我有所关注，印象甚深。美学与文论的各自概念及联系，也逐渐清晰。而1960年代初尚很年轻的王林祥（元骧）先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就鹤鸣九皋，已然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扛鼎者，我们当年做学生的当然更可引以为荣了。

四

因为以前的知识空白，我对始业阶段中的外国文学课很感新奇。讲授外国文学最初部分希腊古代神话和史诗的正好是我们的年级主任华宇清先生。华先生是我们几个余姚同学的同乡，口音亲切，授课内容新鲜，每一个名物和事件都堪记录。希腊的历史并非世界最古，但古希腊文化却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不二轴心，并与中国的先秦历史文化形成了东西对称。于是，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了解似乎为了解西方的古代文明打下了一层最初的底色：特洛伊战争、英雄阿溪里斯和赫克忒、木马之计等等。接下来是以宙斯为主神的奥林比亚诸神、普罗米修斯盗火、雅典和斯巴达国家的形成，直至古希腊艺术中的悲剧和喜剧，奥林匹克运动的起源等，烟波浩淼。华先生所授知识成了我们打开古代世界文化之门的最初启蒙。

以后的授课老师有丁子春（欧洲文学）、蒋寿强（俄罗斯苏联文学）、孙席珍等先生，都堪称专精。孙席珍先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革命，与郭沫若有深厚渊源，诗人、作家、翻译家，30年代教授，学贯中西。孙先生给我们专授歌德《浮士德》，大概是因为《浮士德》

是外国文学中最难读通读懂的作品，而孙先生则是这些作品的研究专家，讲起来当然是眉飞色舞，精彩异常。

丁子春先生是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我们的外国文学他授课时间最长。记得有一次丁先生作斯汤达尔《红与黑》的讲座，向全校开放，听讲座者挤满大教室。他介绍作品的情节生动，分析透辟，激情四射为中老年教师所无。

对于一般人来说，无论是学问或技艺，触及并深入是必须由前人来自启蒙和引路的。即便聆听面授和接触的时间有限，但这样的启蒙和引领是必不可缺的，因为它鲜活生动，是一种个性化的示范；发乎示范者性情，入于学生之心灵，其作用与自学或死读书不可同日而语。更有所谓法其上方能得其中、强将手下才不出弱兵之说，前人的治学经验都说明了这些道理。有名师指点，这是我们的学业之幸。

蒋礼鸿先生是古汉语大家，精研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著述宏富，其《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更是学界“津梁”、“明灯”一级的专著，享誉海内外，他的毕生成就不能用几句话作概括。蒋先生任教我们的古代汉语课时间最长，编发的油印讲义我大多来不及看，讲义多为文献选读。蒋先生的讲授特点是明白、确凿、从不拖泥带水，给人的印象是说一不二。记忆中，在学生课堂上指名道姓直言别家之说有误者，在我们的任课教师中也只有蒋先生。例如他在课堂上讲某一字“北大的王了一先生讲得不对”，某一义“复旦大学的朱东润先生讲错了”。曾华强先生是蒋先生高足，也给我们上过训诂方面的课，蒋先生在边上听课，有时也会插进来讲几句。“文革”中有人写大字报，揭发蒋先生在课堂上的“反动言论”：“把前仆后继写成前赴后继，那是因为他不识得一个仆字。”说这是在恶攻红太阳。（大字报材料是否属实，可存疑。）但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在“文革”牛棚中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却是在劳动改造队伍里最认真的一个。

徐步奎（朔方）先生担任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文选读课程的课时较多。他的学术专攻是明清戏曲、小说，同时精研莎士比亚，学贯中西，青年时代已有独步海内的汤显祖和《牡丹亭》的研究成果，“文革”后更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大家。据说徐先生读书甚勤，视时间为生命。但给我们授课却是一丝不苟。他讲授李白杜甫韩愈苏轼

文章，融通儒释道，补充老庄及程朱阳明之学，娓娓道来，饱含古典哲学的启示和启蒙。课后他也抽时间来到同学中间，讨论课程内问题和蔼可亲。但他也感觉到“文革”前夕言论空间的严峻，对现实政治和政界人物从不作评论。例如有同学问先生对郭沫若的评价，他就挥挥手，说着“你们谈你们谈”就走开了。贺圣谟同学有思想有学问，徐先生生前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

刘操南先生也给我们讲过一段课。今日上网查阅资料，知先生已刊著作600余万言，存稿700余万言，真是洋洋大观。他是文史皆长，文理兼通，并有大量诗词作品。“文革”大字报披露材料中，先生还有天文历法数学佛学等方面的专识和成就，说他即使去数学系，也有信心评上教授，先生是一奇才。

刘先生的课堂别有一景，他朗读古文全用传统的“诵”，即吟唱出调子，抑扬亢坠，摇头晃脑，是旧式读书人的朗读方式。开始时大家暗暗惊奇，不久也就成了我们的一种诵读知识。刘先生的记忆力超强，据说能背很多文章，甚至大段的《红楼梦》原文。

不堪回首，1964年下半年，先生在我们三年级的古代文学史课堂上落了井。他讲授《山海经》“鲧禹治水”篇，照原文讲授，鲧以息壤堙洪水，不待帝命，为帝所杀。鲧生禹继续治水，卒布土以定九州。不知怎么一来，刘先生竟被上纲为宣扬阶级调和，出了政治问题。因为“帝”代表反动统治，禹首先应报阶级和杀父之仇才对，岂可再从帝命。（这一思维与今之“娘打儿，儿不记恨”或“向前看”思想适得其反，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了。）这一课堂事件来得突然，我已不记得后来是怎样不了了之的。【今按：上古谓“合天地之德”主宰万物者为“帝”，释“帝”为某阶级统治者才是真正的谬误。鲧以息壤堙洪水违反天地之德即反客观规律，自应追究其责，而追责者“帝”正是我中华先民所崇奉的理想化身。刘操南先生未必没有想到这一层，只是在当年“旧知识分子”个个与牛鬼为邻而百口莫辩而已。】由此还可管中窥豹，想象到当时的气候已是骄阳烤草木，日后不管有什么样的名义，只要点燃火种，大地早已备下了革命干柴。

马骅先生是诗人和老革命，被浙江省作家协会评为“浙江当代50杰”、省文联评为“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老艺术家”。我们在杭大读

书时，他是系里的写作教研室主任。印象中写作教研室也有不少老师，包括今天已成为民俗学家的吕洪年先生和著名“丁陈反党集团”中的陈企霞先生。

写作是一种技能，需要“激情”作原动力来催生“灵感”。马先生不缺此二者。激情所及，先生的课也讲得特别灵动。他的第一堂写作课，以世界著名音乐、绘画大师的创作为例，层层博喻，既传授写作知识和技能，又激发我们的写作兴趣，妙趣横生，只可惜无当时的录像留给后来者。这里插一笔，马先生对学生作文做批语，有一次要求大家对批语作反馈，我未加重视，以空白应对，被马先生在课堂上未点名地笑评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贺圣谟兄知道这八字典故，回到寝室，被他一番戏谑，我印象至深。

课堂授课章节较多，同学印象较深的吴熊和、蔡义江先生是古典文学室的同龄才俊，我们心目中的双璧。他们给我届同学授课时还不到30足龄，已然是“提刀四顾”，光彩照人。吴先生师承一代词宗夏承焘，“文革”结束后便成为唐宋词研究领域的班头。蔡先生在“文革”后去了北京，成为当代著名红学家。同窗杨仲坚兄好记性，在他的《春秋集》里作了较多记述。其他中青年老师已记不胜记。至于系里的国宝级先生姜亮夫、夏承焘，及胡士莹、王驾吾等未曾在我年级开课，更是让我们高山仰止。

算不得是题外话，从1957年反右斗争到“文革”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提出的整整20年间，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夹起尾巴做人”是国人共识。一路看来，夹紧的尾巴稍可放松，老先生们稍显“活气”的岁月，大概也就是我届同学入学前后的二三年而已，回想起来，令人格外珍惜。

五

趁机想说一下我与傅国通先生相关的事。

傅先生讲授现代汉语的语音部分，力促我们学讲普通话。我们读中学的年代，虽然国家已经颁发了汉语拼音方案，提倡用普通话教学，但多数教师仍用方言和方言书面语，学生更无讲普通话的意识（这点在今天已经颠倒过来了）。傅先生似在课堂上批评过杭州同学的“顽

固”，可见当时学校里口语交流的南腔北调。傅先生印发过不少练习普通话的讲义，颇多趣味；还传授过周有光先生的一首五言律诗《韵母诗》，40字的“渔家乐”妙章把现代汉语语音韵母全包括了进去，太高妙了。

傅先生对汉语语音的研究精深，“文革”后任我省语言学会秘书长和副会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并带研究生，成为国内著名方言学家。

话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西衢县北边的农村中学任教，对本地方言很感新奇。久而久之，发现本地方言中保留了大量见之于近古通俗小说（如水浒、三言、二拍）的白话词语及某些今语的古义，例如“戏啰唆”（闹着玩）、“上东司（上茅厕）”，用“妇女”一词指称单个女性甚至小女孩（说“小妇女”）；还竟发现了《红楼梦》中王夫人刘姥姥的两段骂人话简直就是衢北方言。另外是在语音方面，则有太多的例子可以印证清人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即唇齿音）、“古无舌上音”（即舌尖后音）之说。前者如说“反”为“板”、说“呼”为“铺”，后者如说“虫”为“同”、说“竹”为“笃”等等。此外还有某些带地方色彩的特殊语法。经过多年积累，加上对方言调查和研究的主观猜想，我罗列成上万字的长文，交在杭的唐森灿兄帮我请一省语委专家审阅，而森灿兄帮我找的正是傅国通先生。

大半年之后，傅先生把文稿寄回衢州，在稿子上用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标记和批语，并附上1000余字的长信对我作鼓励、指点和建议。此信存留至今，我抄摘几段如下，它对我似的方言研究的插嘴者来说可是指点门径的箴言：

“（具备方言知识和调查方言的能力，）严格地说，要具备辨音、审音、记音，并能运用国际音标的能力，是颇不容易的。中文系毕业生远远谈不上，大学语言学教师也不是人人都会。能写出有水平的现汉论文，不会方言ABC的大有人在。方言是专门学科，不仅要有理论的根柢，而且更要有科学的方法和熟练的技能，一般都要经过科班的训练，才能获得。

“写方言的文章，贵在描述方言事实，事实描写无误，便有语言学价值。著名方言学家李荣师说：‘如果人家批评我只是罗列事

实……我就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搞学问就是要弄清事实，事实居然已经罗列无误，就很不错了’。

“写方言的文章，时常要说到某种语言现象某地有某地无……这样的话，千万要记住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名言：‘说有容易说无难’。比方衢州有轻唇音读成重唇音的，说它有亲耳所闻，千真万确，但不能轻易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话。重唇音现象闽语最典型……总之说‘无’是不容易的。”

傅先生介绍目前（汉语）语言研究的刊物有《方言》杂志、《中国语言学报》等，而《方言》杂志的国际影响超过了《中国语文》。（我的理解，是因为方言研究真正创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根。）

傅先生还对我那一篇极不成熟文章作了建议，“先写好第二部分，是否可改题为《衢州方言古音古词例述》，行文形式可参照蒋礼鸿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并建议携文参加当年在温州举行的省语会年会。

傅先生的批语和长信是权威人士对我一对一的一次专业教诲和辅导，我已永铭心间。时间又是一晃十余年，巧值衢州市退休名师王世范先生受命本市市志办，重修《衢州市志》中的本市方言篇目，我偶然跟王先生说起十几年前与傅先生的那一次交集，王先生受我启发专程去杭州寻访傅先生，与傅先生抵掌而谈，十分投缘，且受益良多。王先生历时数年，不但完成了市志办交给的任务，还把编撰扩展成皇皇 50 万言的《衢州话》专著，让我私心深感快慰。

六

语无伦次，记二三个杂忆吧。

上大学本来就是年轻人的生活，应该多姿多彩。1962-66 年，除了读书上课，文娱生活还是有一些的。进校后就听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还在继续着特许于“困难时期”的周末小型舞会，而随着“大好形势”的发展，那种适于贴资产阶级标签的交谊舞会就销声匿迹了。

本系高年级同学，为欢迎我们一年级新生，也曾举行过一次文娱表演。搬出教室上课椅子，在礼堂里围成圈，中间就是演出舞台。印象中演出节目有《逛新城》《人民公社亚克西》等舞蹈，还有取笑绍兴乡下人乘火车和宁波土语等的小品，令人发噱。

1963、64 和 66 年的元旦前夜，校系都布置游园活动。猜灯谜是重头戏，班里贺圣谟大显身手。63、64 年元旦前夕，全班互送小礼物，放在一起抽钩获赠。第一年我抽得林崇明礼物，是一只用纸板上用花布缀成的小脚，上面写着祝颂语。第 2 年我抽得张安吉大哥的绿面小相册，相册首页有他的大作：“好朋友千万个不算多，坏朋友一个太多了。但愿你是千万个里的一个，不要是一个里的一个。”幸喜半个多世纪下来，我还属于千万个里面的一个。1963 年元旦前夜那次，游园后，我们第 2 小组还在寝室里搞类似于行令的活动，我力所不及，但还有较深记忆。

大约在我们一年级第 2 学期，上面四年级同学邀请了系里的几位先生，作了一些古典诗词的朗诵录音，记录成简谱，油印成册，分发给全系同学（收工本费 2 角）。小册子的封面是一浅绿色唐朝诗人的吟诗画像，夏承焘先生题写书名为“诗词朗咏谱”。第 1 页是蒋祖怡先生为小册子题写的一首诗：“与公诵读楚声清，铁板红牙各有情。不使广陵成绝响，试将律吕谱心声。”接下来是小册子的铅印前言。后面油印部分便是先生们的朗咏记录了。朗咏者有夏承焘、胡士莹、王驾吾、任铭善、刘操南、盛静霞、吕漠野、张仲浦、蔡义江等十几位先生，朗咏内容不止于唐宋诗词，还有楚辞、史记、汉乐府等先秦两汉作品。《诗词朗咏谱》刚发下二三天，忽又来班里收缴，然后再发下。重新发下的本子已经用刀子裁去了蒋先生的题诗和铅印的前言，只留了油印部分。为什么要裁截销毁，回答很明确——封建主义的东西不宜提倡和流传。

这本小册子在我们第 2 寝室还是造成影响的。因为贺圣谟兄记诵理解力强，且在入大学前已经有了聆听和传习。我受圣谟影响也学会了一些五七言诗的吟诵方式；近体诗的格律常识也在圣谟兄的指点下，先于蒋礼鸿先生的课堂讲授而了然于心。古人作诗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什么注重平仄声韵而且规范成“格律”，本来就有汉字音韵科学上的道理，平声字能拉长，上去入仄声则不能；因此平仄在本句相间，上下句相对，下一个上下句又换成另一种相间相对方式就形成了声韵之美，这就是一种艺术科学。朗诵旧体诗而一味的上四下三或上四下一，其实是对格律常识的漠视或无知。

七

杭大的系科，本来就有师范大学的性质，但从我们的上一届开始，包括中文系在内，学制改4年为5年，毕业目标在试着“转型”。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据说已转换成“语言文字工作者”。但人算赶不上天算，“文革”一来，叫你什么样的工作者都做不成。类似于废物利用，中文系半数以上的毕业生还不是安排去教书？既然如此，延长学制也就成了一种失误。且不说以后各届的腰斩，完成教学计划的折扣就简直无法评估，例如古代文学史还只上到唐代。另一个是所设课程，早知多数毕业生是出去教书，作为中学师资，学一点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哪怕是每门功课开设一个学期甚至半个学期也行，不说是打基础，打几个“桩”也不错。记得王荣初先生是给我们授过一些逻辑学知识的，非常受用；可惜太少，因为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来讲授。至于教育学心理学常识，直到毕业都还付阙如。八九十年代中学教学走上轨道，当作为中学语文教师的我们需要这些理论知识来渗入教学和教学科研（例如写教学论文）的时候，我们就比师范院校出来的教师显得先天不足。杭大中文系是我们这些中学语文教师的娘家，这嫁妆真是太不配套。

此外的遗憾就是外语与政治课。全班半数同学在高中学的是俄语，误人在先；入大学后继续学俄语，全然是浪费时间。改革开放，英语通天，而自己则是个终身的英语盲，除了恨自己的平庸不学，当然也会怨及高中和大学的课程设置。

作为必修的公共课，我不知道真正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课程应该怎么设置和应该学些什么。我们可以把“价值中立”当做茅坑名词，但过分的意识形态化就不是教学之幸。当时给我们开的课（可能全国一律），一年级是中共党史，却离信史远甚。例如讲到陈独秀，简直是十恶不赦；讲到延安整风，只捡动听的说，而远非全部事实真相。二年级上、下学期分别讲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基础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如同一层窗户纸，一到改革开放年代几乎被悉数捅破；而“社会主义经济”无非就是计划经济和人文乌托邦，更是弃如敝屣，一无可取。学生们可是“铸就而今相思错，恨当年、费尽人间铁”，联想到“文革”前政治系学生专攻如此显学，

更可为之恻然。只有三年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至今还值得我们感恩，可惜下乡“四清”，课程中断。以上观点是否有“实用主义”之嫌，任由评说，前提是尚不至于犯忌。顺便说说那时候个别政治教师的文化素质还真不敢让人恭维，讥之为白字先生并无多大冤枉，例如某场政治报告，说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复辟行为是如何的“赤课课”，连一个“裸”字都说不上来，简直是阿猫阿狗都可以充数上大学政治课了。——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只是白米饭中的某一二颗稗子而已。

八

我们这届同学，高中毕业于1962年。3年高中，正好与“3年困难时期”（因含义隐讳而成特殊专有名词）相始终。1962年初，北京召集全国四级党政干部7000人大会，中央最高领导人为此前的大饥荒人祸作了某种罪己的表示，“大跃进”偃旗息鼓，同时提出了国民经济和各项发展计划大收缩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据此，本年度的高校招生数骤然降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水平。

高中母校余姚一中在高考结束后，照样组织毕业班学生去农村社队支援“双抢”。然后，我们城镇同学领取毕业证在家等候大学录取裁决。8月中旬，心慌而又懵懂的我，终于等来了杭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9月8日，是杭大新生大部分同学报到的首日。此日，杭州大雨如注；此情此景对今后的大学生活是否会是某种隐兆，大概谁也不会去无端猜测。

近时读到一则网文，标题是“谁说生不逢时？令人羡慕的40后”。网文说，反右时你年龄不够，下乡时你岁数过了；高校停招时你已入学，学校停课时你毕业了。跨过鸭绿江时你还太小，打老山时你又太老。批斗牛鬼蛇神时，你够不上权威；尊重知识和人才时，你恰好占光……。网文语带腥臊，但作为梅雨季节里却能适逢其时享受到了几缕难得阳光的我们，假如也来跟着大哥大姐或弟妹们起哄说些“无怨无悔”之类的话，那真是“良心被狗吃去”了。

1966年，“文革”祸乱起，钦定自新中国成立至此际的17年为全面贯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亦即封资修牛鬼蛇神统治学校的17年。凑巧的是，我们这批5年制本科的1967届毕业生，正好与这要命的17年相始终。原本生不逢时，可今日的亲们竟然会说“令人羡慕”而垂人口涎，这真是世上沧桑，谁能说得清。但说好说歹，总是会有人说。倘若有人说你是“得了好处还卖乖”，总有他的道理在。

九

从1962年9月至1968年9月整整6长载，算是我们这届（1967届）同学的大学生活。其中1964年入冬到第2年上半年，被派去诸暨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历时半年余；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初夏为大四年级，教学秩序尚称正规。一俟北京传来伟大领袖支持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消息传出，学校已经无法上课。从此时起，进入“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阶段，直至1968年9月份的毕业分配。这6年大学生活说起来有点复杂：学制5年，实际读书不足3年半，参加农村“四清”运动近一年，投入文化大革命两年整，名义上的在校时间（学籍和户籍所属）则是六足年。

按照历史讖纬之说，每逢农历丙午丁未之年，社稷必有祸患灾异之事。天干丙丁和地支午，五行属火，色红；地支未，生肖属羊。因而这两个年头必有的国家灾难谓之“红羊劫”，躲也躲不过，这在历史上验证已多。而1966和1967年正是我中华农历的丙午丁未之年，前面拦着“红羊劫”，似为天意。杨绛先生记述“文革”刻骨铭心遭遇之作，题书名为“丙午丁未年纪事”，就含蕴了这样的历史讖纬。全国大大小小读书人把书读到这里为止，原来是上应于天的。

6载同窗，我有过9位室友，惜乎4位已做了古人，此情最痛。毕业后先后弃世的是姒秉法、孙炳勋、陈景煜和刘曾遂；班里的女同学亦有3位仙逝，她们是徐静茜、何明春和沙真珍，其中何、沙两位在6年中还与我寝室男生合为同一政治学习和活动小组。

除了已逝者，我的同寝室同学另5位是裘金康、熊恩生、唐森灿、章启迪和贺圣谟，其中章和贺与我同室6长载。百年修得同船渡，缘份不浅。

裘金康兄出身成份好，曾是革命接班人队伍中根正苗红的稀缺人才资源。他为人爽直，敢说敢干，“文革”在校期间在班系里有过一段风头正劲的经历。毕业分配在省文化局所属单位，改革开放后听说还办了小企业，为养活若干工人作贡献，境界已与大批刘少奇剥削有功论时殊异云。

熊恩生兄政治业务素质高，有大气象。最令人钦服的是口才绝佳，上得了台面和大场面。作为学生干部，当时的班级和年级管理，颇受年级和系领导的倚重。毕业后恩生兄分配在富阳县，后来担任过富阳县县委副书记、杭州市西湖区书记和杭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泽被人间天堂。恩生也是生不逢时，我有时想，若在中青年时代有个正常的入世升迁大环境，以他之才德，其驰骋天地是决不会止于杭州市的。

章启迪兄是余姚丈亭人，高中与我一同毕业于余姚一中，但余姚时因不在同班而并不相识。启迪为人随和，与我个性相仿；我俩互相照应，走得最近。他的学习交际能力都强于我，还与几位年轻老师有密切交往。毕业后教了几年书，即在家乡丈亭的余姚三中当校长直到退休。退休前家住著名余姚河姆渡遗址边，对遗址非常熟悉且有研究。启迪熟悉家乡，更是热爱家乡，曾写《校址文化》一书记录家乡风土人情，我省民俗学专家，也是原杭大写作教研室的吕洪年先生为此书作了序。启迪兄与老师和同学联系多，我每次回姚省母，总能在启迪口中得知杭大老师和同学的新鲜信息。

唐森灿，又一位从余姚一中出来的年兄。他气宇轩昂，才辩过人，最博彩声。读高中时文理均佳，尤得数学老师器重。入大学后，他争强好胜，但也有这个底蕴，尤其对文艺理论和现代文学的创作争鸣动态和专题，一直都是了如指掌。若在正常年景，毕业留系做一文艺理论或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若干年后必成这些领域的卓著专家学者。只是天意难问，毕业后，先是分配在杭州某中学当教师，几年后调杭州市委机关、市人大机关供职，工作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因文笔好而才思敏捷，又有理论底蕴，做“命题作文”更是拿手戏，所以他一直工作在市人大。至于在里面的升迁，反正说我听我也不懂，因为此地不是小池塘。杭大培养人才，唐兄是一佼佼者。

半世纪后温旧梦

—杭州大学中文系 62 级 毛五星

从 1968 年到 2017 年，从跨出杭大校门到今天，整整过了半个世纪。其间，从教 30 年，退休 20 年，现在已进入耄耋之年了。

回顾 1962 年能够进入杭大中文系，这太不容易了。首先是我家里困难。我哥 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我小学就辍过学。1953 年考入初中，读了一年又停学。因为父亲已 60 多岁。父亲以前在乡村私塾教书，农业劳动缺乏体力，就让我停学务农。我经历了农村单干、初级社、高级社。1956 年初被邻村叫去当高级社会会计，工资照社里最高劳动力收入，每月 9 元。初出茅庐，工作认真，我在这年入了党。我哥回家探亲，回部队缺乏路费，到邻村来找我。我向社里要求提前领工资，得到同意。领出 20 元交给哥。到年底，我哥来信说：“如果你仍想读书，那就去读吧。”父母为了我的前途，也同意了。1957 年初，赤岸戴帽初中招 4 名插班生。11 人参加考试，我被录取了。我哥的信，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此我哥部队发的津贴，要负责老年父母和他妻儿的生活费，还要给我寄钱。

我们尚阳村是个大村子，我家是典型贫困户。我能上大学，顺理成章又成了翻身户。村里开展教育时，把我家实情画成画幅，陈列实物，在村里作宣传。

学生时代，我是党员，更应懂得感恩；家庭贫困，更要发奋读书。读中文系，也是我爱好的。我家有部《聊斋志异》，辍学时凭兴趣阅读，不懂就问父亲，颇能获益，从此爱读文言文。

大学生活最值得回忆是一二年级。1962 年，我觉得全国高校教与学的风气都有好转。在初、高中搞勤工俭学，有劳动过多现象。珍惜上大学机会，静下心来，学习专业知识。听到同学们读过很多中外名著，我很羡慕，也很着急。而我最喜欢的功课是古代文选和古汉语知识。课堂里，班级人数少，听课很静。自修课，自己找个教室坐下自修。作业不多，学得主动，跟中学时代截然不同。

大二时，同寝室 6 人，有 4 位是杭州人，我与仲坚来自义乌、诸暨。仲坚是古文课代表，他竟有两部《古文观止》，我就要求他转让一部。有时课外活动也下盘象棋，仲坚很会算计，总占上风。炳勋做事很细致，很爱干净。他家在七堡，看潮好地方。记得他家里弹棉花，曾帮我弹过被胎，烦他拿去拿回。秉法和气、天真，会懒床，少于言谈。宗兴常练歌喉，“乌苏里江”似乎接近专业。天冷，他还把一件厚衣服给我穿了好多天，感激他的关心。中和时间利用率很高，自修效果大概会很好的。对小组和班里逝去的几位同学，还有老师，我每每想起就悲痛；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心里长存。

1962 年高校招生，全国仅招 12 万。是困难时期，招生宣传 4 个字：“宁缺毋滥”。从我班同学看，质量是好的。从工作到退休。没有负面传闻。我们义乌 3 人，偏于老实巴交。阿朱较活泼，但并不“滑头”。当年分配工作，义乌有一个名额，他和炫亮宁可到东阳、金华，让我回义乌。对此，我至今对朱政、炫亮心存感激。

当年在班里，爱听崇明读报读文件，她普通话读音特准，令我羡慕不已。有段时间我曾学明煊的字，他的钢笔字横平竖直，方正漂亮。有一张他填的表格，经他同意，我代抄一张上交，把他的“真迹”留下作范本，有意描摹练习。但离校后这范本弄丢了，可惜。圣谟的字稍狭长，而笔划紧凑，结实好看，自成一体。

大学生活，迄今印象非常好的是班委中杭州同学组织的课外活动，每学期游几个景点。玉泉、黄龙洞、岳坟、灵隐、苏堤、湖心亭、六和塔等。也曾看日出，观大潮。游过好多地方，这对外地同学来说，格外新鲜，留恋。集体活动后，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去了。我最喜欢去的是黄龙洞，再翻过栖霞岭到岳坟、白堤，经孤山、松木场返回。或由松木场这边出去，到湖滨、儿童公园、柳浪闻莺，然后返回。那时不敢逛书店，工作以后，特别是退休后，向平愿了，才常进书店，俸去书来，随心所欲。黄龙洞离校最近，且它后面的栖霞岭，真是百走不厌。那高大的古树，布满绿苔的石级，路边黯黑的岩石、紫云洞，是典型的古道。城居而走古道，呼吸潮湿的空气，弥漫草木的清香，也领略了“鸟鸣山更幽”的境界。有时站在灵隐寺前，看那飞来峰，

那些白而略带黑的玲珑的岩石，那些从石缝中长出来的树木，两者苍老奇绝。如果稍有白描知识，画出几幅，挂在房内，供年老卧游，该有多好！杭州的山水，经过千百年的养育、保护，才呈现出今天的绚丽多彩。

大学一二年级能静心读书，第3年下乡搞“四清”，后来发生文革，班级从此散了。但即使过了半个世纪，大家还能在杭城聚首，这全是林崇明、唐森灿等同学不辞辛劳，一次次筹备同学会的结果。我只参加过杭州全年级集会、诸暨、金华这几次。如今互联网时代，“大学微信会”应运而生。在这人生老境，还能遇上这等新鲜事，实属幸运。提议每人写点文字，汇成一册，这主意非常好，很有意义。

1997年，我夫妻俩同年退休，起初住到城里儿子家。我那时闲不住，外出打工：到中学代课，到旅游局写义乌旅游志。后来我俩定居佛堂古镇道院山脚。一边是繁华街道，一边是道院山公园，可谓是城居而尽享山林之乐。卧室较大，有25平米，集睡觉、读书、看电视、电脑和储藏四大功能。书桌临南窗，窗下有小块绿化园地，有桂花、枇杷、腊梅各一株。两年前我移来四棵绿竹，现已长出数棵新竹。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或不无道理。手机文字细密，自觉不能久看。不喜逛街，也不爱外出旅游。读点闲书，如历代小说笔记之类。倦了，拉几首二胡小调，自娱自乐。我俩一直坚持掘地种菜，在野外菜地，沐浴阳光下，四周绿色，内心宁静。挥动锄头出点汗，路上与农民闲聊几句，回家洗个热水澡，体会到什么叫“舒服”。钓鱼的人，觉得钓鱼比吃鱼有趣。同样，自种蔬菜，齿颊留香，而种的过程，更富情趣。这时候，让我们再去重温吴伯箫的《菜园小记》，令人不饮而醉。

附七律二首：

闲 趣

作息随心度晚年，逍遥自在赛神仙。
薪资略有堪怡日，余事全无为灌园。

窗前街市人忙碌，屋外林园鸟唱闲。
浏览图书嫌日短，老妻奔走备春筵。

（2018年2月）

游道院山公园

四月暮春笼晚霞，莺飞草长遍山花。
杜蕾绛艳无蜂蝶，樟桂茂繁有雀鸦。
亭榭权当聊话室，儿童自是乐欢家。
绿林最喜迎新竹，湖绕人群莫惊哗。

（2018年4月）

[返回目录](#)

我的杭大记忆

—杭州大学地理系 93 级 金培

转眼离开杭大已二十一年。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好像自己突然失去了母校，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那种悲伤、愤懑甚至带点自嘲的心情，好久都没办法缓解。去年毕业二十周年，约了六七个同学到杭大后门小宾馆住了一晚，喝了酒、发了疯、流了泪，第二天早上起来进校园逛了一圈，怀念了当年的人和事，感叹了一番物是人非，然后又带着莫名的情绪各奔东西。

说起考进杭大，也是冥冥中自有注定。我家兄弟两个，我哥大我两岁，大学是在山西太原读的。然后每次去学校，就好像行军打仗一样，先坐车去义乌，然后挤火车，再去上海转车，再坐两天的火车到太原。我曾经目睹了我爸从车窗里把我哥塞进火车车厢，甚感恐惧。所以高考考完后，除去重点大学志愿外，我的其他志愿一溜烟全部填了杭大，无他，实在是不想出省，出省就要坐火车，坐火车就要被我爸从车窗塞进去，心里有阴影啊。等了好多天，大学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至今，我还记得高考通知书送到家的情形，“杭州大学地理系天气动力学专业”……我当时就懵了，这是啥玩意？好像有点高大上啊，咱农村人都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家里连个电话都没有，我老爸费尽力气，找了好多人问明白，敢情就是“气象”专业啊，这专业名字取的。包括后来上了大学，“地理系”改名叫“资源与环境工程系”，也是云里雾里了。

初入杭大，是有点小小的失望的。校园不大，起码没有想象中的大，倒是校门口迎接新生的热情师姐们让我脸红好久。后来读到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方若有所思。那时候的杭大气象专业，还是有很多牛人的。如教“动力气象”的黄安丽老师，闭着眼睛都能推导复杂的气象动力学方程组；教“天气学原理”的高坤老师，严肃且一丝不苟，当年这门课我考了 98 分被他特意表扬，也是小小的骄傲了；还有当时的系书记翟国庆老师，

还亲力亲为给学生教“雷达气象”课；教概率统计的姚隶荣老师，据说业余时间练气功的，上课时两只小眼睛放出慑人光芒。另外还有一对老夫妻，施公望和李毓芳教授，都很牛 X，常年轮流到美国交流研究，偶尔回来带一带学生。其他很多老师也都是各具特色，周钦华老师说一口难懂的宁波普通话，吉林来的几个同学根本就听不懂；教“农业气象”的周子康老师为人非常和善，对学生很好；还有教“环境气象”的徐二女老师，快退休了依然风姿绰约。当时气象在国内是比较冷门的，在国外倒是比较热，特别是搞数值预报研究的。记得大学四年换了好多班主任，第一个班主任在大一第二学期就去了日本，后来又有一个去了美国搞研究。最后一个班主任是钟国林老师，也很牛气，学理科的跨界去考了一个律师证，实在让人讶异。说起气象专业的各种课程，就一个字：难。后来我们经常跟人吹嘘，物理跟物理系一起上课，数学跟数学系一起上课，至于专业课，更是难上加难，以至于“流体力学”课上了半个学期实在上不下去了，又因为老师的突然出国，只好不了了之，连考试都没考。最后哭笑不得地怀念一下李林老师，他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从开始做论文开始，就没有指导过，只是扔给我一堆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本厚厚的专业英文资料，说弄懂了再写论文。我用我可怜的专业英语费了老大劲把资料翻译完毕，结果发现：李林老师不见了，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出国了，把我这个可怜的学生抛弃了。可我的毕业论文还没有写完啊，没办法，我只好自己根据翻译的一堆资料堆砌了一篇论文，题目大意好像是“两种数值预报模式对暴雨预报的比较研究”。幸好他的老师也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气象牛人李毓芳教授刚好回国，李林老师突然记起我这个学生委托她继续给我论文指导，才让我顺利完成论文答辩拿到学位。李毓芳教授居然对我的论文大加赞赏（实在汗颜，里面很多观点都是国外的研究），鼓励我继续研究。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论文题目放在十年后也是气象学上研究的热门之一，李林老师心也真是够大的。

地理系原本也算大系，及至我们入学，已经没落，只能听师兄们怀念一下曾经的荣光。地理系的大本营在东二教学楼，那是一栋典型

苏联风格的建筑，外面黄墙黑瓦，里面阴暗逼仄，晚自习都不愿意去，深夜里走在大楼里面，脚步声回音很响，胆小的人要三步并两步快跑。我们气象专业人丁稀少，总共 20 人，16 个男生、4 个女生。男生住在 12 幢，刚好两个寝室，女生住哪就不知道了，因为没去过。说起同学们，有意思的事情多了，反正四年时间留下各种笑话。来自新昌的王永铭普通话不标准，第一次喊下铺的“余健”名字就变成了“有钱”，把“袋鼠”说成“台鼠”；来自湖州的小胖，喝酒很快，然后不动声色地就倒了，我们 7 个男生把他送去医院，刚好碰到深夜学校大门关闭，只好集体把他从大门顶上像尸体一样抬过去；来自海南的符琼，爱好踢足球弹吉他；来自吉林的田中臣，典型的东北大汉，却偏生喜欢读言情小说，爱好写字写诗；同样来自吉林的常铮，算是风云人物，一副江湖大哥的派头，现在回忆起来只剩下每个月月底在铁架床的缝隙里找烟头抽的往事；还有爱听张国荣的余健、爱学习的周敬荣、爱打篮球的黄暄、爱玩游戏的黄启以及温文儒雅的海峰等同学。我是班里不显山露水的一个，成绩算不得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差，上课也不怎么积极，社团活动也不参加，在各科老师眼里也是若有若无的那种，每次考试都靠半个多月的自习室突击，至于毕业时评了个优秀毕业生并拿到留杭资格的“红卡”，纯属侥幸。但最终还是没有留杭回到家乡，则是后话。

印象深刻的是杭大浓厚的人文氛围，各种社团活动轰轰烈烈。记得刚入学没几天，就有师兄师姐上门登记兴趣爱好，我因为两个字写得还算拿得出手，居然莫名其妙就进了一个书法社团，还给我发了个证，但我好像没有参加过一次活动，所以到现在连社团的名字都没回忆起来，不过我想那些书法大咖们大概也没把我这样的小虾米放在心上吧。及至后来，因为会写两句歪诗，又给我弄了个什么系学生会干事，可我到毕业也没为学生会干什么事，“干事”却没干什么事，心里很是愧疚。真正伴随我大学四年业余生活的其实是足球，被高中压抑了三年的足球热情在大学里得到爆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启了二十多年的野球生涯。那个年代杭大足球算是浙江高校足球的翘楚，出了好多名人，同届印象最深的是外语系的周伟，练田径出身，身体

素质好、爆发力强，技术一流。教我们体育课的是朱国华老师，也算浙江的足球元老了，也是我足球的启蒙老师，这些年我参加全省中青年足球邀请赛还经常能碰到他，看上去一点都没变老，一起抽根烟、喝杯酒，当年大学里的往事瞬间就蜂拥而来。足球不仅让我充分享受了大学生涯的乐趣，更是让我结交了外系的好多朋友，如旅游系的吕明，天津人，戴个眼镜，算是我大学死党，个子不大，急停急转是他踢球的绝技，毕业以后有次我去北京出差还专门绕到天津去看他。说到这里，不禁想吐槽一下当年的杭大学校医院，我因为踢球时眼睛被足球砸伤，结果在医院被误诊延误了一个多星期，后来转到省中医院治了整整一年多才治好，而且导致我视力大幅度下降。

说到大学，有句俗话说“没有谈过恋爱的大学是不完整的大学”。杭大作为综合性大学在这方面优势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文科类的院系女生资源多，气质好，成为男生们暗中爱慕的对象。平日里校园里三三两两的恋爱人群展示着大学的青春活力，而夜晚婆娑的大树旁，昏暗的路灯下依偎的影子更是给了校园另一种浪漫。我也曾经在这里经历了初恋，一个善良美丽温柔的女生给了我三年多的美好大学时光，一直都不能忘，以至于大学毕业以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怀念这段感情，发在当时比较热的文学网站“榕树下”。我们班是理科班，倒没有其他人谈校园恋爱了，有两三位好像是跟高中同学在谈异地恋。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那个年代，大家普遍比较穷，生活困顿，所以大学业余生活大抵是靠运动、打牌、看录像、看小说度过的。我们一个寝室 8 个人经常分成两组围坐在桌子上光着膀子打双扣，宣泄着青春期的荷尔蒙。后来不知道谁从哪里搞来一个 12 寸的黑白小电视机看满是雪花点的电视，日子也是过得心满意足。至于录像厅那是常客，比较有名的是“文苑”和“银苑”，当年播放周润发的片子“英雄本色”引起轰动，录像厅一票难求，甚至连过道都站满了狂热的影迷。那时候人手一个单放机，条件好点的是爱华、索尼，要好几百，条件差点的就是学校统一发的用来听英语听力的杂牌。听的歌基本上都是以张国荣、张学友、刘德华、黄家驹等为代表的港台歌曲，后面兴起了以老狼为代表的校园民谣，以及崔健、黑豹等的摇滚。前两天在金华听

张学友经典歌曲巡回演唱会，“吻别”、“祝福”、“只想一生跟你走”等经典曲目纷至沓来，恍惚间，我又想起了大学时光。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杭大，一所快要被世间遗忘但仍被所有杭大学子们深刻怀念的大学。这里留下了我的青春，留下了我的初恋，却赠与了我受用一生的学识和直面困难的勇气。当年曾是轻狂年少、热血沸腾，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华发初生。曾经多少次梦回校园，想看一看老旧的东二教学楼，看一看睡了四年的114宿舍，看一看洒满汗水的足球场，看一看驻足等待心爱姑娘的篮球场……不经意间，我们已经在回忆里老去。

最后，谨以这首歌献给所有的杭大兄弟姐妹们，以表怀念：

“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留下的脚印拼成一幅画，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

[返回目录](#)

风雨杭大路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叶子南

上世纪 70 年代，我有一次从绍兴到杭州，去见外文书店的徐淮先生。我们因购书常有书信往来，却未曾谋面。

忘了那天走的是哪条路，也忘了是前往书店的途中，还是返回绍兴的路上，只记得公共汽车途经天目山路，我看到路旁一排灰砖楼房，车上的人说，那是杭州大学的宿舍。

我看到沿街的楼房窗户有的开着，窗外挂着衣服，还隐约看到有人站在窗口晒太阳。我心想，我为什么就不能到这所大学念书？心中充满了羡慕，也有一丝不平。但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七八年后，从其中一幢楼房的窗户探出身来晒衣服的人可能正是我。不过当时，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尽管我十分努力，前途却依旧渺茫。那次杭州之行大概发生在 1974 或 1975 年的冬季。

我自“文革”初十七八岁起就迷恋英语，四处寻找自学的材料，还获赠了几本“文革”前杭大外语系的英语教材。自学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内容，特别是文学课文，难度比较大，在农村又没有可请教的人，也不能频繁进城问老师，所以后来就没能全面提高英语水平，而是把有限的英语用到翻译实践中去了。于是自 1970 年起，我就开始翻译医学文献，一直到 1978 年春进杭大停止。

有人也许会问，自学那么点儿英语能够用吗？其实翻译医学文献专业要求高，对英语要求反倒不算苛刻。如果对所译内容较熟悉，文句的理解相对还算容易。当时不少医大毕业的医生也在翻译医学文献，他们中除个别佼佼者，大部分人的英语水平有限，但靠着专业知识，大多数句子都能理解，个别难理解的，也能蒙对不少。我那次去杭州就是想购买些和医学翻译相关的材料，同时结识一下徐淮。

从杭州回到绍兴后，我继续在公社中学教书。当时已恢复了英语课程。我教高中英语，教学之余，还翻译些医学文献。天目山路旁一闪而过的杭州大学，搅动了我心中的一湖静水。本来我在翻译中寻求

满足，每有一篇译文发表，就能让我的出版欲得到一次满足。虽然当时没有稿费，但每发一次稿，我仅存的希望就像瓶中的水，再次回到原来的水平，尽管水已接近瓶底。

就这样，在希望渺茫的年代里，那一篇篇的译文不停地在添柴加薪，我的希望之火也就没有熄灭。就像有人借杯酒长精神一样，我靠翻译支撑着那个海市蜃楼般的希望。但自那次路过杭州大学，我开始反思医学翻译的不足，意识到必须提高英语基础知识，不能满足于译文的发表。于是业余时间又捡起了那几本已搁置多时的杭大英语教材。

但重拾这些书本，并不是为任何具体的目标做准备，甚至不是为一个模糊的目标磨一剑，那是一种茫无目标的摩拳擦掌，是没有演出排期却仍不敢松懈的练功吊嗓，因为在那段岁月里，没有人知道我们这批人的未来。上调回城的人当然有，甚至还有去读大学的，但对于为数众多的青年人，这些出路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正是在这样的境遇里，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一条更务实的路，而我却远离了一起下乡的伙伴，朝一个在当时看来“最不接地气”目标驶去，在学外语和做翻译的航道上摸索前行。只是现在心中多了一个“干扰”，天目山路边的杭州大学。

我带着没有期盼却也不无热情的心境，又在皇甫公社度过了几个春秋，终于在1976年迎来了政治舞台上的戏剧性变化。在这颠覆性的转变中，直接影响我生活的就是次年恢复高考的大事件。

记得这个消息是在1977年9月份传开的，10月份就有了具体的部署，目标是新生在第二年3月入学。如此大规模的考试，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备完成，足见主政者的决心和执行者的能力。同时也说明，中国人只要给他机会，做起教育来是从不含糊的，因为这是民族文化使然。

我觉得这回机会来了，就和公社以及学校的领导讲了我的愿望，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校长杨乃浚老师也非常激动，觉得这回可能真是我“咸鱼翻生”的时候了。“文革”前我只读过两年初中，很多功课都没修过，于是我的同事金烈侯老师就帮我复习数学。

高考大约是在那年的12月，很多细节都忘记了。只记得皇甫公社考生必须到区所在地马山去考试。我的考试座位是在马山中学大礼堂的舞台上，因为考的人多，台下座位不够，只好把一些考试用的桌椅放到台上。全部科目考完后我心情大好，下午居然没有乘船回皇甫，而是沿着田间石板小路哼着小调走回去的，应该有二十多里路呢！

我安心等待结果，但其实并不安心。仅从考试看，我不担心会落榜。数学是差了点，但我自信文科成绩定会把平均分拉上来，加上我发表的大量译文也肯定会加分。但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仍未完全摆脱“文革”，思想开放的程度甚至还停留在“文革”前，录取时还不能彻底排除家庭出身这个因素，而我的家庭出身显然是会拖后腿的。

在焦急中，我不动声色，照旧改作业、备课、讲课、唱歌、打乒乓球，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突然有一天，有人说公社党委的文书谢和兴在四处找我。我知道他带来的应该就是我焦急等待的消息。皇甫公社九年的艰难生活，就在我拆开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结束了。

成功者因自己的努力而成功，却也常靠机缘巧合。比如一个1966年毕业于的高中生，十多年后成了77级大学生，这迟到十年的成功里面，当然有他自己的汗水，但他一定也记得，十多年前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把刚到他嘴边的果实给夺走了。

那时他肯定也为考大学努力过，但个人的努力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人的一生，无可奈何的地方太多，常被时代的潮流冲来冲去，就算你运气不错，在潮流中躲过了急流险滩，混得风生水起，但也不用往自己脸上涂抹太多的金粉。

比如拿我来说，自己曾努力拼搏不假，但在这顶风冒雨的杭大路上，在日后求职糊口的过程中，机缘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也许可以说，自己的一点努力，再加上风云际会，甚至鬼使神差，才让我有幸坐在杭大的课堂上，听老师们谈文学、讲语法、说翻译，还有幸被外教捷斯基的朗诵感动，才让我日后在大洋彼岸，把在风雨杭大路上的所学所得讲给我的学生听，而这些学生大概也是因自己的努力，加上风云际会或是鬼使神差，坐在了大洋彼岸蒙特雷小城的教室里。

时过境迁，那所屹立在天目山路旁，曾搅动我平静的心湖，激起我无限向往的杭州大学，已经早就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之中了。有人对促成杭大消失的“四校合并”耿耿于怀，一直想着要恢复老杭大，但那毕竟是覆水难收。

学校的命运难道不像我们个人的命运？过去的事还是就让它过去吧。对于曾在杭大学习过的人来说，在记忆中存下当年生活的点滴，在脑海里留住老师的背影、同学的笑容，还有那牵引我们步月前行的校园小径，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2018年5月4日）

（本文摘自叶子南著《蒙特雷随笔》，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

[返回目录](#)

一张老照片里的大学记忆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岳耀勇

离开校园之后，教师节就和我没有多大关系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离“教师”这个词越来越远。最近，因为我的大学老师汤洵编撰的一本回忆录集，我又从脑海深处检拾起对曾经的老师的怀念。



两个月前，7月10日，在浙江图书馆报告厅，我组织了一场对本回忆录集《西溪路五十六号》的阅读分享会。分享会结束之后，有书友抱怨，时间太紧，没有听够。于是，我在两天前的这个教师节下午，又联合唯伊文化、“老杭大”微信公众号，做了一场《西溪路五十六号》阅读分享会杭大中文系校友专场，和我的同学及书友一起，追忆当年的先生们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

这个专场特意选在西溪路56号杭大新村围墙外的沿山河社区党员活动室进行。分享会之前，我的大学老师蒋祖怡的公子蒋绍心，带着参加活动的同学和书友参观了杭大新村，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这里曾经居住过哪些著名的学者教授。听着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一时间，这些破败陈旧的老房子，散发出神圣的人文光芒。



就在分享活动的前一天，杭州市政府批复同意“将杭大新村区域列为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有热心的公益组织准备开辟杭大新村历史文化街区半日游走读项目了，正在招募走读体验官。杭大新村、道古桥旧址、杭大留学生食堂、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坊、杭徽古道、方林富炒货店等等，这些老杭州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串联在一起，实在让人跃跃欲试。

在分享活动现场，作为杭大新村的原住民，我的大学老师汤洵谈起了他编撰这本回忆录集的初衷。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他住进了杭大新村，和左邻右舍的大师级老先生们日日朝夕为伍。在这些先生的教导熏染下，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位先生。他深深地感到，应该为这些老先生们树碑立传，将他们的学术建树、治学精神、高尚情操，作为一种精神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于是，虽然将近 80 高龄，他还是在女儿唯敏的协助下，完成了这部汇集原杭州大学 42 位老先生治学和生活故事的回忆录集。他说，这是他欠下的债，他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份传承先生之风的责任。

蒋绍心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祖怡的小儿子，今年已经 72 岁。1957 年杭大新村建成之时，他就随父亲搬了进来，一直住在这里。从童年时代到古稀之年，他的记忆一直留在杭大新村，舍不得离开，成为杭大新村兴衰的直接见证者。他报出来的那些大师名字，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王承绪、陈桥驿、陈立、陆维钊……，让我们依稀看到杭大新村曾经的辉煌。



为了做这场分享活动，我找出来一张 40 年前杭大中文系学生

剧社演出话剧《在酒楼上》时的合影（后排左一就是本人），并找来了合影中的 6 位同学。1981 年 9 月是鲁迅先生诞辰 100 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对于中文系师生来说非常重要的日子，当时的杭大中文系学生剧社排演了独幕话剧《在酒楼上》。这部话剧不仅在学校演出，还



到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浙江省纪念鲁迅先生百年诞辰的文艺演出。那是我们这些剧社同

学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专门从慈溪赶过来的陈红捷是我们 77 级同学，当年是中文系学生剧社的骨干演员（合影前排左一）。他清晰地记得 40 年前汤洵老师等来指导《在酒楼上》排演的细节。他在国土资源局长任上退休，所以用他的职业眼光说了一个观点：杭大新村总共占地面积 58.01 亩，却产出了那么多大师级的先生，从单位土地的产出效益来说，恐怕除了清华园、燕园之外，很少有地方可以匹敌了。

78 级的马华也是学生剧社的台柱子，当年的中文系学生会文艺部干事（合影前排右二）。大家的讨论勾起了他心底的回忆。他给文澜读书岛的书友们的唱起了《在酒楼上》中的小曲：“正月里来正月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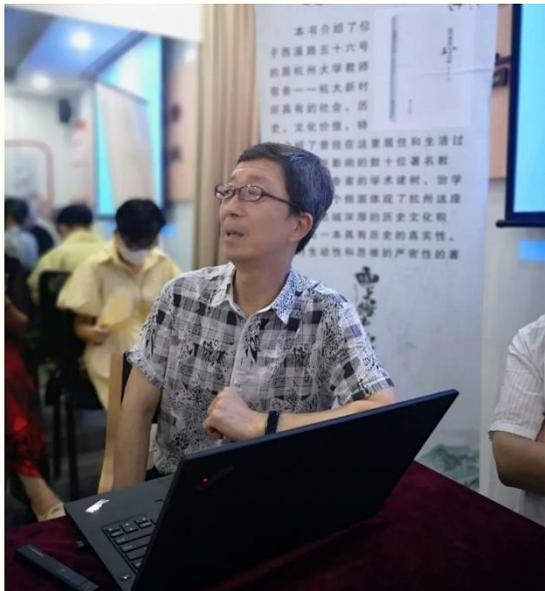


家家户户挂红灯。”他感慨地说，我们在大学里不仅仅学知识、学文化、学文学，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情怀。4 年大学生活，真正的专业学习没有留下很深刻的记忆，记忆最深刻的其实是业余的演戏生活。前几年我们 78 级要出一本书，我就写了一篇“我的

大学文艺生活”。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记忆。

我很赞成马华的说法。在大学里，先生给与学生的，不仅仅有专业知识、学习方式和治学态度，更有生活的情趣和人生的豁达。

杭大中文系素有演艺传统。汤洵老师就是60年代学生剧社的成员。他们演出的话剧《青春之歌》曾经登上省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他们告诉我们，学习戏剧，要到舞台上体验。学习文学，要到人生中感悟。从书本到书本，学不到文学和戏剧的精髓。这些理念和话语，我们至今受用无穷。



因为有像汤洵这样的老师，我们的大学生活是丰富的，快乐的。我们感悟到，中文系不是故纸堆，中文系的学子不该成为老夫子，而应该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



所以，在分享会上，我和陈红捷、马华，还有王自亮、余刚、卫军英、张子帆、徐敏诸位同学一起，为汤洵老师献上了一束鲜花。在老师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学生。

（原载“文澜读书岛”）

[返回目录](#)

找到回家的路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岳耀勇

（2021 年 7 月 11 日）

昨天（2021 年 7 月 10 日）下午，文澜读书岛的第 84 期活动是一场特别阅读分享会，分享了我的大学老师汤洵和他女儿唯敏编撰的回忆录集《西溪路五十六号》。

3 年多前，2018 年 1 月 20 日，文澜读书岛的第 7 期活动，分享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回忆 40 年前高考的《120 个回望》。那本书记录了我们参加高考走进杭州大学的心路历程。而这本《西溪路五十六号》正是那本《120 个回望》的前传和后传。前传是讲述我们高考之前 1958 年杭州大学诞生以后的故事，后传是介绍我们高考之后求学的经历。

西溪路 56 号，原本只是杭州的一个普通门牌号码，但因为这里曾经居住着原杭州大学的几十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而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了杭州市的历史建筑。



1956年，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在松木场另辟新址建造校舍和教师宿舍，其中教师宿舍建设在西溪路南北。1958年，浙江省政府决定把浙江师范学院合并入新成立不久的杭州大学，刚建好的西溪路教师宿舍就成为杭州大学的教师宿舍。1957年和1958年，先后建成宿舍楼14幢。后来又陆续扩建，迄今在西溪路南北有宿舍30余幢。1982年，杭州市地名委员会将这片教师宿舍命名为杭大新村，新村大门的门牌号码是西溪路56号。因为隔着沿山河和杭州大学校舍相望，又被杭州大学的师生们称为“河南宿舍”。2008年8月，杭大新村建筑群被杭州市政府公布为第四批历史建筑，认为该建筑“反映近代建筑演进的历史脉络”。



从1958年开始，先后有几十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住进了杭大新村，如一代词宗夏承焘、著名敦煌学家姜亮夫、著名文史学家王驾吾、我国工业心理学创始人陈立、著名古希腊哲学家严群、著名数学家白正国、中国近代分析化学开创人王琏、中国比较教育学创始人王承绪、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等。他们在这里开展学术研究，著书立说，教书育人，释疑解惑，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使这个普普通通的教师宿舍大院承载了这些老先生的文人情怀和治学精神，成为一代一代的杭州大学学子乃至杭州市民仰慕的知识殿堂和指路明灯。

今年 4 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大学老师汤洵和他女儿唯敏编撰的回忆录集《西溪路五十六号》，讲述了居住在杭大新村的 42 位老先生的治学和生活故事。我作为杭大的毕业生和汤洵老师的学生，当仁不让地组织了第一场《西溪路五十六号》的阅读分享会。



昨天的这场分享会由文澜读书岛、钱塘文化、我们读诗和唯伊文化共同主办，主题为“思远山：杭大新村里的先生之风”，意图通过杭大校友的讲述，追思山高水长绵延不绝的先生之风，弘扬母校传承给我们的优良学风和文化精神。



原杭大校长薛艳庄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居然有那么多校友来到了昨天下午的读书岛活动现场。我们的老校长、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薛艳庄，今年已经整整 91 岁。她从 1958 年杭州大学成立到 1998 年四校合并，一直在杭大工作，对杭大充满感情。所以，她不仅为《西溪路五十六号》作序，而且亲临活动现场，上台讲述她眼里的杭大老先生。昨天现场第二高龄的，是曾经担任过杭大校长助理、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的杨树标教授，今年已经 85 岁了。他在台上讲起当年这些老先生作出的学术贡献，讲起当年杭大的辉煌，依旧激动不已。

因为这本《西溪路五十六号》，100 多位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杭大校友汇聚在浙江图书馆报告厅，一起回忆共同的母校，共同的先生，场面蔚为壮观。就像我的历史系校友张克夫在这本书的荐文里所写，“如今，杭州大学已不复存在，杭大新村已人去楼空，鸿儒先师相继离我们远去，唯有先生的身影一直留在我们脑海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终生受教。师恩如山，从不敢忘！”



分享活动开始前，有一位书友问我，作者汤洵是我的什么老师？我说，是我大学的写作课老师啊！因为“老师”这个词如今用得太多了，听过一次讲座就可以称为老师，所以搞不明白“老师”的确切含义可以理解。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大学四年，造就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正如张克夫所言，师恩如山，从不敢忘。所以，我要抢先承办《西溪路五十六号》的阅读分享会，期望把我们老师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书友听。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母校。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母校而骄傲。我们这些杭州大学毕业的校友们亦是如此，始终怀着对母校和先生的无尽眷恋。当我听到活动开始播放的视频上汤洵老师说的那句话，“你只要找到了西溪路 56 号，你就找到了自己回家的路”，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愿以一个杭大学子的身份，与校友们共同弘扬母校传承给我们的优良学风和文化精神，为我们身处的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

[返回目录](#)

“杭大”在哪里？

——题杭大人出版社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施建基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路标里。宝石山下，黄龙一脉，文教胜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新村里。道古桥边，历史街区，年轮刻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民宿里。古刹钟声，径山深处，心有成蹊。

杭大在哪里？在西溪校园里。求是育英，千钧校训，百年桃李。

杭大在哪里？在万人履历里。饱经岁月，遍走四海，徽证如一。

杭大在哪里？在微信电波里。五洲同频，日夜泉涌，永不消逝。

杭大在哪里？在光影绘画里。青葱翠莲，冰天烈焰，长情醉忆。

杭大在哪里？在心里，在梦里，在眼里，在远方和诗里……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1-970152-41-8